



钱俊瑞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钱俊瑞像



自 传

我于1908年9月28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东乡洪声里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曾当过长工和佃、贫农；后来自已置了两亩多地，加上租地耕种，并在桑叶市场上兼当中间人，还开设过石灰行（兼卖砖瓦），经济地位上升为中农兼小商贩。

我在少年时代上过私塾，后进入洪声小学和江苏省第三师范附属小学（高小）就读。由于家境困难，我一边读书，一边由母亲带着干些农活。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交租，绰号“铁算盘”和“小锉刀”的地主钱树元嫌租米“太糙”，一脚把米踢翻，还大声怒喝，打了我父亲两记耳光。父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还了手，随即带着我逃跑，但第二天就被警察抓去坐牢。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1919年五四运动传到无锡乡下，我们小学生们在小街上参加游行，高呼反日口号，抵制东洋货，激发了我的爱国思想。

1922年，我高小毕业，升入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期间，一面学习，一面兼任图书馆干事，我看了不少书，研读了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名著，开始接受了一点进步思想的影响，十七岁时曾写了一篇评论法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所著《形而上学导言》的文章，登在校刊上。1926年，我在国



民革命大好形势下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喜气洋洋，迎接北伐军，到农村宣传，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作后，即被清除出国民党。

1927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到无锡县立初中附小当教师。当时，正值江苏省举办民众教育学院。我受陶行知先生思想的影响，决心投入大众教育运动，于1928年考入无锡民众教育学院。入院后到黄巷实验区（黄巷是丽新布厂的工人居住村）从事工人教育工作。教育救国思想，逐渐让位于革命思想，遂为工厂大老板杨翰西所不容，最后就于1930年离开了黄巷，去上海参加农村经济研究工作。

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组负责人陈翰笙（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来无锡，组织一批革命青年，开展对我国农村的经济调查。我经王寅生介绍，认识了陈翰笙，并参加了他所领导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共调查了22个农村。1930年又去河北调查了保定18个农村。其他同志又在江苏宝山、河南许昌、山东潍县、陕北榆林、安徽二十里堡以及广东的若干个县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边调查，边学习。先学习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何上肇的《经济学大纲》，1931年以后又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考茨基的《土地问题》等著作，努力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我参加了上述调查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参加编写《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亩的差异》和《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等专著。

在对这些调查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1932年我写了一篇《一九三一年大水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刊于《新创造》，这是我在农村经济问题上的处女作。其后又写了《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中国地租的本质》、《评卜凯



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等几篇论文。1934年我参加了以陈翰笙、吴觉农等同志为主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接着又先后组织了“中国经济情报社”和“文化资料供应所”，调查研究整个中国经济问题。1936年，我写了《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阐述了研究中国经济的科学方法。特别强调按阶级观点，进行实地调查，掌握大量资料，由此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农村经济研究工作，最初由于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先生的掩护和默认，得以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后来影响扩大，便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为了加强控制，于1932年勒令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并任命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傅斯年为所长。傅一上台，便竭力排挤左派。1933年，我被社会科学研究所除名，自南京返回上海，经陈翰笙介绍，到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同年参加了“苏联之友”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始与邹韬奋、胡愈之、金仲华、曹亮、张仲实、艾思奇等人接触并共事。

1934年，我党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大破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移到苏区，但中央文委一部分同志仍被掩护着留在上海。30年代初，在中央文委领导下，组织起左联、社联、影联、剧联、美联、教联等革命文化团体，并组成“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作为总的领导机构。1935年由胡乔木任“文总”书记，邓洁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1935年9月，我经周扬和胡乔木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文委委员。当时，周扬是文委书记，夏衍、胡乔木、钱亦石、曹亮等为委员。

三十年代中期，我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参加各项活动。特



别是组织和从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1934年10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了会刊——《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编，我写了些文章，以陶直夫、周彬等为笔名，在月刊和其他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除上面提到的外，主要还有：《农作机械化的社会意义》、《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等等。我们这些人的文章力图用马列主义观点，阐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论证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批判歪曲中国社会性质，取消中国革命的托派分子（王宜昌、王毓铨、胡秋原之流）的理论和乡村建设派等掩盖阶级矛盾的错误理论。

我们组织“中国经济情报社”，调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我写了《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国防经济建设》两本小书。关于中国的金融货币问题曾与章乃器等人合作写了专著《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在报刊上又发表了《新币制的透视》、《国际货币战与中国币制改革》和《中国跌进英镑集团以后》等文章。

三十年代初，特别是三十年代中期，整个世界充满了火药味，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为了加强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的了解，在胡愈之主持下，我和金仲华、张仲实等以“苏联之友”社为基础，于1934年9月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该刊是我国最早以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介绍和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专门性杂志之一，至今仍在出版发行。在30年代该刊先后由钱亦石、张仲实、金仲华和我任主编，我们在这个刊物上，曾专门介绍过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有关世界经济的论述。我在这个刊物及其他报刊上，曾写了些社论和有关世界经济和



国际问题的文章，其中主要的有：《火药气下的世界景气》、《西班牙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保卫马德里》、《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展望》、《太平洋市场的争霸战》等。在这些文章中论述了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附属国的经济特征，分析了在加紧军备竞赛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动向，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必然爆发的经济基础。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战争的步伐。因此，我除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外，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该所的地下党负责人是张稼夫）组织人到徐家汇办工人夜校，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我参加了这一工作。当年10月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求党组织对我在长期实践中进行考察。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宋庆龄在上海领导救护伤兵的工作。我积极参与这一工作，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

1935年底，上海成立文化界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和我等被推为发起人；我任文化救国会的党团书记。同年我协助组织妇女界和职业界的救国会。

1936年，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相继创办了《永生》周刊和《现世界》杂志，我曾任这两个刊物的主编。

1936年8月底，陶行知代表全国救国联合会，我代表文化界救国会，陆瑾代表学生救国会和陈铭枢等组成中国人民代表团，参加了九月初在比京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接着，我受宋庆龄（她是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副主席；主席是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的委托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法



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在法国我还参加了全欧华侨救国大会，并同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参加了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反对佛朗哥的活动。为了推进抗日救国运动，我写了《给救亡同志的公开信》小册子。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我继续从事各种抗日活动。我当过‘全国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在党中央长江局领导下工作。上海沦陷后，我和邹韬奋、金仲华、沈兹九等辗转来到武汉，创办了《战地知识》和“战时书报供应所”，并和孙冶方、姜君辰等编辑《救亡手册》。武汉失守时，我由党中央长江局派遣，和胡绳、李伯余、刘江陵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人到襄樊，作为主任，主持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创办“鄂北日报”，广泛组织战地文化站、文化室，并利用合法地位帮助建立桐柏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初我到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人民外交工作，并促进民主宪政。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我写了《汪精卫卖国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及时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

1940年7月，我随叶挺军长自重庆到皖南新四军军部，组建战地文化服务处工作，并在军教导总队为军队干部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皖南事变后，我转到苏北根据地，任华中局文委书记，苏北文化协会理事长和《江淮日报》社长。在江淮日报上我写了一篇长文《论苏德战争》。接着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并在华中党校讲课，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3月，我从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奉党中央令派赴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随后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的代社长（社长是徐特立）兼总编辑，创办了《解放》三日刊。1946年4月3日，我和其他40多名报社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同志们在狱中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国民



党反动派被迫道歉认错，释放了全体被捕同志，我们乘车在东直门长安街作了游行宣传，受到北平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6年5月，我奉命自北平赴延安任党中央秘书。9月调《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任该报社论委员会主任。

1947年3月，在胡宗南率领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下，我军主动撤出延安，我随刘少奇、朱德、廖承志等同志经山西去河北，参加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担任党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同志为书记）当时派出的土改工作团之一的领队；接着下放任建屏县中共县委书记，并参加了中国土地法的起草工作；其后，出任华北大学教务长，校长是吴玉章同志，副校长是成仿吾、范文澜同志。

1949年2月，我以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随后，我又奉党中央之命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刘宁一因事未去），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我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在彭真、叶剑英同志领导下负责接管清华、北大、师范大学、燕京、辅仁等高等学校和各项文化教育机关。其后，协助董必武同志主持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工作。建国后，我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2年底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10月起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在教育部和文化部任职其间，我先后发表了《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用革命精神实施新学制》、《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和《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等文章，阐述了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政策。

建国后，我长期担任中苏友好协会的总干事、秘书长，协助刘少奇、宋庆龄会长，主持该会日常工作，曾多次赴苏和接



待苏联各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一些工作。

1956年我参加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我曾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在十年动乱时期我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押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获释放。

1978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到任后，我主持召开了两次世界经济科学规划会议，制订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把世界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筹建了世界经济资料中心。我参加发起建立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并被推选为该学会的会长；参加了《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建工作，并被任命为该报社社长。1980年后，我还兼任了国家计委顾问、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和大百科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从1983年起，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由浦山同志接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恢复工作以来，我主要从事世界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著述，集中力量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工作。近年来，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著有《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马克思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探索》等书，并主编了《世界经济概论》（上下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等专著。我还主编我国世界经济方面的工具书——《世界经济年鉴》。

几年来，我曾多次参加代表团，前往西欧、美国、日本、



印度考察各国经济，并在瑞士、美国、日本、西班牙参加国际会议，作学术讲演。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虽年逾古稀，仍将以有生之年，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继续效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



目 录

上 篇

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论

怎样研究中国经济…………… (3)

中国农村经济

一九三一年大水灾中

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 (71)

中国目下的农业恐慌…………… (99)

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的研究…………… (113)

土地所有的形态…………… (127)

中国本部两大区域的土地关系…………… (141)

中国地租的本质…………… (156)

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 (180)

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 (213)

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244)

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讨论…………… (260)



-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 (269)
谈谈“土地村有”…………… (300)

经济政策

- 中国国防经济建设…………… (309)
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动员…………… (354)
国民经济建设方案…………… (360)
论民生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乎？
社会主义乎？…………… (369)
中国货币制度往那里去…………… (404)

下 篇

世界经济研究

- 当前世界经济研究的根本任务…………… (437)
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世界经济科研
规划…………… (451)

世界经济学

- 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经济学而奋斗…………… (467)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探索…………… (487)
世界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 (674)



世界经济问题综述

- 80年代世界经济、中国经济
和中日经济关系展望…………… (683)

中国经济改革

- 中国经济的调整和改革…………… (701)
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性问题…………… (706)
认真改进我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722)
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730)
放开手脚，勇于改革，开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744)
关于对外开放战略的若干理论问题…………… (769)
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论“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英明构想…………… (779)



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论



怎样研究中国经济

第一章 第一步读《子夜》

这是个秋天的夜。秋虫在窗外唧唧的叫，朱永明一个儿在自修室里读茅盾的《子夜》。

永明的模样是怪严肃的，这显然跟别的同学读子夜之类小说的时候不同，他不是欣赏小说，而像要从书里面解决什么严重的问题。他正经到像在做算学。

朱永明刚才从家里来到学校里不久，他在家里可算整整纳闷了半个暑假。七月梢，学校是放暑假了，永明怀着无限的希望和热情，回到乡间，准备遵照全体同学的决议，进行农村救亡宣传的工作。他坐了轮船到家的时候，火热的太阳刚正下了地平线，夏晚可贵的凉风把人们一切的烦恼都吹散了。就在那时候，永明到了他的家乡，他沿着大田岸，走向他自己的村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大都赤着膊，摇着蒲扇在乘凉，一堆一堆的。这些人们，永明都熟悉，然而在那时，他们已经不是永明的什么堂叔，堂伯，伯母，侄子，堂兄堂弟了；他们在永明的眼睛里，简直个个是义勇军的游击队员，他们是在过着



打了胜仗过后的休息生活，他们手里的扇子，一柄柄都变成抵御敌人武器的盾牌。

永明这颗热烈的青年的心，是在快活地跳跃着。他一走到家乡，觉得学生会所分派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十之八九。农民要参加救亡运动，这还成什么问题吗？他心里胜利地想。

第二天早上，他就开始工作。他走到隔壁尊叔家里去闲谈，他告诉他们日本人如何强抢我东三省，如何叫我们同胞做亡国奴，如何要强抢我们全中国，这一大套。尊叔和婶子他们静听着，他们感觉到稀奇，像听《山海经》那样地听着。“所以”，永明接着说：“我们全中国的同胞应该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打××。做官的，当兵的，做生意的，做工的和我们的种田的，都要起来抗×！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永明说到这里，他扬起拳头兴奋得几乎像已经亲身在率领农民向民族敌人作战。

“不过，阿明，”尊叔打断他的话头，“这年头儿，我们一班子都完了，东洋人打来是这样，东洋人不打来也是这样。种田人有饭吃就算好，没饭吃就算倒运。谁给我们饭吃的就是我们的朋友，谁教我们没饭吃的就是我们的仇人。种田人不管东洋人不东洋人，我们只管要吃饭，……”

尊叔这段话，简直把永明浇上一背冷水，这把永明急得什么似的；喊道：“喂，尊叔，你不知道东洋人的毒辣吗？他们……”。他话还没有说完，早给尊叔抢了说去。“阿明，你们在学堂里看到东洋人，我们乡下人只看到东村朱老虎（是当地的大地主，兼放高利债）。

永明的眼睛向尊叔直瞪着没有话说；尊叔家的婶子却在怪尊叔多话，“明哥儿好好地吧新闻事体讲给我们听，你却这么多嘴！”



永明脸上却红里泛白，白里泛红，他觉得惭愧。他在学校里不是演讲台上的好角色吗？他一上台总是掌声满堂的。然而现在呢？他竟说服不了一个“无知无识”的种田人。他开始怀疑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农民到底受了什么害处？农民到底愿意不愿意抗日的？农民眼前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过去他们在学校里做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的话也有一部份对的，”永明静了好久才这么说，“不过日本人对我们的‘侵略’对农民也是有‘影响’的……”。尊叔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点头。这分明的是一种好意“敷衍”，这在永明是了解的。

夏天的骄阳已经升到半天，火般的天气叫人困闷得什么似的，永明有些烦恼了，这时到处叫得震天价响的螭蝉，几乎比日本帝国主义还要讨厌。永明懒洋洋地回到家里，提起笔来要向学校做工作报告。他更惭愧了，那不是个笑话，在一个“无知无识”的农夫面前碰了钉子？但他只得这样写：“今天早上到农民某家谈话，结果不甚好，因为……”永明越写越觉到打败仗后的苦闷。

你也许会想永明在第二，第三，第四……天的工作成绩或许会好得多吧。那我将告诉你，并没有！学校里收到他的报告，只见到些什么问题，什么困难。老实说吧，学校里从别的同学那边接到的报告，也都是那样。

夏天的天气一天一天地酷热起来，藏在永明心里的苦闷也一天一天厉害起来。他有时顿足骂那些农民是蠢豕，眼光不到一寸远，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民族。但有时却怜念他们的穷困，饥饿，在火烧般的太阳底下，爬在田里当牛马。他显然陷入不可拔的矛盾中了。他心里想，怎么我在学校里读了这么久的书，还不能解决这些日常的问题？教授们教了他们一大套的



政治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怎么对于这些最平常的问题碰都没有碰到？永明在恼怒那些农民之后，就开始怀疑他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来了。

“唔，我想到了，”永明顿悟般地自语着，“陈教授虽然不教我的课，同学们不是说他最清楚吗？我为什么不把这些实际的问题去问问他呢？”于是他马上动笔写信给陈教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必须立刻研究些什么，方始可以解释这些平常的然而却是难解决的问题？”

不到两天，陈教授的覆信跟着一阵初秋的细雨同时来到永明的村里，覆信写得很简单，陈教授教永明要研究一下中国经济问题。

“你第一步先要读矛盾的《子夜》”，陈教授肯定地写着。然而那时已经到了学校开学的时候了。

• • • • •

今天夜里。永明预计一定要把《子夜》读完，同时遵照陈教授的意见做札记。

永明在四天以内把《子夜》读完，真是件愉快的事，他感到自己的知识确乎丰富得多了。中国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们，有许多，永明是梦想都梦想不到的，然而陈教授告诉他这些都是反映着确确实实的事实。

永明开始做札记，内容分下面几项：

(A) 金融活动

“这年头儿，凡是手里有几文的，谁不钻在公债里翻斛斗？听说是各项债库卷一齐猛跌，各人（指那些做公债投机的人——钱）的心事便各人不同：‘空头’们高兴到张大了嘴巴笑，‘多头’们眼泪往肚子里吞。

‘公债又跌了！停板了！’



有人站在那边通到游廊去的门边高声喊叫。立刻从游廊上涌进一彪人，就是先前在那里嚷着‘標金’‘花紗’‘几两几钱’的那夥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向这边探一下，向那边挤一步，乱烘烘地问道：‘是关税么？’‘是编遣么？’‘是裁兵么？’”（页三九）

我们再看时局对於公债市场的影响，和投机商人的钩心斗角吧。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还想做多头。这几天公债的跌风果然是受了战事的影响，将来还可以望涨，但战事未必马上就可以结束吧？并且陇海平汉两路，中央军非常吃紧，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零星小户多头一齐出笼，你就尽量收，也抬不起票价。况且离本月交割期不过十来天，难道到期你想收货吗？那个，四百万现款也不够！……’

‘你说的是大家的看法。这中间还有奥妙！’

赵伯韬截住了杜竹斋（赵杜都是金融界巨子）的议论，很神秘地微笑着。杜竹斋仰起头来闭了眼睛，似乎很在那里用心思。他知道赵伯韬神通广大，最会放空气，又和军政界有联络，或许他得了秘密的军事消息么？然而不像。杜竹斋再睁开眼来，猛地看见赵伯韬的尖利而阴沈的眼光正射在自己脸上，於是突然一个转念在他脑筋上一跳：老赵本来是多头大户，交割期近，又夹着是旧历端午节，他一定感到恐慌，因而什么多头公司莫非是他的‘金蝉脱壳’计罢？……可是赵伯韬的回答却像一道闪电似地使他一跳：‘仲老担保，西北军马上就要退！本月份交割以前公债一定要回涨’！”（页四九……五〇）现在我们要看金融巨头怎样操纵国家的财政。

“‘慢点儿！我先讲老赵跟我们捣蛋的手段。他正在那里布置。他打算用内国公债维持会的名义电请政府禁止卖空！秋律



师从旁的地方打听了来：他们打算一面请财政部令饬中央中交各行，以及其他特许发行钞票的银行对于各项债卷的抵押和贴现，一律照办，不得推诿拒绝；一面请财政部令饬交易所，凡遇卖出期货的户头，都须预缴现货做担保，没有现货缴上去做担保，就一律不准抛空卖出。——’ ‘况且还有下文！老赵还直接去运动交易所理事会和经纪人会，丛愿他们即日发一个命令，要增加卖方的保证金呢！增加到一倍！’ ”（页五六〇）

公债和政府的财政本来有最密切的关系，你看“‘我们大家做编遣和裁兵。政府发行这两笔债，名义上是想法消弭战争，但是实在呢，这回的战争，就从这上头爆发了。战争一起，内地的盗匪就多了，共产党红军也加倍活动了，土财主都带了钱躲到上海来；现金集中上海，却好让政府再多发几千万公债。然而有钱就有仗打，有仗打，就是内地愈加乱做一团糟，内地愈乱，土财主带钱逃到上海来的也就愈加多，政府又可以多发公债——这就叫做发公债和打仗的连环套。老冯，现在应该明白了罢！别项生意碰到开火就该倒霉，做公债却是例外。包你打一千年的仗，公债生意就有一千年的兴隆茂旺！’ ”（页二三六）……。

（B）民族工业

金融家王和甫等收买了八个工厂准备赚钱，可是他：“‘前月里我们收进了八个厂，目前也为了战事不结束，长江客销不动，本街又碰着东洋厂家竞争，没有办法，只好收缩范围，改开半天了。——’ ‘哎！中国工业真是一落千丈，这半年来，天津的面粉业总算势力雄厚，坐中国第一把交椅的了，然而目前天津八个大厂倒有七个停工，剩下的一家也是三天两头歇！’ ”（页五〇二）



民族资本家对于军阀的内战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几位企业家对于雷参谋的敌意上面。

“‘到底打得怎样了？怎样了？’

雷参谋微微一笑，只给了个含糊的回答：‘大致和报纸上的消息差不多。’

‘那是天天说中央军打胜仗啰，然而市面的消息都说是这边不利。报纸上没有正确的消息，人心就更加恐慌。’一位四十多岁长着两撇鬍子的人说，声音异常高朗。雷参谋认得他是大兴煤矿公司的总经理王和甫；两年前雷参谋带一团兵驻扎河南某县的时候，曾经见过他。

大家都点头。对于王和甫的议论表同情。……

‘日本报上还说某人已经和北方默契，就要倒戈。’

坐在孙吉人（太平洋轮船公司总经理）对面的一位丝厂老板朱吟秋抢着说，敌意地看了雷参谋一眼，反用肘弯碰碰他旁边的陈君宜，五云织绸厂的老板，一位将近四十岁的瘦男子。陈君宜却只是微笑。”（页三五）

再看金融市场对于民族工业的影响。

“雷参谋望着周仲伟，很正经地说：‘大家说金贵银贱是中国振兴实业的好机会，实际上究竟怎样？’

周仲伟闭了眼睛摇头。过一会儿，他才睁眼来忿忿地回答：‘我是吃着了金贵银贱的亏！制火柴的原料——药品，木梗，盒子壳，全是从外洋来的；金价一高涨，这些原料也跟着涨价，我还有好处吗？采购本国原料罢？好！原料税，子口税，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国原料还要贵了！况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拚命来竞争，中国人又不知道爱国，不肯用国货。……’

‘就是这么一回事！……拿我们丝业而论，目今是可怜得



很，四面围攻：工人要加工钱，外洋销路受日本丝的竞争，本国捐丝太重，金融界对于放款又不肯通融！你想成本高，销路不好，资本短绌，还有什么希望？我是想起来就灰心！’

朱吟秋也来发牢骚了。在他眼前，立刻浮现出他的四大敌人，尤其是金融界，扼住了他的咽喉，旧历端午节转瞬便到，和他有往来的银行钱庄早就警告他不能再‘通融’，他的押款一定要到期结清。可是丝价低落，洋庄清淡，他用什么去结清？说到日本丝的竞争，他说：‘这两年来，日本政府奖励生丝出口，丝茧两项完全免税，日本丝在里昂和纽约的市场上就压倒了中国丝。’”（页四一——四三）

中国眼前的民族资本家就很少有吴荪甫那位大实业家那样的勇气：

“吴荪甫就站起来，轻声叹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开什么厂！真是淘气！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凭我这资本，这精神，办银行该不至於落在人家后面罢？现在声势浩大的上海银行开办那时候，不过十万块钱……’

他顿了一顿，用手去摸下颔，但随即转成坚决的态度，右手握拳打着左手的掌心。‘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民族的前途更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页六五）

但是大部分的民族资本家并没有这样坚定：

“‘得了，’王和甫站起来说，‘陈君翁还可以携用些日本丝和人造丝。我和孙吉翁呢？这回南北一开火，就只好呆在上海看跑狗，逛堂子！算了罢，他妈的实业！我们还是想点什么玩意儿来享乐一下！’”（页四四）

火柴商周仲伟显得更其糟。“他说：‘我早就盘算过，当



老板已经当厌了，谁要这破厂，我就让给他。可惜瑞典火柴托拉斯不想在中国办厂，不然，我倒愿意跟他们合作。刚才我对你们两位说，有几句正经话要商量：喏，正经话就来了。眼前事想好了两个门路：一条路是向来认识的一位东洋大班，他肯帮忙，另一条路就是益中公司。……’

‘你还是找东洋大班吧！跟吴老三办交涉，简直是老虎嘴里讨肉吃。’朱吟秋抢着说，恨恨地叹了一口气。”（页四九五）

周仲伟“还没走出益中公司的大门，他已经决定了要去找那东洋大班，请他‘注射东洋血’！他又是一团高兴了。坐上了他的包车后，他就这么想：日支向来亲善，同文同种，总比高鼻子强些；爱国无路，有什么办法！况且勾结洋商，也不止是他一个人呀”（页五〇四）

（C）劳资纠纷

劳方和资方的利益总是不容易调和。

“譬如说，荪甫厂里的工人。现在厂丝销路清淡，荪甫对工人说：我们的厂丝经成本太重，不能和日本丝竞争，我们的丝业，就要破产了；要减轻成本，就不得不减低工钱。为了民族的利益，工人们只好忍痛一时，少拿几个工钱。但是工人们回答：生活程度高了，本来就吃不饱，再减工钱那就要我们的命了。你们有钱做老板，总不会饿肚子，你们要顾全民族利益，请你们忍痛一时，少赚几文钱吧。’”（页五四）

《子夜》里这段话对于永明特别显得惹眼。资本家也说为民族利益，工人也说为民族利益，然而他们的意见正如南辕北辙。这问题跟他在农村中所碰见的相仿佛：地主要农民安安稳稳缴些租，也说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利益；农民要地主少收些租籽，也说是为了民族利益。这在永明是一个最需要研



究的问题。

工潮在厂里时常闹着，尤其在这些年头儿：

“莫干丞（工厂管理员）抖抖索索说出这么一句话：

‘厂里有些不妙——’

‘什么！赶快说！’

‘也许不要紧，可是可是，风色不对。我们还没布告减工钱，可是，工人们已经知道了。她们，她们，今天从早上起，就有点——有点怠工的样子。我特来请示——怎么办？’

现在吴荪甫的脸色突然变了，僵在那里不动，也不说话；他脸上的紫疱，一个一个都冒出热气来。这一阵过后，他猛地跳起来，像发疯的老虎似的咆哮着；他骂工人，又骂莫干丞以下的办事员：‘她们先怠工么？混账东西！给她们颜色看！你们管什么的？直到此刻来请示办法？哼，你们只会 在厂里胡调，吊膀子，轧姘头，说不定还是你们自己走漏了减削工钱的消息！’”（页六〇）

厂主们对于工人的剥夺正可以说无微不至。“最后，他们又回到那整顿工厂问题。在这上头，他们自然要加倍努力。裁人，减工资，增加工作时间，新订几条厂严到无以复加的管理规则；一切都提了出来，只在十多分钟内就大体决定了：开除工人，三百到五百；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工人进出厂门都要受搜查，厂方每月扣留工资百分之十，作为存工，扣满六十五元为度，将来解雇时，厂方可以发还。”（页三六〇）

然而工人毕竟‘闹起来了’，一场紧张的场面显露在永明眼前：

工头们“他们远远地就看见厂门外乌黑黑一堆人。呼噪的声音比雷还响。他们三个人直冲上去看得明白时，一齐叫苦，



立刻脸色都灰白了！这里大部份是疯老虎一般的女工！他们三个人赶快转身想溜，可是已经迟了！女工的怒潮把他们冲倒，把他们卷入重围！马路上呼噪着飞来了又一群女工，山一样地压过来，压迫那厂门里边的单薄的防线了。满空中飞响着这些突击者的口号：‘总罢工！总罢工！’‘上工是走狗！’‘关了车冲出来呀！’厂门里那单薄的防线退了。冲厂的女工们火一样的向前卷去。他们涌进那仄狭的小铁门，她们并且强力迫开了那大铤门了！这都是闪电那样快，排山倒海那样猛！”（页四六四）

（D）农村状况

永明对于乡村的经济状况是比较熟悉的，他深知那并不比工厂里好。他看惯了《子夜》里面冯云卿那些劣绅们的行径。

“他，冯云卿，就靠高利贷盘剥农民，居然也挣起一份家产来。他放出去的乡债从没收回过现钱；他也不希罕六个月到期对本对利的现钱，他的目的是农民抵押在他那里的田。他的本领就在放出去的五块十块钱的债能够在两年之内变成了五亩十亩的田！这种方法在内地原很普遍，但冯云卿是有名的‘笑面虎’，有名的‘长线放远鹞’的盘剥者，高利贷网布置得非常严密，恰像一只张网捕捉飞虫的蜘蛛，农民们若和他发生了债务关系，即使只有一块钱，结果总被冯云卿盘剥得倾家荡产，做了冯宅的佃户——实际上就是奴隶，就是牛马了！到齐卢战争那一年，冯云卿已经拥有二三千亩的田地，都是那样三亩五亩诈取巧夺过来的。都是渗透了农民们的眼泪和血汗。就是这样在成千成万贫农的枯骨上，冯云卿建筑起他饱暖的荒淫的生活。齐卢战争时，……孙传芳的军队过境，几乎没有‘人’招待，是冯云卿挺身而出，伺候得非常周到，于是他就挤上了家乡的政治舞台，他的盘剥农民的高利贷网，于是更快地发展，



更加有力；不到两年工夫，他的田产又增加了千多亩。”（页二二〇）

地主们又往往是城市经济生活的主人。冯云卿全家搬到上海之后“幸而政府发行了多量的公债库卷，并且谢谢连年不断的内战使得公债市场常有变化，挟了七八万现款的冯云卿就此进了公债市场，半年来总是得心应手，扯起利息来，二分半是有的”（页二二〇）

农民在过苦生活。他们忍耐到一定程度时，也就要起来挣扎。大地主兼工业家吴荪甫以家乡接到这样的电报“‘四乡农民不稳，镇上兵力单薄，危在旦夕，如何应急之处，乞速电覆’。‘怎么办呢？’‘那只好看人力办去再看了。……目前留在那里的，不过是当铺，钱庄，米厂之类，虽说为数不小，……但兵力单薄到底不行；我们应该联名电请省政府火速调保安队去镇压。’”（页五九）

……

永明的笔记这样做下去，现在差不多做完了。他兴趣浓厚得很，不过他有一点感觉得不足。《子夜》对于农村生活的描写太少，而他自身对于这种生活却比较知道得多，不过他不知道应当怎样观察就是了。

他问陈教授。陈教授告诉他：你读完了《子夜》，再读一本叫做《中国农村描写》的小册子（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新知书店出版，生活书店经售）

永明以同样的热心和方法读那本小册子。

第二章 第二步读《中国经济现势讲话》

永明读过了《子夜》和《中国农村描写》之后，兴致好极



了。老实讲，他在一年前是读过所谓经济学的；教经济学的朱教授，就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研究经济先要从读小说和报告文学入手。朱教授在讲义上所告诉他的原理和原则，在他的记忆里早已跟了月考，学期考的过去而跑掉了。然而小说《子夜》和用报告文学体裁写的《中国农村描写》却给永明一个深刻的印象。他已经立体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轮廓，他已经知道在中国，社会的构造中间那些活跃着的人物，一个个地，一群群地，在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有的在唱他们自身的挽歌，而有的在唱他们的胜利之曲。

永明夹着《子夜，中国农村描写》和他自己读了它们之后所做的笔记，走到陈教授的房间，陈教授不等到他坐下，就递给他一张纸头，上面写着许多问题，一边对永明说，“我知道你那两本书已经看完了，现在请你回答这些问题。”

永明慢慢地阅看陈教授的问题表，一面在想答案：

一、中国的农村为什么会破产？（读到这里，《子夜》里的劣绅地主冯云卿就毫无问题地显现在永明的眼前，诉说中国农村为什么会破产的原因。）

二、农民怎样自求出路？（永明就想到“四乡农民不稳”，调保安队镇压……。）

三、农村地主和都市资本家有什么连系？（冯云卿，吴荪甫等都跑上永明的心头。）

四、中国民族工业的前途怎样？（永明想到内战，日本丝和瑞典火柴的竞争，天津面粉厂的闭歇，丝厂的抵押，火柴厂老板周仲伟跟东洋大班磋商……。）

五、民族企业家怎样维持他们高度的利润？（永明想到资本家在十多分钟内决定的新管理章程，减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停止米贴，收买工贼……）



六、工人怎样自求出路？（永明就想到排山倒海一般猛烈的女工，冲厂，罢工，工人围困周仲伟等……）

七、中国金融资本的任务是怎样？（永明想到吴荪甫和赵伯韬的钩心斗角，想到雷参谋，想到政府滥发公债等等。）

……………

“永明，”陈教授打断永明的念头，说：“你把这些问题仔仔细细去推敲一下，详详细细做答案吧。今天我要告诉你研究中国经济的第二步了。”

“好极了，好极了，”永明喜欢得什么似地叫着，接着便问：“第二步该怎样？”

“第一步的目的是在从活的事实里面，”陈教授郑重地说，“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一般的轮廓。永明，实践是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是研究的归宿。你要研究中国经济首先要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我第一步教你看两本描写实生活的书，目的不仅在使你对于中国经济生活的讨探，发生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在使你把你自身实际生活的经验渗透到两本书所描写的生活过程里去，同时把你自身的经验重新加以组织，使它扩大和丰富起来。

“第二步的目的就不同了。第二步要更“理智”一些，在这里我们要把那些零星的活的现象，归并起来，加以初步的分析，得出比较，一般的结论。你单知道，政府滥发公债以弥补财政，而不知道中国财政整个的趋向，那是不够的。同样，你只知吴荪甫周仲伟等所办的工厂在内外压迫之下，不能发展；而不知道中国民族工业整个的局面，也是万万不够的。同时更重要的，在总的方面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残余摧残之下的整个动向，而只知道一些零星的个别事实，那末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绝对不能说有了正确的了



解。

“所以第二步我向你建议，仔细地读一遍申报月刊社出版的那本《中国经济现势讲话》。不消说得，这本书，有着许多个别的缺点和错误：不过在这一步的研究上我实在没有更好的书可以推荐你。好在这本书里所有的错误，我们还有详细讨论的机会。你把它过细地读一读吧，有问题，就记下来，以备将来讨论。同时，你还是要做札记。这可以帮助你的记忆，同时可以组织你的思想。

“最后，永明，我得附带关照你一件事情。你在这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上，你要培养一种宝贵的友谊，一种对于数字的友谊。数字是死的硬的，这正如永远扳着脸孔的教授先生一样，你们是会害怕的。然而在今天，你得改换一个观念，你不要把数字当作死板板的符号看，你要把它当作活生生事实的垒积。比方说吧，统计表上告诉你，上海总共有几家工厂，那末这个数字你就想像到吴荪甫的丝厂，盆中公司所收买的八个工厂，周仲伟所办的火柴厂，等等，这样，你看这个数字的内容，就多么丰富！又如另一统计表告诉你本年八月份某地的罢工次数共有二十次，那时你就该想像一下工潮的内容，比如，吴荪甫所办丝厂里面女工的罢工和冲突，周仲伟所办火柴厂工人的罢工和包围周宅，这样，你总不会嫌，“二十”这一个数字是怎样空虚了罢。当然你会知道，我们对于数字的友谊是跟着我们对于事实理解的程度正比例地巩固起来；不过你在最初就得排斥对于数字的那种本能的敌视态度。这一点实在是研究科学的基本要求，你得用很大的力量克服原有的错误。方法就是多多理解那些数字所代表的事实。过后你便会明白用数字来表现社会的现象是多么聪明的办法呢。”

陈教授预先知道感情热烈的青年永明，是厌恶数字的。他



看书，遇到数字或是表格，就要跳过去看另一行或是另一页的。

自修室里是闹嚷嚷的。

永明打开陈教授所介绍的《中国经济现势讲话》一看，几乎每页都有数字，尤其是中间一部份，表格多得很。然而在今晚，使得永明恼怒的，倒并不是书里的统计数字，而是同学们的打诨。

“你看朱永明这几天真变了样子！”一位同学向别位说，做着怪脸。

“是呀，他今天为什么不到民众夜校去演讲，宣传！？”

“活老虎变了死老鼠了！”另一位“贬”得更尖刻。

“他平常不爱这些，他现在拚命着经济长，经济短，他快变成书呆子了！”

“……”

这使永明几乎忍耐不下。他明知道过去他跟他们几位一样地轻视读书，轻视研究工作。他也会跟他们同样地骂过别的读死书的同学。然而他觉得他们几位现在对他分明是一种误解。他决不是要安心读死书，也不是要逃避现实；刚刚相反，他要使现实的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效些，才这样发奋研究。

他当天没有做声。回头写封信给陈教授，表示他对这件事情的意见。陈先生的回信是赞成永明的意见，并且补充说：

“你应当说服你的同学：第一，活读书和读活书，这跟实践绝对不是对立的東西；第二，没有正确的理论决不会正确的实践；对于实践的意义没有正确的了解的人，决不能推进实践。”云云。



永明又开始做他的札记：

第一讲 中国经济现势概观

一、中国经济之本质

(A) “中国经济的本质，可以说，对外是“半殖民地的”，对内是“半封建的”，而这半殖民地的及半封建的经济本质，必须的影响及于民族工业的不能发展，原有农商的规模愈趋缩小与没落。”（页八）

(B) “在中国经济上，把握最高权的主要人物有三种：第一是军阀官僚阶级；第二是各帝国主义者；第三者买办阶级。”（页五）

二、“不景气的来临”

(A) 中国的不景气是慢性的，是有持续性的，而不是周期的。

(B) 民国二十年后爆发急性的不景气；原因为（一）世界不景气潮流的激荡远东；（二）长江大水害的发生；（三）沈阳事变的突起和沪战之继起（页九）。

(C) 几个严重的问题：（一）商品入超的激增；（二）列强资本的输入；（三）国民资本与农工业的分离（页十一，十三）。

关于第一讲的疑问：

(1) 中国经济的本质对外是半殖民地的，对内是半封建的。这内和外是不是没有关系？半殖民地的是不是纯粹对外讲的？又什么叫做半殖民地？什么叫做半封建？它们跟全殖民地全封建有什么区别？

(2) 原著者说中国经济上把握最高权的第一是军阀官僚阶级；第二是帝国主义，第三是买办阶级。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握中国经济最高权的，我看第一应当指出帝国主



义。

第二、军阀官僚阶级说他们是单独的阶级是不是妥当？他们恐怕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吧？

第三、原著者并没有指出地主阶级是握中国经济实权的人物，例如冯云卿等。

第四、买办以外的民族资本家和吴荪甫一类的人也是握中国经济的实权的。

（3）关于中国的“不景气”，有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平常人多用“恐慌”，原著者用“不景气”，恐慌和不景气究竟有何差别？

第二、原著者没有把中国“不景气是慢性的是有持续性的而不是周期的”原因说明白。中国的“不景气”跟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景气”究竟有何差别？

第三、民国二十年后的急性不景气，跟白银价格有什么关系？

（4）关于著者提出的几个严重问题，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作者没有提出：（一）中国经济怎样可以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二）中国经济在日本侵略之下，起了什么变化？

.....

第三章 三把钥匙

这回永明自己也觉得已经进步得多。他对数字是不大害怕了，不，他在做札记的时候还抄上许多重要的统计。最看得出他有进步的是他对于《中国经济现势讲话》的内容所提出的问题。他显然已经能够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了解，用批判的态度读



书了。

事实虽然是这样，永明却越发觉得自己空虚了。重重的疑问压在他的心头，急于要待解决；而特别使他纳闷的，是那本《讲话》的许多作者，他们的观点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比方说吧，讲话的结论有道：“中国在打破两重障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时候，必定就是人人有了知识以后。他们有了知识，还会让剥削人的资本主义抬头吗？”（页一五四）这种看法是不是正确呢？永明不敢相信，然而他又说不清不可靠的理由究竟何在。

这番他走到陈教授那里是更严肃了。现在充满着他的脑袋的不仅是吴荪甫，杜竹斋，工人，“红头火柴”那些而且还有许多数字，理论和严重的问题。我得郑重地跟陈先生讨论一下，他想。

陈教授脸上堆着笑欢迎永明走进他的房间，坐下。

“永明，你读了那本《中国经济现势讲话》怎样？”他问。

“很高兴，”永明回答，“不过有许多问题。”

陈教授听说永明有问题，觉得更可喜。他站起来拍着永明的肩膀说。“你的进步是飞快的。我们今天来详细讨论一下罢。”

永明欣喜得什么似的笑着说：“假使，陈先生今天有时间，那我就有许多问题要问你。”说着，把札记簿递给陈教授。

陈教授仔细把永明所提出的问题看过一遍。接着就说：“永明，我们要讨论那些问题，先得要把握几把顶重要的钥匙。以后，我们就能把那些问题一个一个地打开。”

“那些钥匙是什么？”永明心急得什么似的追问。



“第一把钥匙是我们必须了解社会的根本是经济的关系；社会其他的现象像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在根本上都是由经济的关系规定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也就是要研究中国社会里面这种基本的经济关系。”

“什么叫做社会？”永明感觉到这把钥匙并不容易把握，他干脆地从头问起。

“一般社会学者往往以为社会是无数个人并合起来的总和，这种说法初看起来至多发现它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实际上这种说法还是错的。按照正确的看法，社会是包含人类各种关系的不断发展的具有规律性的统一体，在这些关系里面经济的关系是基本的具有决定作用的。”

“什么叫做包含人类各种关系呢？”

“永明，你看吧，人类要生存，一定是要消费的，要消费一定就要有生产，人们在生产的过程里面一定发生着种种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叫做生产关系。此外，人们在社会里面生存着又脱离不了政治的法律的支配，这里就有政治的法律的关系。人们有思想，信宗教，这里又有了思想的宗教的种种关系。人类社会不是无数个人的积集，而是这些种种色色关系的统一体。”

“为什么说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呢？”

“自从有了人类之后，人类的社会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天，他是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着。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已经有原始共产社会怎样发展而为奴隶社会，由奴隶社会发展而为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发展而为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又蜕化像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应当知道，社会决不是一成不变的‘秩序’，而是不断变动，不断发展的历史的产物。世界上有不少傻瓜要想阻止社会的发展和前进，而以维



持现有的秩序为无上的使命，他们一定是徒劳无功的。”

“那末什么叫做具有规律性的呢？”

“不错，社会是花花绿绿形形色色复杂到不得了的存在，然而它绝对不是毫无头绪的一团糟，更不是可以把它分割为许多不相联属的片的东西。它内部存在着一定的规律，社会整个的体系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律建立起来，而社会的发展也是依据一定的规律在发展。”

“最后，为什么经济的关系是社会里面基本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关系呢？”永明问。

“这就是第一把钥匙的本身。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社会的确是一个有规律的统一体。刚才说过，社会决不是毫无头绪的一团糟，它尽管内容复杂，然而还是头绪清楚，上下分明。一个社会可以分成基础的构造和上层的构造两个部份。人类在社会的生产里面必然合结成一定的脱离人类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也不是随随意意结合成功，它是配合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自然而然地产生起来的。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在这基础上面，建立起各种各式的上层的社会现象，如政治，法律，社会心理，道德，宗教，科学，哲学，艺术，习俗……这些上层的构造是和经济构造相适应的。”

“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说上层构造是基础呢？”

“不，那不能的。第一，我们就产生的程序来讲，经济的关系发生在先，那些上层构造的发生在后。人类一定要有物质的生产过程以后，方才有政治法律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第二，经济关系的变动决定着一切上层建筑的变动；一切政治，社会，道德的变动总直接间接反映着生产关系的变动。当经济的构造发生剧烈的变动之后，上层构造，必然会跟着变动。比方，俄



国大革命后，社会的经济构造已经完全变过，于是一切政治组织，法律，道德，艺术等等都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政治组织，法律道德等等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构造相适应。有人想在目前的中国建立起像苏联一样的艺术和道德观来，这正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啦。”

“这样我就知道了，《中国经济现势讲话》结论中所说的‘中国在打破两重障碍的时候，必定是在人人有了知识以后’，这话的确是有毛病。”

“你说得对。中国在没有把这两重障碍打破之前，就不可能使人人有知识。真正的普及教育这一种上层构造一定要在更合理的经济构造缔建之后，方才可能产生。假如我们说，一定要等人人有知识之后，才可以打破两重障碍，那就等于取消了那种打破旧秩序的工作。”

“这，我是了解了。不过，现在我们在农村里和街道上所进行的救亡宣传，到底有什么用呢？”

“这一下，你问得很重要，我几乎把另外一点重要的事情忘了对你讲。我们说过，社会的上层构造要受基础构造的规定，但是反转来，它们也可以相当当地影响到社会的基础。比方说吧，在一个将要没落的社会体系里面，有些人拚命运用他们的政治机构，法律，乃至那些腐朽的道德，来阻止人们的‘打破’工作，维持原有的经济结构。这是就消极的影响讲。关于上层构造对基础构造的积极影响，我们可以举出苏联为例，苏联一切的政治设施，法律，新道德和新艺术，没有一点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构造，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上层构造对于基础的作用并不是基本的，然而我们绝对不容忽视这种相对的影响。现在说到目前的救亡宣传，这种宣传也就是要教育国内的同胞，更进而把他们组织起来，摧毁我们的敌



人，缔建一个新的社会基础。这种积极推动改造基础的工作，我们是不能稍稍忽视的。”

“现在请交给我第二把钥匙吧。”永明这样要求着。

“第二把钥匙也是顶重要的，它不单是开中国经济问题的钥匙，实在是打开一切问题的钥匙。这就是动的想法，或是说动的逻辑，动的想法，首先要求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去观察一切。”

“我们怎样从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观察中国经济？”

“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和其它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一样是在不断地变动着，发展着。永明，你总还记得子夜里边所描写的交易所生活的瞬息万变吧。实际上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也都在这样变动着，不过快慢有所不同，所及的影响也有大小罢了。譬如，自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网满布中国以后，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生活都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就农村而言，农民的手工业被潮水一样的洋货破坏了，农作物也起了变化了，农民的生活程度更加低下了，同时因为机器的输入，有些地方的生产也已经变了样子。在都市方面呢，近代的工业渐渐地兴旺起来，商业的范围也更加广阔了，水陆交通根本变了面目，人也可以变做‘飞鸟’了。这些变动都是朝准一个方向，那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在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发展着，同时又在向殖民地的道路发展着。

“我们再就较小的方面来看。中国的民族工业因为帝国主义资本的压迫，以及国内封建残余的阻碍，实在没有顺畅发展的可能。这正如你在《子夜》里所读到的，周仲伟的火柴厂，不是宣告破产，便得要东洋大班帮忙，抵押给外国资本。中国的民族企业可以说都是在向这两条路不断地前进、它们不是毁



灭，就是自身变成买办的企业，那就是民族资本的买办化。

“我们再就农村来说，农村人口的经济生活也在不断地变动发展。比方，农村各个阶层的分化过程就进行非常之快。大地主往往愈弄愈大，中小地主有许多在破产；在农民中间，较富的农民往往逐渐变成地主，中等的农民降为贫农的很多，至于一般贫农大众，他们在百般负担之下，倾家荡产，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那更是多数了。这种农村阶层的分化很明显地说明了中国农村生活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开头就要注意和把握各部门经济生活的变动和发展的过程。中间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帝国主义它们对于中国侵略的活动和方向是在向什么方面变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趋向如何？国内金融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关系起了什么变化？中国地主的经济活动是在走向什么方面？富裕的农民是不是在向扩张生产的路上发展？无产化了的农民是不是多数走向都市？城市和乡村的劳动大众在怎样争取他们自身的解放？等等。”

“动的逻辑要求我们从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去研究中国经济，这一点我是粗粗了解了。但是我要问陈先生，我们怎样可以发现这种变动和发展过程中的根源？”永明这样问着。

“这一点非常重要，”陈教授回答。“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把握各部门经济生活的运动过程，并且一定要找出这种运动的根源。所以动的逻辑不仅要求我们从变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去研究问题，而且要求我们从事物内部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统一上去研究各种问题。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内部都包含着不能一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面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同时又在不断地斗争。比方，中国社会里面就有像吴荪甫周仲伟一类的资本家，同时又存在着千千万万劳动



终日不得一饱的工人。他们在现社会里面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到工人们不依赖资本家的时候，便不是这样的社会了），同时他们两方面却不断地冲突着。吴荪甫会雇用屠维嶽那样的工头和军警来镇压工人的罢工，而工人们却也会‘排山倒海’般地去冲厂，整个社会内部的这种矛盾在愈弄愈扩大，它们之间的斗争也愈来愈尖锐。这种斗争的结果，必然会使这种矛盾得到一个总解决，而一个新的社会也就会出来代替那个旧社会。这就是社会现象变动和发展过程的全貌，而内部矛盾的斗争，就是一切变动和发展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的体系里面必然地有资本家和劳工两方面的存在，而劳资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它们之间的冲突一天天扩大，一天天尖锐，结果资本主义的体系便被扬弃，代之而起的便有社会主义的社会。

“我们再用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做例。英美德法日各个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在宰割中国人民大众的血肉、削弱中国人民大众的抵抗力量上是一致的，然而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却又非常显著。它们都愿意独吞中国，都要排挤别个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倾轧，相互排斥的倾向。它们是矛盾的存在，它们是在相互斗争着。由于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是在不断地变化着，中国军阀的内战和政派的冲突，就在它们的导演之下不断地演出。我们可以说，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对于中国从前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生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

永明突然插问这样的问题：“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形成一切事物的变动和发展的过程。那末，我们究竟凭着什么标志来认识这种变动的过程呢？”

“等我讲了动的逻辑对于我们第三个要求之后，你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了，”陈教授接着说。“所谓第三个要求，就是



我们要观察事物的质和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变。换句话说，我们要用质和量这两个标志来认识事物的发展过程。事物是有性质，这是你所知道的。比如中国农民的小农生产，和美国的大农场经营，性质完全不同；它跟苏联的集体农场更不相同。这三种生产性质既然不同，它们在生产的范围，劳动的人数，生产力的大小以及生产量的多少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是量的不同。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量是受着质的规定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某种事物的量的不断变化，就可以引起质的变化。比如，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以来拼命地向独占中国的路上迈进，这使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对比，在量上逐渐变化，这种量的变化已经造成列强在华均势的破裂，而把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日帝国主义完完全全的殖民地。这便是个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便是由量的变化发展出来的。

“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质和量的变化，和它们的相互转变。比方民族资本买办化的问题，是我们应当郑重谈到的。周仲伟要把他的火柴厂卖给东洋大班，中国已经有几千几百个周仲伟把他们原有的‘民族企业’，变成帝国主义资本直接的附庸；而且还有几千几百类似吴荪甫和赵伯韬之类的金融家，拼命替帝国主义谋利益。中国民族资本这种买办化的过程是在一天一天发展着。这种量的发展早已引起了质的变化，那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因为已经买办化了，所以他们一面已经从属于外国的资本，不能而且也不愿跟帝国主义抗争；另一方面他们也已经没有和国内阻碍民族资本独立发展的封建残余起什么冲突的勇气。他们早已跟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握手妥洽了。独立发展的民族资本降为依附于外国资本同时又和封建残余狼狈为奸的买办资本，这是一种质的变化。



“又如在一九三四年以后，美国的白银政策弄得中国的白银滚滚流出，国内的通货一天天枯竭，产业和金融的恐慌到达最深刻的程度。这种情形一直发展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就上来一个突变——币制的改革，这样一来，通货收缩的弊病完全可以用政府随时增发纸币的手段来补救，于是一种新的祸患又从这个突变展开起来，人们已经再不怕通货会有收缩的危险，现在所怕的是通货的过份膨胀了。这又说明了在质的变化以后，量的发展又受了新的质的规定。”

现在陈教授要把第三柄钥匙交给永明。永明削他的铅笔，陈教授啜几口茶，接着就说：

“第三，应当一刻也不要忘记：中国是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一点是整个近代中国经济生活的决定因素。你一刻忘怀了它，你就一刻找不到近代中国经济的本质。正因为中国是各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销售场，是他们原料的供给地，是它们投放资本的所在，是廉价劳动的来源，所以中国的民族经济就无从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大道在中国就变得此路不通。这一点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要谋正常的发展，那就非得在欧美资本主义的道路以外，另辟蹊径不可。另一方面，正因为帝国主义资本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中国人民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毛细管，因此中国人民大众的血液里面必然地含有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抗毒素。”

陈教授说到这里骤然停止了，他料想永明那时一定要发问，然而永明却没有问，他满脸显出对这问题已经全部了解的样子。陈教授却反问他了：

“永明，帝国主义已经支配了全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这句话想来你已经了解了。你现在解释一下，一位住在穷乡僻壤



的老农夫，他的经济生活怎样受帝国主义的支配？”

永明转了一转念头，回答说：“他要买外国的火油，火柴，洋布等等，他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洋货的消费者，换句话说，他已经吃了帝国主义资本的亏。——”

“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假使他住在内地的乡村，不用火油而用豆油点灯，不用火柴，而用火石点火，不用洋布而用土布做衣，……那末他是不是算脱离了帝国主义的支配？”陈教授追问着。

“他也许养了蚕做了茧子卖给厂家，再卖到外国去；也许把多余的粮食卖到市上，再卖到外国去；也许他种了棉花卖给商人再卖到外国厂家去。这样，他就是帝国主义所用原料的供给者，吃了他们的亏。”

“这一点也是对的。但是万一这位农民既不养蚕，也不种棉，他没有什么原料供给帝国主义。那末他是不是受帝国主义的支配呢？”陈教授还是追问着。

永明有些窘，他突然想起，冀东农民向日鲜人当铺借钱的事实，以及日人在东北四省抢夺农民土地的事实来。“那末，他也许借外国人的债，受他们的剥削；或是他的土地被外国人抢去吧。”他得意地说。

“这种情形究竟还是少数，而且假使那里的农民已经遭受帝国主义这种剥削，那末他恐怕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十足的奴隶了。假使刚才我们所指的那位农民还没有到这般地步，那末他是不是不受帝国主义的支配？”

“那——，”永明窘极了。“那末，请陈先生解释吧。”

“永明，你观察事物，考虑的方面太不完全，你只注意到帝国主义资本对于中国农民直接的支配。比方，就你刚才所提到的借债为例吧。农民不单是直接向帝国主义者借债才算受帝国



主义者的剥夺，就是你向时下流行的什么农民银行或是农村合作社借债，你间接地也就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剥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银行资本本身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这还是就局部而言，假使我们讲到整个的情形，那末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内统治的政治机构，它本身就是由帝国主义的资本支撑住的，因此尽管你这个农民在直接的关联上好像并没有机会给帝国主义剥削，实际上他在税捐上，农产品的买卖上以及一切经济生活上，都是受到帝国主义的支配。在这里，永明，我们是应当重视的；你们在向大众作救亡宣传的时候，就一定要把那种敌人对于我们一切直接间接的剥夺，都要说得清清楚楚，说明一般人民特别是农民大众，虽然在直接的关系上，并没有受到敌人直接的剥夺，实际他们在一般经济恐慌的日趋深刻上，政府税捐的日益繁重上，都受到敌人侵略的严重打击。

“永明，我所要交给你的三把钥匙已经全都交给你了。今天我还要介绍你两本书，你得仔细去研究一下：一本是马札亚尔著的《中国经济大纲》（徐公达译）；一本是中国经济情报社编的《中国经济年报》（一九三五年）。第一本书是有许多缺点的，你把问题都写下来；第二本书你可以研究一下怎样运用材料。”

第四章 农村调查

已经是初冬的天气了，永明坐在回到家乡去的轮船里感到一阵轻寒，同时又很寂寞。他在回想着陈教授对他的嘱咐。

还是在三天以前家里来了封信，说有事要教永明回家一次。永明就把这消息告诉陈教授。

“那很好，”陈教授喜洋洋地说了，“你可以利用这个机



会去实地观察农村的经济生活了。自然农村生活你是熟悉的，不过你这次回去一定可以看出些新的东西来。你前天告诉我，你已经用了几把有效的钥匙，细读了《中国经济大纲》和《中国经济年报》这两本书，现在你应当运用这些钥匙去实地考察农村的经济生活。”

“我这次回家大概有一个礼拜的勾留，陈先生看在那时我可以做些什么有系统的工作？”永明问。

“我希望你做一个简单的农村调查。”

“农家个别的访问，我倒曾经做过。要做农村经济的正式调查，我还全无经验，陈先生，我们应当怎样着手调查？”

“我们要调查农村经济本来可以运用各种方法来调查。比方，我们要研究某个问题，或是要晓得某一区域的经济状况，我们事先就拟定要调查的项目，制造简要的表格，印好了分发出去，委托各地的熟人或是有其它服务关系的人们从事调查。这就是通讯调查的方法。这种方法自然有许多优点，比如，他的调查范围能够很广，同时如果被委托调查的人真能热心调查，那结果一定是不错的。不过这种调查，就很难找到可以全部付托的人，因此调查的结果就有很难置信的地方。

“要调查得结果真确，那当然要自己实地去调查。只有实地调查方才能把农村里面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弄得一个清清楚楚。然而要实地调查农村，一定要做种种的准备工作。比方，你这次要回到家乡去，你第一先要确定这次我们要研究些什么问题。农村社会的现象虽然说也有一定的规律存在着，不过内容毕竟是非常复杂的；即如从经济生活方面讲吧，我们要在一礼拜这样一个短时期内，做全部的调查，那在时间上恐怕是不容许的。所以我们在未调查之前，先得确定一下，这次调查究竟要调查些什么问题？”



“第二，我们就要根据已经确定了调查问题和范围，拟订一个调查表格。比方，如果我们这次要调查你们家乡农田的租佃制度，那末你一定要列成一张表格，把下列各项包括在内：

- (1) 那家农家总共种几亩田？其中自己有的田几亩？租进的田几亩？租进的田里面还有什么差别（像江苏无锡一带还有灰肥田，借种田，卖租米田等等之分）？近年来各种田亩数有没有变更过？为什么原因有变更？
- (2) 缴租的时期，额数和杂费，这里应当问清楚，农民缴的是谷租，钱租，或是折租？收谷租时地主所用的斗是否比普通所用的大一些？地主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收回他租出的田亩？如果佃农迟交田租，租额是否要加多？加多的办法怎样？佃农除开田租以外还有什么负担（如送东西，替地主服役等）？
- (3) 农民和地主间有没有发生过纠纷，什么原因？后来怎么解决的？

“在这种调查里面，我们主要的要知道中国农民有多少是受地主的剥夺？地主对佃农剥夺的程度和方法是怎样？这种剥夺近年来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地主对于农民是否有超经济的剥削？地主和农民间的冲突有什么新的方向等等。

“又如，我们要调查农业生产的状况，这里我们不单要注意农产物的多少，农业劳动人口的多少，我们要从这些调查里面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地主是否向扩大生产的路上发展？富农们的农业生产是不是在向近代的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一般小农经营的范围在扩充，还是在缩小？一般贫苦的劳动农民，他们参加怎样方式的经营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在我



们调查农业生产的表格里面应当包括着下列各项：

- (1) 农家的人口，参加农业工作的劳动口数，有什么副业？
- (2) 所种农田的面积，近几年内经营面积有什么变化？
- (3) 农作物：如稻田几亩？棉田几亩？桑田几亩？杂粮几亩？近年来有什么变化？
- (4) 作物的种籽，特别注意改良种籽的使用数量。
- (5) 肥料：那家所用肥料自己的有多少，从市场上买来的有多少？用不用改良肥料？
- (6) 农具：农具的购办费和修理费，特别注意用不用改良农具或是农业机器？
- (7) 农舍：估计农舍，牛棚猪圈等费用。
- (8) 人工：注意农家自己的劳动人口，雇工的人数和工资，以及跟别家换工的日数等等。
- (9) 耕畜：自有的耕畜共有几头？借用的共做多少工，化多少钱？
- (10) 农田出产：农产物的名称，每亩的产量及其近年来的变化；还要注意农产物的出售量和购进的数量。

“又如，我们要调查农村市场的状况，这种工作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进行，一面我们从市场（市镇，集）本身去调查，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农村里去调查。

“从市镇或是市集入手调查农村的市场，我们应当注意那个市镇的组织，店铺的种类，交通和运输的概况，市镇上所用的度量衡和币制，收买农产物的种类，数量，方法；出卖农产物的种类，数量和方法，以及卖到什么地方去。关于农产物的价格，我们要注意店铺收买和出卖价格的差异，趸卖和另卖价格的相差。此外我们要注意商人所抽的牙佣，农民向店铺赊账



时的条件等等。特别要注意的，是外国商人或买办到镇上来收买农产或推销洋货的情形。

“如果我们在农村里面调查农村的市场状况，那末我们应当注意到下列几点：

- (1) 本村有没有厂家或是洋商买办来收买农产？收买些什么？收买手续怎样？价格怎样决定？
- (2) 本村贫苦农民中有多少是在农产收获后必须出卖一部份来维持生活，到后来又要买进农产品？
- (3) 本村较富农民每年巢出的农产约占几成？富农出卖农产其价格和贫农出卖农产有多少差异？
- (4) 本村中预卖农产（卖青苗，卖青桑等）的情形多不多？手续如何？价格比另卖低多少？
- (5) 本村因税捐，派款或还债关系不得不出卖农产的情形普遍否？
- (6) 本村现在的洋货有那几种？近年来销售的数量有什么变更？
- (7) 本村从事制造土货的人家近年来有什么变化？
- (8) 本村手工业近年来衰落的情形怎样？

总之我们对于农村市场的调查，主要目的是在观察帝国主义的资本，民族资本以及乡区商业高利贷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夺；农村各级人民在商品经济化的过程中所受不同的影响。”

“表格拟好以后，便该怎样呢？”永明问。

“这样，你就可以着手调查了。你在调查的时候也有许多地方要注意的。第一，你去访问农友的时候，态度必须和蔼，诚恳，耐烦。这在你本乡也许要好得多；同时本乡人都知道你外面大学堂里念书，地位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去问他们什么的时候，大概不至于拒绝你的。假如到别的陌生地方去调查，那



困难就多得多。

“第二，你得辨别农民答案的真假。大部份的农民对于数字是模糊惯了的，你问他多少，他回答你的总是三四十，百来个，几百个等等，这里你得问得更精确些，有时你得根据他们的实际状况，替他们作个估计。教他们说的很难正确，有许多农民还会对你撒谎，特别是那些地主和富农，他们有一百亩田的，至多对你说只有五十亩，六十亩，他是不愿意人家知道他们财产的确数的。穷苦的农民不大撒谎，不过问到他负债数目的时候他也许会说到多些，希望你去救济。

“第三，调查时候的发问，真是大有讲究。如果你只会根据原定的表格，呆板地发问，那末你所得的结果一定不会好的。你得随意跟农友谈话，在这种随便谈谈里面，把要问的问题都问了，然后你把他们的答案逐条地填下。此外，你发问的问题决不能问得太‘文’，你得完全从他们的生活出发来发问。这里，你到家乡去调查，问题是很少的，第一你的话他们都听得懂，第二，你对他们的生活情形都很熟悉，否则你还得学习当地的土话，做些初步调查的准备工作。”

“别方面还要注意什么事情？”永明问。

“这样，你就得进行调查。现在我再跟你说一说，调查完了以后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已经调查得来的材料，我们非加以整理和统计不可，要不然，调查的结果，就不会很有系统很扼要地表示出来。不过整理和统计也不是随便做的。永明，你总看到市面上流行着的许多统计表吧。它们往往没有告诉你什么意思，而一部份却把材料本身的意义表现错了，这真是不得。

“在整理调查材料的时候，我们第一要审查一下我们所调查得来的材料，是不是正确可靠。当然我们要求调查材料的完



全正确可靠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农民的答案，有许多就非常含糊。不过，我们总应当尽可能地求其完全，和正确。所以第一步我们还要把调查所得到的材料，过细审查一下。在审查的时候，我们第一要注意调查材料有没有前后矛盾或是显著错误的地方。比方，农民告诉我们他家里种的田亩数。就往往有前后矛盾的可能。第二，我们要注意调查材料有什么重大的遗漏，比方，我们要调查某一个雇农，他也许只告诉你，他在本村当雇农时的经济状况，而没有把他原来的家庭经济状况告诉你。你知道，中国许多雇农是一面家里有人自家种田，一面出外当人家的雇工。如果你没有把他自己家里的情形问得清楚，那是一个重大的遗漏。你在调查的时候，对于这类的遗漏，就应当随时注意，乘便补问。

“调查材料审查以后，我们就得进行统计。这里我们第一步先要把各个村户的经济地位，大致弄个清楚：他们是地主，还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或是别种村户？我们一定要就各种不同的村户，研究他们的各种经济生活；假使只把全体村户合在一起统计，那末这种统计的结果就不会显得重大的意义。比方说吧，地主所有的土地总是比农民多得多，如果我们把全体村户不问地主也好，毫无土地的雇农也好，‘一古脑儿’统计在一起，求得一个每个村户平均所有的田地亩数。你看这个平均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抹杀了农村社会各个不同的集团的经济生活，而把一个空洞的平均数来掩盖一切么？”

“调查材料经过审查和分类以后，我们就要着手统计。统计主要的意思是用几个简单的数字，表现出具体的复杂的事实；它能化繁为简，使人看了一目瞭然。统计上我们最常用的是平均数，百分数和指数。关于它们的算法，你在学统计学的



时候已经学过了，我希望你再去温习一遍。最后，我还要介绍你一本关于农村调查的书，——黎明书局出版，张锡昌编的《农村社会调查》。这本书可以告诉你一些基本的方法和宝贵的经验。”

* * * * *

现在永明的调查工作已经结束了。他困急得很，他觉得这种调查工作着实干燥，然而同时又非常有趣。农民生活的泉源是丰富的，他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他又觉到他们是太穷乏了。他在调查的时候，也碰到不少困难。最使他头痛同时又最使他害羞的是一般农民多少对他还有些恐惧。永明自己的家里是一个地主的家庭，父亲是个不大不小的绅士。农民等到永明去问短问长，虽然知道这是学堂里的“玩意”，然而总觉得这些长短告诉给永明之后，说不定会吃什么亏，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说话，也不会十分真实。不过大体上说，这次调查总算得到较好的结果了。

永明在调查时期增加了许多怎样跟农民谈话的经验。永明老在学校里面过活，满口是新式的名辞，他在调查时，虽然已经竭力避免，然而总不免流露出许多在农民听来是非常奇怪的话语，比如“经济情形”啦，“农民啦”，“作物”啦，“雇工”啦，“不景气”啦等等。他在这时学习到许多通俗的名辞和说话，这在他无论对于农村调查和以后的救亡宣传，都是非常有用的。

永明一面调查，一面随时把已经填好了的表格审查，有什么重大的遗漏和错误，就设法去补回或纠正。所以到最后调查完了的时候，审查的工作差不多也已经告个段落。接着他做统计。他跟陈教授磋商的结果，在整理材料的时候集中在土地的分配和土地的使用问题上。我们把永明统计所得的结果，举几个在下面：



一、附近五村农户自耕和租种的比较（一九三三——一九三六）

类别	自耕户数		百分比		租种户数		百分比	
	1933	1936	1933	1936	1933	1936	1933	1936
富农	55	57	50.5	53.3	54	50	49.5	46.7
中农	75	75	37.1	38.9	127	118	62.9	61.1
贫农	116	117	23.5	21.7	377	423	76.5	78.3
合计	246	249	39.6	29.6	558	591	69.4	70.4

二、各类农户自田租田比较

类别	自田亩数		百分比		租田亩数		百分比	
	1933	1926	1933	1936	1933	1926	1933	1936
富农	1,182.2	1,115.5	40.8	40.8	1,712.1	1,617.5	59.2	59.2
中农	748.5	673.0	30.3	29.7	1,719.5	1,594.3	67.2	70.3
贫农	509.8	525.0	18.1	17.2	2,306.2	2,530.7	81.9	82.8
合计	2,440.5	2,313.5	29.8	28.7	5,737.8	5,742.5	70.2	71.3

第五章 怎样搜集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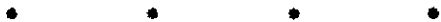
永明调查农村的成绩并不能算坏。他回到学校后，在学校里新设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的座谈会上，关于他的调查就做了一个很有系统的报告。他最后的结论特别郑重地指明，农民对于某种空洞的跟大众生活没有多大关系的“救亡运动”，并不感觉兴趣，这绝对不能说他们是混蛋，更不能像一些自命不凡的理论家，公开诬蔑农民甘愿做汉奸。“他们所需要的”，永明加强他的语气说，“不是一种空谈，因为空谈只有吃饱了饭才能办得到。他们所急迫需要的是一种实际能够救我们的民族，同时又能救他们自己的运动。我现在深深地知道，救亡运



动而脱离大众生活的改善，那末这种运动决没有胜利的可能。同时我们又应当指出，我们必须告诉农民和一切劳苦大众，他们不要近视，他们应当看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大众的剥夺，尽管它们多半是间接的，无形的，然而它们的酷辣，实在足以致中国大众于死命。这里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经济的部门来研究，中国的大众必需参加救亡运动，因为在民族敌人没有被我们驱逐以前，在中华民族没有得到独立与解放之前，大众生活的澈底改善，是无从谈起的。然而同时救亡运动又必须跟大众生活改善的运动联系起来；救亡运动而不顾到大众生活的改善，那末这种运动就无法保证绝大多数人民的参加，也就不能保证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后胜利。”

研究会的学生静听着永明的报告。大家感觉到有些惊奇，惊奇永明在这几个月的非常注意研究工作以后，见解果然卓越得多了。大家不敢再对永明讪笑，永明已经用了自己的努力报了不必要报的仇。

过了几天，永明因为有个机会可以进行工厂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这次他所调查的，祇是一个概况。结果，他对于劳工的生活以及他们对于救亡运动的态度，得到相当深刻的了解。他在这里又真切地感觉到劳工集体力量的伟大。他们是本能的先锋队，永明肯定地想。



陈教授看到永明对于实生活的了解益发感觉到兴趣，使他感到了一种“为人师”的真挚的快慰。他觉得永明不是一个蛀书虫，同时又不是闭了眼睛盲撞的实行家。他把一种大的希望寄托在永明身上。

“永明，你研究经济问题能够多多做实地的考察和调查，当然是非常紧要的。比方你在家乡做了农村调查，回到上海又



能做工厂调查，从这里你可以直接地得到许多活的真切的材料。不过你在另一方面，你也不能看轻人家的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都在人家的文章里书籍里记载着。你得珍视人家的经验，因为这能省了你许多时间，精力，特别重要的，你从人家的经验里面学习，就可能避免重新犯人家的错误。”

“我们要怎样去找好的间接的材料？找些什么材料？”永明问。

“第一，你每天总要仔细看报纸吧，”陈教授答，“那末，这些报纸就是你非常丰富的材料来源。”

“报纸我是每天看的，不过我没有想到去好好运用它。陈先生，你看我们应当怎样整理报纸的材料？”永明说。

“我们第一着，先要确定我们要用那几种报纸。就中国经济的材料来讲，我觉得国内有下列几种报纸比较上是可以找到些材料的：上海方面：申报，大公报，中华日报，生活星期刊；华北方面：天津益世报，大公报；华西方面：重庆商务日报；西北方面：陕西的西北日报和甘肃的新陇日报；华南方面：有香港的工商日报，广州的七十二行商报；广西的南宁民国日报等等。”

“第二步呢？”永明问。

“第二步我们要确定我们到底要用那几方面的材料。我们在事前把我们用的材料分成若干类，这样把剪下的材料贴好，归入各类。这样以后查考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比方我们把中国经济方面的材料分成下列几类：

(1) 总类 (一) 社会经济概况，(二) 自然地理，(三) 社会问题，(四) 失业，(五) 列强投资，(六) 华侨，(七) 毒物。

(2) 农业 (一) 农业概况，(二) 农业团体和会议，



(三)土地, (四)租佃制度, (五)水利, (六)农业经营, (七)雇农及苦力, (八)蠶桑, (九)农村副业, (十)粮食问题, (十一)棉花, (十二)农产品及其运输, (十三)灾荒及救济, (十四)农民组织及运动, (十五)墾殖, (十六)林业, (十七)畜牧, (十八)农村改良运动, (十九)丘差及勒索, (二十)农民生活, (二十一)地主豪绅, (二十二)渔业, (二十三)合作。

(3)工业 (一)工业概况, (二)工业团体及会议, (三)电力, (四)机器, (五)煤矿, (六)其他矿冶, (七)棉纺织业, (八)丝纺织业, (九)其他纺织业, (十)面粉业, (十一)饮食业, (十二)火柴业, (十三)化学工业, (十四)建筑材料业, (十五)捲烟业, (十六)手工业, (十七)其它工业, (十八)劳资纠纷, (十九)劳工生活, (二十)工厂检查, (二十一)资本家。

(4)交通 (一)交通及运输概况, (二)铁道, (三)公路, (四)航运, (五)商港, (六)邮电, (七)航空, (八)其它交通。

(5)贸易 (一)贸易概况, (二)贸易团体及会议, (三)对外贸易, (四)国内贸易, (五)贸易政策, (六)商业纠纷, (七)物价。

(6)金融 (一)金融概况, (二)币制, (三)银行, 钱庄, (四)典当, (五)农村金融, (六)交易所, (七)汇兑, (八)保险, (九)地产。

(7)财政 (一)财政概况, (二)中央财政, (三)各省财政, (四)市县财政, (五)关务及关税, (六)盐务及盐税, (七)统税, (八)杂税, (九)田赋, (十)内战, (十一)外债, (十二)奖券。



(8) 特殊问题 (一) 中日经济提携, (二) 国民经济建设……

(本表根据上海文化资料供应所和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剪报分类法)

“永明, 我现在来举个例子给你看看。比方, 今天我们接到许多报纸。我先得把它们全部看过, 把要用的材料,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分类, 分别记起来。然后把它们一张张剪下来, 假使讲究一点, 还把剪下的材料, 一张张贴起来。最后把贴好的材料分类放好。

“这样做的结果, 我们得到下面许多很有用的材料。永明看吧。”

永明把陈教授一部份已经整理好的材料, 一张一张地看下去:

(一) 总类

一. 社会经济概况

豫北济源调查记: “济源通讯: 济源位于豫省最北部, 与山西仅有一山之隔……” (天津益世报, 七. 一八。)

三. 社会问题

人力车委会不准续办登记: “特区人力车公会, 前因车夫人数税减……”

(申报, 八. 四。)

京市府勘定棚户迁移建筑地点: “京讯: 京市棚户, 散处各地……” (上海中华日报, 八. 四。)

五. 列强投资:

日在沪拟设大银行: “上海航讯: 据经济界传出消息, 日新任大使川樾抵沪后……” (重庆商务日报, 六. 二七。)

日决扩充津青两鲜支行: “华聊社念八日天津电: 朝鲜银



行天津青岛两支行，近为适应……”（上海民报，七．二九。）

漫遊欧美归来陈光甫氏消极：“漫遊欧美归来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氏，以与美国大宗借款进行不顺利……”（上海日日新闻，七．二八。）

六．华侨：

华侨数字：“南京一日电：外部据檀香山领馆报告，近经总查结果，在檀香山华侨总数二万七千二百六十四人……”（天津益世报，八．二。）

凌冰谈赴暹经过，传暹排华系出误会：“南京电：赴遊考察团团长凌冰，廿九晨抵京，即到外交部办公……”（香港工商日报七．三〇。）

七．毒物：

滇省开始二期禁烟：“昆明通讯：查本省因土质气候，宜于种烟，以致十余年来……”（中华日报，七．二六。）

（二）农业

一．农业概况

湖北农村杂写：“应城两日记（下）膏盐概况：膏盐为应城特产，每年输出总值约在三四百万元……”（申报，八．一。）

五．水利

沪银团投资建筑陕省三渠工程：“陕西省政府为举办兴渠工程以利灌溉，而救旱荒起见……”（上海大美晚报，八．三。）

水利捐征收十三年查不出用途：“常熟通讯：江苏常熟县七区沙洲市田亩，每亩带征水利亩捐一角，历时十三年……”（生活日报，七．十二。）



时评：华北水灾与水利问题：“近五年来，遍布全国的大水灾两见，而遍布全国的旱灾一见……”（申报，八。二。）

十. 粮食问题

港汇虽跌米价仍高：“本省因时局不定，港纸市价，突飞猛涨，影响物价高昂……”（香港工商日报，七。三。）

京市粮食现况：“南京电：市粮食公会息，本年小麦收获极丰，来京麦船及购麦客商甚踴躍……”（申报，八。三。）

日停购澳小麦，中国小麦畅销：“日本经济界以对澳经济报复为中心，从事购进澳洲小麦……”（上海日日新闻，八。一。）

十一. 棉产

津市日商调查冀省棉产：“本市消息：本市日本东洋株式会社调查我国各地棉产状况……”（天津大公报，八。三。）

华商方面に於ける本年度棉作豫想：“邦商側の本年度棉花作付反别及び收获豫想に就て……”（上海日报，七。三〇。）

十四. 农民运动：

定海县で盐骚动“警官队と盐民が大冲突，全县城恐怖にモまる……”（上海每日新闻，八。二。）

（三）工业

一. 工业概况

入夏以来，沪市工商业稍见发展：“据本市工商界方面消息，两三年来，本市工商各业，因受……”（中华日报，八。四。）

省府设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广州专讯：省府主席林云陔体察粤省民情，……此次粤局奠定，余总司令决定……”（香港工商日报七。二九。）



二. 工业团体及会议

李德轩朱敬等反粵主持机器工会：“中华全国机器工会广东机器总会等，自前数年林冀中强姦民意……”（香港工商日报，七. 二九。）

四. 机器

日本发动机运销长江流域：“随日本重工业品对华输出跃进之机运，日本冈山县内燃机关工业组合，依外务省并商工省之怂恿……”（上海日日新闻，八. 四。）

六. 其他矿冶

陕县澠池新安矿产概况：“新安煤田：（一）位置……”（河南民报，七. 十四。）

港煤油公司输油入粵发生问题：“专访：陈济棠霸据粤省时期曾藉某种应急问题，向本港三大煤油公司借款三百万元……”（香港工商日报，七. 二七。）

七. 棉纺织业

上海日商纺绩上半期业绩：“利益率平均激增，受币制改革影响……”（上海日日新闻，七. 二九。）

纱业前途黯淡，实部统筹挽救：“实业部鉴于国内各华商纱厂，深受外纱压迫，前途异常暗淡，华北方面几将完全破产……”（中华日报，八. 五。）

八. 丝纺织业

无锡纷设小型丝厂：“无锡通讯：本县各丝厂一部份业已改装新式丝车……”（上海大公报，八. 三。）

九. 面粉业

面粉业表示应当制止华麦出口：“日方最近在我长江一带，农产品购买大量小麦……”（中华日报，八. 五。）

津市面粉交易所开创立大会：“本市消息：津市商界钜子



张品题杨西园等发起组织之面粉交易所，资本已募足二十万元……”（天津大公报，八·三。）

十九. 劳资纠纷

鸿兴厂纠纷未息，厂方拒绝工人膳食：“法租界菜市路鸿兴襪厂全体工人自经市党部劝导先行复工后，……”（上海大公报，八·三。）

鸿兴襪厂工人今晨又起怠工：“本埠菜市路鸿兴襪厂前因开除工人致引起全体工人发生罢工风潮。……”（大美晚报，八·四。）

（四）交通

二. 铁道

建筑京衢路借款卅万镑：“本市消息，中英庚款会昨晨九时在银行俱乐部公开第四十次全体董事会议……”（上海大公报，八·四。）

蒋注意粤汉铁路，曾养甫由韶飞浔：“广州专讯：铁道部自将粤汉铁路南段，株韶，湘鄂等三段合并组织……”（香港工商日报，七·九。）

三. 公路

江浙公路又完成三支线：“中央社上海一日电：江浙两省公路交通，自沪杭，锡沪，苏嘉等干路通车后……”（上海大公报，八·四。）

无锡路工发生暴动：“无锡快信：苏锡公路无锡段筑路工人，昨因强借民房未遂，毁局毆人……”（上海大公报，八·二。）

四. 航运

姚伯龙日内赴粤组航政局：“南京电：交部令派姚伯龙为广州航政局长……”（申报，八·一。）



永明很仔细地翻阅陈教授的剪报材料，他钦佩得什么似地对陈教授说，“我一定要学你做这样有系统的剪报工作。”

“是的”，陈教授答，“这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同时也是非常艰苦的。这一类的事业非用集体的力量是办不好，而且实在，也是办不来的。当然，个人也可以做剪报工作，不过个人所能做的，范围一定不会很广，材料一定不会很多，而且在工作的效率上也一定不见得高的。上海现在有个文化资料供应所，他们就集合着几个朋友，用集团的办法，搜集很多材料，加以整理供给一般研究各项问题的人的参考。什么时候有便，我可以介绍你去参观一下。他们搜集材料的办法是比较科学的，所以他们所取整理出来的材料，也比较可用。”

“我们大规模的剪报工作当然干不来，小规模的我可以用来试试。陈先生，你觉得怎样？”永明问。

陈教授点着头说：“你的话很对。我具体建议，你们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应当可以进行这个工作。你们只要订几份比较重要的报纸——我上面已经举过的报纸，分工阅读剪贴和分类。不过，永明，报纸的材料固然很新鲜很重要，然而往往缺少系统，有时还不很可靠，所以我们对于杂志上比较有系统的材料，也得用科学的办法去搜集。”

“对极了，你说用什么方法来搜集？”是永明的问话。

“好罢，假如你要详细明瞭这些，我就干脆地陪你到刚才说过的文化资料供应所去参观一下，这样你可以窥其全豹，同时可以跟那里面的职员讨论讨论。”

陈教授就马上陪了永明赶到文化资料供应所。一个壮健的男子出来招呼他们，他不多话，只扼要地清楚地答覆永明所问的问题。

永明看见他们所搜集的报纸非常之多，整理的方式跟陈教



授对他说的差得不多，不过范围是更广泛了，包括着国际的政治经济，和国内的政治和一切社会问题。材料按月按类归开要用用的时候非常方便。现在永明特别注意他们用什方法整理杂志材料。关于这个问题，他问那办事员。

“关于我们的杂志材料现在还是很不够的。定阅和赠送的杂志大概有一百种上下。大部份旧的杂志，我们已经都把它们拆散了，各期杂志里面的有用的文章，我们都把它们留下，没大用的就丢掉。有用的文章，也分类保存着，分类的办法也是按照报纸的分类法。

“至于最近的杂志，”那位办事员一边接着说，一边去拿几本厚厚的硬簿子来，“我们把各种杂志中的有用文章分门别类登记在这些簿子里。什么人要参考杂志材料，就用这个簿子作为向导，按他所要用的类别去找他所要用的材料。比方，你要找农业方面的材料你就翻看这一本登记簿，”那位办事员就把簿子给永明。

“假如你要用农村副业方面的材料，那末你就从这里找到你所要用的题目，再到书架子里去找你所要用的杂志和文章。如这里所列的有：

类 目	作者	杂志名称	卷 期	页次	出版年月日
养蜂问题	章元章	农报	2·1	22	24·1·1
养鸡问题	黄异生	农报	2·3	88	24·2·30
河北任邱县农村副业的今昔观	和泰	东方杂志	32·16	96	24·8·16
苏州光福农民之副业	赵丕钟	农报	2·27	966	24·9·30
杭县扇业调查	徐德瑞	实业统计	3·5	127	24·10·1
鄞阳种烟农民	沙芸	中国农村	2·2	63	25·2·1
余姚的盐民生活与盐湖	叔范	东方杂志	33·2	103	25·1·16
江苏省农村副业之新努力	陈一	农行月刊	3·1	12	25·1·16



你看到这些题目假如认为对你有用，那就按照各该杂志的卷数期数和页数去找。”

永明好像突然发现了从未发现过的富源，他尽力要去开发。他翻阅着各类问题的杂志材料登记簿子。

“假使我们做些杂志材料的整理工作，你看可能不可能？”永明问那位办事员。

“有什么不可能呢？”那位办事员回答，“最初进行的时候，规模不妨小些，选几种对你研究工作最有用的杂志，进行分类的登记。这件事比剪报工作要轻松得多，就是不用集体的力量也是可以办到的。至于定购杂志，我想你们可以合几位同学，有计划地分订几份，共同参考。最好你们请图书馆里的办事员进行这种登记工作，即使不可能，你们自己也可以根据图书馆所有的杂志，进行这步工作。”

第六章 中国经济性质座谈

一个风和雪的晚上，永明他们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今天举行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座谈。出席的朋友除了研究会会员而外，还有陈教授和两位陈教授的朋友。

“今天我们要讨论中国经济的性质问题，”永明今天被推为座谈会的主席说，“这是我们上次座谈会所决定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研究中国问题时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改造的途径都要看这个问题怎样解决而决定。今天，我们还是照上次座谈的规定，先请陈先生做一个明确的报告，然后各位提出意见来讨论。”

陈教授在掌声中开始他的报告。

“我今天所报告的，可以说是非常简单，可是，我愿意把



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所要注意的几点，都扼要地提出，然后请大家讨论。

“第一，我先简单地说一说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前的特性。在帝国主义没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经不存在典型的封建制度。在那时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特点：

（一）土地当然是决定的生产要素，不过当时中国的土地已经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面不能自由买卖，可是在本质上他们对于农民高度的收夺，还没有改变封建社会地主的性质。在那时，有钱的人，无论是官僚或是商人，都愿意购置田产，身为地主，坐靠收取高度的地租过活。这些地主在农村里面当然是一切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他们对于农民是有控制一切的权力，他们简直是‘皇帝’在乡村中的代表，同时在实际利益上讲，‘皇帝’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

（二）当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非常猖獗。这一点表示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的特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资本的两种原始形态；它们破坏社会的生产，同时它们自身又建立不起新的方式的生产。它们在小生产统治的社会里面，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它们吸尽小生产的膏血，使他们根本上不能改良他们的生产。它们在中国所造成的只是经济上的颓废和政治上的腐败。假如中国在那时存在着别种有利的条件，使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能产生的时候，那末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中国倒变成了产生新生产方式的杠杆了。可是，不幸得很，中国社会那时内在的和市场的条件都不够滋生一个近代的生产方式，因此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这一对孪生儿在中国便成为一对狠毒的魔鬼。在那时候，高利贷事业和小资本的买卖是兴旺得很，可是在那时候并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二，我们要一般地说一说帝国主义的侵入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生活的影响。不消说得，帝国主义的侵入落后国家为的是要使后者变成它自己商品的尾闾，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特别是要使后者变成它资本的接纳场所。所有这些目的只在于增加帝国主义国家资本家的利润，扩大那些宗主国家的生产，特别是要扩大再生产它那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的体系。

“我们不能否认，帝国主义资本在落后国家的活动，一面又促进了那些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和成长。这在一方面虽然扩充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另一方面却又造成它自身的‘对头’，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显然会给宗主国的母体一种重大的威胁。所以就宗主国资本的主观上讲，它一般地是要阻止落后国家民族资本的发展的。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印度是个很好的例子。英帝国主义束缚和阻止印度民族工业的政策，以英国资本侵入印度起，直到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爆发时止，都是一贯地执行着。大战勃发以后，英国资本因为要对抗日美两国对于印度的影响，同时还因为其它政治上的因素（如印度农民暴动，士兵叛变，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回教同盟跟印度国民会议派的联合等），就相当地放松了对于印度土著资本的钳制。不过英帝国主义对于印度的民族工业却始终保持一种敌意，英国在印的金融资本，运用它们在印各种有利的条件向印度民族工业进攻；尤其是从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后，英国全部资本打进印度民族工业，更进而统制民族企业的政策，进行得格外认真。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多数印度人经营的企业都破产了。这到底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它们受不住英国雄厚资本的压迫，它们绝对够不上跟那些有雄厚的金融资本为背境的英国企业相竞争。



“帝国主义的资本虽然一般地阻止民族资本的发展，然而它们对于落后国家原有的经济却要尽量地破坏。自然，这种破坏工作，决不会来‘成人之美’，替民族资本造成正当发展的基础，相反的，它们破坏殖民地半殖民地自然经济的目的，是在替自己打好出路。换句话说，它们只想怎样扩张它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市场，怎样可以利用殖民地大众的贫困化和无产化，来保证它们得到最便宜的劳动，同时怎样可以造成种种有利的条件，向落后国家输出它们过剩的资本，取得高额的利润。

“所以，我们关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对殖民地经济的影响，大概可以归纳到这样几点：第一是破坏落后国家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生活；第二，加强外资对于殖民地大众的剥夺，而使大众的生活更加穷困，更加悲惨；第三，它在客观上会促进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生长，不过在主观上，它是要用尽方法，阻止土著资本的发展，绞杀各种民族的企业。这种情形在帝国主义已经到了没落的阶段，特别来得显著。

“第三，我们要说到中国民族资本的买办化。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加深对帝国主义的隶属是个同一的过程，这是中国近代经济生活的一个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自始就没有独立的性质，它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侵入国内的结果。

“外国资本在十九世纪就已经部份握有中国经济的支配权。前世纪末叶，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可以有过的入超，一八九九年的对外贸易总额是四六〇、五五三、〇〇〇两，其中输入占二亿六千四百万两，输出是一亿九千九百万两，当时棉织品的输入占到全部输入的百分之三十九。这表示什么呢？这就是说，中国在那时已经做了国外商品的广大市场。

“论到海洋和内河的航运，那更不消说了，在前世纪末，



中国的航运差不多已经操在外国资本手里，中国的船隻只起些补助的作用。铁道建设权完全操在英俄德比法美等帝国主义手里。在金融财政方面，外国银行已经握得支配权，它们在中国的国际借款中，在对外贸易中，在发行纸币中，争取它们优厚的利润，扩张它们的统治地位。在那时候只有矿业和轻工业方面，中国的土著资本还占有相当的优势。

“一九一四年放起第一声大炮的世界第一次大战，一方面给日本在远东的发展一个无上的良机，同时又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所以可怜得很，今天中国还有些傻瓜还在热望一个类似第一次大战的战争，他们认为在那时中国国民经济又可以突飞猛进；他们不知道，假如第二次大战在现存条件爆发起来，中国早给我们的民族敌人一口吞掉了）。在那时期，尤其是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得飞快，纺织品的输入顿然减少下去，新式的纺织工厂固然很快地增加起来，就是手工工厂式的企业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滋长。这就是所谓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历史上最是趾高气扬的时期。在那时，中国的民族资本是可以称颂的，它显出它独立的峥嵘头角，一面对于帝国主义的资本起相当的反抗作用，一面对国内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封建残余，给以重大的打击。

“然而中国民族资本这光荣的瞬间不久便烟消云散了。虽然这种英勇的传统在此后的许多政治运动中还表露出一一点遗迹，但是经济上，因为大战过后欧美资本的对华重振旗鼓和日本资本的加紧侵害，民族工业就呈秋风落叶之概。当然这期间有一部份工业还有相当的发展（像棉纺织业，丝业等），可是到了世界经济恐慌爆发以来，特别是东北失陷，华北大好河山失了屏障以后，这些脆弱的民族企业就不得不遭到其最后没落的厄运。在这期间，民族资本差不多已经完全失去了独立发展



的可能；同时国内革命势力的发展，又剥夺了民族资本反抗外国资本和削弱封建势力的最后的勇气。结果怎样呢？我们的民族资本为要维持其丰厚的利润起见，为要令其自身的存在不受致命的打击起见，它就不得不收束起英勇的独立旗帜向外国资本投降，向封建主义妥协了。

“中国的民族资本逐步逐步地向外国资本投降，结果它只做成帝国主义在华流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所能得到的好处也就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大众身上所取得的额外利润的一部份——‘买办利润’。中国民族资本这种买办化的过程，在这次世界经济长期恐慌跟萧条期内发展得特别显著。恐慌的狂飙，把所谓真正的民族企业，吹得烟消云散。几个硕果仅存的‘民族’工厂不是给外资收买，便是抵押给国内的银行资本。国内买办性的金融资本一天天变成中国‘民族’资本的支配形态；中国整个的经济生活就主要地透过这种‘金融’资本，把支配权交给帝国主义。

“中国的买办资本一面投靠帝国主义，过一种顶无赖的生活，一面却与国内封建势力彻底妥协。它们为什么会妥协呢？第一从经济上看，民族资本本身力量非常脆弱（主要是因为受外资压迫的关系）已经没有那种本领，可以摧毁封建的桎梏，自由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次，从政治方面看，大众改造势力的高涨，使它预感到自身的毁灭已在不久的将来，因此不得不跟旧有的统治力量勾结起来。买办资本跟封建势力妥协的结果，使原有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经济形态搀杂一些资本主义的成份，同时买办性的民族资本又充分地利用各种落后的剥削方式，为了保证帝国主义的长驱直入，维持其自身的苟延残喘，反而显得耀武扬威起来。

“上面所说的是中国民族资本的买办化，及其和封建势力



的妥协。现在第四我们要说到封建和半封建势力的动向问题。

“中国目前是否还存在着典型的封建主义呢？当然，是没有的，中国历史上的典型的封建制度早已给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腐蚀光了，留下来的只是一种破烂而又血腥的残余。这种残余，在近代的中国已经做了帝国主义的附庸，充当外国资本侵略中国的前卫。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残余，他们同国内的买办资本已经建立起最密切的关系，他们一小部分已经自身做了资本家（比方许多军阀兼办实业和银行；许多地主投资实业做了大股东，其余的也接受了这种买办资本的资助。因此一般讲来，封建势力跟买办资本，不仅不在冲突，而是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已经建立起巩固的联合战线，一面效忠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一面宰割农民大众的血汗，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国内封建的残余，就在这些条件之下，它本身的性质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换句话说，它们已经不像外国资本未侵入以前一样，具有那种朴素的性质，现在它们已经跟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资本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农村有许多新兴的地主，他们不是和城市资本具有最好的关系，便是本身在城市中就是工商企业的主人。

“同时我们又不能否认，中国的封建势力有一部份的确是在没落的过程之中，有些孤立的中小地主在农业恐慌一天一天深刻的情形之下，它们的力量在一天天衰竭。可是跟着起来的，不是像正常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农民的经营，或是大地主的企业，而是许许多多新兴的专靠收租为务的地主，这种地主现在就是中国农村中直接的主人，他们在农村中的经营方式多半还是半封建的，他们对于农村大众的剥夺，也是取一种毒辣的落后的方式。

“现在我把上面简单的报告做一个总结：我们已经知道，



帝国主义的资本已经掌握了整个中国国民经济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有的采取直接的方式，而多半还是透过中国的买办资本跟封建势力间接地实现出来。中国的买办资本跟封建残余在帝国主义的指导之下，已经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下层大众。买办资本和封建残余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可是这种矛盾已经给整个统治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掩盖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大部份已经买办化，就是留下些独立的民族企业家，它们也已经失去了对抗帝国主义和削弱封建势力的力量，他们只是靠着对劳动者的野蛮的剥削，维持他们脆弱的存在。至于国内资本和封建势力对于农民的支配，正采取种种原有的或是‘改良了的’半封建方式，在外资的钳制底下，半封建的势力固然不能而且不愿变成近代的资本势力；就是土著的资本也还是沿用旧式资本（即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方式并不向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前进。因此，全中国的劳苦大众，他们虽然都是无产者或者半无产者，可是他们终不能大批地走近资本主义的生产之门，而终于陷溺在半农奴半奴隶式的生活之渊里。所以中国经济的性质，可以说是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的半封建经济。我的报告就这样结束。”

“现在陈先生的报告已经完了”永明以主席的资格说，“陈先生在这样冷的天气赶来详细地指导我们，我们同学实在感谢得很。现在各位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讨论。”

有一位同学发问：“陈教授在刚才报告的结论里面，告诉我们中国经济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半封建经济。现在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半封建，它和完全的封建制度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陈教授回答，“半封建的经济当然同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同，同时也跟完全的封建经济不



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经济的高度商品化，是生产手段所有者（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近代工人）的对立。在完全的封建社会里面，那就完全不同。第一，封建社会一般地是以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封建领主都是自囿于自足自给的范围里面，农民更是靠自己的生产，过着他们跟外界隔绝的生活。在农奴时代，一部份市场的相当发展，那已经是旧制度崩坏的先兆了。封建经济的第二个基础是农民的被束缚于土地，封建的地主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保证农民的劳动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可以看出资本家的社会和封建社会处于正相反的地位。封建社会要把土地分给农民，使他们束缚在土地上面，不能随意移动；而资本家社会却要把生产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变成‘自由自在’的劳动者。封建经济的第三个特点是农民对于地主是有人身的隶属，地主对于农民的一切都有权力支配。

“当封建经济在逐渐解体，商品经济已经相当的发展，这时候就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然而资本主义的经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看那个社会的内部和环境是否已经具备了几种必要的条件（如无产劳动者的阵营，近代的生产组织，适宜的市场等等），而且这些条件也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假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条件还没有成熟，或者已经不可能存在，同时封建经济已经给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特别是强有力的国外金融资本，很快地破坏了，在那时候，社会经济的结构一定会融合着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双重的特点，而形成过一个过渡的时代。这个过渡时代的性质我们就叫它半封建的经济。我们不要忘掉在这个半封建的经济结构里面，封建的成份一般地还占支配的地位。同时这个过渡时期到底有多么久，那全看那个社会内部和客观的环境。比方，近代的中国社会，长期逗



留在半封建的阶段，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帝国主义资本对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束缚，民族资本既是透不过气来，那末半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作顺畅的发展，便完全是不可能了。当然，中国之所以不能走入资本主义的阶段，跟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已经到了没落的阶段这件事也很有关系的。实际说来，衰老的资本主义在今日已经不能培养自己的活力，已经很难扩大自身的再生产了。”

陈先生说完以后不久，永明就接着问道：“陈先生已经把半封建的意义讲个清楚，我们还要请问半殖民地究竟是什么？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究竟有什么区别？还有，中国经济现势讲话所讲的‘中国经济的本质对外是半殖民地的，对内是半封建的’是不是正确？”

陈教授回答说：“半殖民地跟殖民地不同的地方是前者还相当的保持其政治上的独立，而后者则完全隶属于某个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的国家还自成其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而殖民地就已经完全不成其为国家，此外在经济的生活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还有重大的差别。当然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可以说已经完全从属于帝国主义上；然而它比起一个殖民地来还相当地保留着部份的自主性。中国便是这样一个从属于帝国主义同时保留着行政上的独立（尽管是名义上的）的国家。

“至于所谓中国经济对外是半殖民地性，对内是半封建性的话，假使不是机械地去了解它，那就没有多大错误。假使作者的确把对内对外这样机械地分开，那末我们对于中国的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的两种性质，就得不到正确的了解。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之所以逗留在半封建的阶段，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中国的半封建性又保证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即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这两者是相互促



进，相互加深，相互渗透的，这就变成对内的同时也就是对外，对外的同时也就是对内了。”

第七章 今天的课题——国防经济

学校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的会员已经从十多个增加到五十几个。

今天他们要请陈教授演讲中国经济问题。陈先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一个短短的演说：

我们今天的课题——研究国防经济

“目前中国情势的特点是在某帝国主义要想使而且正在使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它完全的殖民地，同时，中国民众的救亡运动正有空前的高涨，可能发展成全国一致的武装抗战。这种情势已经将一种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全国的人民大众。我们要胜利地开展我们的民族解放战争，而取得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们研究目前的中国经济，就应当根据我们全国人民的总的任务规定今天我要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对敌抗战的物资和社会的基础，以便建立起我们的国防经济。详细点说，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课题应当包括下列三项：

第一，帝国主义特别是某帝国主义在如何掠夺我们的领土和资源，破坏我们的经济壁垒，更进而摧毁我们整个的国民经济。

第二，在某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之下，中国各个民族和各种社会成份，那些一定会作为抗敌救亡的主力军，那些可能参加抗敌救亡的民族阵线，而那些又定然会参加敌人和汉奸的阵线。



第三，我们要研究中国现有的资源和生产金融的装置，使它们怎样配合着全民族的抗战战争，进行必要的开发和动员，来保证对敌抗战的胜利。

“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有些‘金装’的经济学者，在背诵亚当斯密列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教条。这些先生们不是有意地在替我们的民族敌人作理论上的辩护，便是在无意之间作成了民族敌人的俘虏。这种现象当然是非常可耻，非常可悲的。然而这种可耻而又可悲的现象，却有它一定的社会根源。这些高贵的经济学者到今天还没有直接接触到某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大众疯狂的掠夺，到今天还没有听到和见到中国民众救亡的呼声和行列，他们的利益还是安安稳稳存放在银行和最高学府里面。他们今天所要求的只是如何在滔天皇恩之下，让他们金屋殿堂继续存在，因此他们愿意捧着那些经济学上的陈言烂说，来讨好敌人，包庇自己。他们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证明敌人的侵占我领土，虐杀我人民之为合理，因为在他们的眼光里，日本的向外扩充领土，的确为了解决他本身的人口过剩问题。然而谁都知道，日本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也并不算最高，它比起我们中国的有些省份来，非但不较高，而且还低些。同时我们知道日本的北海道，至今还是人口稀疏，毫未开发。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不用力开发它自己人口稀少的领土，来解决它的人口问题，而一定要武装占领中国的领土呢？这一点在我们那些高贵的经济学者是不会了解的，而且也是不愿意去了解的。

“又如，他们否认货币权争夺的理论，来掩护敌人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财政金融的进攻。他们认为过去美国的厉行白银政策，英国的怂恿我国改行新币制，乃至日本在华北和上海一带的发行日本纸币，都只是商务和金融技术上的问题。他



们闭着眼睛否认，这是各帝国主义为要争夺我国的货币权，更进而侵夺我整个财政金融权的强盗勾当。他们那种庸俗的理论只在掩饰敌人的进攻，减轻敌人的罪状，结果就会便宜敌人的侵略，松懈国内大众的奋斗。

“又如他们又用经济发展程度决定民族兴亡的机械理论，来证明敌人灭亡中国是天演的公理，同时中国民族的灭亡，也是‘天命所归’，不可相强。这种荒唐的说法曾经作为三日亡国论和唯武器论的根据，而毒害了全中国四万五千万的人民。他们在表面上好像用社会经济来解释民族国家的命运，实际上他们就是最不了解社会经济的结构对于民族存亡究竟可能发生什么作用的傻瓜。他们不知道，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尽管先进，然而假如它从事于一个侵略战争，那末我们就绝对能不说，它一定是会得到胜利。要不然我们对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终究会脱离英国的羁绊，这一点固然不能解释，同时对于苏联在各帝国主义的围攻之下，竟能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干涉军队，争取它最后的胜利这一回事，更加无从解释了。

“上面所说的那些经济学者，他们在主观上尽管不愿做民族敌人的辩护人，然而在客观上，他们的确在长他人的威风，挫自家的锐气。

“其次，我们要说到一部份观点正确的中国经济研究家，他们站在科学的经济学的立场，在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说明他的性质，指明中国社会改造的方向，任务和动力。我们认为这种工作是可敬的基本工作，它对于中国大众求取解放的运动，的确给予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只有在这种基本的工作得到相当的结论以后，才能正确地规定我们前进的途程，要不然，我们便像盲人骑瞎马一样，前途是非常渺茫的。

“然而我们在今天，当民族敌人正在张牙舞爪，满想把中



国一口气吞灭，当民众救亡运动已经普遍全国，向敌人作最后的搏斗的时候，我们只做了这一部份的基本工作是不是已经够了呢？我们说，这是不够的。第一，我们还没有把国内社会改造的任务跟民族解放的任务，正确地联系起来，我们没有正确地把民族解放的任务摆到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位。第二，我们没有充分地估量着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也没有正确地估量着国内各阶层参加救亡民族阵线的可能。第三，我们没有充分地指出敌人正在怎样破坏我们的经济壁垒，更没有具体地规定我们应当怎样积极地建立起我们坚固的国防经济壁垒。

“第一，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还没有把国内社会改造的任务跟民族解放的任务正确地联系起来呢？让我们反省一下罢，过去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经济的朋友们，曾经用多少力量，着重地指明，民族解放是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前提呢？我们敢于自己承认，关于这，我们是做得很少的。我们知道这不单是一个疏漏，而且是个严重的错误。我们试问：在目前中国正从一个半殖民地变为完全的殖民地的时候，还有什么比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更加神圣，更有决定的重要性呢？我们能够设想在最大的民族敌人没有给我们击溃以前，我们能够求得全般的社会解放吗？我们能够设想在我们最大的敌人得寸进尺，企图把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沦为四万五千万奴隶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谈什么彻底改善生活条件吗？我们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不过是争取阿Q式胜利的幻想而已。恰巧相反，我们主要的民族敌人一天没有消灭，他们对于我们的生存权便一天剥夺一天，他们对于我们解放运动的压迫，便一天凶过一天，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放过我们民族最大的敌人，关起门来大谈其在里面改造的工作。所以我们应当把民族解放的任务，摆到我们



一切任务的第一位。

“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把争取民族解放的任务高高地掉在半空，跟社会改造的任务完全隔离起来。假如我们这样做，那末我们又犯了严重的错误了。中国的人民大众在民族解放的任务没有完成以前，决没有可能来彻底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假如我们由此就认为在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之前，或是在民族解放运动进行的过程之中，我们绝对谈不到大众生活的改善，那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就算犯了罪。诸位，你会想象到一个民族解放的战争，没有人民大众的参加而能争取到胜利么？你又能想象到假如大众的生活不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他们会来参加民族的救亡阵线，跟敌人拚命么？”

“在这里永明君和别的同学过去举行农村救亡宣传的经验，就是胜于雄辩的事实。他们对农民谈救国救民，救民族，而农民所要听的是怎样救自己；这显然表示出，不能救大众的‘救国家’‘救民族’，大众是始终不会感到兴趣的；而且这种所谓‘救国家’‘救民族’，也就不是真正的救国家救民族，他们是救不了什么的。只有在救亡的过程中，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才能保证人民的参加这个阵线；同时，只有人民大众热诚地参加救亡阵线，民族解放的运动才有发展的可能。这就是民族革命和社会改造之间的正确的联系：民族革命是社会改造的前提，同时民族革命一定要有社会的改造来充实它的内容，保障它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要附带说到一部份研究中国经济的朋友对于民族问题确乎存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在今天可以说是非常有害的。他们怕谈民族独立和自主的问题，因为他们怕被贬做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怕说民族革命，为的是他们怕被人家骂



做抹杀社会革命的混蛋。他们甚至不敢设想中国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他们认为中国只是一个社会，一个由几个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实际上这种了解可以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是这么一个社会，那是不错的，然而中国却同时又是一个民族，又是一个具备着各种必要条件的国家。我们不怕中国是一个民族，恰恰相反，我们还夸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光荣和优越，我们还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要凭着这种夸耀和热爱团结起一切人力和物力，来摧毁我们民族的内外敌人。我们认为，我们光荣的民族，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这一世纪来，已经受尽帝国主义者兽性的践踏和国内奸细们无耻的污辱。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决不是为要扩张自己的领土，侵略别的国家和民族。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一个压迫别个民族的民族，它本身决不会是一个自由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少数统治人物对外固然要侵略别人，对内还是要压迫国内的大众，所以这个民族本身就是重重桎梏之中。而我们民族的前途决不能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也决不能做一个侵略的民族主义者，侵略的爱国主义者。

“然而我们还是热爱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我们明白我们是处于被帝国主义支配的被压迫民族的地位，一个被压迫民族之受内外敌人的双重压迫是无疑的。因此被压迫大众首先应当团结整个民族的力量，打击内外的敌人，以求得这个民族的真正独立与解放。

“第二，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对于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国内各阶层参加民族救亡阵线的可能，没有作充分的估量呢？

“是的，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性质的研究已经做了些初步的工作，然而我们对于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中国社会在急速殖民地化的过程中间，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各个阶层的地位和它们



之间力量的对比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些问题曾经加以精详的研究和明确的结论没有？我们敢于承认，那是没有的。比方我们知道民族资本的阵营里在最近的确起了很大的变化。从基本的方面看来，民族资本已经失去它的独立自存的性质，它已经充分买办化了，那是不错的。然而这种估量在目前可以说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是不够的。我们知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所受某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进攻，已经使得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遇到最后的危机，这期间大部份的民族资本家也早已感到致命的威胁。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疯狂的进攻，使得中国整个的国民经济可能完全破坏。结果，民族资本的阵营，在他们没有重新英勇地参加广大的抗敌民族阵线之前，只有被打得七零八落，毫无存在的余地。

“其次，我们再说到民族资本买办化的问题。不错，民族资本在外力的打击之下，只有更加强它买办化的企图。可是，在另一方面这种买办化的可能却在一天天减少，因为第一，某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一天天趋于独占，其他帝国主义已经遭受到最后的排挤；第二，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一天天在采取直接统治的形式，买办资本的功能在一天天缩小。这样民族资本在它买办化的‘顺路’上，也碰到了无数的荆棘。

“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甚至于一小部份的买办资本（尤其那些给某帝国主义以外的帝国主义谋利的买办资本）对于日本的进攻，可能不立即投降，而且有参加整个民族抗敌阵线的可能。你看，从某帝国主义对华的武装走私一天天厉害以后，国内的财政大受影响了，民族企业都要闭歇了，这时候民族资本家也不得不起来作最后的呐喊，组织缉私团体赞助一般群众的强制缉私工作，这不是最明显的例子么？

“民族资本的阵营已经起了这样的变化，其它像农村中间的



各个阶层也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就地主而论吧，当日本的军阀和资本家一步步抢夺我们的领土的时候，农民的土地固然要使他们没收，就是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也是朝不保夕。你看，日方在东北的作为，就是这样。在那种情形之下，就是最顽固最反动的地主，有时也会参加抗敌的运动。东北有些失了土地的地主，曾经参加甚至暂时领导过农民的抗敌游击战争，这不又是很明显的例子么？其次像农村里面的富农，他们虽然平时也是要剥削贫农和雇农的，然而在目前空前的民族问题使得经济恐慌更加深刻，这使富农感到无限的苦痛，同时敌人的占夺土地，富农当然不能幸免。因此他们比起地主来，更有参加抗敌运动的可能。

“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的朋友，假如对于这些社会各阶层地位的变化，各阶层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没有充分的正确的估计，那末我们在建立民族抗敌阵线的时候，就不可能有胜利的前途。

“第三，我们要说国防经济中的物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过去的研究是更加不够了。倒是那些落后的经济学者，他们对于中国的资源问题比较上用了些工夫。不过，你们要知道，他们的研究因为方法上根本成问题，所以他们研究所得的结论，对于全中国抗战的任务，往往帮助很少。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第一要研究敌人怎样在占夺我们的资源，支配我们的铁路航运等交通机关，怎样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制度，而代之以它自己的货币，它自己的资本；怎样在搜罗我们的粮食和食盐等原料，自己巩固他们侵略战线的后方。而同时就是削弱我们的抗敌力量。

“第二要研究中国资源的分配，生产，以及金融，交通运输的技术机构，为的是要完成我们经济上的总动员，保证我们



对敌抗战的胜利。我们要最具体地研究近代的战时经济，研究经济的动员跟军事动员的配合；研究在总的抗战战略之下，人力财力的动员方式和效率，研究经济动员与改善大众生活的适当联系与相互的促进。这种新的任务我们一定是以最大的力量，最大的胆量肩负起来。这种使命是神圣的，一切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员都必须负担起来的。

“我们在今天要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那末我们对于上面所说的三个问题：（一）民族解放跟社会改造的联系，（二）各个阶层参加民族救亡的可能，（三）经济的总动员，非彻底加以研究不可。

“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我们今天的课题。”陈教授的讲演就这样结束。



中国农村经济



一九三一年大水灾中 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

中国历史上充满着农民大众惨痛的呼声，他们在追踪来到的饥馑和灾荒中呻吟而咆哮。特别在最近一世纪内，灾荒所及的面积一次比一次扩大，饥馑的程度更一次深过一次。

1878年英国的驻华领事和西氏 (Alexander Hosie) 曾编过“中国的旱灾” (Droughts in China) 一书，他从《图书集成》中找到许多记载和数字材料。据他的统计，中国北部诸省 (包括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甘肃) 在西元620—1619年这一千年中间所发生的比较严重的旱灾共有一百次；中部诸省 (浙江，江苏，湖北，四川，安徽) 则有七十七次；南部 (江西，湖南，福建，广西，云南，贵州，广东) 也有三十九次。

竺可桢先生曾在他所著的中国有史以来之气候变化一文上发表了一个自唐初至二十世纪初叶每一百年间所发生的旱灾次数的统计：

	唐	五代及北宋	南宋	元	明	清
	618—907	908—	1127—	1280—	1368—	1644—1847
		1126	1279	1367	1643	1861—1900
河南	4.2	24.2	5.3	21.9	2.9	12.4



河北	2.1	9.1	9.9	29.9	5.1	26.9
陕西	4.5	6.9	5.3	12.7	7.3	9.5
山西	4.5	2.3	5.3	19.6	13.8	7.3
山东	3.4	3.7	6.6	8.1	4.0	19.0
甘肃	0.4	1.4	0.7	5.3	0.7	7.0
浙江	3.1	4.1	15.2	6.9	16.7	13.9
江苏	4.2	4.1	14.5	10.4	3.3	15.7
湖北	1.7	2.3	4.6	12.7	16.0	16.2
四川	1.7	8—	9.2	2.3	1.5	0.4
安徽	4.5	7.8	9.9	4.6	2.2	14.5
江西	1.7	0.9	6.6	3.5	4.4	13.6
湖南	1.7	2.7	4.0	6.9	5.1	8.7
福建	1.4	1.4	5.9	4.6	7.9	3.7
广西	—	0.5	—	6.9	4.7	2.1
云南	—	—	—	—	6.5	0.8
贵州	—	—	—	—	1.1	—
广东	—	—	1.3	4.6	2.6	0.8

同时他关于水灾的次数他也有相同的统计（每百年中的次数）：（见73页）

从下引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灾荒发现的次数——特别是水灾，在清季为最多。沿海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河北，山东诸省在清季饥荒次数一般地比较以前更为增多，这些地方是和国外的经济势力接触得最早同时也最频繁的处所。我们所认为缺憾的便是在清季的灾荒次数统计中并没有将1840以前和以后分别统计，即从帝国主义的吸血管插入中国农村以后而呈现着的急激破产由灾荒反映出来的过程并没有用数字明白表现出来。



	唐 617—907	五代及北宋 908—1127	南宋 1128—1279	元 1280—1367	明 1368—1643	清 1644—1847 1861—1900
河南	4.2	17.8	1.3	34.4	2.2	26.0
河北	2.1	6.9	3.9	25.3	1.8	43.7
陕西	9.1	1.8	3.9	4.9	2.2	11.6
山西	0.7	2.3	—	4.6	7.3	12.8
山东	1.7	5.5	0.7	20.7	2.2	27.7
甘肃	2.3	1.8	1.3	5.7	—	8.3
浙江	1.4	1.4	17.8	4.6	4.0	22.7
江苏	1.4	2.7	9.9	3.4	1.5	43.3
湖北	0.3	0.9	4.6	4.6	0.7	26.2
四川	0.7	—	2.6	—	1.1	2.9
安徽	0.7	3.7	5.9	4.9	—	36.8
江西	0.7	1.4	5.9	4.6	1.5	21.8
湖南	—	1.4	—	3.4	1.1	20.6
福建	—	0.9	4.6	4.6	3.3	6.5
广西	—	0.5	—	1.2	0.7	1.6
云南	—	—	—	—	6.9	2.5
贵州	—	—	—	—	—	2.5
广东	—	0.5	0.7	2.3	1.5	7.0

民国以来灾荒的利爪更频繁地更深刻地更广泛地抓住了中国的农民大众。例如1911年淮河汛滥，在安徽淹没了10,470方哩，江苏省淹2,300方哩。这两省里平均每六七年总要发生一次同样严重的水灾，至于影响较轻的灾害则在三四年内即须发生一次。(W. H. Mallory, China, The Lana of



Famine, New York, 1926, P. 49)

黄河一向在缔造了“黄祸”特别在近年在1925年的夏秋二季山东省内黄河南岸的堤坝被水冲倒，淹没的地面达800方哩。这次损失单就农田收获而言，已有二千万元之巨。(Mallory, *ibid*, P. 52)

自从1891年以后河北的中部平原上曾发生过七次严重的水灾，即每六七年发生水灾一次。1924年的夏季河北又遭大水，被淹面积竟达五千方哩。那次单是农产物的损失将近有100,000,000元，再加上因不能种植冬麦和其他谷类而所受的损失，则其总数必将在125,000,000元以上了。(Mallory, *ibid*, P. 53)

1924年江西大水。赣州附近的堤坝，多半被水冲倒，于是几百方哩的良田，顷刻变成泽国。(Mallory, *ibid*, P. 56)

在这儿我们将讲不尽那些发生于近二十年内的悲惨的故事。1928—1929年间西北诸省空前的大旱灾当是我们最难忘的一幕古典的悲剧。它的区域跨及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热河，察哈尔诸省，五千多万人被禁锢在于冻与饿所制成的帐幕中，有几千几万个难民流浪到东三省以及江浙诸省，贩卖妇女的人市构成山西与陕西新兴的而且最旺盛的市场，小孩的数目特别迅速地减少着，因为政府“禁止”(！)不了贫农们因无食而屠杀自己的孩子的“残暴行为”。(！)田地整批地荒芜起来，田价暴跌了，富人出来做好事，用廉价大批收买田地，慈悲地养活了整千整万的灾民。

在这“灾荒的中国”，灾荒这魔鬼必然地将在其更扩大的规模中被生产出来，这“阵痛”的周期将愈来愈短，而其痛楚的程度将愈来愈剧。于是1931年的大水灾便背负其历史的任务



而“沛然”来到。

一、崩溃的全行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伴着政治的纷乱而显示出中国的特性的便是气候的继续不断的劣化。1921年后中国北部及西北部仅丰收过二年，最近五年更演成灾荒的连锁，水灾在1927及1929年发生于中部，1930年亦在中部发生。1928—29年西北大旱灾，1930年还继续演其余波。依据估计，1927年的灾民约有九百万，1928—一千四百万，1929—五千四百万，1930—三千万。

1931年的大水灾表现为这饥馑过程的最高点，灾区涉及十六省，全国受灾面积约四十余万方里。灾情较重的省份有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山东，河南八省。

据水灾救济委员会的调查在这八省中间确罹水灾而提出报告的有271县，占总县数642的42%，未被水灾的75县占总数的12%；其它没有提出报告的有296县，占全数46%（张心一，灾害损失与农业，满铁支那日志，卷8，号12，1931）。关于上述八省被灾的耕地可参看76页表。

下表为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所制成，据该局自己的说明，上述八省被灾县份中还有20县没有报告，所以“估计数目，较实数稍低，（但）当不致相差甚远。”

振务委员会调查所得的结果，一部分可以校正这估计太低的缺陷。例如皖省全省被淹的田亩占原有田亩的56%（振务委员会，安徽省水灾查勘报告书，1981页——以下略作皖报告书）。而主计处的调查仅48%。

南京金陵大学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调查131县受灾县份。这131县中被淹没的耕地占全面积的56%。



省别	全省耕地面积(百万亩)	有报告各县受灾面积(百万亩)	对全省面积的%
山东	110.7	14.0	13
河南	113.0	23.8	21
安徽	48.8	23.4	48
江苏	91.7	36.7	40
湖北	61.0	14.6	24
湖南	46.6	11.8	25
江西	41.6	6.4	23
浙江	42.2	8.0	19
共计	554.6	141.7	26

(天津大公报, 21, XI, 1931)

省别	被查的受灾县数	耕地全面积(百亩)	被淹亩数(百亩)	对全面积的%
湖南	15	174,056	89,634	51
湖北	30	253,427	139,183	55
江西	14	96,348	49,427	51
安徽南部	24	140,227	86,797	62
江苏南部	11	98,675	40,255	48
河南	1	37,500	31,875	85
安徽北部	19	394,309	237,678	60
江苏北部	17	368,333	196,716	53
总 计	131	1,557,878	871,565	56

(L. Buck, The 1931 Flood in China, The univers-



ity of Nanking, 1932, Table 2.)

灾情奇重的县份几乎全部耕地都给淹没。例如安徽省灾情最重县份：

	原有亩数 (A)	被淹亩数 (B)	B对A的%
五河	845,215	845,215	100%
芜湖	600,000	500,000	83
当涂	750,000	600,000	80
凤台	750,600	700,000	93

(皖报告书页16)

湘省被灾最重县份被淹田地对原有田地的比较

	原有田地(千亩)	被淹田地(千亩)	被淹田地对原有田地的%
南县	650	632	97.2%
沅江	760	725	95.4
安乡	514	490	95.3
汉寿	520	490	94.2
临湘	300	270	90.7

(振务委员会，湖南省水灾查勘报告书1931页22)——以下略作湘报告书)

湘省滨湖各县总共有垸圩一千四百余；本年水灾溃决的达1,292，未溃的仅166，以面积论，溃垸计3,968,194亩，占全垸面积80%，溃垸计937,218亩，占全面积20%(湘报告书页20)。

在1928—29年的大旱灾中被灾的人数达五千四百万，而在去年的水灾灾民人数竟达八千万。据主计处的统计重灾八省中被灾农户总数为八百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6%



省别	全省农户数 (千户)	有报告各县受灾农 户数估计(千户)	对总数的%
山东	5,918	722	14
河南	5,062	1,020	20
安徽	2,682	1,397	52
江苏	5,057	2,136	42
湖北	3,900	1,154	29
湖南	3,900	873	22
江西	3,292	683	21
浙江	3,165	544	17
共计	33,036	8,579	29

(天津大公报 21 XI 1931)

这估计当然又因为据报未全而失之过低。振务委员会关于湖南省的报告，称据报47县中(灾区及66县)被灾人口占全人口的29.6%(页. 18)中间滨湖区域的沅江，南县，汉寿，安乡，岳阳等县罹灾最重。

县名	原有人口数	被灾人口数	对原有人口的%
沅江	267,159	250,104	93
南县	265,158	243,000	92
汉寿	416,512	358,152	85.9
安乡	220,410	188,000	85.3
岳阳	478,231	377,500	78.9

(湘报告书，页17—18)

安徽被灾最重的县份如当涂，五河，凤台，怀远等县，其被灾人口竟占全人口的90%，86%，84%，83%，(皖报告书14页)据金陵大学关于江苏南部11县和北部17县的调查其结果为：



	农户总数 (百户)	被灾农户数 (百户)	%
江苏南部	5,375	2,243	41.73
江苏北部	15,790	8,741	55.36

(根据 Buck, *ibid*, Table 2. 计算)

在这广大灾民群众中间有一部分是死亡了，一部分还留在家乡，另外的便逃亡外乡，外县和外省去。

全国农民中至少有一百多万人的死亡。据金陵大学调查的结果，被灾县份中死亡人口占全人口的2.2%。

省 别	被调查的人 口	死亡人口	每百人中的 死亡数
湖 南	11,897	341	2.9
湖 北	9,952	387	3.9
江 西	8,254	212	2.6
安徽南部	14,151	252	1.8
江苏南部	7,703	98	1.3
安徽北部	18,651	344	1.8
江苏北部	6,421	65	1.0
平均(各 县平均)	77,029	1,710	2.2

(Buck, *ibid*, Table 25)

这些无辜的牺牲者在怎样凄惨的情景中断送其生命，我们只要举几个例就得明白：

江苏北部以高邮，兴化等县罹灾为最重。高邮县被狂波冲洗时，一起死了一万多人，其时水利局长茅以昇及工务段长李季强均乘船逃去。(大公报2,9,1931)邵伯镇附近的堤坝，猝被冲溃，死亡几千人。事实是这样：25日上午，北风大作，当



即报告该段所长邵福震，彼云治运堤岸颇坚，当无意外。下午风势更大并转吹西风，河中波浪汹涌，高约丈余，直扑运堤。乡民当即鸣锣报警，该地公安第八分局萧绍源事前不加协助，迨乡民鸣锣，反谓其故作惊报。待至下午三四时左右，大通公司码头一段运堤，即行出险；同时大王庙以北各段亦纷纷溃决，欲堵填则纷纷溃决，而所长邵福震久已逃避，不知去向遂溺斃数千人。

（天津大公报，2,9,1931,）

在兴化“沿途所见露出水面者多半仅屋顶与树杪，死者悬尸树杪，活者流离失所，妇孺老弱无力迁徙，攀登倾斜未倒之屋顶与断堤残桥上，为苟延残喘者莫不鸠形鹤状，待哺嗷嗷”。

（上海民国日报，1,11,1931）

这种情境可以作为灾区一般的描画。

这留在故乡的多半是一钱莫名的穷光蛋。他们已全部损失了田内的收获，储粮，家具，以及下期耕种时所必需的农具，牲畜等等。

在重兴诸省中仅就稻，高粱小米的损失额讲，它已尽够一千八百万人全年的食量。见81页表

上表稻的损失额约九十万万斤，折成净米约合六十万万斤；高粱小米折净成粉约合十万万斤。折合美吨计（短吨）共约五百万吨。输入中国赈灾的美麦共四十五万吨，按八成折成净粉不过三十六万吨。仅约当损失额7.2%。

（天津大公报，21. 11. 1931）

上项农产损失的总价值稻每斤以0.01元计（稻价每斤以0.4元计，高粱小米每斤以0.03元计）约456,690,000元。假如立法院通过的八千万赈灾公债真能照数发行，还不及农产损失总



省别	稻			棉			小米,高粱		
	平 年 产 额 百 万 斤	本 年 损 失 额 百 万 斤	%	平 年 产 额 百 万 斤	本 年 损 失 额 百 万 斤	%	平 年 产 额 百 万 斤	本 年 损 失 额 百 万 斤	%
山东			-	26	4	15	2,146	449	21
河南	-	-	-	79	14	18	1,426	554	39
安徽	3,813	1,637	43	50	9	18	438	120	27
江苏	6,100	1,698	28	211	55	26	575	177	31
湖北	4,538	6,649	36	126	38	30	262	102	39
湖南	5,018	1,894	38	35	9	26	-	-	-
江西	2,792	1,422	51	24	7	29	-	-	-
浙江	2,355	642	27	30	9	20	-	-	-
共计	24,616	8,942	36	581	142	20	4,847	1,407	29

额的十分之二。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到主计处的统计在地域上在农产种类上都有很多缺漏，实际的损失当更甚于此。

大量的耕畜的淹毙和被屠杀将使下期的耕种绝不可能。据金陵大学的调查，各省在这次水灾中牲畜的总损失达165,000,000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4, 1923. Simpson 演说辞) 湘省汉寿，沅江，南县，常德，湘阴，临湘，岳阳，安乡，华容，益阳等县中共计损失耕牛28,488头，中间淹毙的5,062头，由灾民无食自宰或贱价出卖供屠杀的23,426头，(湘报告书，页25)。下面一段记载颇能描画耕牛被淹的惨状。

当大水正盛时，淹没耕牛无算。前日武陵轮船来湘，经过洞庭湖中，屡次有牛浮至，腾跃上船。……现灾民将耕牛贱卖以顾目前，竟有以子母牛二头在长沙城外共卖洋十五元。将来滨湖各县欲重购耕牛大约亦在一二百万内外。(湖南，民国



日报，24，页1931）

安徽寿县牲畜死亡470头（天津大公报，23，XI，31。）凤台九千余头（大公报，27，XI）

灾民在下期耕种前当然无力购置耕畜，那末以人代牛的现象，必然会有。关于这曾有上述的记载：其从前所养之牲畜如牛骡等，非被土匪抢去，便为军队拉去，亦有于灾重时卖于屠场，救了人命。但现时皆无购买能力，因是乡村中发明一种人力犁地法，一到田间便可见先后二人扛一椽，系犁于椽之中央，仍由后一人按住犁柄，前拉后推而行。如是耕地，令人一见几疑身临数千年前之田间而忘记尚在今日所谓农业的工业化或电气化之时代。

（大公报10，VIII，130）

农具种子等的损失同样使农民难能重新从事生产。在这次水灾中所损失的农具总值大约在118,000,000元左右。（North China Daily News, 14, I, 1932, Simpson 演说辞）金陵大学在5省87县中调查了11,791农家所受农具的损失结果如下：

	农具损失总值 (元)	每户平均损失值 (元)
湖 南	16,300,000	35.52
湖 北	30,700,000	29.94
江 西	10,500,000	45.68
安徽南部	20,400,000	33.27
江苏南部	2,200,000	9.94
安徽北部	16,600,000	19.67
江苏北部	23,200,000	27.36
共 计	119,900,000	201.38



(L, Buck, *ibid* Table 7)

因此，农民要简单地恢复其原来的生产范围，在农具方面每户必需添置0.8具大农具。4.0具小农具（L, Buck, *ibid* P.19）至于种籽在5省87县的11,791农户中已需52,000,000元（L.Buck, *ibid* P.30）。

在事实上农民的生活资料已全部损失，他们要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尚不可能，那里说得到从事耕种。

灾民的住房被水冲毁了，衣服被水冲跑了，家具也损失殆尽，他们已失去他们身外的一切。1931年7月24—27日汉口附近的张公堤和护江堤相继溃决，屋内浸水的人家达132,129户；武昌的筷子街万年闸溃决时，室内浸水者达3,368户，而且一部分的房屋竟给洪水冲净毁尽，（日文上海每日新闻，1, XI, 1931.）湖南各县倒塌的或毁坏的房屋由下表中可见一斑，（下表为举例性质）：

县名	倒塌或冲坏的间数
岳阳	18,000 （湖南民国日报，6, IX, 1931）
湘乡	3,800 （同 上）
沅县	17,781 （同 上）
汉寿	21,845 （同 上）
湘潭	507 （湖南民国日报，11, IX, 1931）
新代	3,220 （同 上 12, IX, 1931）
石门	1,648 （同 上 13, IX, 1931）
沅江	10,000 （同 上 17, IX, 1931）

据金陵大学的估计灾区房屋的总损失额达470,000元，（North China Daily News 14, 页, 1932）衣服，床铺和家具的损失也颇惊人，在五省87县1,791农户中衣服和床铺总共损失69,100,000元，大小家具损失54,200,000元，但这浩大的数额，



(二项总数)仅当全部损失的6.4%(L. Buck, *ibid*, Table 3, 10 P. 30),其他11,791农户还损失燃料83,000,000元,饲料31,000,000元,家畜11,000,000元。(L. Buck, *ibid*, P. 30)

这广大的灾民群众,死的死了,活着的除一部分留住家乡之外剩下的因为全部生活资料都给冲洗乾净,不能不一批一批地逃亡到外乡去乞食,做苦力,当工人,坐监牢,以至死!

灾民的移动在两种形式下进行着。一部分人逃入附近的山坳,高冈,甚至山上以暂时躲避波臣的袭击。另外的人便单独地,或扶老携幼地到别县别省去。“逃荒”有的人逃到大城市里的难民收容所去喝粥,有的四出找求工作或流浪着做乞丐,更有的去当兵。(武昌街上各军各师各旅各团的招兵旗子在各处飞扬飘动,此所谓“以兵代賑”天津大公报, 161X, 1931)

据金陵大学的调查,灾区住民中有百分之四十逃亡到他处。逃亡出来的人有三分之一已找到生活做,五分之一在行乞,其他多半没有事做或不知下落(L. Buck, *ibid*, P. 23)。找求工作当然是难事,就是找到也只是藉此可以过着另外一种形式的奴隶生活。在下面我们将举一个江苏宜兴的例,现在乡间穷人在乡村里面,既不能解决借米卖工等民生问题,多赴市上想法,市上都是擦背黑皮肤的农夫,如人山人海,挤得了不得,浑身都是汗,从表面上看真是热闹,实际上他们身边连几个铜板也没有。他们不是去借贷粟米的,便是去卖工求生的。宜兴乡间的种田夥计,身体强健的每年得四十多块的工价,次等的是三十余元,末等只有二十余元,……他们连自己本人也难养活,怎样还会有钱养活老婆孩子呢,所以在平常时候,他们的儿子为人放牛,不受教育,他们的妻子多入城做奶娘或佣仆,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此次大水之后,当然这种情形更



为普遍，就是自己家里种田的农妇也有这种情状的。如最负盛名的万亩圩的农妇，便是一例。并且他们入城为佣，只求饱腹，毫不计较工钱，一钱不给也不要紧；因此城里贪便宜的富者：多没理由的撤退原有有俸的佣仆，改雇那新来无俸的佣仆。…还有大批男女农人或赴张渚山里为果户打果，或赴上海设法佣工——但山地以大风无收。上海灾民过多，他们只好仍旧回老乡，在乡间过饿着肚，黄着脸的生活。

（天津大公报，9, IX, 1931）

河南省政府有遣送难民到东北垦殖的计划，预定遣送的数额有十万人。1931年六月三日将第一批运往吉林，但因为水土不服，无切实办法，生活也同样艰苦等原因纷纷奔回原籍。（盛京时报，5, VI, 31）热河的灾民也有移垦东北，如在五月中朝阳县。有大小难民611口送往东北。但移民到达东北后的悲惨的命运又有日本正式占领满洲而决定；此后中国内地便绝无移民到东北去的可能。

另外有一部分难民被收容在各大城市的难民收容所，或救济所里。这些收容难民的处所一般地由饥饿和疾病主宰着，此外再设有严密的政治的防范。在上年十一月上海收容灾民约六千余人。在那时已有多数灾民被遣送回籍。因为‘灾民来者将如潮涌…莠民流氓混迹其中，一旦设有事故，治安可虞。……彼等，若长此坐食沪市……养成许多惰民（！）又岂国家社会之福！’（某难民收容机关负责人谈话，上海新闻报。4, XI, 1931）因此虽有高邮聚的灾民代表到会这样申述苦况：

‘此数千人中（指在计划中预定在十一月底遣送完毕的六千余人）原为求生逃死而来，若再遣散各地，更无办法，无家无食，不啻置诸死地。’（上同）而终究被遣散了。

堆聚在武汉的灾民数更多，在十二月里还有十七万五千多



难民住在汉口附近，‘气候严寒，每日冻毙达百余人（上海新闻报，16，XII，1931）每天他们只以二碗粥果腹，对于这些难民有一个时期预定将他们全数遣送出去，深恐他们滋扰。但在另外一个时期反禁令他们不准出境，怕他们多动生事。在汉口有几百个难民因为有反动嫌疑，凌迟处死，听说别的处所的难民在这种不同的方法下走入他们的坟墓的也是很多。

这整整八千万酷受“天诛”的灾民，已全部或大部分。失去了他们生活的工具和生活的资料，他们无论留在家乡，无论逃往他乡，死终是他们唯一的大道。

二、成因和动向

那使全国16省四十余万里的沃壤沦为泽国，八千万群众面对着饥饿和死亡的1931年空前的大水灾，无疑地是中国农业恐慌的极端的表现。同时，这恐慌又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一般危机中的一个环节。

E. Varga氏曾将世界各国的农业恐慌分为两个畴类：第一种农业恐慌的形态是发现于那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主宰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中，在那里是由农产品的过剩促成生产大众的贫困。第二种恐慌形态是发现于那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等经济发展的阶段比较落后的国家中间，在那里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宰割，他方面遭受封建势力的剥削，在那里是生产力的薄弱即生产量的不足陷农民大众于饥饿与死亡。

中国的农业恐慌采取着第二种形态而体现着。在中国，封建的关系还是农村中支配的生产关系。而帝国主义之侵入，并没有成为撕破这种关系的杠杆，反之，它却使它在更新的形态上重复生产起来。——中国的封建势力不单被帝国主义者利用为绝好的政治工具，同时它又能尽其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甚经济掠夺的任务。



帝国主义者对于封建经济的抗争一般地表现于下述的途径：1. 掠夺落后国的土地，森林，矿产等重要的生产手段；2. 使劳动力脱离种种羁绊，能自由地被人雇用；3. 破坏自然经济，使经济商品化；4. 使农业脱离其它手工业而存在，(R. Luxemburg,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1912, S. 290)。这些过程在中国的遂行已成尽人皆知的事实。煤铁等主要矿产权的旁落，东北及汉口附近等处耕地的被外人收买，满洲森林采伐权的为日人所掌握，以及最及日本更露骨地攫取东北一切支配权的事件，这些都扩大了各帝国主义者的资本的垒积。其次，中国农民大众的贫乏造成了大批离村的分子，他们已从一切原有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而得自由地兢赴都市供人宰割。同时，帝国主义者为了要获得大量并廉价的原料扩大其商品的市场不得不使殖民地的农村经济充分商品化，中国农村中的**技术作物如棉，烟草，小麦等的栽植面积的逐渐扩张**，农村需要品的供给须仰赖于市场的程度一天一天加强，都明显地表现着这过程进行的如何剧烈。中国自然经济之破坏的另一方面的表现便是手工业逐渐脱离农业而存在。社会的分业确乎在逐渐扩展，种种的原料加工形态渐次与农业脱离而另外组成独立的产业部门。这在农民经济上又意味着一宗极大的消费，或一宗极大收入（副业收入）减少。

总之，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农民原有的经济形式破产。农业的商品生产化使农民更易受到饥饿威胁，同时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日益普遍，更多量的商业利润自农民身上榨取。他们的收入急激减少，而支出却日益加大，于是农民的经济容量一天一天变得窄狭，而更深刻的贫困便降临在他们头上。

实在，帝国主义者多半在间接的方式下掠夺和苦累中国的农民大众。他维持着原有的封建的，或更正确地说，半封建的



统治，以贯彻其劫掠殖民地的初衷，半封建的关系由他的扶助而日益加深，税捐的频繁，（广东省已用尽世界上所有税捐的名称，四川田税已征到51年）田租的重累（占生产量的50—70%）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更刻骨的剥削（农产买卖时商业利润竟有达50%者，利率普遍通总在30—30%之间）都原原本本地表现着这一点。中国的农村生产大众在对各帝国主义者而言，只身受着资本主义体系的苛毒的压迫，而绝未曾蒙被资本主义的“文明的”洗礼，换言之，农村生产关系绝没有走上自身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同时，以各帝国主义者自身间之冲突为背景的中国，军伐的内战在近二十年内几乎无岁无之，无省无之，自1927年夏至1930年夏这短短三年中间，动员十万人以上之内战已多至近三十次。（朱新繁，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1930，P.207）而且内战越到最近其区域亦越扩大，自1916至1924中间每年战区所及平均有七省之多；而1925至1930年中间平均更增至14省左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兵差与农民，1931，P8）在军阀混战的泥坑里，战前的给养与准备，战时的征派，骚扰，毁灭，战后的军队补充及善后费都由农民血汗的产物来提供。

农民贫穷化的过程，使中国的小农制度更坚固地支撑着。他们的生产范围逐渐缩小，农耕技术日益拙劣。他更“排斥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诸形态，资本的社会 的 积 集，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Karl Marx, Kapital Ed IIIS304）他在天候顺调的境况下还不能维持其半野蛮的奴隶生活，等到恶劣的自然条件如洪水，大旱，蝗虫等降临时，他们当然只能一凭天命，无辜地牺牲了。人们要了解近数十年来的中国为什么被灾荒所连锁所镇压时，便不得不先把



握住这个锁钥。但中外人士对于中国连年几百万几千万的群众陷入死亡的境地，徒抱着柏拉图式的同情与哀悼，他们一致认为这实堪怜悯的灾害是“天灾”。他们根本没有了解：第一，自然条件的变劣仅是使天灾爆发的直接的契机；换言之，原有的社会结构制成了火药，而天候的变劣仅尽其点燃火药的任务。第二，就是自然条件的劣化还是由政治的社会的原因所促成。关于这一点我们还须有更详细的叙述。

诚如上面所说，在世界大战以后，气候继续不断的劣化成为中国许多特性之一。其主要之原因便是森林之采伐。“在世界上再没有中国像那样采伐森林之盛了，这完全是军阀残暴行为的结果。”（经济生活日报，莫斯科，30，IX，1931）“国家，政府，支配阶级在这方面（指吉林等建设事业）什么事都不做，偏把仅存的树木悉数采伐。……在山东胶州湾德国人先前曾植过森林，那时气候非常顺调。而现在山东的森林都给倒伐了，这是我们所目见的灾害的一大原因。”

军阀自身露骨地破坏水利工程的事实层出不穷，冯军在河南就地抽饷，往往在这样狡诡的掩饰之下进行的，他“不忍”向民间征派，他愿意把栽种在河边巩固堤防的树木出卖，以供给自己军队的给养，民众起来说情了，他们苦苦请求，树木是防河水泛滥的，千万不能拔起出卖；若是要饷项，还是由民众摊派。这样“君子国”的全剧便完成了第一幕。等到饷项重新告罄，便没法演同样一套把戏，老百姓无奈何，只得再抽钱缴去。不过，因为民众实在“集腋”不成，以致防堤树木全数被斩的事实，据说也屡见不鲜。

政府平时对于防堤工程丝毫不加注意，江苏北段的运河在去年便直率地暴露政府当局平时对它的漠视。几千万人被冲在巨流中，而平时安吃俸禄，否，吞吃公款的官僚，只想临时脱



逃。去年武汉曾长期沉浸在水里，传说是城隍老爷发气，是的，且让我们翻读这一段城隍老爷发气的故事。

“湖北堤防修筑费积存金，为下列数项积聚而成：（1）征收武汉海关收入的一成，作为附加税，（武汉海关收入年额1,500—2,000万元，一成至少为150万元）（2）两湖特税——鸦片税二成附加税年约500余万元（特税收入每月至少250万元以上，二成附加每年可收600万元，至少500万元）（3）各县粮税附加每年加100万元（湖北除西部数县外其余均征收）（4）各种厘金附加每年收约150万元，其他如茶，酒，烟草，生丝等特别税，几无不带征水利费，是等资金总额，每年至少1,000万元左右。年来除民国十七年曾一度用此资金修筑孙家拐堤坊外，尚未举行堤坊及闸门之大修筑，但每年报告所列之工事费数百万元，实由上自省主席下至水利局之杂役吞吃分配，但资金额数实在太大，故除虚报之工事费外，每年尚有2000余元之剩余。

武汉当局对堤防修筑积存金，一向非常重视，虽在王占元任督军时尚未移用一钱，但到现在，此项巨额之积存金已成乌有。第一个挪用该项资金者即蒋中正，时方本仁为湖北省主席。当时蒋自湖南来湖北，方本仁及萱萧（湖北省政府委员）迎之于信阳站，方本仁即劝蒋动用该项资金作为军饷。当初蒋犹多少忌憚，深恐堤防修筑费积存金为地方费性质，动用该款恐遭人民反对。但以方萧力劝，遂试用50万元，此乃堤坊修筑费积存金设立后之破天荒举动。民众闻此消息，立即出而反对，方萧等努力使各方面谅解，当时水利局长彭介石乃利用其职位，竭力镇压民气。此辈省委等并非全为忠诚于蒋氏，实欲乘此机会分配积存金之一部。据可靠消息，方本仁得50万元，萧萱及彭介石各得25万元，其他大小职员各分配到



相当额数，共计用去350万元，而反对之声浪全归沉默。

人民既无反对，动用积存金之事乃益多发现。1930年蒋阎战事，宋子文特派湖北省财政部特派员陈某，一次即挪用一千余万元（此额或谓为1600万元，或谓1200万元，总在1000万元以上）因之，积存金几倾数流用，此费当然作为军费。而此外多少剩余额数，又受川江龙（鸦片商人）之拐骗，损失60余万元。——该项资金一向存于某指定银行，后保管委员会，由指定银行提取数十万金，贷与一鸦片商而遭损失。保管委员会因欲此以肥私囊，而有监督权之省政府亦默不一言，最为可怪总之，近三年来上下一致地将数千万元之积存金全部挪用为军费，并饱私。

湖北水利局之腐败情形，不胜枚举，本来湖北省水利局要对武汉三镇的堤防及闸门的保护修筑负完全责任，特别是汉口背后的张公堤及其分堤最为重要，（前清张之洞修筑，工费尚不满80万元）局内设专门技术员十二人，张公堤及分堤分十二区各区分件修筑施工之责，1929年何成浚为省主席，水利局长彭介石（彭今年卸职，但其责任当比新局长程克明为重）任十二名技术员为各部门处长，（因技术员之名义，须雇专门人才，改称处长后便得引用私人）堤防保缮之责完全不顾，遂酿成此次巨灾，现局内有专门知识之技术家仅三人，其余都是官僚，彼等每年作一二回的视察官样文书，他们的特长不在“修筑堤坊”而在制造收支报告。

汉口实为湖沼地，昔时属夏口所治，当时仅有现在之前后花楼一带，此外之特别区及日法两租界怡园等繁盛区域，多数为湖沼地，张之洞修筑襄河之长堤及其分堤（张公堤及其分堤），断绝水源，旧日湖沼渐成陆地。在长江方面，以修筑有刘家庙之护江地，遂出现一陆地。地势既低，所恃者亦仅张公堤（及



其分堤)及护江堤二堤,1931年汉口水灾最大原因,即因此两堤岸年久失修,京汉铁道线外,纵横百余里,突成一片汪洋,陷二十五六万农民于失业。七月二十四日张公堤溃决,二十七日护江堤即丹水池亦溃决,加以单洞门及双洞门之冲溃,汉口市街遂成泽国。洞口既破,何主席大发雷霆,申斥防水不力之水利局长及汉口市市长。但有何益?

本来长江的增水得用人工防止。按海关水准表长江水量在47呎以上之年份如下:

1866	8月13日	48呎3吋
1869	7月28日	49呎
1870	8月4日	50呎6吋
1878	8月6日	48呎
1887	7月23日	44呎8吋
1889	10月13日	48呎3吋
1911	8月26日	47呎8吋
1922	8月15日	47呎2吋
1924	8月23日	48呎2吋
1926	8月20日	48呎9吋
1931	8月19日	53呎6吋

以前从未罹此巨灾,因长江增水,有法防止。且长江水量之增高每日至多几吋,绝无突涨几尺之理。

今年(1931年)汉口水灾时,日本租界及特一区均以土壤临时筑堤,防浊流侵入。日本租界计费二万二千元,特一区共一万余。当时汉口正在排日运动中,日本租界所费之木材费,人工费,均较时价为贵。汉口全市面积不过日本租界之十五倍,按此比例计,则至少多少费三十三万元即可防长江浊水,而保全全市(武汉水灾原因,满铁支那月志,卷八号10,1931)。



在这儿我们应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年在中国发现的天灾的连锁完全是帝国主义者国内半封建的统治集团的联合剥削的结果，它是从长期的准备中蜕化出来的成虫。而一般近视学者所指为“天灾”的也无非是“人祸”的继续。

接着我们将观察在这大灾荒或这极端的，农业恐慌里面农村社会的各阶层在起和将起怎样的变化。

在灾荒的行列中，在证实了下述一段话的真确：“每个恐慌都使现在的对立更加尖锐，而且把这个对立在它的全剧烈与全含蓄上暴露出来，（德波林，依里齐的辩证法，汉译本，上海页86，）统治机关的分润和“乾榨，”地主富农的扩展其经济，商人及高利贷者的诛求，使贫农更无产化的进程更形急激。

美国为要缓和其自身的矛盾就慈悲地输给中国小麦四十五万顷，作为赈灾之用。中国政府方面在美麦价格的折算和赈灾时用麦或用钱的手续上，一转手间便可捞到几千万元。在赈济时官吏的朋比分肥更是熟见的事实。湖南岳州粮站主任洋员古特温浮报侵蚀公款已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湖南国民日报，9,9,1932），蚌埠商会主席兼水灾善后委员高蔚，扣住赈款5,000元不发（上海时事新报，9,11,1931）。又上海民国日报（30,11,1931）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央拨发安徽赈款三十万元，至今六十余日尚无发放消息。或云为中央放赈委员张公衡已交由通银行生息，或云已为陈主席挪用，令由各县钱粮项下征足抵拨”。

大众之与死神为伍，并没有使“为民父母”者 焉悻恻过。灾区催激田赋的消息在过去六七个月中间的报章上占了很多的篇幅。例如江苏“阜宁各机关既未为灾民呼吁救援，而反群集县村，力主催追前欠，开征本年粮赋，以充薪资，”（天津大公报，3,11,1931）湖南好些地方的农民曾发到涓滴的赈款，



官厅便向他勒交额定税捐，税捐的额数远过于已得的账款，因此全体灾民宁可不受赈济，只求免缴赈捐。天津大公报税于安徽阜阳的保卫团有下列的记载：“保卫团共有三千人，每人每月平均最多十元，每年三十六万元，已足致农民于死地矣。该县计有地七万四千顷，每顷每年竟附加治安捐四元，每年合五十一万八千元，究竟作何用途，殊令人莫解。上忙业已征遇，下忙不久也要开征，而团总大人急不能待，竟预备下忙治安捐，何如是之急乎？恐灾民之不即死乎？”（23,11,1931）在灾区里边，灾后的物价一般比灾前要高。这样使难民维持其生活。据金陵大学在5省81县中的调查，灾后物价比灾前高涨到20—30%

省 别	谷 类	燃料及饲料
湖 南	138	146
湖 北	117	125
江 西	117	118
安徽南部	121	148
江苏南部	104	126
安徽北部	124	142
江苏北部	117	133
平均数	120	130

(L. Buck, *ibid.* Table 26)

据振务委员会的调查，物价的高涨实更甚于此。例如皖省米价在灾前平均每百斤5.34元，麦4.24元，高粱4.04元，灾后米7.45元，麦5.54元，高粱5.14元，即灾后米价较灾前涨40%，麦涨30%，高粱涨27%，（皖报告书，页17）湘省平均米价灾后比灾前涨37%而保靖县在灾前每斤米价为0.06元，灾后为0.14元，涨价对原价之比为133%，（湘报告书页25）



商人总会利用种种机会从灾民身上榨油。如汉口的轮船公司，在水灾最严重时汉口居民都拟逃居下游各地，各公司便增加其票资数倍，竟达60元（满铁支那月志，卷8，号10,1631）于是大部分的农民因为生活艰难，不得不向地主，富农以及商人告贷。需款的急迫使他们不得不屈从于任何苛酷的条件。借贷利率的飞涨成为灾区一般的现象。在金陵大学调查的五省81县中灾后的利率平均比灾前，增加33%，中间湖南增38%，湖北—17%，江右—17%，—21皖，皖北—24%，江南—40%，江北—17%，（L. Buck, *ibid*, Table 26）高利贷的活动在灾荒期内特别地行出其伟大的权能。例如江苏青江浦的华兴典当（冯国璋是该典最大股东）“平时利息一二分半，赎期为二年，淮阴，淮安，涟水，泗阳，宿迁，宝应，阜宁各县的贫民明知饮鸩止渴，但为生计所迫，虽自家无物可质，亦必转向亲友商借。……该典近忽闭歇，商会代为呈请财厅代向中央银行借款十万元，以便维持开当。”（天津大公报，26,11,1931

下面一段记载足以把灾民怎样呻吟于高利贷的箝制之下的情形描写出来。在清江浦地方“屯粮之户，美其名为不向外售，救济本村，实则专与有放田之灾民，每小麦或玉蜀黍一石市价不过六七元，来来年夏季须照十元偿还，无田者尚借不着。…富户择可靠之灾民，零星放款，每于阴历九月以前放出，至来麦期归还，每元还一元五角，九月以后每元还一元三四角不等，合计总在分以上。…上年所借之债，今年水灾未能还利，以欠利滚入原本再行换约起息。…灾民以地出典，百计哀求，其价甚贱，或以地契质押，所扣利息，利率甚高，“天津大公报，3,11,1911）。灾民为要过活便将他仅存的东西如牲畜，田地等出卖。无疑地这些东西在出卖时价格必异常低廉。在5省81县中牲畜的价格灾后比灾前平均正跌落30%（L.



Buck, *ibid*, Table 26) 在上节所举湖南贱卖牲畜——子母二共卖牛15元的事实，并不只限于一县一省曾发生。

地主富农，商人及官吏等在灾荒期内贱价收买田地成为灾区普遍的现象。大批的土地脱离农民的手里，而动员到富有的阶层的掌握中去，地价的跌落到惊人的程度，在5省81县中灾后较灾前平均跌37%，而皖北诸县竟跌到半价。（L. Buck, *ibid*, Table 26）

田产的动员多数在典当的方式进行着。灾区农民在借钱时主要的抵押当是田地，多数农民无力偿还，因此产权便移入地主商人等手里。就是Buck教授也率直地申述，“这种情形的结果，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L. Buck, *ibid*, P. 25）

实在，土地集中的过程是灾荒中必然的现象。如1928—29年西北大旱灾时，陕西的土地多数被富禄官吏收买。”在灾荒中农村中之关系更有极大之变易，实有大影响于国民生计者，即土地所有权之转移土地之集中。盖农民卖妻鬻女者其于卖鬻女之前妻已将平时赖以生存之土地，早以贱价典卖一空矣。收买此种土地者，自为乡林中之当豪城市中之官吏。去岁渭北旱地有以一元二亩出售者，西安附近及省西南一带之水浇地，可以十余元购一亩，因与土地集中之趋势极为迅速。麦收流离在外之农民渐归原处（注意，他们又不得不回来！）但其所耕土地多不为已有。……土地下集中农林中形成一部分地主，以前之自耕农。现均在雇佣情形佃地而耕。”（大连秦东日报，10，8，1931）

恩格斯关于1891年的灾荒曾这样说过：“饥馑促进了从来的村落团体的分解，大农的富强化，以及大农转变为地主的进程；一般地讲来，它促进土地从农民及贵族的手里转移到新的



资产阶级手里的进行。

在这里我们须注意到在殖民地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帝国主义只使它感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并不使它自身资本主义化。因此正像Madgar所说：“土地移入于中国，印度，波斯等国的商人，高利贷者和大农的掌握中去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生产的改进，事实倒是这样在由农民手里拿来的土地上实行着保有旧的技术和旧的农奴关系的经营。”(L. Magyar, Agra kus und Hunger not in Osbon, Agvarprobleine Baud 2, Heft 2, 1929, S326)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的重重钳制和封建势力的层层牵制的条件底下很少发展的可能，因此尽管一方面存在着从农村中排挤出来的劳动者之群，但终不能为工业部门尽数吸收。这些找不到工作的过剩劳动不得不复归农村，租进一小块田地进行其零细的经营。这种经营的本身便意味着技术的落后，同时它又是高额田租及高利贷最有利的的前提条件。因此在灾区里面土地集中的过程也便是旧的半封建的关系在更扩大的规模上被再生产的过程。

于此我们将到达我们最后的结论：由百年来政治的社会的成因所促成的1931年的大水灾，更加深了农村的矛盾，它使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于贫农的压迫日益加甚，它更促进贫农及乡村无产者的抗争的情绪。1848年发生于欧洲的大灾荒成为1848年革命的动因，而在1918—19年间印度大众的饥馑，也展开了印度的革命运动。同时，我们不要忘记这空前的中国大水灾还仅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环。中小企业的纷纷倒闭，生产规模的日益缩小，失业工人的急激增加，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现象。这国际的环境无疑地将更推进那些在1931年灾荒中匍匐在死神面前的农民大众，以他们自己的力量来继续完成其毁灭



那吞吃他们的生命的旧社会秩序的任务。

(1932年4月20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原载《新创造》第一卷第二期)



中国目下的农业恐慌

一 中国农业恐慌底现象

中国的农业恐慌正在资本主义世界总恐慌底扫荡之下，正在国际占资本底垄断作用日益加强的情况之下，也正在国内民族资本底独立发展越发感觉绝望的条件下，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表现出来。农产物底价格在继续狂跌；地价在很快地低落；农产底输出还在逐年减少；农民底购买力在跟着收入底激减而降低；农村负债和失业人数正以可惊的速度而增加，而饥饿和死亡更成为中国农业人口延续底标志。所有这些都是目下中国农业恐慌底主要现象。

（一）农产价格底跌落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底报告，中国各区粮食底产量一九三三年比一九三一年虽多2%，而比一九三二年则减少6%。可是粮食底价格却在逐年跌落。据国定税则委员会底报告，上海历年粮食价格底指数有如下表：

根据下表：上海各种粮食的价格近二年比一九三一年平均降落了26%。（见《中行月刊》8卷1.2合期，1934年）。一九三四年的粮价还在继续跌落。一九三三年上海躉售粮价指



近三年十一月上海粮食趸售价格指数

年 份	11月份指数	当1931年之%	比1931年降落之%
1931	91	100	0
1932	72	79	21
1933	63	69	31

数一月份为78.6,七月份为69.5;到本年一月则降为60.7,七月份亦仅为68.8(以上均以一九二六年为100);

这三年来棉花底收获估计与国棉在上海的趸售价格相比,其结果略如下表:

	1931	1932	1933
棉花收获(1)	100	108	135
棉花价格(2)	100	99	81

(1)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之估计。

(2) 据税则委员会调查各年十一月通州花之价格为计集标准。

其它农产物在上海趸售价格,也在逐年跌落(据税则委员会调查,价格以国币一元为单见下表位):

据下表:小麦底价格,1933年当1931年的76%,当1932年的80%,茶底价格落得最惨,1933年当1931年的43%,当1932年的59%。茧底价格,最近两年虽相差不多,而比1931年降落43%,花生价格,1933年比1931年落40%。比1932年落20%(见《中行月刊》,8卷,1.2合期)。



农 产 品	价格所指之月份	数量单位	1931	1932	实价	1933年	1933年
						当1931	当1932
						年之%	年之%
小 麦(汉口)	7月	担	4.9	4.6	7.3	76	80
茶(祁门华茶)	7月	担	290.0	202.0	120.8	43	59
茧(无锡乾茧)	5月	担	171.0	99.0	98.0	57	99
花 生(徐州)	11月	担	9.9	7.5	6.0	60	80

(二) 农田价格底降落 农产价格底跌落，农民贫困底加深，就造成大部份农民都想脱售其田地的局面，这样，田地价格就急激降落。

近三年来各省地价底变迁(1931年 = 100)

省 区	有报告 之县数	水 田			旱 地		
		1931	1932	1933	1931	1932	1933
北方合计		100	97	89	100	95	87
西北区合计		100	91	80	100	88	76
中部合计		100	93	88	100	94	93
东部合计		100	83	77	100	79	75
西南合记		100	103	102	100	105	107
东南合计		100	102	96	100	99	95
各省总计	700	100	94	88	100	93	89

据上表，田地底价格，除西南一区外，最近两年都在降落。各省总计以1931年为标准，水田底价格，1932年降落6%，1933年降落12%。旱地底价格1932年降落7%，1933年降落11%。

**(三) 农产物输出底减少**

年 份	主要农产输出总值
1931	421 000,000元
1932	253,000,000
1933	241,000,000

按照上面的数字，1933年生产这些农产的农民单以输出而言，就比1932年少得了12,000,000元现金的收入，比1931年少得了180,000,000元。再按几种主要农产来分别观察，据海关报告，茶，花生和丝这三种货物底出口价值如下（元）：

	1931	1932	1933
茶	51,080,000元	39,087,000元	38,579,000元
花生	42,940,000	30,638,000	17,417,000
丝	147,041,000	56,419,000	57,736,000

据上表：卖茶的收入，去年与前年大致相等，比1931年则少收25%。花生底收入，去年比前年少收43%，比1931年少收60%。丝底收入，去年与前年大略相等，比1931年少收60%。

（《中行月刊》，8卷，1. 2合期）

这种趋向在本年一般地还在继续。

(四) 农民购买力底激减 农产价格跌落，对外输出减少，都使中国农民大众购买日用品的能力急激减低。据张履鸞先生在江苏武进县调查的结果，近三年来农产品底购买力底指数从一九三一年的96，降为1932年的88，再降而为一九三三年的70。再就农产品在上海对于日用品的购买力来看：种稻的农民要买一包棉纱，在一九三一年仅用米19石，一九三二年须用



几种农产底出口价值(元)

	一九三四年第一季	上年同期	一九三四年第二季	上年同期
杂粮	939,032	1,207,636	1,057,799	971,124
蛋类	5,019,238	5,058,041	9,350,795	10,081,026
棉类	5,042,739	7,770,679	4,143,967	6,019,199
生丝	6,691,943	11,758,100	6,353,556	14,642,380

(摘自国际贸易导报,6卷10期,1934)

23石,到一九三三年须用26石。买一匹粗布,在一九三一年仅用米0.59石,一九三二年用米0.64石,一九三三年则需用米0.78石。若买硫酸钾做肥料,一九三一年买一担肥料仅出米0.54石,一九三二年须出米1.45石,一九三三年须出米1.38石(《中行月刊》,8卷,1.2合期)。实际上,农民因为购买力底竭度疲弱,过着他们地狱生活的情形,决不是上引的几则数字所能说明得了的。

(五)农村负债人数底激增 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底《农情报告》,在一九三三年各区负债的农家,占农家总数底百分数,及借款底周息有如下表:

据下表737县的报告,负债的农家占农家总数底62%,借款的周息,达三分六厘之重。西北区的农家,负债者最多,借款底利息也最大。中部,东部,西南部的利息虽小,而负债的农家也有60%以上。北方及西南两区的农民,负债者虽在60%以下,而借款的利息几到四分。目前恐慌下的农民因为需款更急,借贷时的利率也在逐渐高涨。

(六)失业饥饿跟死亡 农业生产既然普遍地破坏,城市里的工厂又在倒闭和停工,因此目前中国的农村可说是失业饥



负债农家占农家总数之百分数及借款周息

区域	所包括之省份	有报告之县数	负债农家占农家总数之百分数	借款周息(厘)
西北区	察,绥,冀,甘,陕五省	84	68	51
北方区	晋,冀,鲁,豫四省	305	57	39
中部区	鄂,湘,赣三省	80	62	28
东部区	皖,苏,浙三省	107	66	31
西南区	川,云,贵三省	90	59	39
东南区	闽,粤二省	71	60	27
各区合计		737	62	36

饿军底总汇之所。这里虽然没有可怕的数字来说明这种失业的现象，可是农民大批地离村，盗匪底横行，以及一般农村秩序底不安已够反映这个问题底严重。即使他们仍旧留在村里，也只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在素以富饶著称的河套区域，“近一二年来，粟贱民贫，丰收成灾，农民难免于饥馑。一切苦痛万状，麦面为农人终年不见之食品，菽面为绥远普通之产品，近一二年来，农人得不断食用，已如山珍海珠矣。衣则不能蔽体，有许多小儿不能穿衣，住则更恶劣不堪，土房门窗不全，大多数农民皆伏处于此。更有穴居者，在山崖下挖洞居住，卑陋更甚（绥远农村速写，大晚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苏浙两省素有天堂之名，而农民赖吃糠过活的已到处都是。国内其他地方的农民生活，其惨苦当然更不用说。南川因为天旱，禾菜青草，同归枯萎，饥民除剥树皮挖草根以果腹外，每日还得掘白土充饥。他们因为耐不住目前饥饿，恐怖着秋收的绝望，自杀的更不可胜数。萧山有一老农饮盐卤自尽，有二农妇



投江悬梁自尽；嘉善，投环投河的有五六命；浦江某乡有一农家十一人同服砒霜自杀；尚有一家八人亦服毒毕命；溧阳某农民在典质什物：割舍儿女之后，夫妻悬梁自杀；无锡某农亦因旱自缢；九江的农民苦于天旱而自斃的更难统计。在水灾区域，山洪与江水又夺去了无数性命，湖北郧县，修路民夫被水冲去三十余人；黄河泛滥时滑县溺毙者千余人；广东东江水涨，溺死者数百人；四川达县因山洪暴发死百余人；什邡溺死五千余人，德阳溺死三千余人，彭县溺死九百余人，新繁淹毙二百余人，温江淹毙二百人，邛崃淹毙二千余人；昆山淹毙三百余人。山西夏县人畜死者一百二三十口，安邑死二十余人，崞县死四十余人。这些零星的记载跟灾民大批死于沟壑的事实，相差得还是很远。

二 中国农业恐慌底特性

——灾荒与农业恐慌——

要说明中国农业恐慌底特性，一定先要了解农业恐慌一般的性质。农业恐慌也和工业恐慌一样，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社会的生产与私有的分配间矛盾底表现；换句话说，是生产与消费底极度的失调；再简单些说，是农业物底相对过剩。然而农业恐慌对于工业恐慌而言并不是毫无差别，它却保有其自身底特点：即前者和后者比较起来，常以慢性的恣态表现出来，同时也更不容易恢复。其原因是：第一，因为有土地所有底存在，土地底独占阻止了资本流动底自由，因此农业经营比较地难于走上大规模生产的道路，而过剩生产底形成也就比较缓和。第二，土地所有底存在，使农业企业家必须支出一笔地租，交给地主；这种非生产的支出减少了农业活动资本，



换言之，它减少企业家取得额外利润的机会，减弱了扩大再生产底可能；这样，生产过剩的现象也就比较地不易造成。第三，因为土地底独占和地租底支付，阻滞农业企业底扩展和改进，这样使恐慌中的农业极不容易恢复其正常的生产规模，因此农业恐慌之恢复到景气的阶段，一般地常跛行于工业恐慌之后。

此外，我们在说明农业恐慌一般性质的时候，不得不指出农业底落后性在恐慌期内所发生的作用。农业生产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落后，是农业所固有的技术因素（如自然支配力量之较大）和社会因素（主要的就是土地所有和地租之存在）作用的结果，而这种落后的性质便构成各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农村生产关系得以残留的前提。美国是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得最为通畅的国家，然而其南部却有多量半封建的关系存在；如强制的劳动，隶属的关系以及高利贷底榨取等等，所有这些在农业恐慌底序列中，都是使恐慌底程度特别加深，农民底生活更为恶劣的有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在落后的农业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农业恐慌中所起的作用最为强烈。另一方面，独占资本又利用农业生产底分散，和农民底缺乏组织，特别抑低农产底价格，而将工业方面的损失转嫁到农业部门，这样更加深了农业恐慌底程度。

以上说明了农业恐慌一般的性质。那末，目下中国农业恐慌到底具有何种特性呢？

我们要说明目下中国农业恐慌底特性，一定先要了解目下世界农业恐慌底特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蔓延全世界的慢性的农业恐慌，跟十九世纪末叶以及末叶以前的历次农业恐慌比较起来，具有下面几种特性。第一，战后的农业恐慌是以资本主义体系底急危机为基础。第二，目前世界的农业恐慌在就地域而言，可说是囊括世界各国，就范围而言，又是笼罩整个农业



生产部门。第三，这次长期的农业恐慌是在一个金融资本已经充分侵入农业部门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换句话说，独占资本对于这次农业恐慌底成长和发展以及阻止恐慌之恢复常态，是尽了决定的作用。第四，目下的世界农业恐慌是在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最为急速，和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最为尖锐的条件之下，继续成长起来。最后第五，这次的恐慌恰在世界上两个不同的体系，即资本主义的体系和社会主义的体系分裂的局面之下发展起来，而资本主义农业底破坏和社会主义农业底发展形成一个尖刻的对照。

同时，我们要说明目下中国农业恐慌底特性，一定先要了解目下中国经济恐慌底特性。一九三一年以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就陷入恐慌底深渊。这种经济恐慌跟从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七年间间的恐慌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即后者是以世界资本主义战后暂时的稳定为背境，而前者却以世界资本主义的总恐慌为基础。就这点而论，目前中国的经济恐慌，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者将恐慌底巨祸转嫁于中国大众身上的结果。此其一。中国的经济恐慌正跟一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恐慌一样，乃以农业恐慌为基础；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的经济恐慌就国内的条件而言，乃在农民大众极度贫困的基础之上作全面的展开。此其二。此外，这种恐慌再因为国内地方经济封锁性底日益加甚，国内经济不平衡发展底日趋尖锐，以及一种敌对的经济制度底存在，于是就以最尖锐的形态表现出来。

中国目下的农业恐慌就以具有上述特性的世界农业恐慌底一部份，和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恐慌底一部份的恣态显现在我们眼前。现在且让我们来说明这种农业恐慌所具有的特性。

(一)中国的农业恐慌是以生产力底极度衰落为基础。尽管农产价格底不断跌落跟世界各国一样是目下恐慌底主要现象之



一, 尽管中国目下的恐慌在性质上已是“资本主义的恐慌”(正犹俄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农业恐慌是资本主义的恐慌一样, 虽然当时俄国还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成份), 可是中国农业恐慌决不是中国农业生产底本身相对过剩底结果。一九三三年, 中国稻的收获量由一九三二年的115减到108, 而其价格却从一九三二年的70减到一九三三年的55。小麦的产量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二年相仿, 而其价格却从一九三二年的94减到一九三三年的76(以上产量和价格都以一九三一年为100)。以技术特别落后, 生产性特别薄弱为特徵的中国农业生产, 只有在一般购买力空前的降低, 地方经济底封锁性愈加浓厚, 特别是世界经济总恐慌底更加深刻等条件底下才能形成一种虚渺的过剩生产。更进一步来说, 中国落后的农业, 只有被牵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 只有以世界商品生产构成分子资格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场合, 才发生了恐慌——“资本主义的恐慌”的现象。更简单些说, 以中国的经济做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底一环之后, 中国的农业才有发生恐慌的可能。所以按照我们底意见, 尽管“谷贱伤农”“丰收成灾”是目下农业恐慌典型的描摹, 不过只是“谷贱伤农”决不足以规定农业恐慌底属性。中国一二千年前的“谷贱伤农”我们决不能名之为“农业恐慌”; 反之, 今日的“丰收成灾”, 甚且“收既不丰价乃大跌”的现象, 却因为处境底不同, 就变成农业恐慌具体的表现。总括说一句, 中国目下农业恐慌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恐慌, 正因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世界一分子的缘故。

自然我们在这里并不能忽视国内主观的条件。上面说过, 国内一般大众购买力底降低和地方经济封锁性底加甚, 都是促成目下农业恐慌底主要条件。大众购买力底降低是造成相对过剩生产的直接的因素; 而地方经济封锁分立的倾向是促成目前农



产价格局部昂贵和局部跌落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国内的条件都在和国外贱价农产物底大量输入，国内农产物底无法输出，配合起来，加深了目下相对“农产过剩”的程度。

接着我们要讲一讲“灾荒”和“农业恐慌”的关系的问题。什么是农业恐慌？根据上面的话，我们知道农业恐慌，是生产过剩的表现，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我们在自足自给的社会里面，断然找不出农业恐慌底现象；同样，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面，也找不到农业恐慌底踪迹。什么是灾荒？灾荒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于财富和生产力的破坏，它主要地是表现自然和人类的冲突，它决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我们在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固然能够发见古埃及尼罗河洪水泛滥那样的天灾，在资本主义时代也会发现美国的水灾，和日本的风灾；甚至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也会发生旱灾。这种天灾的程度自然会随着人类生产力和生产组织底扩张和改进，逐渐减轻。比如一九三四年旱灾，在苏联因为集体农耕制度底优越，并没有减少农作物底收获；反之在中国便形成赤地千里，饿殍盈野的惨境。

中国连年的灾荒（水，旱，风雹，霜，蝗等灾），当然是农业生产底力绝端衰敝的表徵，换言之，它是中国农民大众身受独占资本和封建剥削过后，绝无能力抵抗自然条件恶化的结果。然而灾荒本身却不是农业恐慌底表现；反之，它是促成目下农业恐慌有力的因素。第一，它极度地增加农民底贫困，使他们绝对没有力量耐受因农产跌价而来的损失；第二，它极度地减低农民大众底购买能力，直接地加基工业底恐慌，间接地促进了农业恐慌底发展；第三，它减弱了各地当局诛求底来源，令后者不得不多方搜括，因此更加增进了农民底贫困。

一般而论，在旧的经济制度无法持续，新的经济制度尚未产生之际，天灾底爆发往往可以作为完成这种过渡的有力的杠



杆。例如十四世纪欧洲接连发生的饥荒和黑瘟，就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农业底发展。而目前中国的灾荒呢，却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一般的衰老，和殖民地经济发展的特殊行程，只能做成整个国民经济恐慌，特别是农业恐慌推动力量。

灾荒固然是促进农业恐慌底因素之一，同时农业恐慌又能使灾荒底爆发更加容易，令灾荒底程度更加厉害。第一，农业恐慌削减了农民底收入，破坏他们底生产，因此也就更加剥夺他们抵御自然的能力，这样使水，旱，风，蝗，更易作祟。第二，它加深了农民底贫困，使他们更无能力承受天灾底压迫，而陷于饥饿和死亡的境地。

在目下的中国，灾荒和农业恐慌就这样交错地存在，相互地促进。它们都是外资侵略和半封建剥削底成果；所不同的前者是以单纯的孤立的形式表现生产力底衰敝，而后者却以世界成员底资格，表现为一种生产过剩底假象。这种假象底本质还是生产力底不足，而令此种本质作假态的表现的，主要地却是资本主义世界一般的相对生产过剩。一般人以为灾荒本身就是农业恐慌，固然是一种误解；同时以为中国的农业恐慌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恐慌完全没有区别，也是绝大的错误。

(二) 中国目前农业恐慌底第二个特性是：这次的恐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总恐慌的基础之上发展和加深起来。中国作为列强原料根据地的作用在世界恐慌期内显然大为减弱，这可由历年原料品输出底减少来证明。同时，国外廉价农产却变成中国土产致命的威胁。此外，恐慌期内外资对华统治的加强，却又束缚了中国民族工业底发展，这样更使农产无由脱售，农村大众没有逗留城市的可能。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虽以军需工业底发展，通货膨胀底厉行，以及对于国内外大众剥削的加甚，而暂呈“好转”之象，可是各国的农业恐慌非但没



有跟着减轻，反在日趋深刻。这种国际的环境决定了目前中国的农业恐慌只有日趋深刻，绝无超度的希望。

(三) **这次农业恐慌是在列强资本对华的活动特别加紧，而且它们之间的冲突特别尖锐的条件之下，不断地加深。**单就经济的意义而言，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几乎是中国国民经济底丧钟；此后列强资本(特别是日美资本)在华的猛进和冲突底结果，使中国各个经济部门都陷于僵局，——农产底出口急激减少，民族工业大遭摧折，因此农业恐慌就以更尖锐的姿态开展起来。

(四) **中国今日的农业恐慌是跟国内民族工业底极度恐慌交织起来，互尽促进的作用。**就国内而言，农村大众底贫困是促成中国工业恐慌的最主要的动力；而工业底衰敝，使原料底销路急减，同时使失业人数激增，因此更加甚了农业恐慌底程度。在这里，中国工业恐慌很难恢复常态的事实，又规定了目下农业恐慌长期的厄运。

(五) **目前中国农业恐慌底另一特色，就是它底发展恰巧又在地方军事势力扎砾得最为酷烈的时候。**列强资本利用地方封建性势力的趋势，在一天一天加甚，同时各地财政的危机又在一天一天尖锐，因此各个地方当局一面都愿“各保吾圉”，一面却又想夺人地盘。我们姑舍事事政治而不谈，只就经济而言，各地所谓“统制经济”，正如实业部长陈公博逊先生所说早已成为“割据经济”。经济割据底结果，使各地生产物底流通格外困难，因此使上面所说“假态的”局部的生产过剩，更加容易形成；而“谷贱如泥”也就是当然的结果了。此外，各个地方势力为要弥补财政不足，苛捐杂税，不一而足；这样就更加深了农业恐慌底程度。

(六) **这次农业恐慌底最后一个特点，便是这个恐慌无论**



就国际和国内而言，都在两个新旧社会体系底分裂中发展起来。在旧的体系里面，恐慌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作用，已经显示其世纪末样的结果；这里留着的是贫困，饥饿和死亡。因此恐慌下的农民大众对于其未来世界底模型，自然会格外渴望，格外关心。

总结起来说：目前中国的农业恐慌正以世界经济恐慌，特别是殖民地经济恐慌底一环的恣态，在作执拗的发展。这种发展再受其自身所具各种特性底规定，会使农民大众所受的剥削越发加强，都市与农村间的矛盾越发深刻，整个国民经济对于列强资本的隶属格外巩固，农民对于农业彻底改造的关心格外加甚。这些便是目下中国农业恐慌底成果。至于这种发展底前途到底如何，那就要靠上述各种成果在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和配合底程度来决定。

1934年11月14日

追记：本文所述灾荒跟农业恐慌的关系一节，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情报社一部份朋友讨论时暂时得到的结论。特此附记。



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的研究

一 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出发点

资本主义在完成其统治国民经济的局面时，本来可以采取两条迥不相同的途径。一条是自由的畅快的康庄大道，另外一条是迂回的惨黯的羊肠小径。这两条途径的孰去孰从，要由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一般的发展程度和国内固有的经济结构来决定。年青的资本主义在英国铲除了一切封建社会的基础，拓展其愉快而自由的生活；同样的，资本主义在美国的顺畅发展，是建筑于稀薄的封建关系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与此不同的有一般经济落后国家的命运。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和帝俄铁蹄下的中亚细亚，资本主义在进行其统治任务时，是企图幽禁某一世界的大众，以增进另一世界的幸福的。这两种不同的情形表现于农村经济的，一面是‘圈地’Enclosure)(英)和政府收买土地(美)的雷厉风行，是租佃企业家(英)和家园(Homestead)(美)的迅速发展；而另外一面是商业高利贷地主的束缚加深(最显著的是印度，)小规模经营的日占优势，(中亚细亚、印度)和半封建佃农(印)和无地雇农



——（中亚细亚）的创建。

成为问题的中国，已为国际资本主义所统治，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事实。问题是：在帝国主义者采取何种途径来统治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农村而言，帝国主义的统治作用，是在肃清中国农村中一切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与彼等自身相类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是尽量利用原有的经济结构，如在印度和中亚细亚一样，以适应其自身的生产方式。

作者的意见，以为只有在对上述问题作具体的运动、的探讨中，我们才能阐明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的性质。同时以为只有这样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并估价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中所起的作用，才能祛除一切对于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偏见。

从十九世纪下半期起，中国的农村便为资本主义的浪潮所激荡。自然经济的破坏，近代土地所有形态的形成，以及农村人口的流动，都以高度的速率在增进、在扩大。农村经济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就在追踪和分析旧有的农村机构怎样在世界统治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秩序——的影响下，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和偏差（Deviation），驯至发生什么本质上的变化。换句话说，对现阶段农村经济的分析，我们丝毫没有理由以农业经营的自足自给和家长制的（Patriarchal）诸特徵做我们研究的出发点，而应当从先资本主义的（Precapitalist）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环境间所存在的社会的经济的关系，着手进行。在这里我们当作如下的声明。第一、我们并不以为先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身，不需加以研究；我们的意见是：对于先资本主义关系的剖析，为的是要了解具有某种本质的旧关系，是怎样分解或变形为统治的资本主义的因素。第二、我们非但不能忘怀了在资本主义秩序的‘统一’中所包藏着的矛盾，而且应该



重视这些矛盾的展开。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固有的农村生产关系在宗主国资本的统治底下，有些乾脆地转变为与宗主国相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有些却尽可能地保持着旧有的关系（如印度，但本质上不消说已根本变过，它现在是帝国主义附庸的经济成份了。）因此，我们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先资本主义关系，因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在转变的内容等量齐观。

关于资本主义使中国农村经济形态变形的研究，不仅在诊断现阶段农村经济性质时具有决定的重要性，而且是检讨中国国民经济性质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有些研究者用农村经济和都市经济的比重（以人口或生产量为单位）来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性质。这种概括的办法，有时会发生严重的错误。加拿大和阿根廷诸国都是农业生产占优势，但他们无疑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照我们的意见，国民经济的性质应当用各种经济成份的比重，发展的速度（tempo）和它对于别种经济成份的统制作用来决定（当然政权谁属也是决定因素之一）因此，在从事这种工作时，我们必须检讨资本主义对于中国农村所起的分解和建立的任务，即它已毁灭了何种旧的经济成份，缔建了何种新的经济成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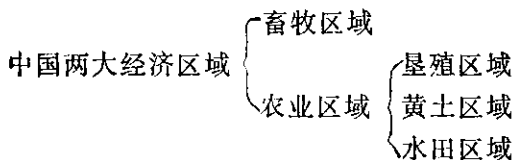
二 各区农村经济特徵的研究

地质、温度和湿度等自然条件是规定各种经济经营的主要因素，而生产技术进步的表现也随着各种经济经营的不同而互异。因而各种经济成份所占的比重以及其发展的途径等等，都跟着有显著的差异。

对于中国经济，有意作分区研究的，前有美国的克莱赛



(G. B. Clessey), 内容略见 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Service, (Vol. II. No. 33) 和苏联的马加 (Madgar, 详见中译马扎亚尔氏《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等。自然, 实地调查材料的缺乏, 使所有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人对于各区经济的特征还不能作完善的概括的描画。至今日为止。我们的意见。赞同将中国分成两大区和四小区, 来进行更精细的分析。



畜牧区域或称沙草区域, 这里定住的农耕生活已经开始, 有些地方且已很发展, 不过畜牧经济还占优势。这区域包括西藏、西康、新疆、青海、甘肃及宁夏西北部, 陕北一部分以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北部。余下的部分都属于农耕区域。在农耕区域内, 大体上还得分成三区。整个东三省以及热、察、绥的中南部乃属垦殖区域, 在那里农业经济的历史还很幼稚, 中国内地的移民是该区拓荒的‘功臣’, 直到现在还留着大批未经开垦的荒地。黄土区域的自然特征, 是全区具有或厚或薄的黄土层。黄土本身不需要多量肥料, 因为它能从空气中及地层里摄取养料。这区域是中国历史的摇篮, 包括河北、山东、山西的全省, 以及江苏、安徽的极北部, 河南的中部和北部, 陕西的关中和榆林道的一部分, 以及甘肃、宁夏的东南部。在这里, 麦是最主要的作物。在水田区域内, 灌溉是农业生产的前提。在这里, 气候、温度以及地质最适宜于培植稻作, 因此, 水稻是中国中部和南部最主要的作物, 而大米便成为本区人民最主要的食物。



这样粗率的划分区域，自然还免不了重要的错误（一些微究更不用说），作者的目地，仅想凭此建议，来展开我们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对于各区自然的、经济的特徵，才能得更确切的理地，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各区经济的特殊行程，和通过这种特殊行程探求其一般的性质。

自然的条件规制着经营的种类，而技术的发展，各种经济成分的成长和泯灭，以及外来经济势力所给予它们的影响，都随着经营种类的不同，而异其表现与程度。关于沙草区域的经济，我们可说至今还是茫无所知，例如在新疆，我们仅知回族的首领领有大批的牲畜和土地。但汉人蒙人中也有很多是大地主。材料极度的缺乏，使我们一点也不能把握其真实的经济结构及其阶级的划分，因此也无从谈及外来经济使它们起了什么变形，以及此种变化将趋向何种途径。同样，我们对于西藏、青海、西康以及其他畜牧经济占优势的区域，都只有一些零星的材料，对于它们要作初步的分析，还是绝不可能。

其次，讲到垦殖区域，比较说来，这里是具有经济自由发展最大可能的区域。旧有的足以束缚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稀薄，构成此项可能的最大前提。在满洲和内蒙原为满蒙王公的土地领有关系占优势，不过因为区域辽阔和荒地广大等原因，使这种领有关系就纯粹的经济关系而言，仅成一种极稀薄的构成。但一到大批的土地转移到新式的官僚、商人和买办手里的时候，一等到帝国主义势力——如日本之对东北——暴风雨般侵袭的时候，情形便急剧地起了变化。因为旧有的经济结构并不十分坚实和复杂，帝国主义在执行其统治的时候，也格外畅快和顺手。这样，垦殖区的东北全部便很快地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就农村经济而言，东北已成为供给帝国主义原料的主要场所，栽植大豆的面积以惊人的速度扩充着。劳动力的不足也迅速地



由直、鲁、豫诸省的移民来补充，于是荒地渐次变成熟地，封闭的自足经济也很快地变成流动的商品经济。随着垦荒运动的进行，大批的土地都落到许多军阀官僚手里。东北的新旧军阀官僚如张作霖、张作相、杨宇霆、吴俊升、刘尚书辈，都是鼎鼎大名的大地主，同时也是最大的买办。由领荒而变成大地主的事实，在热、察绥一带也是一样，例如绥境河套部分的良田多数属于巨大的地主。这儿须特别注意帝国主义收买土地的事实。原来在东北满铁沿线和朝鲜人移居种稻的处所，日本人早已收买农田；同样，在绥远一带，天主教堂收买的土地也很可观。至于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强制收买田地的情形更是普遍。旧的地主崩坏，代之以日本人和土著的新起地主。这种现象我们在日本征服台湾的以后，已经历历见到。

垦殖区内的农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急激地变为世界经济网内的生产和消费分子，这种情形特别在东北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的经济内容已普遍地转变为单纯商品生产，在较富的农民（在北满租佃企业家为多，在辽宁富裕的自耕农多些）还雇用多数雇工，进行其资本主义的经营，这些较高级的经营，在技术上也代表着进步的成分，有些农民还采用曳引机（Tractor）。

黄土区域虽有肥沃的黄土层，但是单就地力而论，一般说来，是不及垦殖区域和水田区域。例如小麦每公顷的产量，在华北平均为八五四公斤，在东南诸省为一、一一二公斤；大豆在华北平均为五六三斤，东南则为一、一五九斤。另一方面，华北最主要的经营形式是旱田经济，它所需要的劳动力较诸中南部的的水田经营一般地要少些。黄土区域内地力的较薄和所需工人的较少，使华北农民经济每单位所需和所能耕种的农田面积较水田区域为大。根据金陵大学的调查，华北平均每一农户所种的



田亩为二·四六公顷。东南部为一·五八公顷。因此，华北有田五百亩以下的人家多数自己经营耕种，不将农田出租。他们往往雇用了通常的年工和短工，来进行规模较大的经营。这样，一方面雇工经营的成份在华北就占较大的比重，同时农村各阶级中农业劳动者的成份也较中南部为多。

黄土区域内中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既多数自己经营农业，中小地主就异常缺少，因此患‘土地饥饿’的贫农大众，就很难租到田地。据华洋义赈会的调查，在江浙两省农民自有的土地，只占耕种农田的三二·六%，而在河北则占九〇%左右。根据前立法院一般的概算，自耕农在农民总数中所占的成分，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32%，在东北六省为51%，而在黄河流域竟为69%。这样小农土地所有的占优势，就构成黄土区域土地关系最主要的特徵（例外当然很多，如各大城市的附近，陕北、豫北、晋西北等区内佃农的成份遥占优势、）

在水田区域内水稻是最主要的作物。水田经济需要多量的人工，同时能提供较多的产物，这样使农业人口的密度较高，农民对土地所有的竞争也较烈。另一方面，长江和珠江流域工商业的发达远过于黄土区域，因此，旧有农村经济结构的分解也较早较快。大批的土地集中于少数个人的和家族的地主手里，是水田区域通常的现象。在整个水田区域内，地主所有的土地，占到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这里，自然存在着各种个别的差异，如南部诸省家族的土地所有势力颇大，在中部则比较小些；有些地方，小农土地所有还占优势；有些地方，则地主所有的土地几占土地的全部。

水田区域内中小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和黄土区域有很显著的不同，它们往往一面自己雇人耕种，一面将部分的农田，租给人家。因此，水田区域的中小地主遥多于华北，同时富农兼做



小地主，成为本区富农一般的特性。

水田区域的农田，既多数在大小地主的手里，无田或有田很少的农民，当然只能租田耕种，因此，水田区域内租佃农户的成份在全国各区要算最高。据前立法院概算，租佃农（包括佃农及自耕兼佃农）在全部农户中的比重，在黄河流域为31%，在华北六省为49%，而在长江及珠江流域为69%。

三 农村经济成份的分析

一般说来，要鉴别某种生产方式的性质时，我们须从下面三个因素综合地决定。这三个因素：是生产工具、生产者和围绕于生产过程的一般社会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的特质，其生产工具为机器，其生产者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其一般的关系是最澈底最全般的商品交换关系。不过普通生产者群的性质，往往就能作为辨识某种生产方式的指标。在本节中我们向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建议，我们来更进一步地分析各经济集团的性质，它们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发展的趋向和速度，这样来具体地确定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的性质。

在中国整个农耕区域内存在着一种自己经营农业的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往往出租一部分农田，留下一部分由自己雇工耕种，本人仅指挥雇农工作。这种地主，我们称为‘经营地主，’以便和以纯粹的土地所有为工具而收取地租的‘收租地主’相区别。这种地主经营的产品，当然多数售诸市场。这些地主所得到的，是利润和地租，他们是带有封建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

在中国农村中，以带有封建性的资本主义成份的姿态存在的，还有富农经济。中国的富农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范畴。一种



是中级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因为自己劳力不足，经常地雇用多量的雇工耕种，自己也参加工作。他们往往还出租一部分的农田给人家耕种。另外一种，是规模较大的租佃企业家，他们租进很多农田，雇用大量雇工，而他们本人或仅监督工作，或亲自参加耕种。这些富农经营的产物，也多半要在市场上实现。富农就其生产的部分而言，除得到自己的工资以外，还能获取利润。

在中国，正和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样，多数零细的贫弱的农民经济，（除在最闭塞的内地外），已具有相当高度的商品经济的性质。例如在陕西、四川、云南等省的鸦片区域，农民经济的规模愈小，所种鸦片的成份倒愈大，原因是鸦片税额太重，贫农兼种粮食，必致更无力量纳税；反之，较富的农民，却能划出一部分农田种植自给的粮食。在谷物区域内的情形也是一样，贫农收获以后，必将谷物零星卖出，以供日常零用，此后便另外找钱（副业收入或告贷），再向粮食铺零星买进粮食。同时，大批的贫农都得出卖劳力，季节地或经年地出来当厂工、矿工、雇农或苦力，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这些生产者在中国农村中构成单纯商品生产的经济成份的中心部份。

中国的中农，却典型地代表着家长制的自足自给的经济成份。一般讲来，他们自有足够维持生活的农田，和足够耕种农田的劳力。典型的中农是既不出租农田，也不租进农田，既不出雇于人，也不雇佣人家；换句话说，他们在租佃或雇佣关系上，是既不剥削人家也不被人剥削的直接生产者。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往往还保持其经济的自足，他们除少数必须购进的生活资料外，其他部分都由自己供给，有些最简单的生产工具，还由自己制造。这些保守的经济形式，在现时当然极不稳固，他们在商品经济的巨浪中，已起了痉挛的摆动。他们摆动的



结果，少数上升为赢取利润的富农，多数沦落为被人宰割的贫农。

现时中国农村除封建性较浓的转租地主经济外，便包含着这些资本主义的单纯商品生产的和家长制自足自给的三种经济成份。整个农耕区域内各种经济成份的比重和它们发展的趋向与速度，因缺乏广汎的实地调查，我们还不能作一般的鉴定。

据中东路经济局E. E. Yashnoff氏的统计，一九二五年吉林、黑龙江五十二县七十万村户中，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占百分之十四，他们所有的农田占总面积百分之五十二，中农户数占全部村户的百分之四十二·八，他们所有的农田占总面积百分之三十九。此外，占经济总单位数百分之四二·九的贫农仅有土地百分之九。我们从满铁会社在南满沿路所作的农村调查中，也知道富农经济的相当滋长。至于绥远垦殖区内大规模的租佃企业家更不在少数。就目前所知而论，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中的发展，确以垦殖区域为最具规模，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在那里已具有相当雄厚的力量。

在黄土区域，特别在华北平原，极少数的拥有大批田地的军阀大地主占极大的优势，而住在农村中的地主多数自己经营农田。他们在华北农村中是跨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尾随着他们的便是些富农经营，尽管它们都带有不少的封建性。根据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会调查所一九三〇年在河北保定县对十村一、五六五户的调查，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也占相当的优势。

	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比	所有田亩占总亩数的百分比	每户平均所有田亩(亩)
地主	三·七	一三·四	五八·五
富农	八·〇	二七·九	五六·三



中农	二三·一	三二·八	二三·二
贫农及雇农	六五·二	二五·九	六·六

在水田区域内便展开了不同的情境。在那里是由不事生产而专事剥夺生产资金投诸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的收租地主占绝对的优势。世界资本主义现阶段的桎梏已摘落了这些地主走上普鲁士式地主资产阶级化的一切可能与意愿，而使成为维护旧经济秩序的最有力的代表。在这里代表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富农，毫不踌躇地表现其对统治的经济形式的粘着，他们互续地弹性地走着由富农而兼地主，由兼地主而纯粹地主的途径。这些新起的地主往往较诸旧有地主更为有力，他们能取旧地主而代之。根据中央研究院一九二九年在江苏无锡所作二十村一，〇三五户的调查，地主所有的田亩几占总亩数的半数。

	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比	所有亩数占总亩数的百分比	每户平均所有田亩(亩)
地主	五·七	四七·三	五四·五
富农	五·六	一七·七	二〇·八
中农	一九·八	二〇·八	六·九
贫农及雇农	六八·九	一四·二	一·四

根据各方面的调查与估计，广东全省的情形大致如下：

	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比	所有亩数占总亩数的百分比	每户平均田亩(亩)
地主	二	五三	二〇三·三
富农	四	一三	二四·八
中农	二〇	一五	六·〇
贫农及雇农	七四	一九	二·〇

在追踪各区各种经济成分演进的趋向和估定其发展的速度时，我们首先要识清什么是阻难着中国农业中前进的经济成份



之发展和技术革命的最大的障碍物。无疑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是目下中国农村中前进的因素，它们急迫地需要机械的生产。可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却是苛酷的采取着新的形式而本质上还是封建主义剥削的重担；另一方面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再用种种方法（如作为投资的主要形式的借款）来增强这些负担一切对于中国地租、利息、商业利润、税捐等等剥削分量的研究，所以具有重大意义者，就是为此。

在中国整个农耕区域内，一切前进的资本主义因素，都在这封建的，更正确地说，半封建的胎盘中挣扎和妥洽。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矛盾的构成和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堕落和保守的特性，使这种半封建的关系成为统治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因素。这种因素的统治作用，我们在资本主义较为发展的垦殖区域也得清楚看到。在‘九一八’以前，东北繁重的税捐、高额的田租和利息、由货币的紊乱所受的损失、军阀买办通过商业资本所起的价格垄断作用，这些都是遏止农业经营的扩大和阻碍农耕技术的改进的基本因素。‘九一八’后的东北农村经济，在乾脆地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将以澈底缩小生产规模表现其萎缩的姿态。

至于黄土区域，除军阀大地主所收苛重的田租而外，税捐的需索成为剥夺新进经济成分的生产之最残忍的因素。只看在以各帝国主义者利益为背境的历次内战中，除了炮火劫掠等直接损失以外，兵差的徵派已多够惊人！华北的兵差比较中南部分更是普遍和繁重。在这种情形之下，黄土区域的地主经营者和富农自然不得不缩小经营范围，减小农业成本（据中央研究院和社会调查所在保定的调查，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较大经营的规模也显著缩小。）许多地主和富农原来雇用雇工耕种，后来怕不合算，便将农田逐渐出租，或者改用那些原始的



雇工形态的雇农从事耕种。

这种经营萎缩和经营形态后退的现象，在水田区域也很普遍。例如中央研究院在无锡调查三个农村农户的结果，规模较大的经营在逐渐减少。

	使用田亩在 十亩以下的 农户百分数	使用田亩一〇 一一九亩的 农户百分数	使用田亩在 二〇亩以上的 农户百分数
一九二二	三八·三五	三六·〇九	二五·五六
一九二七	四一·五〇	三五·三七	二三·一三
一九三二	五〇·三〇	三四·一三	一五·五七

就是上海邻近的宝山，在离城较远的处所落后的‘脚色’经营（以劳力还租），还有逐渐巩固的趋势。整个水田区域内仅有的经营地主和富农，转变为收租地主的趋向，毕常显著。富农所有的农田愈多，其出租农田的成份也愈大。这种现象恰和十九世纪下半纪农村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的俄国完全相反。

四 尾 声

篇幅的限制，使作者连几点建议都没有说得完全；至于在建议中所罗列的意见更没有详叙佐证的余裕。作者的愿望是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讨论应当进于更具体的更深刻的阶段；自然，正确方法的运用是必要的前提。我们将由此广泛地掀起一种实际研究的运动，而在实地生活于农村中的人们和少数研究者中间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且将大部分的工作加担于前者身上。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新的有效的材料，来确定各区经济的特徵和分析各种经济成份的性质及其发展途径。同时，在中国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帝国主义者及地主间的关系，以及这种



资本与农业生产间相互从属的关系未经阐明以前，在各区农业经营形式的演变以及农业成本构成的高度，没有作‘动的研究’以前，我们是无法指明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的性质。

（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土地所有的形态

农业的演进是和社会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内的社会关系的演进密接地结合着的。特别是对于农业的那种最主要的生产手段——即土地所结合的那种人与人的关系，在农业生产的实际过程中具有决定的意义，谁都知道，土地是农业生产不可分的附物，换句话说：它是农业的最主要的自然条件。就是土地的这种自然的特性，诱致了一般学者着迷般的拜物狂。多数保守的研究者，当它们从事于经济现象的研究的时，都愿意将一切社会的关系还原到技术的要素；那就是说，他们不惜用了心理的猜测和数字的偏差，将一切人与人间暂存的关系，还原到人对自然的永存的关系。这种倾向在学者研究农村经济的时候，表现得最是明显。土地对于农业，在那些学者看来，简直象神之统驭万物一样，它生产力的大小，可以直接决定农业盛衰。因此，在农村经济研究中，土地便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土地报酬渐减原则的被视为永恒绝对的法则，便是用自然主的见地来说明农村经济关系那种倾向的最完全的表现。实际上只有在土地这物质因素周围结合着的人类的社会关系——土地关系，对于农业生产实际行程才给予决定的影响。换言之，农业劳动的配置资本的构成，以及其它在农业特有的条件下具体地变形了



的各种经济现象，它们都要在某种一定的土地关系中才表现出它们底特性来。因此要探求农业中各种基本的要素和关系，必须先阐明某特定阶段的土地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的那种财产关系。

一 氏族共有

土地所有绝不是永久的范畴，它的内容和形态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大而变化的。就在这变化的过程中，它有时作为推动生产力的有力因素，有时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物。即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所有者以是代替老的资格而残留着的。他们完全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分取社会上一部分的价值物，而阻碍着再生产力的扩大。在上古氏族社会崩坏的时期中，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却表现为助长社会生产力前进的力量。

在氏族社会中整个的氏族构成了一个生产的单位。生产和分配都十足地保持着自给自足的性质，在这场合，土地是属于整个的氏族，非各人所能私有。这种氏族共有制度，表现得最完全的典型，要中世纪德意志的‘马克’（Mak）公社。在‘马克’的境界以内，氏族中各个族员都领到一定面的‘分地’（Hufe），不过这种分地，只是分配给他们使用，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属于公社的。最初，无论耕地牧场，都是共同使用的，每一块‘分地’都一样大小。可是到了后来，这些土地的分配，逐尔不均了，公共使用的土地，一天一天减少起来。有许多公社的族员，简直已没有‘分地’，而有许多竟拥有几块‘分地’，俨然成为有力的地主。不仅这样，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还占有了许多没有分配给族员的土地。公社底内部，那时已显然隐潜着土地私有的萌芽。农民的土地逐渐减少，他们终



至投身于大土地所有者的门下。于是公社急速地崩坏了，农民对地主的从属关系，也从此建立起来了。

这种土地氏族共有的形态，在东方也常见到。波斯到现在还保留着很巩固的公社的制。波斯境内的山地经济中，土地是属于整个的公社的，这种共有制，在波斯称为Umuml（公社所有）或Moachterek（协同所有），公社所有地上的生产物，完全属于公社，而再分配给曾在土地上工作的各户，土地上的收获物多数是在事前按照播种的分量，规定各户应留的产物量，而后由族员用了一定容量的器具（称Tas或Pima ne）而分得的。

在现时的印度还存续着许多原始的公社。这些公社是建立在土地的共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的结合和某种固定的分业等基础上面的。这些公社，每个约占有一百至一千英亩的土地，经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产的主要部分，既供给公社自身的直接需要，只有很少部分的剩余产物，作为商品而入于交换的范围，因此，每个公社，几和整个印度的市场相隔绝，而表现其十足孤立的姿态。这些公社，在印度各地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最简单的公社中，土地为公社族员共同耕作，生产物也分配给全体族员。各户还从事纺织等副业。除掉这些不从事全然同样劳动的人们以为还有身兼裁判官，警吏和收税吏的公社首领，再有管理农业的计算，登录等各项农业生产上所发生的事件的书记员，以及其它执管公共蓄水池内蓄水的分配的治水员等等。这些人们，当然须由公社中公费来维持。在许多较复杂的公社中，社会的公业要比较地更复杂些。

在农业，畜牧和手工业中，生产中渐增加，人类的劳动，在产生维持它自身的，必要资料以为，还能生产剩余的产物。这种生产力的扩大，便给予私有制的萌芽以强烈的刺激，使它



发滋长起来。每个氏族或公社的分子，都要将生产物占为私有，以满足他们更大的欲望；而在上的领袖们，更要公社整个的剩余产物，掠夺为已有。这种私有制的滋长，在那时表现为推进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力量。同时，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一方面使劳动生产力格外增大，另一方面更增强了对于劳动需要的程度。于是在战争时俘虏着的奴隶，现在便大批地驱使到农田和工场上去了；而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因此便告确立。这种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促使社会进入于一个新阶段—有阶级的社会的过程根本推毁了原始的公社机构，土地的氏族或公社的共有，已形成一种足以阻碍生产力前进的障碍，公社的土地共有形态，因此必然地破坏了，以前暂时分给各户种的土地，现在已作为他们永久使用的了。至于权力较大的人们，他们所有的土地，一天一天增多，他们采用了奴隶的或农奴的劳动，来增强自己的富力。

二 封建的土地所有

封建的土地所有，有三种基本的形态：（一）是国家的土地所有，（二）是具有超经济的特权者的大土地所有，（三）是小农的土地所有。

国有土地，特别在东方诸国的历史上，曾起有巨大的作用。在日本印度以及诸回教国家，土地国有，都曾扮演着封建初期的田权形态。当土耳其为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所统治时，土地完全为国家所有。十二世纪以后，中亚细亚的氏族，所有土地也完全被领导建设灌溉工程的国王宣布为国有的财产。在朝鲜土地氏族共有的制度，继续到高句百济和新罗鼎立的时代，后来氏族的纽带，逐渐弛紧，私有的土地，渐次增多。到



新罗统一了三国，便采用‘公田’的制度，将全国的土地都宣布为‘公田’一般人民，一到丁年，便可领导‘丁田’耕种，而在‘租’‘庸’‘调’等方式之下，向国家缴纳一定额数的租税。相类似的制度也在中国和日本通行过。朝鲜人民领受‘丁田’的年龄在十五岁，中国唐代规定十八岁受田，北魏十五岁。而在日本，‘班田’制下的农民，六岁就能分到土地。

当土地属于国家时，耕种农田的人民，都须向国家缴纳租税。在这场合，农民是在‘租’和‘税’不分的方式底下，将他的剩余生产物缴给国家，要是土地属于具有封建特权的大土地所有者，他们所缴纳的剩余生产物，将包含着‘租’和‘税’两部分。

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中，大土地所有者主要地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是领主的封地；第二是教会所有的土地；第三是私人的大土地私有者。

日耳曼民族底建立‘马克’公社上的平和的生活，从纪元后三七五年住居窝瓦河畔的HUM族的侵入到‘民族移居’（Vael-kerwanderung，指日耳曼人大批向南方移动而集居于罗马帝国的边境那件史实而言），便整个地崩坏。在‘民族移居’的混乱状态中，许多有力的人，乘机兼并土地，因此出现了种种等级的贵族。就在这些贵族阶级中，就产生了国王。称为法兰克王之祖的Ch.Lodwig，便是在民族移居的混乱时代中拥有巨大土地的一人。他统一了西日耳曼诸侯，建立起法兰克王国，将被征服土地的一部分赏赐给贵族和功臣。从此，拥有巨大土地的领主，一天一天增多，领主们所有的土地，还一天一天地扩大。自由农民所有的土地，都被领主兼并了，农民自身，不久便隶属于封建的领主。领主之下，还有家臣，他们也得领受封地。整个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就建筑在这



些领主所有的庄园的经济基础之上。

每个封建庄园的中心，有供给领主庄园职员和奴婢等住的住所，还有物仓，牲畜棚，手工业工场和直属于领主的土地和森林等等，在这些周围，便是农民耕种的土地。庄园内的农民，对于领主须负三种义务；第一，是缴纳自然物（农产或手工业品）的贡物。这种贡物，到后来须用货币来缴纳；第二，农民须在领主直属的农田上做各种劳作。这种赋役劳动，是庄园内所有的农民应尽的义务；第三，是缴纳各种杂税，如结婚税，死亡税等等。这种在中世纪欧洲大陆上通行的庄园经济和英国的庄园（Manor）在本质上没有差别。

教会的土地所有，在中世纪也很普遍。中世纪欧洲各王国的土地，很大的部分归于宗教的领主——即代表着寺院、修道院教会的长老僧侣等等。在Ch. Lodwig王时代法兰克王国的大分地方，已经基督教化的教徒们，在热诚地传播着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因此，许多自由农民，要仰仗教会来保证，只得将自有的农用寄存给教会。还有许多已经死亡的信徒们所有的土地，根据习惯法，也必须归诸教会。另一方面，当时的封建领主，为要巩固他们的掠夺，竭力地保证宗教地，豁免宗教地上一切的负担。这样，教会的领地就猛烈地扩张起来。这些教会的大土地所有，也建立起和世俗领主的同样的经济。宗教领地上的农民，除掉负担一般的贡物，力役以其它杂税以为，还需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即对宗教的领主，要缴纳十分之一的贡税。这种教会的土地所有，不但在欧洲就是在东方也很盛行。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国的佛教寺院所有的土地，中亚细亚的宗教地，土耳其，阿富汗等地方的Wakuf，虽然在形式上互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所具有的宗教领地的实质，却并无轩轻。

封建社会的体制，本来是宽松而不坚固的发展，使自然经



济的基础，连根动摇，土地逐渐地变成一般的商品，自由地转移起来。就在这过渡的阶段——即封建社会已经开始崩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确立的时候，许多商人和高利贷资本家，都会变成巨大的土地所有者。旧时的封建领主贵族等，都会被资力雄厚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所吞灭他们底地位就由这些新兴的地主起而代之。这种现象特别在现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内，发现得最多。这些落后的国家，一方面，受国外资本主义的侵入而使旧时的封建经济崩坏，其他方面，因为国外资本主义强烈的阻遏，而使自身资本主义的发展陷于绝小可能的困境。就在这些条件下，商人和高利贷者得仰承国外资本主义之鼻息。从农民手里攫得大量的土地，转身就租给无数走投无路的贫农耕种，而收取高额的田租。现时印度的大地主，多数是商人或高利贷者，他们的土地，是全部出租的波斯，阿富汗，朝鲜等地的地主也都是如此。

在封建社会中，自有土地的小农，虽然并不是构成封建生产关系的物质分子，虽然他们只形成一种中间的阶层，但在数量上也不能全被忽视。特别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和末期，这种自由的农民，占到很大的比重，在封建的初期，多数私有农田的农民，还没有全部托底于巨大的领主，或将土地寄存给教会。在封建的末期，一部分资力较厚的租田耕种的农民，有力购买田地，因此有田农民的人数，在那时也会相当地增多。一般说来，这些小农在这种封建的机构中，多少要受封建特权的约束，而且在土地的所有和使用上，还多量地保留着氏族或公社的共有共用遗迹。在英国的封建庄园中，存在着许多自由的农民。虽然他们不是庄园本质的要素，虽然它们并不象隶属的农民(Willain)一样固定地已属于某个领主，而可以自由地变更住处，或另找领主，可是因为它们要求领主保证，而将土地献给领主，自己只领



得租种权，因此对于领主也得担负种种义务。实际上，他们多数已不是自有土地的农民，而仅是比较自由的佃农，当然免不了要受领主种种的约束。在十一，十二世纪时，英国耕地的总面积，约五百万至五百五十万英亩，就中一百万乃二至二百万英亩，由各种隶属的农民共同使用，其余的，就为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所使用(F. Seebohm, *The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1883, P. 102) 这些自由农民所使用的土地，许多是共同使用的。这种情形，直到十三世纪‘圈地’运动(Enclosure)开始时，还是保留着。法国是典型的小农土地所有占优势的国家。不过在很长的时期内，土地所有的最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有特权的大土地所有者手里。法国在革命前，虽然有四十五万人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所有的耕地，只占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其余的，都属于国王贵族和僧侣。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在当时实际上还受到领主(政治的或宗教的)很严厉的约束。

小农的土地所有，在东方诸国占更大的比重。现时经济落后，而多数是水田经营占优势的东方诸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方面因有巨大的封建地主，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散漫的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些小农的土地，在使用的时候，确乎还带着很多共同使用共同收获的遗迹。中国各地的农民，在出卖农田的时候，必须得到田邻的同意；北方各省，在劈高粱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去收取，田主不得加以干涉。

三 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

资本主义要撕毁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土地所有形态，而创造出同它相适合的关系。它将公社式的共同所有转化为小土地



私有的形态。对于小农的土地所有，它要尽量地收夺，使小农都成无产者。同时它对于有特权的大土地所有者，不是使它们丧失一切的特权而没落，便催促他们自身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经营者。资本主义总会采取革命或缓和的手段来分解和腐蚀资本主义以前的土地所有诸形态，它使土地全般地转变为单纯的商品。这样，土地才丧失了一切温情的牵制，一切社会的政治的附加物，而纯粹表露其物质的形态。它这时才单纯地作为农业的生产手段，它的大小和位置，因此不得不适应着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和各种要求。于是，土地分外地必须以单纯商品的资格置身市场中去供人买卖。

可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条件，使土地的社会化和集中过程，不能同在工业部门资本集中一样迅速地进行。小生产者的土地，决不能彻底丧失。因此，那些在封建社会中同有特权的大土地所有，和公社式共同使用并存在着的小农的土地所有，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的国家，这是普遍地存在着。许多已经无产化了的人们，不久又会去买进些农田，形成了新的小土地所有的形态。而且就他们底经营方式来说，这些细小的经营，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凡是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地方，农村中小经营的增加，只变成为无产者家庭经营增加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增加是和资本主义式的大经营的增加并驾齐驱的’。（K. Kautsky Die Agrarfrage, 1898. 5174）。

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的形成，在各先进的国家，曾经过各种不同的历程。我们将用下面四个模式来代表各种特殊的行径。

一、英国现时的土地关系，是由集中到最高程度的封建的土地所有诸条件直接地发展出来，小农的土地所有，完全被吞灭了。同时土地所有和农业经营的分离，在英国表现得最是完



全,因此,这种土地关系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的条件异常适合。

在一二三五年,关于‘圈地’公布了最初的法律,允许领主将荒地和林野圈入他们的所有地内。这法律便是以后几世纪内露骨掠夺的端倪。十五到十六世纪之间,毛织工业开始发展,羊毛的价格急速地腾贵。当时,英国的土地所有者,在‘化黄沙为黄金者唯羊而已矣’的口号之下,感觉着那些先资本主义的佃农,决不能满足他们增加收入的新的希望,他们感觉着零星交错的公社式的土地使用,决不能适应那种需要大块的场地的牧羊的经营的新的倾向,于是他们就大批地将共同使用的田地没收,甚至将农民自有的土地也都圈入自己的所有地内。这种以十六世纪开始的大批没收共用地运动,直到十九世纪才告终了。到一七六〇年,被圈的土地已达三十三万八千英亩。从一七九〇到一八二〇年,三十年间,公布关于圈地的法令有三千二百五十九件所圈的地达六百十一万英亩。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再圈入八十万英亩的土地,总计已经被圈的土地总面积达八百三十七万三千英亩。到十九世纪,农村土地所有的资本化的过程已告完成。据一八七三年‘土地调查’的结果,土地所有的分配如下:

土地所有的阶段	对土地所有者总数的%	对所有地总面积的%
1 英亩以下	72.3	0.5
1—10英亩	12.5	1.5
10—50英亩	7.4	5.3
50—100英亩	2.7	5.4
100—500英亩	3.3	2.07
500—1,000英亩	0.5	10.0
1,000—5,000英亩	0.5	28.2



5000英亩以上	0.1	2,8,4
其它	0.7	0.0

占总数92%的小土地所有者（1—100英亩），只有11.4%的耕地，而1.1%的大土地所有者，却占有67%的耕地，土地集中的高度，于此可见。

在英国的土地制度之下，农业和土地所有，几乎已经完全脱离。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虽为大土地所有者所占有，而由他们经营的土地只有17%；其余83%的完全借给租田农耕种。租种农田很少的佃农，在户数上虽差不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但他们的地位很不稳固，他们多数从属于各个资本主义的大公司。

二、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土地关系的构成，在大土地所有者对小生产者的掠夺这一点上，同英国的有些相似。可是它的发展。自有其特殊的途径。有特权的封建地主，用了强力，使以前自由的农民，无论在经济上或法律上都屈服在他们底下，而将大部分公用的土地，甚至一部分私有地没收为己有；可是这种掠夺的过程，并没有进行得象英国那样彻底。另一方面，那样大土地所有的封建的特权，也没有象法国一样，在革命时代全被剥夺。反之，封建的统治，在德国很久地维持着。直到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多数封建的大地主（Junker），也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采用半隶属性的农工，进行其资本主义企业的大地主经营。同时，农也急速地无产化，中农和富农的经营，也一天一天资本主义化。至于那些小土地所有的命运，当然只是日趋零星。据一八七八年调查的材料，普鲁士的分配土地是这样：



土地所有的阶段	所有者数 (%)	土地面积 (%)	每公顷所得 (泰来)
所得在500‘泰来’以上的	3	38	15.01
所得在100—500‘泰来’的	12	30	15.83
所得为100‘泰来’的	17	19	10.01
不能给予足够收入的	69	13	10.47

普鲁士的土地，很显然地集中在大所有者手里，那些小土地所有，却在一天一天地零细化。

三、如上所述，法兰西是小农的土地所有占优势的国家。在革命以前，土地已多数被编入封建的领地以内。有特权的大土地所有者，很能同英国一样，将农民共用的和私有的土地，大批地圈为已有。可是革命将这种土地掠夺过程打断了。非但这样，革命还将特权的土地所有剥夺，同时，也将领主的政治和经济的支配权剥夺。有名的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的法令，毁灭了封建的土地制度的基础，没收了很多部分的教会和贵族的领土。领税地那一种封建的残余，也在一七九三年被废止了。可是革命并没有使土地成为国有的财产，反之，这些土地，多数被大资本家，投机者和中农收买了去。那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乃是经过买卖的手续的，总值达七十万万法郎。因此，法国的革命，一面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另一方面建立了中农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者。据一八八二年的调查，法国最小的土地所有者（有地1公顷以下的）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二，他们所有的土地，只占全部耕地的二十分之一。

土地所有的阶段	所有者 (%)	土地面积 (%)
1公顷以下	61.0	5.2
1—10公顷	31.1	30.3
10—40公顷	6.6	25.8



40公顷以上	1.3	38.7
--------	-----	------

法国的土地所有，既这样分散，小土地所有者，当然只得向大地主租地耕种。因此法国的分益佃农便普及于全国，而每个经营的面积，一般地比所有的面积大些。小土地所有和小农业经营的占优势，这样便构成法国土地关系的特征。

四、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农业资本主义诸关系，经由着直线的爽快的途径，而被确立起来。它底建立，并不需要和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者相苦斗，也不依赖对独立生产者的掠夺；它自始就建筑在自由的土地占有的基础上面。虽然在最初殖民的时候，各国的移民，也曾将各种旧有的制度和习惯移殖到美洲，但在新的经济环境底下，那些古旧的欧洲式的土地关系，就很快地废除了。那种保留土地世袭和限嗣继承制的英国贵族土地所有的残余，在十八世纪的末叶，已破坏无余。在独立的国家和统一的联邦形式以后，新的政治的统一，要在新的土地所有的关系中建立其自己的经济基础，联邦政府，便将各洲所有的自由的土地，都宣布为国有地(Public Lands)，政府将国有土地分让给私人和公司。一面，政府还大力扩充国有地的面积，终至扩大到十三万九百英亩。实际上，买进土地的并不是农民，倒是些资本家，大公司和地产投机的人。土地的投机，在一八三五——一八三七年，特别地盛行，到一八五七年，掀起第二个投机的浪潮。当时，每年买卖的田产竟达两千万英亩。参加投机的人，除资本家外，银行也是染指的。自一八〇一——一九二一年间，卖出的国有地共达二万八千五百万英亩，共值四万二千五百万元。据一九二〇年的调查，全国的农场总面积为九万五千六百万英亩，可知卖出的国有地，倒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因此，美国的土地政策在名义上虽然要保证小农经营，实际上却助长了土地的投机和土地所有的集中。政府虽屡次公布法



令要巩固农民的经营，不过在资本的政策之下，和欧洲同样的对小土地所有者的掠夺，还是免不了的。在形式上，和欧洲各国不同的，在美国是因为农民的负债而陷于佃农的土位，土地就在事实上集中到大资本家和银行的掌握里去。农业经营脱离土地所有的过程，虽然没有进行得象英国那样尖锐。从十九世纪的末叶起，这种倾向也已经十分明显。金融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但要在支配工业的领域，对于农业，也要获得其完全的支配权。因此，在分散的个人的农业领域中，它也明显地表现其独占的统制的倾向。

多数新兴殖民地的土地关系，都采取同美国相类似的形态。法国的土地所有形态，可以做为比利士，意大利的一部分和日本等处的典型。丹麦的情形，便和德国相似，所不同的在丹麦是中农的经营占优势，在德国则为大地主的农业企业所支配。

资本主义，为要完成合理的自由的企业组织，对于公社或民族的土地共有，或封建的大土地所有，或小农的土地所有，不是使它急速地消灭，便使它缓慢地腐蚀。不过，在资本主义的内部总包含些自身解决不了的矛盾。谁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土地所有者是没有参加生产的必要的；这种代表着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的残余的土地所有者，却因为没有财产的神圣性，而在资本主义底整个过程中，竟始终被维护着。资本家将地租缴给土地所有者，分明减少了他们投入再生产的资本容量。同时，土地所有的独占，限制着资本的自由投放，更使农业资本主义不能彻底发展。资本家们虽然感受着这些苦痛，但他们自身却没有勇气来铲除这种独占的地租的根源。这种根源便构成了现时资本主义农业恐慌的基本原因。

1932年10月24日



中国本部两大区域的土地关系

宗主国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众的残酷的掠夺。建基于价值决则底破坏上面。宗主国制置品向落后地带的销售，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原料品向宗主国的输出，都在非等价物底交换过程中进行。这种非等价物交换过程底形成，是以宗主国和殖民地间劳动生产率底差异为基础。殖民地民众的劳动生产率愈低，则其所生产的价值物中无偿地被另外一个世界所吸收去的成分便愈大。因此宗主国的主人们，为了保证其巨量掠夺，除保持殖民地能适应地提供其所需要的，原料和销售其制成品的能力以外，不能不尽力阻遇殖民地生产底发展。这基本的动因足以说明列强为要维持其自身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便在落后的国家作一切增强土著的先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的尝试。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因受列强资本底侵入而加强，中国土地关系底性质固以列资和民族资本底激荡逐渐染濡资本主义财产底色彩，因而中国土地所有底集中也以贫困与累债为过而日趋尖锐，可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终于在资本主义末期殖民地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底下，保持其对于前一社会发展阶段而言，表现为一种残零的废墟，对后一阶段而论仅为未放的苞蕾的状态。目下中国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间的关系得充分表现此种特性，特



别是在中国本部的黄土和水田区域。

黄土区域

黄土区域是中国历史底初期的宝库，它包括着河北、山东、山西、甘肃的全省和江苏、安徽、河南的北部，陕西的关中榆林两道。这广漠的华北领域自然的特征是全区具有忽厚或薄的黄土层。所谓黄土是一种经过河流浸淹，积久沉溺的土壤。黄土中没有砂砾的成分，同时黄土从空气中吸收养料和由毛细管作用从地底吸收养分，因此，它本身不需要多量的肥料。这种黄土在华北平原（河北、山东、河南）分布得最厚。在西部黄土只构成极薄的地层，土壤异常平瘠，例如甘肃全省约三千万亩的耕地，中间十分之九是平瘠的旱地，每年至多收种一次，有些高寒的地带，隔年始得一种。可是就有地力较厚的华北平原，也因为灌溉和气候的关系，农田底生产力远不如中部和南部诸省。在东南部各省一年两熟是经常的收种次数，南部竟有一年三熟乃至四、五熟的作物，在黄土区域二年三熟要算最多的了。各种作物每单位而种的产量，华北也远不及中部和南方。据金陵大学的调查，小麦每公顷的产量在华北平均为854公斤，在东南诸省为1112公斤；大豆在华北平均为563公斤，东南为1159公斤；绿豆在华北为660公斤，在东南为1512公斤，蕃薯在华北为5992公斤，在东南为10273公斤。（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1930, No203—204）。

黄土区域农田生产力既比较地薄弱，农民为要维持其生活，不得不耕种较多的农田，华北农民每户所种的田因此一般地比中南部要大。据美国农部O. F. Balsler氏估计，华北种



植杂粮的区域内平均每一农家耕种 $3\frac{1}{3}$ 亩，约合20亩，南部种稻区域平均每户只耕 $1\frac{2}{3}$ 亩，约合10亩。根据金陵大学的调查，华北（指皖北、河北、河南，山西境内诸调查区）平均每一农户所种的田亩为2.46公顷，东南部（指皖南、浙江，江苏、福建境内诸调查区）平均为1.58公顷（Buck, P. 46）。

华北地力底瘠薄和工商业底不发达使500亩以下的土地所有者宁愿自己经营，耕种，不愿将农田出租。因为假如出租，他所得到的田租并不丰厚，同时他们又很少机会向工商业方面投资而仅藉土地所有为绞取农村资金的工具。因此，在华北中小规模的收租地主远不如中南部为多，而富农和地主经营者底成份却远过于中部和南部。这些富农和地主经营者都用年工耕种。他们在河北平汉沿线一带的农村中所占的成分约在10—15%之间。在山西大同一带自耕农种田稍多的，就要雇用年工耕种，每户所雇的人数大约一、二人至三、四人不等（大同县的农民状况，西北，期三，页三）。根据金陵大学的调查，农户所雇年工的费用在全部劳动的费用（家工的工资在内）中所占的成份，在华北为26.3%，在东南部为21.7%（Buck, P. 235, Table 4）。据清华大学调查的结果，农民使用雇农的同时自己也参加耕作的耕地在浙江省鄞县为5.6%，江苏省的江险，吴江诸县平均为3.6%，（以上为东南部）；安徽省的宿县为7.2%，山东省露化为3.3%，河北省遵化，唐县和邯郸诸县平均为16.5%（Malone and Tayl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1924, P. 25）。华北富农和地主经营者所雇用的雇工既多，农业劳动者在华北所占的成分自然也比中南部多些。在山西大同一带纯粹的雇农占全部农户底百分之三上下，在河北中部约占百分之五，在陕西关中占



10%以上，而在河南淮河以北的区域中雇农竟占到百分之二十。（东方杂志农民生活调查专号，淮河流域的农民状况）。在华北各省现时通行着定期的劳动市场，在农忙的季节大批雇农在市节上等着被雇。这种情形在中南部很少存在。雇农在江苏南部总占1—2%，在其它中部和南部各地雇农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成分减少，超过百分之十。

现时华北500亩以下的土地所有者既多数是自己经营的地主经营者和富农，广大的贫农和中农之群，虽然缺乏土地也无从租进农田耕种。因此，黄土区域的农民所种的租田一般地比中南部要少。

北部和东南部农民耕种自田和租田的成分。

	所种的自田%	所种的租田%
东南部：浙江县	32.6	67.4
江苏 徽	52.0	48.0
江 险	30.1	69.9
吴 江	23.8	76.2
江苏各县平均	32.6	67.4
北部：安徽宿县	50.1	49.9
山东露化	99.6	0.4
河北遵化	86.7	13.3
唐 县	82.5	17.5
邯 郸	97.1	2.9
河北各县平均	89.3	10.7

(Malone and Taylor, P. 25)

在江浙两省农民自有的土地只占耕种农田底32.6%，而在河北则占90%上下。因此小农土地所有底占优势构成黄土区域土地关系底特征之一。



在华北住在农村的土地所有者出租的农田很少见到。农民所租种的农田多数是从住在城市里的大地主手里租进。

出租农田占有所有农田底%	自村外地主租来的农田 占使用农田总数的%
江苏：徽、吴江、江险诸县 4.15	25.9
河北：遵化、唐县、邯郸诸县 2.5	8.2

(Malone and Taylor P, 25)

这些城居的大地主几乎全数是军阀和官僚，曹家兄弟便是天津，静海附近最大的地主，他垄断着一切灌溉和排水的装置。阎锡山在他的本乡五台附近拥有巨大的土地，同时因为阎氏本人及其僚属在山西争购田产，近十年来山西的田价跟着急速增加。据陕西省 务人员说，关中在连年旱灾以后农民都出卖田地，这种移转的田产中十分之七集中在军人手里，其余十分之三为官僚和商人所收夺（陈翰笙，关中小农经济底崩坏，东方杂志，三十卷一期）。华北工商业底比较不发展，使土地成为军阀底唯一的收入的泉源，因此他们一面尽量占有土地，以直接收取地租，（虽然有些新兴的军阀不去买地，仅将钱存入银行），一面无限制地增加田地上的税捐。特别是兵差一项，华北农民所负担的比中南部的更是繁重。例如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两年中全国各省负担兵差的县分占有县分总数底44.13%，而华北有76.94%的县分负担兵差；尤其是黄河流域各省负担兵差的县分竟占全境底87.12%（中央研究院华北的兵差与农民，一九三一，十一页）。这些兵差几乎全部按照地亩摊派，而军阀所征派到的兵差和他们所有的其它收入一样，是用作扩大地盘的手段。华北军阀底收入既多半取诸土地，则从经济的观点说，军阀之为大地主的意义，在华北特别显明。现时农民的土地所有在黄土区域虽占优势，但在军阀大地主



底统治底下这种农民的土地所有 (Grundbesitz)。同时，华北农民有产者和无产者间比较深刻的分化，在军阀地主和全体农民支配的对立底下，相对地不甚显著。在这里须特别注意下述的事实，在最近期内黄土区域的小农土地所有已在根本动摇。亘续的灾祸鞭策农民奔上无产化的前程，大批的土地便落入军人官僚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手里。这些新的地主多半不自营，他们将农田出租，给贫农耕种。在这场合我们不难见到中国中南部的土地使用形态会在黄土区域照样重演。

二 水田区域

在长江流域 (中部) 和珠江流域，稻是最主要的作物。稻作特别需要多量的水分，因此中南部水田底成分比较最多。水田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人工灌溉，它所需要的人工还多于旱田生产，它所提供的生产物也比较地多。中南部的这种技术的特性，使农业人口底密度较高，(中南部每农户平均摊到耕地12—22亩，北部平均每户为18—32亩，东北和内蒙古平均每户为37—103亩)，同时农民对土地所有的竞争也较烈，这样使土地分配极不平均。

现时中部田区域的土地有百分之五十至七十被握在地主手里。福林氏对于广东全省土地底分配作成下列的估计：

土地所有者类别	占总户数底%	所有农田总面积估计 (亩)
地主	2—3	10,000,000
富农	2—3	4,000,000—5,000,000
中农	12—15	7,000,000—8,000,000
贫农	80	7,000,000—8,000,000



总计 100 28,000,000—30,000,000

即占总户口2—3%拥有38%以上的耕地，而占户口总数的80%的贫农只有25%的农田。在广西的东部，苍梧附近七县的耕地有58.1%被仅占人口总数2.2%的地主所占有，而农民只有全部耕地底21.4%，其余为民族的田产和公产。贵州和云南两省土司和汉大地主占有的土地至少在60%以上。例如黔西大定全县的土地，有20%以上是土司底私产，此外土司因事归公的土地现由县公署管理的约占全县土地底10%。私人地主所有的土地占全县人底30%，农民只占有10%，其余30%是未经开垦的荒地。当地的土司直到现在还可以将旗帜插在土人田里就算自己私产（扬万选，贵州大定县的农民，东方杂志农民生活专号，一九二六）。在长江流域各省地主占有的农田不比南部少些。江苏南部至少有40—60%的农田落在地主手里，有田1,000亩以上的大地主江南各县可说无县无之，最多的县竟在40人以上。甚至有田10,000万亩以上的地主在整个江南还有16—20户。浙江地主所拥有农田的成分决不低于江苏南部。嘉兴一县有田1,000—5,000亩的地主有二三一）。根据浙江平湖农业调查的材料，我们得估计平湖全县地主共有田三十六万多亩，占全县田底70%。

地主所有田亩	户数	所有农田面积估计
50—100亩	600户	50,000
100—500	300	100,000
500—1,000	65	49,000
1,000—3,000	46	92,000
3,000—5,000	5	20,000
5,000—10,000	4	30,000
10,000以上	3	45,000



（张宗弼平湖农业调查，统计月报，一卷三期。按平湖全县农田为四九六，六三九亩）

安徽的西部英山霍山一带全由大地主所统治。皖南的农田也多数在地主手里，例如南陵一县有四家客籍的大地主，最多的拥地二万余亩，本地地主中有田2,000亩以上的也不少（南陵农民生活状况，东方杂志农民生活专号）。金陵大学曾在芜湖调查到四十六户佃户，他们向三十六户地主租进农田耕种，此三十六户地主中，二十三家是商人，他们每户平均有田一，三〇〇亩；两家是地主经营者，他们每户平均有田一，五四〇亩，再有两家是官僚，他们每户平均有田一，六五〇亩，另外些地主是读书人和寺院等等。（金陵大学，芜湖一〇二家农户调查，六五页）。

江西全省可说全由地主所支配，特别在阳湖滨各县，那里的农田几乎全部在大地主手里。湖北的汉口，武昌及鄂东的黄冈，黄陂等县都是以多大地主著称的地方，例如在黄冈县方本仁和刘尚喜两家各有田一万亩左右。鄂中南漳一县有田两千亩以上的至少在四十户以上。在湖南四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军阀和官僚手里，特别是四川、刘湘，刘文辉等大小军阀都拥有农田几万乃至几十万亩。

在这里我们须注意中部和南部地主底特性。第一，中南部的巨大土地所有者，往往是整个的小家族，这种族有田产所占的比重在南部的两粤及福建特别地大。在那里每个氏族保有若干族有的土地，这些族地全部由族中的豪户执管，租给同族的或别族的人耕种。例如番禺县吴姓的一族，由一百家组成，这些家庭按照亲族的关系分为七个大家族。全族有祖先的祠堂，在祠堂内解决族内一切的争端，吴族占有广大的土地，这些田产必须得到全族大多数人底同意才能出卖，由族土地底出租而得到



的收入，照例是用来抚卹贫困的族员，祭祀和本族防卫的组织等等。根据福林和约尔克在广东研究五十九村的结果，族地竟占耕地总面积底59%。据前粤省农民协会底调查，在十一个县份中族有土地占全部耕地底40%。塔尔哈诺夫在广西东部七县的调查，指明氏族和宗教组织所占的农田也占20.7%。在江浙一带‘义庄’和‘祠堂’等氏族仓库和祭祀的组织也拥有很多田产，在江苏南部氏族田产至少占5—10%。

其次，中小地主在中南部农村中所起的作用比中国其它部分所起的作用都还为重要。江苏南部有田一，〇〇〇亩以上的大地主约占全部农田百分之十至十五，一，〇〇〇亩以下的中小地主却占有却占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土地。根据上述的浙江平湖农业调查，全县地主所拥有百分之七十的农田中，一，〇〇〇亩以下的中小地主却占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又如浙江的高岛，大地主并不多，小地主则各村都有，占全村户底百分之十至十五。（东方杂志农民生活专号）。一般地说，水田区域内有田一〇〇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会象黄土区域的一样，自己经营耕种的十分稀少，他们宁可将田地出租，一面苛收田租，一面兼营商业和高利贷。这些中小地主多半住在镇上，或村里，镇上粮食店和押店等底主人往往就由他们充任。他们自己的经济容量本来不很大，他们只能苛待佃户和债户，获取较多的田租和利息。在水田区域中小地主所占土地的成分既多，他们对农民剥削的程度又强，因此，中小地主整个的经济系统（包括收租、经商、放债、包办手工业、包收税捐等机能）。对于下层农民构成直接的支配之纲。

其次，中南部诸省有田较多的农民，往往一面自己雇人耕种，一面将一部分农田租给贫农。这种富农兼做小地主的现象成为水田区域富农底特性，同时也是中南部小地主特多的主要



原因。一般地说，黄土区域的富农并不出租农田，甚至有些地方，富农非但不出租农田，还租进或典进农田扩大他们经营底范围。水田区域的富农等到他们所有的农田扩大到某种程度，一面因为雇工经营并不值得，一面田租的收入比较稳当，都愿将田出租。江苏南部富农所有的农田中至少有15—20%租到别人耕种。他们所有的农田愈多，出租的田地也愈多，因此他们有渐次变为纯粹收租地主的倾向。

中南部的耕地既绝对大多数被握在地主和富农手里，无地或有地很少的贫农当然只能租田耕种，因此租种农田的佃户构成中南部贫农底中心部分。在江苏南部至少有50—80%的农户租种人家底耕地。

	纯粹种自田的农户%	租种农田的农户%
江宁	25.4	64.6 (江宁农业情况, 统计月报, 一卷四期)
武进	7	80 (东方农民生活专号)
吴县	16	62 (同上)
松江	30	60 (同上)
太苍	40	40 (同上)
海门	35	50 (同上)

浙江的嘉兴贫农租田耕种的占70% (杭州民国日报, 一九三二, 一〇, 三一)。平湖的自耕农仅占8—10%, 而租田农竟在90%以上。(张宗弼, 农业调查)。浙东的衢, 金华, 兰谿, 嵊县, 绍兴, 东阳, 江山, 崇德等八县自耕农占村户总数底14.75%, 租田农占54.34% (浙江大学农学院, 浙江八县农村调查报告, 一九三〇, 三四页)。安徽西部给大地主统治的区域佃户所占的成分当然很多, 就在中部和南部租地也在半数以上。例如在当涂租田农占农户总数底50%, 合肥占70%, 潜山占



50% (均见东方农民生活状况专号)。

江西鄱阳湖周围的农民几乎全部是无田的佃户，湖北的中部和东部各县租田农所占的成份至少在60—80%，而鄂西的佃户比自耕农多至三倍以上（武江日报，一九三一年，三，一〇。）四川省佃户所占的成分也异常高，川北各县的租田农多过自耕农三倍（东方杂志农民生活状况专号）。据H. D. Brown在成都平原的调查，租田农占全部农户底56%（Brown A, Survey of 50 Farms on the Chengtu Plain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 H, No. 1, ）。同时，峨嵋山全部农户是向寺院和私人地主租进农田的佃户（Brown, A Survey of 25 Farms on Mount Omei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 1, No. 12）。中国南部各省租农田所占的成分也和长江流域相仿。据各私人 and 学校在广东调查的结果，佃农在广东平均要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

调查区域	纯佃农最低率	纯佃农最高率	佃农平均率
东红十二县	——	——	65.5
中部五县	80	95	85
广州及其附近	——	——	96.4
河南	——	——	94.9
中山大学调查的七县	60	90	70.0
济南大学调查的诸县	——	——	85.5

(D. K. Lien Land Tenure System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 No. 6, P. 458) 广西苍梧一带，林户中纯粹自耕农只占19.4%，自耕兼佃农15.7%，而纯粹的佃农竟占52.1%。福建各地租佃成分也占最大多数，



如在沿海的连江租田农占55.3% (Buck, P, 146) 福州占60% (香港工商日报, 一九三二, 一〇, 五); 在闽西佃户占全部农户底70% (香港工商日报, 一九三二, 一〇, 一〇, 龙岩的适中竟占80%。(中央夜报, 一九三二, 一〇, 一〇)。贵州和云南土司所有的土地量很大的成分, 也有些汉人招了大批的佃户耕种, 特别在济南各县那里几乎全是‘小小的资本没有, 耕牛和全部向地主租借’的佃户(中山大学, 西南研究创刊号, 二一页; 云南南部农村状况, 东方杂记农民生活专号)。为要使中南部的租佃成分和中国其它区域构成亲切的对比, 我们试来用下引的一般的概算:

区 域	自耕农%	自耕兼佃农%	佃农%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32	28	40
黄河流域	69	18	13
东北六省	51	19	30

即在中南部各省租种农田的佃户占全部农户底68%, 在东北六省(辽, 吉, 黑, 鸡, 察, 绥)只占49%, 在华北只占31%。

水田区域的贫农和黄土区域不同的, 前者多数佃户, 而后者多数兼做雇农。苛酷的收夺逼着农民失却土地, 失地的农民在中南部还只能向地主租田耕种, 因此租农的贫农现时还在不断地增加。例如江苏的崑山和南通和安徽的宿县佃户在二十年里增加了7—18%。

崑山与南通宿县佃户底增加(佃户对农户总数百分比)

年 份	崑山	南通	宿县
1905年	74.0%	79.8%	40.5%
1914年	78.3	84.2	57.5
1924年	91.7	87.0	56.0



(乔启明, 岷山南田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 一九二六年九页。)在湖北的西部近一〇年来自耕农减少四倍以上, 佃农差不多增加一倍(武汉日报, 一九三一, 三, 一〇)。四川的北部, 自耕农和佃农也在急速地消长:

年份	自耕农%	佃农%
1912年	15	28
1926年	11.5	35

(东方农民生活状况调查专号, 根据所列图表估计)。中南部的贫农就是这样大批地陷入半奴隶的租佃关系中。

在水田区域富有农田的地主和富农既不注意于农业生产, 贫农的农民又很难买到或租到农田, 农业经营底规模因此异常狭小。根据金陵大学底调查, 东南部各地的农户平均每户耕种一, 五八公顷, 在华北平均为二, 六四公顷(Buck, P, 46)。江苏南部的富农普通每户种三十亩左右, 中农种二十亩左右, 贫农每户只种五六亩。在安徽芜湖纯粹佃户平均每户只种一五, 〇亩, 半自耕农种三七, 九亩, 纯粹只耕农也只十九, 六亩(金陵大学, 芜湖一百零二家农户经济的社会调查, 二三页)。在湖北中部和东部, 富农每户所种的农田普通在三〇亩以上, 中农在二〇亩左右, 而贫农只种五一—一〇亩。四川成都平原所种的农田比较多些, Brown氏在成都附近一百里以内抽选五十户加以调查, 结果, 每户平均耕种的亩数自耕农为七三, 一亩, 佃农为六八、七亩, 半自耕农为三〇, 一亩, (H. D. Brown A Survey of 50 Farms on the chengtu Plain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 II. No. 1.)。但在峨嵋山附近的农民平均每户只种八, 四亩, 最大的也只一六亩, 最少的甚至只种〇五亩(H. D. Brown A Survey of 20 Farms on Mount Omei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 1, No. 12, 1927, P)。南部各种农户所种的农田和中部一样的狭小。福建连自耕种二〇亩以下的农户占总数底60%以上(Buck, P. 40)广西东部租佃成份极大, 经营规模自然极小; 就在自耕农占优势的村西农民每户所耕的农田普通也在一〇——一五亩之间。根据马加氏所举南宁市的材料来推算可得如下的比例:

	农民总数底%
耕种二至五亩的	25
耕种一〇——一五亩的	60
耕种二〇亩的	2—3
全无耕地的雇农	5—6

广东农户耕种面积比其它各省都小。根据广东中山大学的广东农概况调查录, 广东全省农民每户所耕的农田普通在五——一〇亩之间。现略举数县情况以概知一般……

东江流域及观梅各岛

开封, 兴宁, 蕉发, 平远等县: 每户平均种田5—6亩;

五华: 三亩左右;

龙川: 2.5亩,

河源: 一〇亩以下的占10%, 10—15亩占60%, 15亩以下的占30%。

西北江流域:

南雄: 五亩以下占30%, 5—20亩占60%, 20亩以上占30%;

英德: 五亩以下占25%, 5—10亩占40%, 10—20亩占25%, 25亩以上占10%。

增城: 10亩以下占40%, 10—20亩占45%, 20—30亩占10%, 30亩以上占5%。



高雷各关：

信宜：五亩以下占50%，5—10亩占40%，10亩以上占10%。

化县：五亩以下30%，5—10亩占50%，10亩以上的占20%。

茂名：五亩以下占20%，5—10亩占40%，10—20亩占30%，20亩以上占10%。

同时根据海南岛志的记载（陈铭枢，一九三三）：环崖各县每户耕地在5亩以下的占70%，5—20亩的占30%，至于种田20亩以上的真是绝无仅有（二七八页）。在整个水田区域虽也发现些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底痕迹（例如海南岛，珠江入海处的沙田，浙江嘉兴的佃农，江苏无锡当州一带的富农经济等），但这些幼弱的萌芽决受不了国内中世纪剥夺和国外帝国主义底摧折。因此平和的民主主义者，在期望缔造之朝夕企求的资本主义秩序时，无论在华北黄土区域和中国南部水田区域都会感到无限的失望。同时农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底稀薄也得使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跳跃论者，即否认阶级论者不再沉流于幻梦。

（1933年8月）



中国地租的本质

一 地租范畴的一般概念

地租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社会生产过程发展的阶段相适应。地租的收受便是土地所有实现时的经济形态，也就是土地所有者与实际生产者间榨取关系的具体表现。只要有土地私有权存在，同时也就有地租存在；无论土地私有者是农村公社的代表人，或是君临在奴隶或农奴之上的领主，或是现代的完全脱离农业的名义上的地主，地租无非是他们向实际生产者所领受的剩余劳动、或剩余生产物、或剩余价值的一种名目。就因为地租具有这样的共同性，人们对于适应于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地租的本质上的差别，才会发生不可恕的混淆。

地租正和私有财产一样，是一个并不神怪的历史的命题，它的内容完全为社会的生产方式所规定。只有土地所有已采取着资本的形式而存在，换言之，它已经屈服在平均利润下的时候，土地所有者才能以三位一体（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构成近代社会的骨干）中一‘位’的资格，领受所谓资本主义的地租。租佃的农业企业家向地主租进农田、自己



仅负经营的责任，实际耕种者还由工资劳动者来充任。在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中，租佃的企业家必须按照契约，支付定额的货币，给予土地所有者，这便是他交给地主的**地租**。在这种场合，租佃企业家和一般的资本家一样，从事于资本家的商品生产，他在农业这特殊生产部门中投下了资本，当然也要捞到和一般资本家所能得到的一样的平均利润。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均衡的条件底下，地租是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换言之，它是作为一种超过利润而体现着。这样在平均利润以上的农业利润的超过部分，不是一般的剩余价值，而是农业上所特有的**超额剩余价值**。这部分超额剩余价值又是由于农产物的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部分所构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产物的生产价格，因为受到各个所有者所有土地面积的制限，并不是由中等的土地，而是由最劣等的土地上的生产费来决定。各种土地上农产的价格和生产价格的差额，便构成**差级地租**，同时土地的私有阻碍了资本流入农业产业部门的自由，因此造成了**独占**；这种独占便因为农业生产中资本较低度的构成，给予土地所有者维持其价格超出平均以上的可能。独占价格的形成就产生**绝对地租**。

绝对地租和差级地租是资本主义地租的两翼，它们都被包含在农业特有的超额剩余价值中。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资本的利润是剩余价值的支配形态，地主所榨取到的仅是这种利润以上的超过部分。

封建地租和资本主义的地租完全不同。“它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唯一的标准的形态”（K. Marx, *Das Kapital*, Bd. III, 2, S. 292），它包摄全部的剩余劳动，而绝不是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地租的前提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三个阶级的存在，而封建地租却以一一方面是收取农民



剩余生产物的领主或地主，一方面是自己有生产工具的农民的存在为前提（Lapidus and Oshevityanov, *An Outline of Political Economy*, Letchworth, England, 1929, P. 297）。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所见到的劳动生产物，以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范畴而分配的事情，简直不能见之于封建的生产关系中；在后者只以剩余劳动的全部作为地租归诸地主，另外以必需的劳动生产物归诸农民的朴素形态而表现着。而封建的体制在一种关系上是和资本主义的体制相同的，即劳动者只能领取自己的必要的劳动生产物，其剩余的劳动生产物必须无偿地归到生产手段的所有者手里。所以封建的地租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用语来说明，它包含着相当于利润和地租的部分，因此它是剩余价值的支配的标准形态。而且“假如真有某种利润伴随着这种地租发生，那末利润并不是地租的制限，反之，地租倒是利润的制限呢”（*Das Kapital*, Bd. III, 2. S. 296）。

典型的封建经济是建筑在自足自给的基础上，同时农民隶属于土地，地主对于他们有种种经济外的强制，如法律的隶属、权利的不平等。最初直接生产者在每周中除掉耕种那事实上归他所有的耕地以外，必须抽出几天用了自有的农具耕畜到地主的地上耕作，这种无偿的劳动便是最单纯的地租形态——力租。那时劳动者替自己的劳动和替地主的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分划清楚，也就是说，那时的土地所有者在形式上也占有了全部的过剩劳动力的支出。不待说，这种力租必须以剩余劳动的存在为前提，但产生剩余劳动的可能并没有创造地租，只有地主对农民的强制才使力租产生。等到社会以及生产者的劳动发展到较高的阶段时，力租逐渐转变为用实物缴纳的物租。这种转化在经济学上讲地租的本质没有起什么变化。物租还和力



租一样，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唯一的支配的形态，“它和过去形态的区别，就在剩余劳动不再呈现它的本来面目，并且已不再在地主或其代表者的直接监督及强制下面形成”（Das Kapital, Bd. III, 2, S. 293）。这种剩余生产那时已经无须在地主的土地上实现，他只要在事实上属于他自己的生产领域内，即他自己开发的耕地上去进行。

纯粹的物租当然还以自然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这场合，农业和手工业还固结地联系着，农民全部至少大部分日常的需要都由自己的产品来满足，所有再生产的资料也须在他自己生产领域中造成。生产者和市场简直没有多大关涉，他几乎与整个的社会相隔离，他偶然独存于历史的行程之外。“这种地租形态恰和在亚细亚所见到的静止的社会状态的基础完全适合”（Das Kapital, Bd. III, 2, S. 294）。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商品生产化的过程。货币的流通到达一定的程度，劳役和现物的地租便有转变为货币地租即钱租的可能。但这种单纯的由物租向钱租的地租形式的转变，也正和力租转变为物租一样，并没有根本变更了地租的本质。那时的直接生产还和以前同样的是传统的土地使用者，他对于土地所有者还须无偿地缴纳其全部或大部的剩余生产物，不过这时的剩余生产物已经采取了货币的形式来支付了。它绝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即超过利润性质的地租，却还是剩余价值的支配的形态。在这场合那种已经在萌芽中的利润，还是受到和初期的地租形态一样的限制，而利润决不能限制着地租。

不过，钱租虽然是封建地租的一种形式，也无疑地已是它最后的一种形式，换言之，它已是封建经济崩坏中的一种具体的过渡形式的表现。和钱租相适应的那种生产方式已多少起了些变化。直接生产者在那时虽然还须继续生产他大部分的生活



资料，但至少他这时必须将他一部分的产物变为商品，这样，他逐渐和市场相接近，他的独立的以及隔离的性质便渐次消失，而在租佃关系本身也起了很多的变化。随着钱租的确立，原有耕作的农民和土地所有者间的传统的身分的以至遵从习惯的关系就转变为一种法律的契约的纯粹货币的关系。从事耕作的农民现在变成一个单纯的佃农，他渐次地脱离一切中世纪的束缚，而变成一个自由的人。这种转变是引起阶级分化的最有力的杠杆。“它在其它相当的一般生产关系底下，一面便可以逐渐移转旧的土地保有者（使用农田的农民）的地位，而代之以资本家的佃农；另一方面便可使历来的保有者免除缴纳地租的义务，而变成独立的农民，即具有自耕地的全部所有权的农民。此外由物租转变为钱租，不但必然地会伴随着无产的以工资为生的日工劳动者阶级的形成，并且这种阶级甚至会预先发生”（Das Kapital, Bd. III, 2, S. 296）。这种乡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完成了农业企业家存在的前提，农村中较富的农民在顺利的情况底下便会雇佣了多量的工资劳动者，进行其资本主义的经营。到那时地租的本质根本上起了变化，地租已不再以剩余价值唯一的支配的形态而存在，却表现为超过平均利润的特殊部分了。

二 中国的租佃制和农户经济现状

地主和农民的对立构成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枢轴。租佃的农民占到农民总数的半数左右，特别在中部和南部为最多。据一九二九年南京政府立法院十九省一百七十八县六百三十八村调查材料的统计，自耕农所占的成分为45.0%，自耕佃农为22.2%，纯粹佃农为32.8%；总计租佃的农民当占55%。据金陵



大学所作2、866户调查的结果，在中国北部平均只有23.5%的农户租田耕种，在东南部则有51.8%。

省	县	自耕农%	自耕兼佃农%	佃农%
中国华北部	安徽怀远	84.7	14.5	0.8
	宿县	58.0	22.0	20.0
	河北平乡	84.2	14.5	1.3
	盐山(1922)	100.0	-	-
	盐山(1923)	97.0	2.3	0.7
	河南新郑	65.3	30.5	4.2
	开封	77.9	22.1	-
	山武西乡	81.7	15.1	3.2
	五台	39.8	-	60.2
	北部平均	76.5	13.4	10.1
中国东南部	安徽来安(1921)	45.5	4.0	50.5
	来安(1922)	73.0	6.0	21.0
	芜湖	54.9	31.4	12.7
	浙江镇海	1.5	22.4	76.1
	福建连江	44.7	41.6	13.7
江苏	江甯(一)	63.0	29.6	7.4
	江甯(二)	30.4	21.2	48.4
	武进	72.3	13.4	14.3
东南部平均		48.2	21.3	30.5
总平均		63.2	17.1	19.7

再就耕地面积来看，全国大部分的土地是在地主手里。据武汉政府的估计，全国地主所有地占全耕地的60%。地主们都不自己经营，只将农田出租给农民。因此农民所租种的农田中



租田占很多的成份，特别在中部和南部。

省 县	调查田总面积(亩)	自耕田面积%	租种田面积%
浙江鄞县	4,764	32.6	67.4
江苏仪徵	4,121	52.0	48.0
江阴	14,291	30.1	69.9
吴江	4,931	23.8	76.2
安徽宿州	28,843	50.1	49.9
山东霑化	11,867	99.6	0.4
直隶遵化	24,369	86.7	13.3
唐县	20,073	82.5	17.5
邯郸	25,507	97.1	2.9

农民无地化的过程，在中国半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更使租佃的成分增多。在较早的调查材料中，我们可举出下列二例：

四川北部地主与农户的增减：

年份	地主	自耕农	佃农
1912	20%	15%	28%
1924	28%	13%	35%

(见《东方杂志》二十四卷十六号)

即在十二年中，佃农的比重增加了四分之一。

江苏的崑山南通和安徽宿县的调查，也明显地指明租佃农户激增的趋向。

各类农户的百分比表



类别及年份	崑山			南通			宿县		
	1905	1914	1924	1905	1914	1924	1905	1914	1924
自耕农	26.0	11.7	8.3	20.2	15.8	13.0	59.5	42.6	44.0
自耕兼佃农	16.6	16.6	14.1	22.9	22.7	22.6	22.6	30.6	30.5
佃农	57.4	71.7	77.6	56.9	61.5	64.4	17.9	26.9	25.5

(乔启明：《崑山南通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1926，页29)

这种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租佃农民的成分增加的过程，特别在最近几年进行得更为急剧。在灾荒的区域中，曾为农民自有的土地，现在已给军阀官僚豪绅大批地廉价收买，转瞬间变为掠夺他们的尤物。陕西、河南、河北等省，近年来佃农成分的增加，已成人们周知的事实。

这种作为中国农村中基本的支配的对立关系的地主与农民间的对立，便由地租这经济的范畴具体表现出来。因此在说明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上，地租本质的阐明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地租也只是农村中主要榨取关系的表现，换言之，正如上文所说，它的内容须由作为它基础的社会生产过程来规定。更简单地说，绝不是地租规定着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规定着地租的本质。近年来多少探求中国田租性质的先生们，不幸都有意无意地落入皮毛的推测和倒因为果的胡诌的陷坑中。

在中国和在现时的印度、朝鲜、埃及，以及帝俄治下的中央亚细亚一样，进行着两种并行的过程，即一方面是土地所有的集中，他方面是土地使用的分散。军阀、官僚、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从大众身上括来的大量货币，因为本国工业的缺乏，产业利润之不能保证，不是被存入外国的或本国的银行，



便去廉价收买土地。然而这种土地所有的集中并没有伴随着农业经营的扩大。现在，中国的农业生产还被零细的经营所统治。有大量土地的人都愿意把地出租，而全般没有地或有地极少的人，都急于租地耕种。土地所有者所以不愿从事巨大的经营，是由国际的乃至国内的条件所决定。资本主义国家高度的生产技术，以及生产物的过剩，造成农产物的低廉的价格，同时再加上中国关税的屏蔽全失，更使国内的农产物的价格感受重大的威胁。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恐慌，更使国内农产物对外的销路减缩到十分可怜的程度；反之，国外输入的农产，却已占了进口货值的首位。在这种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更趋恶劣的场合，国内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当然没有立足的可能。同时，在中国既由小农经济占优势，则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各地农产物的价格，当然个别地由小农的产物价格来决定。劳动的小农经济绝不能意外地追求什么利润和地租。小农们能在市场上得到他们的工资或生活资料，已是幸事，他们只能将自己的生活减到生理的最低限度，即尽力减低其产物的价格，以求农产价值的实现。这里，不是生产力的强大，倒是极度的贫穷促成小农的产物的廉价，强制地使他们不等价地赠送其大部分的价值给别人。可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决不能以得到工资为止，它必须获取大量的利润。因此在中国有些地方虽然存在着萌芽状态的资本制的农业企业，他们也必然地感受着种种威胁，而趋于衰灭。帝俄时代的中央亚细亚曾一度采取近代的经营形态，以培植棉花，终究因为一方面不能与美棉，同时也不能和小农所产的棉花相竞争而归于失败。这种惨败的经验在中国的“实业家”们如张季直之流，也几经领受过。因此他们都愿意尽力逃避自己经营。冒尽企业的险事，而利润终不可必的途径，努力地向坐收高额地租的道上，大踏步迈进。



高额的地租更被土地的饥馑所刺激，而益发亢进。中国的农民已经不是刚刚站到无地化过程的起点，土地成为特种的商品，而彼此移转的事实已在很久以前发现。可是近世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更带来了一种近代的财产观念，土地的买卖因此益发变得自由。于是呻吟在税捐，地租，利息以及商业利润等重负之下的中国农民大众，不得不以现代式的勇士的资格，站在无地化过程的尖端去。工业的缺乏表现为殖民地经济的特性，中国的民族工业也不能如买办事业一样，承乏着帝国主义者的侍从而繁荣起来。城市工业的缺乏向着正在乡村中大量生产着的相对过剩人口挂起“此路不通”的牌子，于是他们只得哀鸣如羚羊了。而生存的欲求迫得他们不得不百般屈服的意态，便成为高利贷地主猖獗的张本，在这场合贫困的传统的农民都想租进一些耕地来进行他零细的经营。同时，农民因为缺乏成本，当然不能大批租进土地，他只能运用他原始的耕种技术，从事小规模的生业。这种经营“按其性质说来，就排斥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化、资本的社会集中，大规模的畜牧业和累进地利用科学”（Das Kapital, Bd. III, 2, S, 304）在中国这种低级的经营实在是农业生产的典型形态。

一般说来，小农经济都建筑在自足自给的基础上面。但在殖民地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却构成小农经济的特性。资本的巨爪撕破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联系，它要从殖民地农村中抓取多量的原料，同时它又输进商品的农村日用品。经济容量过小的农民抵敌不住这猛厉的袭击，不得不完全屈服。当中央亚细亚在帝俄治下的时候，租佃的大农经济也占绝对的优势。在那里曾最明显地表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特点。在弗尔根区域中，经营的范围愈小，商品经济化的程度也愈高。



阶 段	货币收支占全收支的%
耕种五Tam以下者	八六·八
耕种五——一〇Tam者	八七·六
耕种一〇——二〇Tam者	六七·九
耕种二〇Tam以上者	六一·九

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是帝国主义国家超等的供给原料和销售商品的场所。一九一四年张季直任农商部长时，曾提倡棉铁救国主义，西北的植棉事业因此大盛。例如陕西一省，在一九二〇——二一年一年间植棉面积自一、二八三、六五〇亩增加到二、四〇五、六四〇亩，产量自二九三、九六七担增加到四二九、九六七担。其他如大豆、小麦、油籽、茶、桑等的生产，也表现出猛烈的增加。而近年来陕西、甘肃、四川、福建等省鸦片的增殖，更令人咋舌。陕省关中道所有肥沃的水田已有一半以上面积的粮食作物被鸦片所逐驱，在陕北的神木府谷诸县十分之八的耕地已开遍了灿烂的鲜花。这些由军阀和商人联合促成的凄惨局面，更显示出这农产商品化的强制性来。很明显的，在陕西种地较多的农民还能空些余地栽培粮食，以备自给；至于贫穷的小农则在“种固然要捐，不种也要捐”的鞭策之下，不得不尽量种植鸦片，得到足额的货币，以缴纳捐款。根据金陵大学的调查，中国北部诸省的村户的农田全收入中，货币收入占五〇·九九%，东南诸省的村户则占四五·九六%。同时北方诸省村户的农场全支出中，货币支出价值的比重为四五·四六%，在东南诸省达六六·二二%（根据J. 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Shanghai, 1930, pp. 65, 75, 两表数字统计）就在绥远，农户生活资料已大半取诸市场。

绥远毕克齐七十三户农户生活费用调查



生活费用总额	一七、八九三·四四元	
自给部分	八、〇九八·八四元	四五·二六%
购买部分	九、七九四·六〇元	五四·七四%

（唐启宇等：《绥远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农学，一卷三期，一九二六年二四——二五页）

根据数字的统计我们还得证明中国贫困的农民正和帝俄的中央亚细亚的一样，被强制着遂行高度的商品生产。

各类农户的农田收入

省	县	自耕农		自耕兼佃农		佃农	
		货币收入 (元)	非货币 收入元	货币收入 (元)	非货币 收入元	货币收入 (元)	非货币 (元)
中国 北部	安徽怀远	62.63	126.65	—	—	—	—
	宿县	129.10	181.72	60.30	120.28	68.53	126.21
	河北平乡	76.15	65.06	69.72	93.40	—	—
	山盐 (1922)	87.68	80.12	—	—	—	—
	山盐 (1923)	41.54	96.35	—	—	—	—
河南	新郑	111.98	221.49	104.04	200.88	—	—
	开封	131.08	267.50	181.59	402.27	—	—
山西	武乡	64.62	82.54	57.93	75.44	—	—
	五台	111.32	161.15	—	—	146.84	75.83
中国 东部	安徽来安 (1921)	296.32	281.65	—	—	230.08	251.32
	来安 (1922)	207.65	158.51	—	—	148.36	149.36
	芜湖	190.08	176.05	395.36	260.82	—	—
浙江	镇海	—	—	—	—	221.86	38.76



福建连江	417.57	189.69	350.71	160.18	237.75	133.23
江苏江甯(一)	442.97	133.91	292.48	123.20	167.43	79.90
江甯(二)	224.63	131.65	227.27	107.76	—	—
武 进	171.84	211.18	163.53	155.99	80.45	166.88
总 平 均	174.95	160.26	190.40	166.62	185.92	127.56

(根据Buck, *ibid*, pp 67 69 70三表制成)

从上引的三表我们可得到下述的结果：

农户类别	货币的农田收入对总收入%
自耕农	52.05
自耕兼佃农	53.53
佃 农	59.17

即自耕农送到市场上的农产物只占农产总值的52%，而佃农的却占59%。中国水泡样的农产物的市场，就这样由贫困的呼吸所嘘成。

三 中国地租形式的转变及其本质

国内市场的发展，货币流通深入农村，使自然经济走上其必然崩溃的途径。因此建基于自然经济的地租诸形式，也一定逐渐转变为货币的形式。

不过，在现在，定额的物租和分租还是地租的支配形式。有些地方物租已在“折租”的形式下，将谷物按照市价折应银钱缴纳，而过渡到钱租。至于纯粹的钱租，一般地只存在于近城或工商业特别发展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还有力租的残痕。

北部和东南诸省的田租形式：（6省641农户）



省 县	租 佃 农 别	分租	谷租及 折租	分租及 钱租	钱租	钱租及 折租
安徽宿县	一、佃农	54	3	—	—	—
	二、自耕兼佃农	30	32	—	—	—
河南新郑	自耕兼佃农	28	16	—	—	—
开 封	自耕兼佃农	—	33	—	—	—
山西五台	佃 农	—	136	—	—	—
安徽来安(1921)	佃 农	—	51	—	—	—
来安(1922)	佃 农	—	21	—	—	—
浙江镇海	佃 农	16	18	17	—	—
福建连江	佃 农	—	22	—	—	—
江苏江宁(一)	佃 农	—	15	—	—	—
江宁(二)	佃 农	4	60	—	33	8
武 进	佃 农	—	42	—	—	—

(根据Buck, *idid*, p. 148, Table 2,制成)

其他如甘肃全省通行定额物租和分租；山西的汾城、平定、黎城、代县、吉县等地、山东的巨野，以及察哈尔的商都、绥远的归绥、吉林的晖春、福建的闽清漳平、连江等地、都通行分租；黑龙江全省，辽宁的通化、洮南、洮安等地，都并行着定额物租和分租。广东、江西、湖南、江苏、浙江诸省，除极小区域内存在钱租外，定额物租和分租都占统治的地位。

商品经济的发生，使直接生产者从事于一部分的简单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当然会使地租的性质变更。中国现在通行的分租制，有两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是地主只将农田



租给农民，另外不供给任何资料，到收获时便按照一定的比例，由业佃两方分取谷物。这是比较通行的分租制。第二种情形是地主不但租借土地，并且供给一部或全部的肥料、牲畜和种子，佃农除提供劳力外，还须自备农具。在山西的五台便通行这种租佃；在这种场合，佃农固然是农场的管理人，可是必须受到地主种种的监督。又如在黑龙江绥化县的所谓“对半制，”就是地主和佃户各得全收获的半数，种子、牲畜和农具也各担任一半，田赋和地方税捐亦然，可是地主还须供给佃户的住房（东铁路局，北满农业，哈尔滨，1928页186。）这种制度实在是从封建地租转向资本制地租的过渡形态。地主所得的收入，并不是单纯的地租，还包含着他所出资本的利息；而在佃农方面，他并不是以纯粹的雇工的资格而只领受工资，他还须取得自有成本的利息。“这里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地租已经不是剩余价值的一般的标准形式了”（*Das Kapital*, Bd III, 2, S. 300），这种制度必然地发现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十分发展，而古旧的生产方式还是一种强有力的沉淀的时候。俄国农奴制崩溃之后产生工偿制下的农民、美国南部的黑人佃农、帝俄中央亚细亚的无地雇农、阿富汗的海拉脱和阿富汗土耳其斯坦两农业区域的租佃农民，以及罗马尼亚在一八六四年农奴解放后所盛行的分租制下的农民，都生存在这种过渡的生产方式中。

无论第一种或第二种的分租制，都有转变为定额物租的倾向。如在江苏的南部，以前曾行分租制度，现在差不多已经绝迹。至于现在中国的物租，也已具有特殊的性质。货币的魔力正在消灭农村中一切的身分关系；所有传统的隶属关系都被渐次磨灭，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契约的纯粹“计算”的关系。物租在中国已经多半采用契约，虽然现在还有许多生存于永佃制下



的农民，还见不到租契。永佃制在中国还很普遍，在这种制度下的地主和农民还存在有隶属的关系，在有些地方永佃制佃农还须替地主操作杂务。在这场合，当然没有契约的必要。但现在永佃制已有渐次崩坏的趋向，而在一九二九年南京政府立法院所颁布的民法中关于地主撤佃条件的规定，也是促使这种制度消灭的有力的契机（见民法第八四四、八四五、八四六诸条）。契约的租佃现在一天一天通行。同时契约的形式也有由口头变为书面的倾向。封建的深情挚谊逐渐被资本的铁腕所摧毁，口头契约已在矫诈、抵赖与生疏之前，表现其无力，于是书面契约不得不起而代之，现在人间的关系已多数由拜物教的魔障所掩蔽了。在这种关系的转变中，中国的物租在很多地方当然还保有其原有的基础，而在另外的处所却仅建筑在自然经济的废墟之上。在工商业发展区域中，地主所收进的物租，已经不是当作使用价值而留给自用，倒是当作交换价值输送到市场去实现。多数离村的地主，都催促佃户改缴钱租。安徽宿县不愿收受蕃薯的田租，因此促进佃户商品生产的程度（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p.72,）在蚕桑等副业发达的区域，或在商品作物所占成分很高的地方，佃户一方面因为粮食的缺乏，同时因为货币收入增多，都有改用折租或适用钱租的办法。在有些地方，地主曾表示其不愿将物租改为钱租的意向，这无非表现地主在单纯的地租之外还想掠取更多的东西。一般讲来，谷价总在收获时低落，在青黄不接时腾贵。地主将收获后得到的租谷，留待善价而沽，这样他还能剽取大量的商业利润。

身分关系的转化为契约关系，分租物租的转变为了钱租，甚至物租采取变相货币形态等等，这些都是目前不能否认的事实。于是中国的机械论者，便洋洋然下其断语曰，中国的地租



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地租了；地租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了。

这里首先应注意的是下面的话：不是地租决定着生产关系，倒是生产关系决定着地租。今之论中国地租者，只揣摩了地租的表皮，而漫然得其什么什么性的断语，再根据了这断语，从而规定生产关系的本质关于由地租来规定生产关系的那种因果倒置的企图，这里自然不必多化力量来斩劈。

中国的地租已是资本主义的地租么？多数研究经济学的人以为钱租在中国已逐渐通行，在有些区域物租简直已带有钱租的性质，因此断定中国的地租已是资本主义的地租。普利鸦古夫的意见也是这样，他说：“用一定量生产物支付的地租不消说是和物租不同的。以自然经济为前提的物租仅在中国最落后的地租保留其残余……用生产物支付地租的事在法意美（植棉区域）诸国也有；假如因为这种地租在欧美并不广泛地存在，就说中国和欧美诸国的地租关系有原则上的差异，那和事实绝不适合的’（A. Polyakow: Agrar Problem, 1928, H. 4, S. 692）。不错，德意志在欧战以后，因马克跌价，租金不能确定，曾将钱租改为实物徵纳（Skalweit, Das Pacht Problem, S. 52—53），这正和不能因为最近德国金融极度的恐慌，发生物物交换的现象，而断言德国是原始社会一样，这种变态的物租还全般地以资本主义的地租而出现。同样地在往昔的罗马因为要徵收货币的赋税，曾一度采用钱租，但我们不能就说罗马那时的地租已是资本主义的地租。普利鸦古夫肤浅的论断，无疑地是一种对科学的冷嘲，他蔑视质和量，形式与实质间真实的关系。他甚至认为中国钱租成分较少于欧美诸国，完全是事实之偶然。他全不知道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一般的社会基础时，资本主义地租才能全般地适用。就在那时，独立



生产者的收入多少也能应用资本主义三个基本的范畴（即工资利润和地租）来分析，在这场合，他之所以能获得自己私有的剩余劳动，不是因为是自己劳动的产物，而是根据自己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而领取。一般讲来，土地在那时已采取了资本的形式而存在。

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确立的社会中，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地租。有些浅薄的研究者竟以为中国已被帝国主义所征服，中国的经济已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环节，因此中国的经济已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中国的地租已充分表现其资本主义性，这种根本漠视整个与分体、客观与主观间的辩证关系的论断，自然要让A. B. C.来指摘。在这里只想说到钱租和资本主义性质的规定的问题。

正如第一节所说，作为剩余价值支配形态的钱租还只是物租单纯的变形，它和物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可是伴随着这种转变的过程，必然是商品经济高度的发展。较富的农民有扩张经营范围的余裕，便大批租进土地，雇用工资劳动者来耕种，这样便产生资本主义的经营。十六世纪英国租佃企业家便是这样形成的。不过，“照一般的规则，这种形式只能在这样的国家中形成，就是它从封建制向资本制生产的转变中能够支配世界的市场”（*Das Kapital*, Bd. III, 2, S. 297）。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的特性不是被摒弃于世界市场之外，而是被资本所胁迫，拉到市场的上，任人宰割。它本身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含有十足的强制性质，因此一般说来，殖民地和半殖民的农业的趋于商品生产，倒是极度贫困的表现。当然，原则地讲，简单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前提（在中国也有大批的学者们以为商品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因为中国商品经济的渐次发展，便得到中国已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结论！）可



是在殖民地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底下，商品经济只促成了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活跃，以及地主在农民的土地饥馑中的淫威，而绝对不能使殖民地自身资本主义化。换句话说，商品经济仅是替资本主义国家廓清了掠夺的大道，而并没有使殖民地经济走上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途径。在中国决不能像英国那样产生了租佃的企业家。虽然现在有些地方存在着这种经营的萌芽，但它们的比重既小，它们的前途必然地趋于没落。同时地价的日益高涨，使中国的佃农更难买进自己租佃的耕地，以免除田租的重负。恰恰相反，连年的灾荒使自耕农成分较多的北部诸省，也进行着土地集中和租佃农户激增的过程。税捐、高利贷利息、商业利润以至最新的田租负担，使他们的生产益发低劣。这些中间阶层也就在这场站到半殖民地经济特有的生产行程的轮回的起点，背离着一切社会生产的发展和高度资本集中的可能的道上前进。

在中国无论租佃的农户以至现时的自耕农，都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在社会的劳动没有被编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场所，根本就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地租；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作为社会一般基础的时候，对于小农经济绝对不能应用资本主义的范畴，规定它们的地租是资本主义的地租。

四 中国地租租额的高度

就地租本身而言地租的本质，主要的还得由它的高度来规定。伴随着资本制生产的发展，地租脱离剩余价值的支配形态转变为剩余价值的特殊部分。这里就地租本身讲，是数量规定着质量。

中国所通行的分租和物租的租额一般地占全生产量的半数



上下；至于钱租则多超过地价的十分之一。据立法院的统计（见统计月报卷二期二，一九三〇统计资料页四五）——全国廿二省的平均租额如下：

	上等水田	中等水田	下等水田
分租占产量%	51.5	48.2	44.9
谷租占产额%	46.3	46.1	46.2
钱租占地价%	10.3	11.3	12.0
	上等旱田	中等旱田	下等旱田
分租占产量%	47.8	45.3	43.7
谷租占产额%	45.4	44.6	44.3
钱租占地价%	10.3	11.0	11.5

从立法院租率的统计材料中，我们能发见安徽省分租的额数无论田的等项如何，都占产量70%以上，四川和福建都在60%上下。四川的谷租占全生产额的60%以上，陕西也在55%上下。钱租最高的如陕西、四川、福建、云南、吉林和绥远诸省，竟有超过地价20%以上的。

农民逐渐失去土地，使他们对土地追求得更为急切，地租因此也逐年增高。下引的统计虽嫌过于陈旧，但还能表示挽近的趋势。

田 别	南 通			宿 县		
	1905年	1914年	1924年	1905年	1914年	1924年
上 等	100	147	229	100	81	148
中 等	100	157	240	100	96	169
下 等	100	174	255	100	64	160

（乔启明崑山南通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页二三）



将中国的租额和资本主义国家作简单的比较，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地租的本质。在调查租价占地价之百分之几，再算出几年的租等于地价，这种年数通常称为“购买年”（Year purchase）。英国在十九世纪末年工业革命时期中，“购买年”为二〇——二五；卑斯麦克时代普鲁土地方的“购买年”为二八——三二。欧战以后德国的经济衰落，“购买年”顿降为二〇的光景。至于在中国则“购买年”数异常的少。钱租的额数一般要较分租谷租为少，就照立法院的统计，则钱租的“购买年”平均已在十年以下。至于陕西、四川、福建、云南、吉林、绥远等省，“购买年”都在五年以下。这种对比，因为中国的地价和地租的性质根本不同于英德诸国，没有多大意义，但至少由此也可看到中国的租额是怎样地高亢。

押租在各地都有存在，它无形中增加了田租的高度。田价和农产品价格的高涨，更使押租的成分增多。

佃户中负担押租的百分率

	一九〇五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二四年
崑山	25.5%	40.9%	61.8%
南通	72.7	76.7	88.1

现在除分租和钱租中已行预租制的场合，多数已采用押租制。江南区域的“顶首，”浙江衡州的“填租，”河南光山的“礼钱、”湖北当阳的“莊钱、”安徽当涂的“押绍、”广东高安的“批头、”四川合江的“稳租银，”这些都是押租的个别名称。

中国这种存在于小农制下的高额地租，无疑地已是直接生产者剩余价值的支配形态，换言之，它已摄取了（如按照资本主义的范畴来说）地租和利润的全部，甚至还包括着一部分的工资。根据一九二二年六月廿三日无锡的人报上所载的农家



收支调查，我们可作如下的计算：

稻麦田每亩收入			稻麦田每亩支出		
糙米	19.20元		人工	9.22	
稻柴	1.80		机器灌溉费	1.70	
小麦	4.55		种子	1.12	
麦柴	1.00		肥料	4.29	
			农具消耗	0.30	
			磨磬价	0.41	
			地租	7.00	
收入共计	26.55元		支出共计	24.04	

在这统计中，第一、糙米的收入估计得太高，实在每亩平均只一四元（二石，每石七元，这已是好的收成和米价了。）第二、农田支出中农舍费没有加入估计，现假定为一元。这样，总收支应改作：

收入共计	21.32元
支出共计	25.04元

首先我们要指出地租占全收入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假如按照资本制企业来计算，佃农对每亩稻麦田所投可变和不变资本的总值为18.04元。假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为20%，则农民应得到3.608元的利润。但现在支出超过收入已达3.72元，即农民的工资已被地租吞蚀了3.72元，利润更不必说了。中国的佃农为要维持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就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活程度减缩到生理必需的限度以下。

然而这些简单的事实，对于诡辩的理论家，却只给予了曲解的机会。不错，在我们第一节里所引述的资本主义的和封建的地租，都是抽象了一切附加物的纯粹形态；在现实中存在着的地租，决不是这样单纯。就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经占支配



地位的农业中，从而资本主义的地租已成统治的地租形态的场合，实际地租的额数也会超过地租法则上所规定的额数。地主对于留在土地物质中的土地资本（土质的改进、水利工程、农舍等）固着于土地资本，详见 K. Marx: *Miserere de la Philosophie*, p. 165.）所生的利息，也附带在地租中一并向佃户收取，这样自然使地租加高。英国的地主在政治上握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他们时时欺侮一般怯弱的租佃企业家，勒迫他们缴纳高额的地租。还有些租地的资本家极力减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这部分的掠夺者有时也贡纳给地主（*Das Kapital*, Bd. III, 2, S. 139—146）举凡这些都使现实的地租远超出纯粹的地租。因此有些人就认定：中国高额的地租虽然包含着利润和一部分工资，但这仅是资本主义地租的不纯粹的表现而已。

这里又必须重复申述下列的话：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便谈不到资本主义的租佃。马克思在论资本主义地租的引言中，曾有这样的话：“我们并不是在说及那种情形：即虽然存在着那种已经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土地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身并没有存在，因此佃户不是一个资本家，并且他的经营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的那种场合。爱尔兰便是一个实例”（*Das Kapital*, Bd. III, 2, S. 146.）中国受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社会的机构当然已起了不少变化。商品经济加速度的发展，制成了种种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财产形式，近代的土地私有财产在中国也渐次确立。但在现阶段的这种财产，绝没有采取资本的形式而存在。事实恰恰相反，这种适应着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形式，在现今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特殊条件底下，只是推动整个社会趋向于一种新的封建关系的完成的最有力的杠杆。诚然，自田的或租佃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萌芽，会在极幸运的条件之下偶然地存在，但这些正像欧战时期



中国勃兴的许多民族工业一样，终不能经常地顺畅地发展，而往往由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矛盾所决定，终于趋于衰灭。中国现时的地租虽然形式上已有很多转变，只不过是这种新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特有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同时我们还不能忘却，在中国还有那种最单纯的最原始的力租形式的存在。有些地方的地主在“近代”的租佃契约上竟订明每年要替地主做工几天（如江苏的灌云）。即在江苏南部工商业比较最发展的区域，永佃的佃农逢到地主家婚丧大事，必须全家替地主服役，虽然名义上得到些低廉的工资，但实质上仅是赏钱的遗迹，封建的馈赠至今遥盛行于业佃关系中。有些地方地主规定佃户逢年过节必须送些农产（鸡果实等），地主也留佃户吃顿便饭。最后，伴随着物租的存在也留存种种身分的隶属关系。所有这些仅成残余的习俗，也都是适应着现存的半封建关系而留存着。中国现时的半封建的地租，对于这些残余形态虽能傲慢地表示自身的先进，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租却绝不像普利鸦古夫所说的没有“原则上的差别。”

《新创造半月刊》



评卜凯教授所著 《中国农场经济》

一 引言

落后的中国，在近百年来确已走上“近代化”的过程。这种“开发”工经作常地是在外人的指导之下进行。农村的改良运动自然不会是一个例外。远在几十年前，外国在华的教士，和服务于中国政府的西人官吏，就注意到考察中国的农村生活，来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使命。例如有开明头脑的美国教士 A. H. Smith 曾在山东河北等省传导四十多年，有系统地观察各地的农村状况，写了很多作品。中间最主要的有‘中国农村生活’ (Village Life in China), 和‘中国人的特性’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两书，都在三十年前出版。德国学者伐格纳 (Wagner) 也经过长期的调查，著成‘中国农业’一大卷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 (现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着手翻译)，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

民国成立以后，有些在中国教书的外籍教授就想用近代的社会调查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数量的研究。一九一七年清华学校教授 C. G. Dittmer 指导该校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一



九五家的生活费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间沪江大学的D. H. Kulp 氏也领导学生在广东潮州调查了一个凤凰村，到一九二五年出版了一本‘华南乡村生活调查’（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一九二二年华洋义赈会总会请C. B. Malone和J. B. Jaylor两教授领导调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二四〇个村庄的经济状况；到一九二四年著成‘中国农村经济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一书。此外Brown氏在四川成都和峨嵋山附近指导举行两个小规模的投资。在这时期内，有一个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那就是金陵大学的教授卜凯所领导的中国七省十七县，二，八六六个农场的详细调查。这个调查是在各个地方分别进行，最早的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最后的到一九二五年完成。其调查结果的总舍的表现，就是一九三〇年用英文发表的‘中国农场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一书。

卜凯教授在南京金陵大学主持中国农场经济调查已有多多年。他的著作在这本‘中国农场经济’以前发表的有：（一）直隶盐山一五〇个农场经济和社会的调查（An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150 Farms, Yenshan County, Chihli Province, China），和（二）中国之田权与租佃制（Farms Ownership and Tenancy System in China）。在这本书以后出版的有中国一九三一水灾调查报告’（The 1931 Flood in China）。最近几年内，金陵大学还接受美国罗凯弗洛基金（Rokefeller Foundation）的津贴在卜凯教授的领导之下进行全国土地利用的调查，现在正在继续调查和覆查之中，将来将调查结果，编成报告，其在卜凯教授个人的业绩中必能造成一个空前的纪录。可是就今日而言，卜凯的作品中间，求其能代



表其技术的高度和观念的水准的，还得轮到‘中国农场经济’一书。同时，卜凯正在领导一个“用金千万”，规模浩大的土地利用调查，其调查方针以及整理统计的方法，大体上当然是承接他在“中国农场经济”所表现的一切。我们第一为要正确地认识卜凯氏在‘中国农场经济’所表现的优点和缺陷，第二为要提出几点重要的意见，希望对于卜凯现时进行着的巨大工作，能根据中国国民经济本身的需要，有所改进；因此我们要在这里对于卜凯教授这本巨著，加以介绍和批评。

“中国农场经济”这本书是根据七个省份内十七县的二，八六六个农场调查和研究的结果。英文原本共四七一页（中文本由金陵大学张履鸾先生译就，尚未出版），内正文四二七页，分十二章；附录四十页，分四种；附表二三八，图六八，地图二，摄影三九帧。经过调查的七省是中国北部的河北，河南，山西，和安徽北部；和中东部的浙江，福建，江苏和安徽中南部。各省调查的县份和村落数目是：河北的平乡（村二）盐山（经过一九二二和一九二三两次的调查，村七）；河南的新郑（村六），和开封（村十）；山西的武乡（村四），和五台（村八），安徽的怀运（村一），宿县（符离集附近五十三村），来安（一九二一年调查四十三小村，一九二二年调查三十七小村），芜湖（村三），江苏的江甯（淳化镇附近十五村，太平门车站北四十九户）和武进曹家桥附近四十九村）；浙江的镇海（村三）；福建的连江（村三）。

本书第一章是绪论，叙述全书研究的方法和范围，考察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并解释书中所用各种词类的意义。第二章一部份讨论农场的配置，着重于地块分布的说明；另一部分讨论土地的利用，在这里只说到非耕地的利用。第三和第四章讨论农场的收支状况，先作一般的研究，求农场收入与支出的差



数，再讨论农场面积与收支差数的关系，农场面积和劳力，资本等效率的关系，以及最适宜的农场面积。第五章讨论租佃制度，说明租佃的分布和各种方式，比较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的经济状况，再提出公允地租的办法。第六章讨论作物和收成，第七章讨论牲畜和肥料，第八章讨论农业劳动，特别注意于季节和作物与劳动分配间的关系。第九章讨论农家与人口，第十章讨论农家食物的消费，分析食物营养的成份。第十一章讨论生活程度，研究农家衣，食，住，行，宗教，娱乐等费用。末章为结论，作者将中国农村生活的贫苦归结到农村人口的太密，所以希望实行人口统制，来改造中国的农场经济。

本书主要的内容已略如上述，我们对于本书的意见想分下列三个部份来讨论：

- 一、关于本书研究范围的讨论
- 二、关于本书研究方法的讨论
- 三、关于本书作者所提建议和意见的讨论

二 关于研究范围的讨论

本书作者认定研究农场经济的中心问题，是在求得并比较各种农场的收支关系。换句话说，他想用收入减掉支出后的纯利 (Profit)，来衡量各种农场的优劣；因此他在讨论土地的利用，地块的分布，农场的大小，地权的关系，以及肥料耕畜等等的时候，都以农场纯利的多少为起点，同时也以此为归结。在这样的规定之下，作者研究的范围自然会局限于各种和农场收支直接有关的因素，同时在这些因素中也只注意它们在收支中所表现的技术方面的功能。

卜凯教授这类的办法，正是代表国外和国内一般农业经济



学家的见解。据我们的意见，这种办法非但是偏而不全，而且没有找到问题底中心。

农业经济的中心问题是在探讨：某一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换句话说，农业经济学者应当研究某种社会内农业部门各种经济的关系，而求得其一般的准则；在这里各种技术关系都构成经济关系的部份。比方在中国，农业经济的几个主要问题乃是列强资本对于中国农村直接间接的支配，国内封建性剥夺的加强和转化，农村阶层的分化和小农经营的统治等等；这些问题才是规定中国现阶段农业经济特性及其发展前途的主要因素。而人口问题，农场大小问题，农业劳动问题，耕畜和肥料问题等等，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一个综合的合理的说明。

再就狭义的方面来说。卜凯教授所提出的论题也许不是农业经济的全部，而只限于以各个农场的私经济为单位而研究其经营的状况，即所谓“农场经济”。例如本书最主要的几章如第二，三，四，六，七，八等章都以农场的经营为中心，观察田块的配置，土地的利用，收支和面积，以及作物，肥料，耕畜等等。就在标题为“田权和租佃制度”的第五章，其讨论的对象也主要地在于田权和各类农场收支的关系。

关于这点我们和卜凯教授的意见也有些不同。我们研究农场经济（或称农业经营）主要的目的是在探求中国最主要的农场经营方式，以及它们发展的趋向。因此在目前的中国我们要研究农场经济（或称农业经营）至少要看到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市场的机构。近几十年来，商品经济加速度的发展，已使中国整个的农村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而农业经营的方式也在渐次转变。农民和市场的关系一天密切一天，一天广泛一天，结果，农村中大多数人便越来越



越快地变穷，只有少数上层的分子，才能更快地把财产积聚起来，这是一方面。其次，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主要的意义就是列强资本在中国农村中势力的扩充。在列强资本的压迫和刺激之下，农村的作物变化了，农村手工业破坏了，农村的金融枯竭了；总之，列强资本是凭藉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来直接间接支配中国农村的巨魁，这是第二点。一般说来，近代的生产越是发达，运销产物的市场便越受生产者支配。目下中国农村市场的机构主要地是在农业生产者统治之下呢？还是受那些和生产完全脱离关系的商人们的支配？

关于这些方面，卜凯教授并不是丝毫未加注意。例如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问题，他在第三章论列农场收支的时候，常把收入和支出分成货币的和非货币的两部份，因此颇能提供我们关于货币经济发展程度的具体材料。不过这种工作在作者自己好像并没有显出何种重要的意义，因为他关于货币收支和非货币收支的比重，从来没有说明它们的意义。又如关于农村市场的结构，作者在导言里曾化了短短不到一页的篇幅（一六页），简单地说到一些农产运输的方法。至于第二点列强资本的侵入中国农村，作者当然略而不谈，不过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却是有决定的重要性的。

第二，是关于农场面积的消长和农业成本的构成方面的研究。这里所谓农场（Farm）是承接卜凯教授的意思，指每个农家所种的田场而言。农场面积的大小是农业经营广度的指标，而农业成本的构成是农业经营深度的规准。这两个方面在决定经营的方式和性质的时候都是异常重要。一般讲来，面积较大的农场在各种生产工具（如农具，肥料、种籽，农舍等）的配合和效率，以及农产品的销售方面，总比面积零细的农场处于较为优越的地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近代经济



一般发展的过程中，较小的农场常受大农场的排挤；更精确地说，具有中等面积的农场往往日渐萎缩，而处于两极的大农场和零细农场往往跟着“孳乳日繁”。

不过上面的说法，只能限于一般的场合；至于各个历史的具体的状况，却往往与之大相出入。十九世纪下半季和二十世纪初叶美国农业的发展，便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的南部一向由拥有巨大土地的奴隶主人所统治，那里的农场一般比较西部和北部大得多。然而具体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时美国南部的农业经营比较西部，特别是工业化最甚的北部远为落后。我们再来看他们发展的趋势。美国南部奴隶主人巨大的土地所有，经过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内战，受到命致的打击。巨大的土地所有分解了，农场的平均面积也从一八六〇年的一〇一·三英亩，缩小成一九一〇年的四八·六英亩。在工业化的北部农场的平均面积却从一八六〇年的六八·三英亩，扩大到一九一〇年的一〇〇·三英亩。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部农场的从大变小，和北部农场的从小变大，它们在面积变化的倾向上虽然表现得刚正相反，可是在本质上它们却同样地走着前进的道路。那就是说，无论南部和北部的农场，都在适应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采取各种最为适当的经营面积；同时扬弃资本主义以前的渣滓。

因此我们见到在研究农场经营的时候，我们只看农场的面积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必得要追究各种大小不同的农场所具有的内容。农业成本的构成便是主要内容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第一要看农业集约的程度。在一般场合，农业愈是发展，经营的方式愈是进步那末每个农场所投下的农本也就愈多。（这里的所谓农本，自然兼指人的劳动和劳动以外的成本而言）。这种集约经营的结果，农产物的收获也一定比较丰厚。第二，



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农本中间的(一)人类劳动和(二)人类劳动以外的成本这两部份间的比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经营发达了,农具耕畜等等都会跟着改进,最后并且应用了机器,于是人类的劳动便跟着相对地减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农场经营愈是落后,农民劳动在农业成本中便愈占优势。这种农业成本构成的观察,在决定农业经营发展阶段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卜凯教授关于农场的大小和农本的分析可说费了充分的力量。我们感谢教授在这方面的努力,使读者们得到很多宝贵的材料。关于农场的面积,他在本书第四章里,就将农场分成“大”“中大”,“中”,“中小”,“小”五种,而分别研究其与各种收支因素的关系,例如农场大小和经营人或家主(Operator)兼营职业的关系(九九页),农场大小和各种形式纯利的关系(一〇五至一一六页),农场大小和劳动效率的关系(一二四至一三二页),农场大小和作物收成的关系(一三三页),农场大小和地价的关系(一三七页),农场大小和每公顷农田收入的关系(一三八页),农场大小和每公顷农田支出的关系(一三九页),农场大小和每公顷农舍投资的关系(一四〇页),农场大小和每公顷农具投资的关系(一四一页),田权差异和农场大小的关系(一五一页),以及农场大小和农家规模的关系等等。作者在第四章里,还根据丰富材料的指示,得到较大的农场经营比较小农场是处于优越地位的结论。卜凯教授这一点成绩,非但在中国,就在世界农业经济文献中可说是一种有力的供献。无论过去和现在,有多少学者老是愿意说明以最紧张的劳动和最低劣的生活为基础的小农场经营,具有顽强的优越性,而卜凯教授却能直率地指明,“由各种纯利的衡量看来,面积最大的农场群,终是最为有利(Most



profitable) ” (一四三页)。

在这里我们所当引为遗憾的，就在第(一)卜凯教授没有清楚地指明有时农场面积虽小，而其地位却比较有利的情形；第(二)作者没有说明各个区域内农场大小变迁的趋势。关于第一点作者虽然也曾说到农场最适宜的面积要由农家的大小，所种的作物和土地的生产力来决定(一四二页)，同时在讨论农场大小和各项收支因素的时候，也曾说到有时较小的经营反为有利，(如中国北部小农场的作物收成较大农场稍高，一三四页)，可是绝没有有系统地说明，在某种场合(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区域)农场的面积虽小，所投的农本却较为集约，同时采取一种前进的经营形态。例如各大都市附近的蔬菜区域，就是最好的例子。那些专种蔬菜，以待出卖的农场，其面积虽较一般田场要小得多，可是它们却是商业性质的农本十分集约的经营，关于这些我们在卜凯教授书中并不是一点不能见到，(如论华北和中东部的农场支出，见七五页)，可是书中零星的叙述和材料因为作者着眼之处有所不同，也就不能给读者明确的印象了。

其次是关于农场大小变迁的问题。卜凯教授在本书一四三页上曾经提出中国的小农场为什么不能变得“大些”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农民人口过多，从而指明分家析产使每户所种的田场有日趋细小的趋势。这里我们可以见到，本书的作者似乎已经肯定中国的农场面积是在逐渐缩小。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三四页)，作者用数字证明，调查时期内被调查的农场家主所种的田亩，要比他们开始耕种时的田亩要大些(平均自二·四公顷增加到二·五二公顷)。这里我们不想讨论作者意见的对不对，我们所要说的是他观察的方面。农场大小的变动，可以由析产，田地的买卖，典当，抵押，租佃乃至赠送等等方式



进行，单是分家一项自然不能决定一切，上述种种方式对于各类人家的作用，可以完全不同；有田多的人家多数会将田亩买进，典进，押进或租出，而有田少的多数会将田亩出卖，典出，押出或租进。卜凯教授在这里只知道作出一般的结论，不想具体地研究各类农场面积的变动，因此，虽然他要顾到那些农田的所有和使用移转的方式（三五到三六页），结果只能使人家得到毫无内容的概念。本来，这种表示各类农场面积变迁倾向的材料，对于只求努力证明自己高倡的农村人口过剩论是千真万确的作者，自然不大感觉兴趣，可是对整个“中国农场经济”的研究，却是异常重要。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对于卜凯教授关于农场大小的劳绩，接着我们要讨论他关于农业成本的研究。我们的作者在这方面确已大显身手，而且他所涉及的范围，（材料真确的程度暂且不管）也和一般的要求相差不多。上面说过，农本构成方面的研究第一要看农业集约的程度。关于这点，我们从本书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等章，特别是第五七页的每个农场的农本及其分配，第五八到六三页自耕农，佃农，半自耕农，乃至地主的农本及其分配；第六四页的农场面积和农本的关系；第七五到八五页各表关于各种农民和地主农场支出的分析（主要地研究其货币的与非货币的支出），等等处所，可以得到一个相当具体的概念。自然，我们在这里还不能不顾到这些材料可信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关于这，且让我们到后面再讲。

其次关于农本构成中第二个问题即人工和其他农本间比重的问題，卜凯教授在材料上也已经给我们一个在表面上是异常明快的图影。他在第三章内专论“资本数量与分配”一节中，分析各类村户所化农本的时候，都将农本分为货币的支出和非货



币的支出两大项。前者包括雇工工资，住房及其修理费，农具及其修理费，饲料费，税捐，购进家畜，钱租，及其他。后者包括家庭劳动和固定资本的损失。我们在此很容易算出农业劳动在全体农本中所占的成份。卜凯教授也说‘劳动是一种最主要的支出，它在全部费用中几乎占了三分之二’（七七页）。

在这方面作者所留下的主要问题，第一是家庭劳动应当怎样计算，第二是这种农业劳动和其它成本的比重应当怎样分类观察。这些问题都和一般的研究方法有关，所以要捺到下节再讲。

第三，我们要研究中国农场经济的方式，和发展的阶段，必须要注意中国农村中雇佣劳动的成份。我们要观察资本主义在农业部门的发展，这种雇佣劳动便是最主要的指标。一般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愈是发展，那末雇佣劳动的成份也就愈大。这种雇佣劳动的成份通常是跟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增高。不过在事实上往往也有例外，例如上面引述过的美国的情形，便是一例。在工业化的美国北部，农场的面积虽小，可是具有资本家生产性质的农场在全部农场中所占的成份要比落后的南部多得多。

卜凯教授在本书中也曾以农业收支的观点，计算雇工的成份。例如他在第三章里指明农业劳动构成农本的主要部份，而雇工占全部劳动的三分之一，家庭劳动（家主工作在外）占三分之二，（七七到七八页）。同时在第八章研究全部劳动分配的时候，他更进一步阐明农场大小和雇工成份的关系，并且得到一个结论，即农场面积愈大，雇佣劳动量便愈须增加（二三四到二三七页）；同时指明面积最大的农场虽然在雇工工资方面的支出很大，然而在一般场合，它们所得纯利还是最多（二三七页）。



我们对于作者在这方面所提供的材料，虽然因为方法的问题，还认为有提出讨论的必要，可是他能指明雇佣劳动一般所占的成份，以及在各种大小的农场中所占的成份，也就很够我们感谢了。

但是我们于此还不能无所遗憾。卜凯教授对于中国和美国不同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的因素的了解，是很贫弱的。他的了解中国的雇佣用劳正和他了解中国租佃制度一样，只看到近代的外衣，没有捉住陈旧的内容。我们决不能跟着作者煊赫的统计，随便地断定较大的农场便是资本家的经营，因为雇工的性质还有种种差异。在目下的中国，固然不少真正的自由劳动者，可是种种不脱离农奴或半农奴性质的雇农，（如自带农具的，或是用住房或谷物当做工资的，或是用工作纳租的农民）除掉工商业较为发展的区域，可算到处可见。卜凯教授虽然也将雇工分成年工，日工及童工来观察，并且计算这些雇工所占的成份（二三四到二三五页），可是对于上述各种雇佣劳动的类型和它们的性质，丝毫没有顾及。因此作者在这方面的分析只可以供给研究农场收支时的参考，而决不够说明农业经营的性质。（未完）

三 关于本书研究方法的讨论

正像本书著者所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可靠的统计的国家，”（页四二六）因此我们对于卜凯教授在本书中所罗列的统计材料，曾赋以最大的注意。同时，教授在本书导言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本书所有材料都由调查方法搜集得来，”因此我们对于本书的材料，一向是特别珍视。

本节的目的就在讨论下面两个问题：（一）本书搜集材料



的方法是否可靠？（二）本书处理所有材料的方法是否合理？我们希望能在这类问题的检讨中，来正确地衡量我们的所赋予的注意和珍视的代价。

卜凯教授在本书第一章中说明研究方法和范围的时候，曾经郑重声明：“假如有人要批评本书的研究并不精确(Inaccuracy)……那末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簿记意义上的精确，而在这些材料是否正确地阐明了农场经济的本质”（页一）我们以为卜凯教授这个声明在他本人简直是一个最为辉煌的命题，虽然教授本人有时候会和它相距得很远很远。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些材料真否能正确地阐明农场经营的本质”的观点出发。

这些丰富的材料到底是怎样调查得来的呢？作者在第一章里就告诉我们，这些材料差不多有半数是由金陵大学的学生调查得来，另外的是请助手调查。所有的调查员无论他是学生或是雇佣的助手，都是调查地点的本地人，同时是很熟悉农民和农场情形的人。“据作者调查中国农村的经验，我们第一着必须考虑到，我们所用的调查员，须是调查地点的本地人，同时要同农民熟悉。这个因素就决定了此项调查的各个地点”（页二）。这些地点就是山西东境的五台，和东南部的武乡；河北东南部的盐山，和南部的平乡；河南北部的开封和新郑，安徽北部的宿县怀远，以上是属于本书所谓“华北”（North China）的部份。此外属于“中东部中国”（East Central China）的，有安徽东北部的来安，和东南部的芜湖，江苏南部的武进和江宁，浙东沿海的镇海，和闽北沿海的连江。在这些县份中，调查员所选查的村落最多的是53村（安徽宿县符离集周围），最少的是一村（安徽怀远）。在调查的时候，调查员在各村抽户调查，如怀远耿家村共有150户，被调查的为124户；



五台的北阳村有50户，被调查的为5户；盐山的吴家阁村共有84户，被调查的为2户。

卜凯教授对于整个“中国农场经济”至少是“华北”和“中南部中国”的农场经济的讨论，就建筑在这样的调查上面。自然，他所采用的调查方法是所谓（选样方法）（Sampling method）；换句话说，他选取各个区域内若干农场的标样，把他们当作中国全般的农场的代表来从事研究。常识告诉我们，在我们举行选样调查之前，对于研究对象中所包含的各项重要因素，应该先有一般的认识，然后有意识地选取标样从事调查。这些标样应该等比例地包含着全体所有的因素，然后才能真正代表全体。譬如要调查中国的农村经济，事前对于中国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先要有个一般的了解，然后就各区选取定量的对象，加以精详的调查。

固然，在实际举行调查的场合，并不能完全照上述办法做去。调查之前要对调查对象的全体求得一般的了解，多数是不大可能的。因此通常我们只能采取任意选样（Random sample）的办法，按照极机械的顺序，选样调查；尽可能地排除主观的因素。这种办法自然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因此我们不能不顾到它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一般说来，在任意选样来从事调查的时候，在没有继续不断地发现同一倾向之前，应该尽量多选标样，使调查对象中所包含的各项重要因素，都有被发现的机会。

上面说的是举行调查时候的一般的准则。现在且让我们检讨卜凯教授书中列材料，其取得方法的本身是否具有缺陷。在这里我们要顺次指明：第一，卜凯教授在调查的时候是用的那一种办法，第二，调查地点的决定是否成问题；第三被调查的对象的数目是否成问题。



第一，卜凯教授无疑是采用了所谓任意选样的调查法，他在调查之前对于中国各个区域内农村社会的情况固然多所隔膜，就是对于自然条件也没有一个综合的概念。他在本书第一章内曾想将已经调查了的若干地方，配合到Cressey氏对于中国所分的各个区域里去讨论（页九）。这个企图一面表现教授研究方法的颠倒，一面显出他所领导的调查在事前对于调查地点的自然条件也未能顾到。实际上我们要说明卜凯教授所用的方法是任意选样，上述的引证可称并不需要；反正作者早已声明，他们调查的地点，是由调查员是当地人而且熟悉农情的一点来决定。

第二，问题就在于：这样来决定调查地点是不是成问题？既是任意选样，就应当避免一切主观的因素。单凭着调查员和农村的关系来决定调查的地点，那末里边搀和的主观因素就太多。第一，调查员的籍贯何在，完全是一种偶然，也许有些调查员的本乡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并不能代表附近区域内一般的情形。凭着这样一个类似“客观”的偶然，就会造成一种实际上十分偏颇的“主观”；而参加调查的人数太少（共15人，每人决定一处）更加强了这种危险。只看卜凯教授在已经请人调查了福建的连江之后，硬把连江的情形作为“中东部中国”农村一部份的代表。其为牵强已很显然（卜凯自己也说连江实位华南，只因其情形对于中东部各地的平均数并不起严重的影响，所以也就划入中东部了！见本书页九）。第二，调查的地点单凭调查员的乡土关系来决定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作者告诉我们，这些调查员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和聘请来的助手。在中国上得起金陵大学这类学校读书的学生和够得上做金大助手的人们（按照金大习惯设想，这些助手至少受过大学教育），其家庭的境况不消说是运在一般水平之上。因此，



这些大学生的家乡，（也就是调查的地点）其经济状况往往比较别处好些。这种情形在调查村落的决定上特别会表现得明显；假如一县只调查一村（如怀远只调查耿家村，是由一位耿家柱先生调查的），其所谓标样的危险性，那真够大了。

第三，上述种种情形在选定调查村户的时候，实有更大的影响。上面已经讲过，他们在调查的村落已经决定以后，再从全部村户里面选择若干户来从事调查。这里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农村的构成往往异常复杂：在上面有少数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家，中间有中等的人家，最大多数贫困的村户地位终是最低。更清楚些说，农村的上层往往有少数的地主和富农，中间有中农，下层有占最多数的贫农，雇农和苦力。按照理想的办法，假如我们要从全体村户内选样调查，应当对于各类村户的成份大致有些把握，然后按照一定比例选取各种村户来调查。在实地调查的时候，这种理想的办法自然很难办到；可是我们在方法上应当尽可能地避免抹杀各类村户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所有差异的缺陷。例如在一个已经选定的村庄上应当尽量地多调查些村户，因为只有这样各类村户方有被发现的机会。很可惜的，在卜凯教授所领导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几乎不可恕的缺陷。有时调查的村户在各该村的总户数竟少得可惊。例如五台的七里沟，在当时共有150户，可是被调查的只有11户；盐山的吴家阁共有84户，被调查的只有2户（页六至七）。这样少数的标样，不知究竟代表了什么！第二，在这样少数的选样中，我们不得不特别指明调查员自身的经济地位所发生的重大的影响；同时卜凯教授所奉为金科玉律的因素，即调查员须是当地人而且和农民熟悉这一点在这里会起何种消极的作用。稍有调查经验的人，一定能想到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中从事调查的时候那些最容易和他们发生关系的不是那些经济地位和自己相仿，



便是时常来往，或是带些亲谊的人们。他们在调查的时候最容易找到的也就是这些人们。在全村调查的人家很多的场合，这种关系所起的作用便较轻微；要是全村总共只调查几家，那末调查的材料就会发生显著的偏差。上面说过金陵大学调查员的经济地位既然较高，那末他们在极少数的人家中所能调查到的材料，就会或多或少反映出超过一般状况之上的情形。卜凯教授书中所表现的中国农村的生活，所以还不像我们实际所见的那么破烂和惨苦者，这种取材上的缺陷确是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像此种调查工作多数是趁学生假期回乡，个别进行，因此而产生各种意想之内的疏略和杜撰等等弊病，这些我们根据和金大有关朋友的谈话，以及实地办理调查的经验来推测都不能断定其为必无；而这些弊病对于材料的真确性却都是致命之伤！

以上所说都是关于本书《材料搜集》方法是否可靠的话，接着我们要讨论本书处理材料的方法是否合理的问题。

本书所有丰富的材料，在“素来没有可靠统计的”中国（本书页四二六），几乎象沙漠里仅有的水源一样，不管它是甜水咸水，脏水清水，终是够人珍贵。而且在教授的全本书中无论就统计表格和数字所占的量来说，或是就作者说明的重心来说，作者的主要贡献与其说在建立什么意见和建议，毋宁说是提供多量具体的材料。自然，我们决不会抹煞卜凯教授所提出的意见，这些且让下节去说。本节所要讨论的就在：这些作为本书主要贡献的统计材料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

第一，我们先就作者所用的统计方法来讨论。作者在本书统计上所费的力量，自然值得钦佩。他在观察某种因素（如劳动收入，页九四）在各个区域内所表现的数列（Series）时，非但用算术平均数（Mean）中位数（Medium）等来表示其



集中的趋势，并且还用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bility)，等来表示它们的差量 (Deviation) 和偏斜度 (Assymtry) 非但这样，他在这些集中量数 (如算术中数，中位数等) 之后往往附有‘或差’ (probable error)，以表示其可靠的程度。所有这些都足以表示本书在技术方面的优越和谨严。不过，我们为要适当地运用本书的材料，为要正确地估量它们的价值，而且为要维护统计的恰当的功能计，我们却不得不为‘求全之责’。可是在这里须请读者注意，下面的讨论是纯粹从统计的立场说话，换句话说，就是假定被统计的材料已是全很可靠的了 (上面关于调查方法的讨论已经可以指明这个假定是何等的脆弱)。

本书在统计上所表现的最大缺陷是在：绝对大多数的平均数 (Averages) 是从以各个调查县份为一个单位的办法而计算出来；换句话说，这些平均数多数是‘平均数的平均数’ (Average of averages。) 统计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个极大的错误。著名的统计学家 Zizek 在他‘统计学上的平均数论’一书中曾经这样说过：‘按规则讲，我们决不能从一系列平均数中，直接地算出一般的平均数；反之，我们必须独立地根据那些组成这个数列的各种小组中间的个别事件，来算出更高级的更有内容的平均数’ (Dr. Frang Zizek, Statistical Averages, translated by W. M. persons, 1913, New york, p. 23)。举个显明的实例来说。假如我们在皖北的怀远调查了 1,000 个农场，这 1,000 个农场每个平均的面积是 5 亩。同时我们在山西的五台调查了 10 个农场，它们每个农场的平均面积是 10 亩。现在我们要求出两处农场的平均面积 (假定这样求法是合理的)。假如按照计算平均数的平均数的方法，那末怀远和



五台两处农场的平均面积是 $\frac{10+5}{2}$,就是7.5亩。假如根据各个

别事件的绝对数来计算,结果就成 $\frac{5 \times 100 + 10 \times 10}{1,000 + 10}$ 即5.05

亩。调查的事实完全一样,因为所采的方法不同,结果就相差很大。上述的例子虽属极端,可是卜凯教授书中与此相类的情形,实在到处可见。例如他在分析农场面积(Farm area)的时候,便是从各县所调查到的农场的平均面积(如安徽宿县为4.83公顷,怀远为3.58公顷,河北平乡为1.14公顷等),求出华北和中东部的两个总平均数(如华北各地平均数为3.54公顷,中东部为2.05公顷),从而再求出全体的平均面积(2.54公顷;以上见页四六,表三)。在这里他完全忽视了调查材料的‘重量’(Weight)问题。宿县的每个农场的平均面积4.83公顷,是调查3286户农家的结果,而怀远的3.68公顷却只是124户的平均数。286和124之差,虽然不及1,000与10之甚,而其成为问题还是一样。

这里我们应当更进一步指明调查材料所能代表的范围与统计方法间的关系。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在安徽宿县所调查的286个农家,它们所能代表的范围假定是50,000户;而在怀远所调查的124户假定能代表100,000户。这样我们在求一般平均数的时候必须顾到各个个别平均数所能代表的范围。我们还用平均农场面积为例。本书第五十六页告诉我们,怀远每个被调查农场的平均面积是3.68公顷,宿县是4.83公顷,假如我们将这两个平均数所能代表的范围加入考虑,那末它们‘更高级的’平均数既不是 $\frac{4.83+3.68}{2} = 4.25$,也不是



$$\frac{4.83 \times 286 + 3.68 \times 124}{286 + 124} = 4.482, \text{ 而是}$$

$$\frac{4.83 \times 50,000 + 3.68 \times 100,000}{50,000 + 100,000} = 4.533, \text{ 卜凯教授所习用的}$$

‘平均数的平均数’，和这种理想的统计结果自然相去更远了。

然而，卜凯教授在采用那种‘平均数的平均数’方法的时候，也自有其论据。他在本书第一章里（页一八）早就说过，本书平均数多数采用平均数的平均数，因为各县的农耕式样有所不同（Because the type of farming varies with the locality），所以把各县作成一个单位。可是，这种根据非但异常薄弱，而且万分错误。他没有估量到各个县份内各种农耕式样所能代表的范围，而作为完全均一；所以我们说他根据薄弱。其次，假如他以为各种农耕式样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差异，因而非得另成单位不可，那末他又忘却统计学上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性质不同的事物绝对不能放在一起统计的。换句话说，他绝对没有注意到Uniformity in the behavior of masses of data！这样，他的根据，又不是万分错误么？实际上作者如此的错误，不在其根据的结果，而在其根据的本身。在各个较大的区域中间（在华北和中南部）‘农耕式样’并不是以县区而不同，倒是在各个县区中间，因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悬殊，各类农场才有性质上的差异。

上面我们说过了‘平均数的平均数’的不甚妥当，下面我们要说到本书在统计方面的其他缺点。第一，卜凯教授往往不顾材料自身的趋向，普汎地运用种种统计方法。例如山西五台被调查的226个农场，它们面积的次数分配图（页四三），显然表示出两个高峰（一个在60亩左右，一个在140至180亩之



间)。在此场合我们自然不宜用一般的平均数来表现此种现象的集中趋势。可是卜凯教授也竟用单纯的算术平均数 (Mean) 和中位数 (Medium) 来表现了 (页四六, 表三)。

第二, 单就统计技术的观点来看, 假如作者能够更多地注意到事实的性质, 从而决定采取何种统计的方法, 那末结果一定会给读者以更大的帮助。举例来说, 作者在统计各种农民——自耕农, 半自耕农和佃农, 在农民总数中所占成份的时候, 华北和中南部的平均数, 和十七县的总平均数自然是用的‘平均数的平均数’。这一点, 我们现在可暂置不论。目前我们假定, 各种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百分数可以由各地的百分数来取平均数的。在此场合我们对于实际现象的特性必须充分顾到。例如自耕农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 在河北的盐山为 97—100%, 而在浙江的镇海只有 1.5%。这些极端的现象在我们计算平均数的时候, 当然须要尽量避免它们所施的影响。很可惜的, 卜凯教授在这里还是用他同一的法——算术平均数 (见页一四六, 表一); 实际上在这里就是用了几何平均数 (Geometric mean) 而把这种极端数的影响避免了, 也是绝无意义的。这类统计的轻率可由下面简单的例子充分地看出: 华北各地佃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数为 0.8, 20.0, 1.3, 0, 0.7, 4.2, 0, 3.2, 60.2 (各县次序为怀远, 宿县, 平乡, 盐山, 盐山二, 新郑, 开封, 武乡和五台)。对于这些数字的序列我们不该有这样的勇气来计算平均数的。可是卜凯教授却给我们一个华北各县的总平均数——10.1 (页一四六, 表一)!

最后, 在统计方面我们要替尊贵的‘平均数’来作一个正确的估价。本来所谓平均数, 就是在一个具有同样性质的数列 (Series) 的分配中表示其集中趋势的量数 (Measure); 这种量数, 一般地可以代表整个数列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应当了



解，在事实的内容异常丰富，事物的因素非常庞杂的场合，假如我们不把各种条件分析清楚，贸然来上一个总的平均数，那末非但没有找得这些事物的真正的代表（实在是不可能的），而且掩盖事物的真相，抹杀他们一切的特性。例如本书作者明明知道十七个县区内的农场情况各有不同，明明知道农场中间有自耕的，半自耕的，租佃的不同，明明知道农场经营有雇工的和家工的不同，又明明知道各类农民在贫富的，剥削的与被剥削的关系上大有差别，然而作者总是勇敢地把这些性质不同的属性一起排除，来上一个至高无上的平均数。关于这点，巫实三先生对于本书也有同样的批评，他说，‘将各种农场混作一体，平均再平均，而以各该区域（按指县）为单位，互相比较，则该单位所代表的乃是农场的幻影，而非该区域农场的实象’（大公报，经济周刊，第七期，一九三三，四，一二）。这样 距离实际很远的“幻象”在本书中可说举不胜举。例如作者在第三章表四二指明，十七个县区内每个农家的平均所得是278元。这种数字除掉给人家一个空洞的数字本身之外，还能代表些什么呢？实际上作者也很容易推知这个平均数是绝无意义的，它的标准差不是多至208么？固然“278元”在多数贫农看来，正像是孩子们平地要捉到月亮的一样的难于巴望，可是这些实际的尖刻的内容，在我们的作者都可以不管；就是另一个有力的统计数字——标准差，也阻挠不了他所爱用的，而且可以表示一般农民“还可过活”的“平均数”呢！

接着我们要讨论卜凯教授对于各种范畴和现象的处理是否完全妥当的问题。自然，我们因为篇幅的关系只能举出较为主要的几点来，和作者来磋商。

第一，本书的材料前后相距4年多，即最早的调查材料起自1921年4月，最晚的直到1925年9月。（如浙江镇海的材料



代表1921年4月到1922年3月的情形；而安徽怀远的材料则代表192年10月到1925年9月的情形。）中国最近无论在政治或经济方面都是瞬息万变，农村生活的变化虽然较慢，可是在这漫漫四年的长时期内，各地物价，工资，田地价格，以及田权的分配等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卜凯教授虽然一面招架，声称历年物价差异，“对于各地的比较还不致发生严重影响”，一面自留防地，声明怀远和镇海的价格确有“例外”的差异（见页四，注意，这两县正是调查时期前后相距最远的地方！），可是终究免不了有将连续四年多的材料，一手压成平面的嫌疑。因此，我们对于卜凯教授“统计”出来的农场收入，投资，雇农工资，自耕农佃农的成份，田场面积等等数字，都会要求给予更详细的说明，以免对于历年“中国”农场经济中各种因素的递变，轻易地被人抹杀。因为，我们研究的主要任务，就在看出这些因素在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的真象。

第二，我们要说到如何分类来观察农场经济的问题。本书作者曾有两种方法，或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农场的收支。第一种办法是按照面积的大小将农场分成大，中大，中，中小，小等五类，然后观察各类农场收支因素的成分和关系。第二种办法是按照所种耕地所有权的不同，所有的农民分成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三类，然后分析田权和各种收支因素的关系。第二种办法主要地用于农场收支的总分析（第三章），和田权的观察（第五章）；其他各部份的分析都是采用第一种方法。关于这点，我们大体上和卜凯教授表示同意。一般讲来，将农场分成‘大’‘中’‘小’的方法，其优点就在能够把握住农场大小的座标，来规定各种农场经营在经济上特别是技术上的特性。换句话说，我们用了这种办法，就比较地易于追寻农业经营在其广度上和深度上的发展，更进而探求其经营方式的转



变。至于本书将农民分成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从而用此来分析农场的经营，那只能说是‘用非其当’。因为这种办法的优点，乃在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表现某个区域内田权的分配（详见本刊创刊号《读者问答》栏（一）《怎样分类观察农户经济》），而不在便于分析农场经营的性质。因此作者在第三章中所列自耕农，（甚至地主）半自耕农和佃农农场的各种分析，不但不能给人家一个明确的印象，甚至反而模糊了事实的真相。谁有这样的权利来承认：在同一地方一个种田二百亩大批雇人来耕耘的自耕农，和另外一个种田五亩多数日子要出雇于人的自耕农，是处于同样的经济地位，而且他们的农场经营是具有同样的性质呢？性质不同的事物硬要看做同一，那便是抹杀事物内部的对立，斩绝其应有的和可能的发展。

自然，我们对于卜凯教授所用的分类方法还是觉得不够的。一，农业经营往往跟着作物的不同，而具有各别的形式。像华北的旱田经营和中东部的的水田经营，因为作物轮栽，灌溉制度，所需劳力等等的差异，的确具有不同的特性。在这里我们的作者并非完全没有注意，不过他在说明的时候往往漠视这些特性，爱作一般的解释罢了。实际上，这种经营形式的差异在别种场合也常发现。例如山东和河南一部份的烟草区域，和各大城市附近的蔬菜区域，因为种种耕作技术上的特性和商品经济性较高的缘故，那里农场经营也采取着特有的形式（自然，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些区域内各类农场内部的差异）。关于这点，卜凯教授也许因为调查的地域较狭（如所谓“华北”只包含少数县份；这些县份的分布又不普遍，一一如山东一省，一处都没有调查），未能加以注意。二，按照我们的意见，关于农场经营或整个农业经济的研究，我们最好要采用目下所流行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分类



方法。因为这种办法能够根据各类村户经济生活的几个重要指标（田权，雇佣关系，以及其它在生产和交换上的人与人间的关系），同时能参考其生活的全部，来规定各类村户的阶层。我们只有采用这样的分类方法，才能全面地观察各种经营发展的趋向，以及它们所具特性的成长和消灭，才能把握住整个农村生活的“来路”和“去处”。很可惜的，我们虽然愿意用这种方法，将本书所列几种重要材料改制一过，以便探求更具体更有用的意义，只因原料无从找得，我们也就不能着手，这样“求全”的期望，只能落在卜凯教授以后的劳绩上了。

第三，我们要简单地指明卜凯教授在统计农业收支上的几个缺陷。一，书作者毕竟是一个来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客卿，中国的一切事物一经他的目光便充分地“资本主义化”了。譬如，中国的农场经营还是由家长制的（patriarchal）形式统治着；换句话说，中国的农场差不多都是在家长的督促之下的家庭劳动的经营；这种经营实在由整个家庭共同负责。而一到卜凯教授手里，便把家主和其它家庭分子硬生生地对立起来（例如计算农场支出的时候，家庭的劳动当作支出，而家主的劳动却不在内。见页二十，七五）。又如本书对于家工的工资，统用普通雇工工价折算。这种办法用于计算雇工和家工的比重是可以的，因为这里只要表示一种相对的量的关系。可是要将这样求出来的家工工资，加入农场支出计算，那末至少在现时的中国，不能认为合适。因为在目下中国的农村中，雇佣劳动还不是农业劳动的支配形式，普通雇工的工价还不能作为农业劳动价格的支配的表现形式。我们研究农业经济的目的决不在以大批动人的数字来歪曲地表现各种因素间的关系，倒是在具体地着实地把握着农业经营结构的真相。准此而论，本书所列劳动支出在全部农业支出中所作的成份，确有斟酌的余地



了。

卜凯教授又将地主所有耕地的地价加入佃农农场资本中去计算（页六一至六三），而得出佃农农场资本较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资本为多的结论。这种办法的缺陷，第一在将地主和佃农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的投资并在一起，抹杀了他们投资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二在夸张了佃农的投资成分，令读者对于中国一般非企业性的租佃经营得到一种异常错误的观念。又如本书作者将10%作为农场的纯收入率（页六五），又是犯了将纯资本主义关系的标准误为应用的弊病。作者又由统计的结果，指明农场全年平均投资的利息率为9.4%，并且说明此项利息率得为农民银行放款时的参考。这种立论，因为作者统计和观察方法的多成问题，自然难为读者苟同的。本书作者在分析农业以外的收入的时候，非但将各种不同的农户，混同处理；而且将商人，地主等等收入，不通通加入（例如页九九指明村户收入中平均有三分之一由家庭以外寄来，中间经商收入占五分之一，田租占八分之一，其它专业占十分之一），结果把各类性质不同的村户的收入完全等量齐观，而将它们所有不同的意义一概抹煞。这种错误的由来，是在作者将农村社会的结构看成静的平面，而不知道它是动的立体。

讲到作者关于村户支出方面的计算除掉上述一般的或根本的问题之外，还有各种较小的特殊的问题。例如作者在货币支出中列有钱租一项，而在非货币支出中却无田租，分租等等的支出（页七八到七九）。又如作者对于生活费用的分析确乎很用力量，不过一方面因为材料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未能按照各种村户的阶层来从事分析（作者虽另立一节，讨论租佃与生活程度，指明佃农的生活程度较差于自耕农；但这些还是不够）因此很难使读者得到更为具体和明确的概念。



四 关于本书作者所提 建议和意见的讨论

一般说来，尽管作者所用的方法还不能说全无缺陷，尽管作者在运用各种正确的方法的时候，还不能全无弊窦，然而作者在本书中所有最辉煌的贡献，却还在其较高度的处理材料的技术上面。至于作者所用以摆布各种材料的立场，以及由各项统计所引伸出来的结论，从中国农业经济彻底改造的观点看来，那末非但是颇见薄弱，而且是异常有害的。

作者虽然也曾高唱中国的农村社会制度和多数西方国家完全不同（页四二二），可是我们绝对不敢相信卜凯教授已经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特质，以及它和“西方各国”在本质上的差异。比方我们在上面讲过的作者对于农业雇佣劳动的看法，农业投资的计算，硬将家主和家庭人员对立起来，所有这些都足以表现卜凯教授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理解的薄弱。这种缺陷表现得最显著的，要算作者对于中国租佃制度的理解。他对于中国租佃制度一切先资本主义的特性和形态——如经济以外的剥削，物租的统治，租额的过重，工价制的保留，以及水佃制的存在等等，简直连一些支离破碎的了解都付缺如，无怪他会说出中国的“田租制度和别国十分相类”的话来了。

卜凯教授既然还没有把握得住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换句话说，他既是时常对于这中国这样的病人“按错了脉”，那末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他做成一个对症发药的良医了。我们在以下所要简单说到的，就是卜凯教授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所开的几种主要的脉案。

第一，卜凯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至少是最主要的大毛病，就是人口太密。照他的意思，中国农村的贫困固然在农场



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等等，而这些贫困之源的总泉源还在农村人口的过剩。他说，“因为人口的稠密，和资本化费的昂贵，所以中国伟大的资源便是人力。中国所须要的，就在怎样去学习去利用这种大量的资源（指人力）”（页四二三）。他以为中国农村因为人口过密，劳力过剩，因此劳力，便成为农场投资中最主要的成份（页四二三）。他又指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低劣的原因，第一在人口太密，第二在教育不足（页四二〇至四二一）。他在讨论补救细小农场经济问题的时候，又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治本办法，似乎在实行人口节制”（页四二四）。这重见解在卜凯教授和乔启明先生合著的The Composition and Growth of Rural Population Groups in China（工商访问局出版）书中也同样表现过（页二二五）。

卜凯教授这种见解在中国学术界看来自然并不会感觉新鲜，反之，它不过是承袭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陈旧的衣钵。从亚丹斯密，李嘉图，弥尔，特别是马尔萨斯以下，绝对的人口过剩一向是被看作永久不变的范畴。实际上，土地的容受能力，或是土地所容许的人口密度，都是由生产力和技术的水准来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Ratzel氏的数字来说明。据Ratzel的推算，每平方公里所能养活的人数在原始狩猎经济和渔捞经济时代只有0.0017人；在农业有相当发展的原始狩猎经济是0.2—0.7人；在原始畜牧经济时代为0.7—1.7人；在西欧农业国家为91—109人；而在欧洲具有大工业的地方则为300—318人（见廖钦珂，《农业经济学》，日文译本，页四七六）。

决定土地对于人口的容受能力的，除掉生产力和技术水准以外，还有一定社会内社会生产物的各种分配条件。只有在私



有财产制度存在的社会，换言之，只有土地作为少数人所私有的社会条件之下，才有得不到工作（因此是饭或面包）的过剩劳动。我们在原始社会，或是在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土地的殖民地，或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中，断然找不到绝对人口过剩的现象。

卜凯教授和他的先生们以及他在中国的同志和门徒们，在固定的生产力社会分配条件的前提底下，来悬想着一个解决农村过剩人口的根本办法，自然会差以千里的。他们虽然也曾想到工业的发展，荒地的开垦，以及移民等等，都能或多或少地减轻人口过剩的苦痛；可是因为他们只能把这些办法孤立起来考察，没有在它们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间的联系中去找寻其正确的功能，因此不能不认为这些都不是办法，只有实行人口节制才是根本的出路了（页四二四）。在这里，我们似乎有做下述补充的必要：不错，在现存条件底下，即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半封建生产关系支配的条件底下，我们的民族工业决没有发展的余地，荒地的开垦只加增了少数军人官吏的财富，至于移民不是只落得一句空话，便是充当了少数地主酒肉的资料，其他像农业生产力的改进等等更是不敢想望；结果只有人口自然的节制可以解决眼前人口过剩的苦痛。卜凯教授在这里是不怕麻烦地追随着他的先生们，替自然的过程作有意识的注释。中国挽近接连发生的天灾，以及作为此种天灾的基本成因的里应外合的人祸已经扫荡了全国的农村，绝灭了千千万万的农民大众。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又在等待着死亡，大自然（社会的因素占支配的地位）的规条不是已经用了最有效的方式在最广泛的规模之内执行了卜凯教授们所倡导的人口节制政策了吗？然而卜凯教授觉得还是不够。他拚命要抨击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应用了Rock kill氏的统计材料，说明了中国的人口并不在增加，而且有减少的趋势。他觉得这种误用材料和



错误见解 (Misconception) 是十分不幸的 (详见卜凯教授和乔启明先生合著: 前引书, 页二一九)。而我们仁慈的作者却以一个热望中国能‘自己改进’ (Self-improvement 见本书页四二六) 的导师的资格, 渴望着更残酷的人口节制呢!

第二, 我们要谈到细小农业经营补救的问题。卜凯教授认为中国农场的零细显然不像初看那样的细小 (因为多数耕地能种作物两熟, 见页四二二), 他终觉得这样细小的经营决不及大农场那样有利 (页一四三)。那末‘为什么农场不变得大些呢?’ ‘农民供给的过多‘就是它的答案’ (页一四三)。这样, 卜凯教授就将零细农场的问题和人口过剩的问题紧紧地联结起来, 而且简捷地说明了它们中间的因果关系。他在讨论细小农场补救方法的时候, 虽然也列举种种步骤, 象垦荒, 殖民, 去除坟地, 使农民转业工业运输业, 用更集约的耕种方法, 增加劳力和资本 (内有改良土壤, 利用多量肥料, 改良灌溉排水系统, 防制病虫害, 改良种籽等等) 以及创设合理的信用机关, 和改进运输组织等等 (详见页一四三至一四四) 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人口节制”。我曾说过: “解决这个问题 (指细小农场问题) 最好的治本办法, 似乎在实行人口节制; 而目前最好的治标办法, 乃在用更集约的方法来种植那些在每个单位面积上能够生产更多食物的作物” (页四二四)。

卜凯教授在这里似乎也丝毫没有把握住细小农场经营的核心问题。大家知道小农经营也和别种人类的赘疣一样, 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的产生的前程, 并不是“人口的过剩”, 而是先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 换句话说, 是近代经济方式的发展的薄弱, 农业和农业以外各个生产部门内资本累积的狭隘。细小农场经营不仅如卜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并不有利 (Not profitable), 而且它在本质上是排斥劳动生产的发展, 资本



的累积和合理农耕的采用。伴随着这种细小经营的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自足，稳定和“经济”（卜凯教授在别的地方又指明那里适应着全家劳动量的农场面积 Family-sized farm，是最经济的单位，页一四二），而是非人的愚昧和惨苦。重压在这种细小经营之上的负担，并不是什么万恶的过剩人口，倒是高昂的地价，过重的地租，以及那些和土地所有凝结着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一切苛杂的剥夺，我们在这里不必详细说明，所有这些统治的因子都以土地所有为枢纽；而其目的乃在直接地剥夺一般小农的细微农本（卜凯教授也曾以中国农民缺乏资本为虑，并且说中国农民根本需要之一，是在以合理的利息借钱；不过他于农本缺乏的原因是不大明瞭的。页四二四），间接地榨取农民的血肉，令其冻馁，而实行其人口的节制！此外，在中国再加上帝国主义者强烈的压榨，小农经营的面貌便更加憔悴得可怕了。

一般讲来，这种细小的农场经营在大工业的发展迫令农村手工业破灭的时候，在土地的生产力趋于竭度贫弱的时候，以及在资本主义的大农业产物带来了猛烈的竞争的时候，就会渐趋没落，而让位于技术较为高度的经营。不过在今日的中国，一般地因为小农经营所具有的本能的黏着性，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性，特殊地因为中国民族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的无从发展，因此中国的细小农场经营更加易于沉淀，而且执拗地残留着。

我们只有这样在理解中国细小农场经营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过程中，才能发现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已经了解，这个问题的治本办法，决不是什么人口节制，而是与排除外资的统治和土地所有的支配分拆不开的。

第三，我们还来谈谈卜凯教授关于田租的建议。租佃问题



虽是中国农业改造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卜凯教授正和别的外国来华的顾问一样，对于这个问题可说绝无了解。比方他曾根据了十七县的调查，大胆地断定全国的“农田一般地由自耕农耕种，此外佃农所耕种的约占五分之一，半自耕农耕种的也占五分之一”（页四二三）。他对于租佃形式和性质的模糊（如谷租和折租的混同Cropper system和share rent的不加审别，其它租佃形式和永佃制的抹杀等等，详见页一四七至一四九）。他以为佃农的农场能得到较大的利润，原因是“经营的较为优良”（页一五六）。他又以为田租的额数“往往对于佃农或是地主不甚公允”（页四二三）。所有这些已够显示本书作者对于中国租佃制度的了解是何等贫弱！

卜凯教授所提“公允地租”（fair rent）的办法，就建立在这些不正确的了解上面。所谓公允地租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分配田内的收入；地主应得的是所投资本的利息，佃户所得的是劳动和管理能力的报酬。他再详细地规定地主所收资本利息的利率，以及佃农所应得到的“劳动的价值”。末了，他再声明，实际上田租的额数多半还要看土地的供求来决定。（页一五九至一六一）。

在此，我们不得不郑重指明，卜凯教授提出这种办法，一面似乎在巧施其惯用的手腕，一面又表露其不可恕的滑稽。第一，谁都知道卜凯教授这种办法是根据于资本主义的田租法则（地价是资本化了的田租），而有意地忽视中国的地权还保持着“社会的特权”（卜凯教授也曾指出过）的性质。谁能相信，在半封建的土地关系没有崩坏的今日，田租的高度实际上会由一般的利润率或利息率来决定呢？其次，假如佃户所能得到的真是所谓“劳动的报酬”，那末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真正能够产生新的价值的也只有人类的劳动，那末佃户所得到的应当



是他全部的劳动生产物，换句话说，应当是农田产物的全部。那末田租又何在呢？自然，卜凯教授决不会作这样愚蠢的解释，而我们在这里也只想质朴地指出教授的用心罢了。

第二，卜凯教授这种手段再用最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说实际上就是这种公允地租的额数，多半还是要看土地的供求来决定。换句话说，农民的数目愈多，他们对于耕地的需要愈急，这样田租的额数也就应当愈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按照教授的人口理论，中国的人口正在急速增加，他们对于耕地的需要也在日益加强，而地主得到佃户也更加容易（见卜凯教授和乔启明先生合著：前引书，页二二五，第15项）。这样看来，卜凯教授的全部理论不是在证明中国的地租应当不断地增高吗？无怪他要说中国的地租对于地主往往也不公允了。可是，卜凯教授所提倡的“公允地租”又在何处呢！

以上我们已将卜凯教授最主要的意见和建议稍加检讨，其他较为琐碎的地方（如他以为中国灾荒的原因是平日水利不修，森林太少，缺乏信用组织，交通不便，乃至平时积蓄的贫乏，绝没有指明帝国主义者和半封建的剥夺是造成中国农业恐慌的基本原因。见页四二五），将略而不谈。

总结起来说，卜凯教授在这本“中国农场经济”中，因为所持的观点并不在中国农业经济彻底的改造，而在提供“西方人士”以“可靠的”材料，以为进行国际“和平合作”的基础（页四二六），因此所得的结论往往和中国国民经济自身的要求大相凿枘。我们虽在可惜卜凯教授所用比较高的方法和技术，因为上述的关系，不能得到我们所盼望的结果；可是教授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于落后的中国学术界已尽了推进的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

（1934年11月1日）



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

一 引 言

这年头弥漫着解决土地问题的声浪。从国际驻华专家起，至国内学术团体止，都会提出中国‘急需改革土地制度’^①或是‘以分配生产为重心来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②在实际上从事解决这个问题的，有‘赤区’的土地革命，收复区域的土地整理，乃至闽变期内福建实行的‘计口授田’等办法。年来政府人员和银行家在高唱入云的‘复兴农村的口号中，也总说到‘人浮於地’，‘贫无立锥’等类的话。问题诚热辣而迫切，但问题底内容和意义还须严密地加以规定和探讨。

目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已陷入极度的危机。这种危机正配合着国际和国内的条件，以更深刻的更全面的姿态表现出来。就国际关系而论，中国正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环节格的资格，表现为过剩生产物底泛滥之所，因而形成物价狂跌，产业

①拉西曼(Rasichman)报告书(全国经济委员会汇编第二集)。

②中国地政学会年会作决议(上海《新闻报》，一月十六日，一九三四。)



衰歇和农村破产的现象。再就国内的条件来说，中国半封建生产关系底沉淀，阻断了生产力继续增长之路，甚至使它日趋衰落。市场上过剩的商品，和极度低落的生产力虽是互相排斥的范畴，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却给统一起来，而成为现阶段国民经济危机底两大特征。定两个特征正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同时列强资本对华统制底加强又是使此等特征全面展开的基本动因。

先来观察第一个特征。生产物之在中国形成相对的过剩，就其世界的意义而言，乃由所谓社会化的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这个基本的矛盾所支配；就其特有的条件而言，这种相对的过剩现象，却以国内大众，特别是农村人口购买力底极端低落，而表现得特别尖锐。中国挽近慢性的农业恐慌，就是使国内农村人口底购买力极度低减的主要原因。因此，假如我们舍去国际的条件不讲，中国的农业恐慌实在是使此种相对的过剩生产表现得特别深刻的主要原因，因此也是阻挠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的契机之一。

再来观察第二个特征。目下中国市场上商品充斥，价格猛跌的现象，一面是因为外货底倾销，一面是因为大众购买力底特别疲弱，至于中国自有的生产机关，则技术底幼稚，生产力底低弱，实极可惊。这种现象在农业生产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楚。而中国慢性的农业恐慌，便以此种生产力底极度衰歇为其基本特色。

我们在上面已经简单地说明了中国国民经济危机底特征，以及农业恐慌在此种危机底总体中所占的地位。接着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中国农业恐慌底基本成因的问题。换句话说，就国内而言，什么是令中国的农业生产陷于极度衰敝的境地，因此而令中国整个国民经济难以昭苏的主因呢？关于这点有些人们归咎



于高利贷商业资本底剥夺，和苛捐杂税底征收。外国较进步的专家最善于说明这一点。例如唐纳（R、H、Tawney）在其所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话：“佃户使用地主的土地，便要向地主缴纳其收获底半数上下。……无疑的，这种现象较诸农民不能善价出卖其产物，以及债主底剥削，为害恒较轻”^①。他更显明地说：“租佃问题之在中国不及借贷问题来得重要。”^②此外多数人便以为农业底衰落作为现时农村经济破产底直接动因。国联专家拉西曼便是这种见解底代表。他说：“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唯苦地不整理。……职是之故……认为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③他也看到中国农民地位底日益低落，可是他以为“佃农之数日见增加，则以自耕农迫受农业衰落之影响，被迫变卖或典出其田产，而变为佃农”。^④中国地政学会一定要令分配与生产合并，作为土地问题底中心也就是这个意思。

作者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则以为土地分配底不均，确是促成目下农业恐慌的基本的杠杆。第一，全国的农民每年至少要将一万万元以上的巨款，以地租的形态贡纳地主，供其非生产的消费。农民这种巨额的支出，自然是摧残其经营，削弱其生产力的主因。第二，中国农村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底猖獗，诚如国内外专家所见，是使农村大家陷于苦海的源泉。不过，现时乡镇商店多数由地主和富农所开设，同时农村中经营高利贷的债主，主要的也就是这些地主和富农。所以就

①R、H、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1932 pp. 60—67

②R、H、Tawney, ibid, p. 63.

③拉西曼报告书页四二。

④拉西曼同上，页三一。



内在的条件而论，现时横行于中国农村中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实以地主底土地所有为轮轴。第三，中国一般军人和官吏底活动，常和这种下层的以土地所有为骨干，而由商业高利贷资本为其外缘的机构，保持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往往身为地主；同时通常政府征派税捐，终由各地的地主绅士经手。因此各地的苛捐杂税，虽为人人诟病，可是它们与大土地所有底利害，却常相一致。①

上面的分析虽极简单，可是已够证明一般人所视为造成现时农业恐慌的原因，如高利贷活动，物价剥削，苛捐杂税等等，都以土地所有做它们底基础和骨干。更进一步来说，前者是后者底派生物，同时前者底活动，适足以加强后者所具有的内在的矛盾。于此就不难了解，土地问题实是把握中国农业问题的锁钥，同时也是研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问题的关键。

土地所有底分配自然是土地问题底核心；可是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意义，决不限于土地所有底分配。第一，单看土地所有底分配，我们还找不到农业经济现有的特质，以及其发展底趋向。同样是土地分配底极度不均，在中古时代的欧洲，以及现代的波斯印度等国，我们所见到的是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农业经营；而在现代的英国，则存在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因此，我们假如不对土地所有底性质，和农业经营底内容加以深切的探讨，就决不能明瞭与某种形态的土地所有底分配，相配合着某种经济结构底内容和动向。第二，单看土地底分配而忽视了整个社会发展底阶段，更贴切言之，忽视了土地所有以外的各种关系底性质，我们决不能得到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欧洲中古时代的大土地所有，是后起资产阶级底“死对

① 详见拙著《农业恐慌与中国土地问题》，《中华月报》卷二，期四。



头”，而现时英国，德国东北部以及日本等处的大土地所有，已成为金融资本底附庸，他们非但见谅于资产阶级。而且为后者所维护，这里我们见到：假如单看土地所有底分配，就不能发见解决当时和当地土地问题底主要动力。第三，单看土地所有底分配，而不分析土地关系和民族问题等等的关联，我们将不能把土地问题和整个民族解放的问题，溶合一起，得到一条总的出路。日本之在台湾、朝鲜，英法比之在非洲，乃至德国之在波罗的海诸国，都曾收买大批的土地，因此在台湾朝鲜等地，单就土地所有的关系而论，土地问题就直接地和整个民族问题冶为一炉。

本文之作，就想在这些关系之上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描画一个简单的图形。

二 土地所有与使用的矛盾

（一）近代土地所有权底形成

中国目下还存在着各种先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形态。所谓“军田”（屯田）“旗地”“学田”乃至华南各省最为普遍的氏族所有田产，西南的土司所有田产以及长江流域各省最为盛行的寺庙所有田产等等，无疑地带有浓厚的先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底色彩。^①甚至现有的私有田产也还保留着或多或少的先资本主义的情调。不过，正如英国的资本将近代的私有概念移植于印度一样，中国各种各样中古的土地所有形态，在列强资本底影响底下，也已或急或缓地趋于崩坏。在十六世纪的下半期，中国耕地总面积中仅有半数上下为私人家庭所有的田产，

^①详见马札亚尔（Magyar）《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译本。



其余百分之九。一九是军垦的屯田，百分之二七。二四是其他各种国有土地，此外还有庙产族产等等。^①现时长江流域诸省虽然还有“屯田”底名称，但这种田产已经完全转入私人手里，因此在性质上和普通的私有田产已全无分别。例如江苏的宝山太仓诸县的“屯田”（“卫田”）多数早已落入太仓几个大地主底手里。至于“学田”和“旗地”也已公开或秘密地出卖，成为普通的私产。现在的庙产很显明地已是寺院住持或当地豪绅底私产。有些地方（如江苏南部各县）族有的田产也在私相买卖和分析族产等方式中，逐渐减少。在广东各地族产似有继续扩张之势，不过它们底性质已和过去不同。它们在名义上虽是族有的产业，实际上的收入却已为少数有力的族员所霸占；换句话说，那些有力的族员正在利用此种残留的田产形式，以完成其原始的资本蓄积，而那种田产，假如我们一定要赐以“共有”的美名的话，也至多是少数私人地主的“共用田产”而已。

附着于家庭私有田产的先资本主义的色彩，也在商品交换范围日益扩充的潮流中，逐渐销褪。一般说来，中国的家庭私有田产还多少具有家族共有的性质。比如产权底移转要受到种种累赘的牵制，便是一例。普通私人田产出卖、典当，甚至较为轻易的抵押都得经过族长乃至田邻底同意。然而这些桎梏现时显然在逐渐减轻，在大都市附近田产买卖最为畅行的地方，田产移转简直已无需得到卖主以外任何人底同意。在那些地方我们看到近代私有制全般的确立，以及先资本主义田产形式最后的消失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种永佃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田产

^①陈翰笙, *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 1933, P. 11.



有所谓“田底”和“田面”的区别，（名称各地不同）地主所有的是田底权，佃户所有的是一种田面权。有田面权的佃户，只要经常缴租，得永久佃耕他那块土地；不仅如此，他还可以不经地主底同意，将田面权出卖，或抵押出去。田面权底买卖既是常事，所以田面也有一定的价格，例如江苏无锡一带，田底和田面底价格形成七十与三十的比例。在近城的区域以及人口较密，地力较厚的地方，田面底价格竟能超过田底。永佃的佃户甚至再能将自有的田面辗转出租，自己收取一部份田租，其大部份还由自己或由真正的佃农直接缴给地主。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分割的土地所有形态：土地底所有权固属于地主，而所有权中一部份的作用形态——即使用权却永远属于佃户。这种土地底分割所有形态对于田产底移转，以及经营底发展？无疑地是一种有力的障碍，因此当资本主义的经济逐渐扩展的时候，它必然地归于消灭。意大利日本等地原来也存在着永佃制度，可是当近代的经济形式开始发展，资本底势力开始凌驾一切的时候，这种制度就告崩溃。中国很多省份如江苏、浙江、湖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现在都有永佃制度底存在；不过这种田产形式目下已在采取各种方式（如地主收回田面，少数的佃户也在收买田底，最普通的是地主否认田面权而强迫收回，变成田底和田面归于合一的形式也就是变成一种比较近代的土地所有形态。

原来土地所有权趋于近代化的倾向，主要地是适应着田产得以彻底自由移转的需要。土地所有底集中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底前提之一，而近代田权底确立就促成这种前提底完成中国土地分配之不均，已是悠久的事实；自从外资侵入以后，商品经济底发展一日千里，农民底破产日益加速，田产底移转也渐趋自由，因此土地所有集中底趋势，益发加强。



（二）土地所有底集中

现在似乎只有那些有意规避实际的人们才会主张：“因为有多数小自耕农底存在，地权之在中国作为分划阶级的因素，不及在几世纪内的欧洲那么重要”。^① 就据国际专家拉西曼底见地自耕农在中国中南部十二省也只占到百分之三二，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二五，而纯粹的佃农却占百分之四三。“其中有数省佃农成数，尚高逾于此。例如在福建佃农占百分之六十九，自耕农仅占百分之九。佃农之数日见增加，则以自耕农近受农业衰落之影响，被迫变卖或典王其地产，而变为佃农”。^②

按照社会经济的体系来讲，目前的中国，事实上可以分成三个部份：第一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东北，它已变成美国主义实际的殖民地。第二部份是所谓“赤区”，那里存在着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第三部份包括着上述二者以外的庞大区域，那里保留着半殖民地的附庸性。上述三部份除“赤区”以外，都与帝国主义底统治和浓厚的封建残余的问题有关。

在半殖民性的部份，我们按照自然的（特别是地理的和地质的，条件，以及经营的形式，还可以分成两大区域。在第一个区域，畜牧经济尚占优势，农业也有相当限度的发展。这个区域包括西藏、西康、新疆、青海、甘肃及宁夏西北部，陕北一部份及热察绥的北部。余下的部份都属于农耕区域。^③ 在畜牧区域内，土地多数属于贵胄王公。在新疆一带汉人中官吏和商人也占领了多量的土地。不过在有些地方，定居的农业生

① 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P. 68—69.

② 《拉西曼报告书》，页四二至四三。

③ 详见拙著《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载《新中华》，卷一，期二十三；并载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



活，还没有占到支配的地位，因此土地对于生产的意义，也比较轻淡得多。

农耕区域内土地分配的情形，在华北黄土区域和中南部的水田区域有很大的差异。华北是自有土地的小农生产占优势的区域，而长江和珠江流域，贫农多数租田耕种。根据立法院的概算，纯粹自耕农在农民总数中所占的成份，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百分之三二，在黄河流域则为百分之六九。一般说来，在华北各省除军人官吏以外，平常的中小地主并不多见；而在水田区域地主所有的土地要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以上所述是中国半殖民地性的农耕区域土地分配的一般情形。接着我们要更进一步地分析这种土地在地主和各级农民中间的分配。在此我们首先要确定中国的地主和各类农民底意义。自然，这些意义要由社会经济实际的生动的内容来规定。

所谓“地主”，不消说总是拥有多量田产的人们。一般说来，中国的地主还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指那些纯以土地所有为根据，而向佃户收取地租的人们而言。第二类是雇工耕种，而身为经营的地主。我们为易于区别计，称前者为“收租地主”，后者为“经营地主”。

在农民集团中在上的有极少数的富农，处于底层的是广大的贫农和雇农。大众中农就介乎两者之间。一个标准的“中农”是有适量的土地和劳力，并不出租土地，也不雇用多数雇工；他们有时还被雇於人，有时租进土地，不过为数很少。一般说来，这种农民在租佃和雇佣关系上是既不剥削人家，也不被人家剥削。上层的富农，情形就不同。他们自有或租进多量的土地，雇用多数雇工，自己虽然参加耕作，大部份的工作，乃由雇工担负；同时他们多数出租一些土地，而兼有小地主的地位。至于贫农则因为土地不足，就须租地耕种，或兼带被人



雇佣，换句话说，他们常在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上，受人宰割，至于自己全无生产工具，纯以出卖劳力在他人田场上耕作的农民，就称雇农。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些农村阶层底经济地位，主要地就以田产底有无和多少来决定。地主在人数或户数虽仅占极少数，他们所有的土地至少有中国全部耕地底半数。据马札亚尔（Magyar）在1929年的估计，中国西南部各省地主所有土地占到耕地总面积底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在中部各省约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陕西和河南约占百分之五十。湖北约占百分之十至三十。满洲和内蒙约占百分之五十至七十。^①这种估计当然极为概括，免不了过高和过低的弊病^②。

上面说过在水田区域，地主所有田产所占的成份要比黄土区域为大。河北平原的农业状况可以代表黄土区域东部的华北平原；而河北的保定又大致可以代表河北平原的一般状况。根据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在1930年的调查，地主（住在村里的）以不到百分之四的户口占百分之十三的田亩；而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和雇农，只有耕地总面积底四分之一^③。

河北保定的地权分配（一九三〇年，十代表村调查）

	户数	户数百分比	所有田亩	所有田亩百分比
地主	58	3.7	3,392	13.4
富农	125	8.0	7,042	27.9
中农	362	23.1	8,400	32.8
贫农及雇农	1,020	65.2	6,686	25.9
总计	1,555	100.0	25,520	100.0

① Magyar, 《中国经济大纲》，徐公达中译本，页十一。

② 拙著《中国农业恐慌与土地问题》，页A, 19。

③ 陈翰笙, 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 P. 2.



豫北农业底自然条件很和河北平原相类，可是村居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已较保定为多。贫农和雇农所有的农田也远少于保定。①

河南辉县的地权分配（一九三三年，四代表村调查）

	户数	户数百分比	所有田亩	所有田亩百分比
地主	19	4.39	2,272.00	27.50
富农	35	8.08	1,702.00	20.60
中农	107	24.71	2,803.00	33.94
贫农及雇农	251	57.97	1,473.00	17.83
其它村户	21	4.85	10.00	0.13
总计	433	100.00	8,260.00	100.00

水田区域内地主所有的土地占到可警的成分。例如在浙江的平湖，地主在户口总数中仅占百分之三，他们所有的田产竟占全县的百分之八十。②江苏无锡的农村很可作为江南东部各县的代表；实际场的调查的结果全县农民所有的土地仅占总面积百分之五十二。只是在村的地主，他们所占的田亩已达总面积底百分之四十七。③

江苏无锡的地权分配（一九二九年二〇代表村调查）

	户数	户数百分比	所有田亩	所有田亩百分比
地主	59	5.7	3,217	47.3
富农	58	5.6	1,206	17.7
中农	205	19.8	1,418	20.8
贫农及雇农	713	68.6	965	14.2
总计	1,035	100.0	6,806	100.0

①张锡昌，根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材料。

②前立法院统计局，《统计月报》，卷一，期三，一九二九。陈翰笙前引书页三。

③陈翰笙，前引书页四。



族有土地占有优势是珠江流域土地所有关系底特色。据苏联学者塔哈诺夫在一九二六年的调查，广西东部八县中氏族和寺庙等所有的土地占到县面积底百分之二十。七。^①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一九三三年曾由薛暮桥先生主持调查，全省的农村经济，据他们在三十八个县份内调查的结果，证明地主所有的田亩差不多占到百分之三十。^②

广西的地权分配（一九三三年，三八县四八村调查）

	户数百分比	所有田亩百分比
地主	3.4	28.9
富农	6.4	22.3
中农	20.6	28.0
贫农	69.6	20.8
总计	100.0	100.0

在桂省东部的苍梧道，土地兼并的情形格外尖锐，地主在户数上仅占百分之三。八，所有的田亩仅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五。七。这里我们如再加上族有田产，寺庙田产及公地等等估计在内，农民所有的田产自然更少。这种情形在与广西苍梧道情形相似的广东全省，格外可以看得清楚。根据一般的估计，广东全省留在农民手里的土地至多只有总面积底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①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页二三四。

②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广东的地权分配（一九三三年全省估计）

	户数	户数的百分比	所有田亩	所有田亩的百分比
地主	110,000	2	22,360,000	53
富农	220,000	4	5,460,000	13
中农	1,090,000	20	6,550,000	15
贫农及 雇农	4,040,000	74	8,080,000	19
总计	5,460,000	100	42,450,000	100

上表所列地主户数占总户数百分之二，自然只是一种极模糊的概数，因为氏族单位很难并入普通的户口计算，同时族有的田产差不多要占到地主所有田亩中的半数。

我们根据各方面的调查，通讯和其他材料，估计全国现有的耕地为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亩，全国和耕地有直接的所有和耕作关系的户数为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户（甚至连拥有田产的氏族，寺庙，公共团体也都常作户计）。全国（上述半殖民性的和殖民地性的区域，包括官地在内）土地的分配大致如下。

中国土地的分配（一九三四年估计）

	户数 (千户)	百分比	所有土地面积 (百万亩)	百分比
地主	2,400	4	700	50
富农	2,600	6	252	18
中农	12,000	20	210	15
贫农及 雇农	42,000	70	238	17
合计	60,000	100	1,400	100

上表所列自然只能当作最一般的指示方向的图形，在这里



没有顾到各个区域内特有的分配形态，而只指出一般问题的基点。这基点乃在：农村人口中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竟拥有全国土地底百分之六十八；而构成农村人口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十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他们所有的土地却不到三分之一。

（三）土地分配与农业经营

这种土地分配的数字，在静的方面只能说明农业主要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在动的方面说，却能当作某种经济体系发展的前提。罗马大土地所有（Ladifundium）底形成，发展了采用奴隶劳动的生产方式；而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地主所有土地底膨胀却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底发展。在后一种场合，英国的地主在“化砂土而为黄金者，唯羊而已”的口号之下，圈占农民土地，将所有的耕地变成了份外有利的牧场。到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地主收夺大批土地，自田农民急激破灭，以及租佃企业家从而产生的过程已很成熟，换句话说，当时英国的农业已完成了资本主义的组织。

现时中国的情形怎样呢？占有全部耕地半数以上的地主究竟怎样发展其经济呢？

固然，目下中国的地主，也有自己经营田场，而雇工耕种的情形。这种“经营地主”在上述的黄土区域比较多些。例如根据河北保定农村的调查，地主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自己经营田场。①农村复兴委员会一九三三年在河南辉县所调查四个代表村，一九二八年十六户地主中还有一家经营地主；到一九三三年地主的总户数虽已增为十九家，可是已全部变成收租地主。据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调查桂省二十二县四十八村九十二家

①陈翰笙前引书，页三。



地主的結果，純粹將田畝出租的雖然只占總戶數底百分之三十二。六、而余下百分之六十七。四的地主他們所留着自種的耕地委實很少；甚至他們每戶平均耕種的面積還不及富農。（前者為28.3畝，後者為39.0畝）。這些在村地主所有的土地，出租給農民耕種的，占有總面積底百分之七十五，如連住在城市的地主計算在內，當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中國正和現在的印度、朝鮮、波斯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樣，大地主們都將土地出租給農民耕種。這種情形在日下農業生產絕無希望發展的場合正在日益加甚，例如河南輝縣的地主其出租田畝在絕對數和相對數上都在增加。

河南輝縣四村地主出租的農田（一九三三）

	所有田畝 (A)	出租田畝 (B)	B對A的百分比
1928	1,913	1,753	91.64
1933	2,272	2,140	94.19

同時在江蘇無錫寶山等地，經營地主之變為收租地主是很普遍的现象。

一般說來，農業經營和土地所有的脫離，正猶土地所有底集中一樣是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基本行程；因為假如農業經營能和土地所有完全脫離，那麼這種土地關係便最能適合於資本主義底生產。英國的農業經濟所以被視為典型的資本主義關係，就是在此。因此，我們決不能單就中國的地主脫離生產這一點來說明中國農業生產方式底性質或階段。

在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跟着土地所有底集中，以及中間階層農民底破裂來到的，是資本主義的租佃企業家底產生。當時占有全部耕地三分之二的大地主們，他們自己經營的土地只占自有耕地的百分之十七，其餘的百分之八十三都租給佃戶耕種。這些租佃的經營多半是資本主義的企業；中間占支配地位



的当然是那些经营面积广大的大经营和一部份中级经营。

中国的情形怎样呢？在中国正和在印度一样，大地主的土地主要是租给那些痛感土地饥饿的贫农大众。不错，中国有些地方，特别在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区域，存在着那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租佃企业。例如广东的果园经济，江浙（如无锡嘉兴，上海，附近）的蔬菜，果树甚至稻作的规模较大的经营，以及绥远一带垦殖区域的集资经营等等，都能归入这种范畴。它们的确租进大批土地，雇用工资劳动，来从事经营。它们的确投下较多的农本，讲究农耕的技术；同时以广大的都市市场，作为实现其产物的领域^①。可是就全国农村而言，这种企业在现在固然还没有占到支配的主导的地位，到以后也只能遭遇其没落的命运。这种趋势在西北垦殖区域中表现得异常明显。例如河套放垦区内的大农经营正在急速破产，临河县原有十家垦殖团体，投资二十六万元，近来只剩一两家了。^②

实际上中国典型的富农经济，一方面固然带着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可是主要的还具有小地主，高利贷者底小商人等等半封建的上层分子的姿态。他们正和那些在资本主义顺畅发展过程中的富农相反，非但不大租进土地，扩大他们的经营，他们反而出租他们的田亩，稳收地租，极力避免企业的危险。下面的例子已够明显。

^①例如广西思恩县的“富的佃农”，他们租种大批土地；最初时参加耕种者是家人父子，以后则雇数名或数十名雇农为其耕种。这种佃农因为资本足，农业经营上各种动力又丰富，故禾稻之收获量比一般贫困佃农为多，即租谷之缴纳，地主亦不敢苛求……此类佃农大都最能采用新式农业知识，以经营农业，如用肥田粉田；为彼等最先采用”。（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上卷，第七章，G，244）

^②曙明“蒙古，江南”一之临河，县农村新中华，卷一期四，



无锡二十代表村富农底土地（一九二九年）

所有田亩	户数	总亩数	出租田亩数	对总数百分比
16亩以下	22	161.0	1.5	0.83
16—31.9	29	667.1	80.4	12.05
32—	7	358.2	143.3	40.01
总计	58	1,206.3	225.2	18.67

这里指明富农所有的土地愈多，他们出租田亩的成份也愈大；同时他们由富农而转变成收租地主的倾向也愈甚。据河南辉县四村的调查，一九二八年共有富农三十八家，他们到一九三三年竟有四家已变成纯粹的收租地主。

地主和富农出租的农田主要地由贫农大众租进耕种。这种情形在水田区域特别显著，江苏无锡的贫农，他们租种的田亩至少要占百分之八十；广东方面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广西的西北部自有田亩的农民较多，可是就全省而论，（根据二十二县四十八村调查）。贫农使用田亩中租田还占百分之五十三。二，中农为百分之二十九。一，而富农仅为百分之九。九。

有地较多的地主（甚至富农）既然多数将农田出租，租进田亩的又多数是那些没有土地或有地很少的贫农，因此细小的经营就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形式。

黄土区域水田区域的农业经营面积

	平均每户使用农田（亩）	调查年份
河北保定	16.6	1930
江苏无锡	7.5	1929
广西二十二县	10.0	1933

就全国而论农业经营的平均面积远在一公顷以下；这种情形在欧美可说绝不存在。例如在德国以小经营闻名的巴登(Baden)地方，每个经营的平均面积还有三、六公顷。



可是以上仅就全部经营的平均面积而言，假如我们单看占中国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他们经营面积底零细自然更足惊人。

黄土区域和水田区域各类农产底经营面积（一九三三）

	河南辉县（亩）	广西二十二县（亩）
富农	107.17	30.9
中农	32.97	16.6
贫农	10.05	5.6

同时各类经营都有逐渐变小之势。例如河北保定各类经营面积的总指数在一九二九年为一〇〇；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九七。五；到一九三〇年再降为百分之九六。七。较大的经营的解体可说是一般的趋势，所以经营面积的缩小，往往以经营地主及富农为最甚。

河南镇平六代表村各类经营底面积

	富农	中农	贫农
1928	51.33	21.19	8.21
1933	42.83	19.80	8.48

细小的经营构成中国农业生产典型的形式，已如上述。不过，经营的面积在观察农业经营的构成和性质的时候，决不是一个决定的条件。面积广大的经营不一定是进步的，技术优良的企业；反之，经营的面积尽管很小，它们的构成倒会是比较高级的。举例来说，美国在本世纪初叶，南部诸州还以巨大的经营占优势，而在工业发展的北部，农业经营的面积却一般较小。可是据一九〇九年的调查，南部诸州的经营中使用工资劳动的占到百分之三十六。五，在北部则有百分之五十五。一；就农场中所有机械和其他农具的价值来看，南部的巨大经营每英亩平均只有〇。七一——〇。九五美元；而北部则有一。五



九——三。八八美元。同时在集约耕种占优势的北部商业性的经营却最发展。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农业在美国的北部的发展，较诸南部遥为先进。^①

中国的情形怎样呢？中国农民所经营的田场如和别国相比，都只能说是细小的经营。假如分区观察，那末黄土区域的田场面积一般要较水田大些。雇佣劳动的成份在黄土区域也就比较地多。华北经营地主的成份较多，以及华北贫农多数人雇佣这一点，就是上述事实的证明。同时就全国而论，面积较小的经营，它们所雇佣的工资劳动决不会大于规模较大的经营。根据金陵大学调查十七县二八六六户村户的结果，所谓“大田场”的雇佣劳动要占其全部劳动消费的百分之三十一、六而“小田场”仅为百分之四、三。

华北、华中、华东诸地工资劳动在全部劳动消费中所占百分数

	小田场	中级田场	大田场
华北各地	4.1	13.0	31.8
华中华东各地	4.5	15.7	20.1
合计	4.3	14.3	31.6

（根据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P, 236, Table, 5 制成）经营地主和富农的雇佣工资劳动，自然是经常的现象，而中农和贫农零碎的田场上至多只能看到一些日工（短工的踪迹），因此中国农村中说得上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初期形态的也只有那些经营地主和富农的经营。

再从农业成本方面看。中国的农耕仍以人工极度的集约为特征；换言之，中国的农业成本的有机构成，仍然极低。例如

^①乌利雅诺夫，〈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资料〉。



耕畜一项，中国耕畜劳动对一个成人在田场上工作量的比例为〇。四八比一，而美国则为三。八二比一。^① 这些耕畜在各类经营中的分配自然以地主富农为最多。

广西十县二十四村耕畜底分配

	户数百分数	耕畜百分数	平均每户头数
地主	2.8	5.5	2.30
富农	6.3	14.7	2.75
中贫	21.4	31.5	1.74
贫农	69.5	48.5	0.82

而且地主富农所有的耕畜往往质量较优。譬如华北各省所用的耕畜通常有牛、驴、马、骡几种。贫农所有的往往只是力弱的牛和驴，而地主富农所有的多数是矫健的骡和马。

河南辉县富农和贫农耕畜底分配

	富农		贫农	
	头数	百分比	头数	百分比
牛	30	17.44	116	56.86
驴	16	9.30	49	24.02
马	21	12.21	15	7.35
骡	105	61.05	24	11.77
合计	172	100.00	204	100.00

至于别种农本如肥料、农具、农舍，种籽等等，在经营地主和富农，终是质量较佳，数量又多。例如江苏无锡除机器灌溉以外，现在又流行改良打谷器；这种打谷器的效力比较人工打谷高好几倍，可是买得起这种改良农具的，还不过是几家富农。有时中农贫农也用这种改良工具打谷，不过是向地主富农租来

^①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p. 231.



应用，或由他们包打，缴付一定的租金和包金。

根据上面一般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中国目下土地所有底集中，并没有产生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经营（不论是类似东普鲁士的那种地主经营，或是类似英国的那种租佃企业家），而只好经营和技术异常低劣的零细田场安排了最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正由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商人以及军阀官僚底活动来维持；他们正以地租，利息，商业利润税捐，征派等等形式，绞榨贫困农民的血肉，践踏他们的生命，并破碎他们的经营。于是农村大众的生产能率在此缩小再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急激减低，而土地所有和农田使用间的矛盾就在此种生产力竭度减缩的过程中尖刻地表现出来。

三 目前的危机与土地问题

土地所有的集中在中国目下的情形下促进土地所有与农田使用的脱离，更造成农田使用的分散，更进而召致农业生产力程度的衰落。这便是中国土地问题基本的内容。我们在本节中将阐明这种基本的内容，在中国目前政治的经济的危机中，怎样地更变得复杂更变得尖锐。

（一）农业恐慌的深刻化

农业生产力的薄弱，和多数农民经常地因为生产不足而陷于饥饿状态的情形，是中国近年来农业慢性恐慌的基本特征。同时因为国内商品经济已有较高度的发展，再加上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就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这种现象又是中国最近期内农业恐慌作一般的急性的爆发底主要征象。水灾旱魃可算前者最显著的表现，而近年来洋洋盈耳的“谷贱伤农”便是后者最好的译语。这两种现象并不独立存在；反之，它们是相互



错综，在交互促进。以自然条件的突趋恶劣而促成灾荒，当然会将农业生产力减低到可怕的程度。连年来的水灾旱荒不知已经荡尽了多少农民的生命，以及耕畜，农具，农舍肥料和籽种等等。据金陵大学的调查，在一九三一年长江流域大水灾中，逃亡的灾民，占灾区人民的百分之四十。至于死亡的人数占灾民百分之二。二。陕西大旱灾，七十五县的人口自七，二一二，六六四人减为六，二六八，〇四五人。就中凤翔各区死亡逃亡的人们几占半数。农村复兴会在凤翔县调查五县的结果，从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贫农减少了三九六人，就中饿死的占百分之五四。八〇，病死的占百分之六。〇六，逃亡的占百分之三五。三五，被卖掉的占百分之二。五三。送养出去的占百分之一。二六。①这种劳动力底损失当然使当地的农业生产不能照常进行。再加上各种耕畜等等的消失，农民自然更难从事经营。在陕西省受灾较轻的邵阳，没有一头耕畜的农户在过去十年内已从百分之二十九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七；有三头和三头以上的人家已从百分之十三，减到百分之八。②因而田园荒芜，生产绝无。例如察哈尔与和县因历遭灾荒，全县熟地，多半荒芜，无人耕种。③陕省荒地“穷白皆是”，而贫农荒芜的耕地自然最多。据农复会凤翔五村调查结果，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三年，中农荒芜的田亩在一九二八年是没有，到一九三三年就有九八亩；贫农竟从十二亩增加？到七四七。五亩。

在灾荒进行的序列中，农民的生产固然在一天一天变得困

①勾适生，根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

②陈翰笙，前引书，p. 28。

③绥远《民国日报》，一月十二日，一九三四。



难，在多数场合，简直变成不能进行而一般军阀、官僚、地主和商人一般却在灾荒中扩大他们的田产。例如甘肃宁定地方，“从民十七年灾乱以来，人民逃难四方，迄未上庄。有土豪何腰哥儿等率其族属，分散占据田地。遇有难民上庄探询者，则仅予贱价，勒写卖约以为据，每晌竟以一元或三四元买得。何腰哥儿又恃其子宁定记当护弁，目借为护符”。^② 陕西关中受灾最深，多数土地都集中在军人商人手里。这种现象以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天津的《大公报》指得最为清楚：“陕西贫等农民，甚至小康之家，都以‘灾’的原因，而廉价变卖产业，以苟延性命，反之，土豪、劣绅，富商大贾，更以‘灾’的原故，巧为金钱的操纵，收买贱价土地，暴发横财。于是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地无立锥。”根据凤翔五村的实际调查材料指明富农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三年，出卖的农田（他们还买进土地，在此仅从出卖方面观察）共占一九二八年所有农田底百分之八；中农则占到百分之十八，贫农竟多至百分之二十五。换句话说贫农在二十年中间简直可以变成纯粹的‘光棍’，何况这种无田化的过程是在加速度进行。

如上所述，在以生产力竭度衰落为特征的‘天灾’中，我们见到农业经营底日益破损，以及土地所有底格外集中。其次我们在以农产价格狂跌为特征的“丰收成灾”中间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农民底收入因农产跌价而激减，于是“救死唯恐不赡”，再没有余力去改善经营。在这场合，农民底生产多数不能照常进行。例如河南许昌一带种植烟草的区域，农民因为收入激减，（四五年前每亩收入可达七十至一百元；现在能有

^①石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与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半月刊，卷二，一二合期，一九三二。



二三十元收入的，已不多见），种烟面积非但不在扩张，从一九三〇年后倒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江浙一带因为近年丝业不振，养蚕农民非但不能获利，反要累累亏本，所以纷纷将桑田倒翻，改成稻田。现在无锡杭州附近桑田底面积比较三年以前，只有二分之一；即使留种桑田，也因不能并不愿多加农本，产量一天比一天减少。

“丰收成灾”对于农民田产底移转也是一种有效的刺激。多数农民因为收入激减，无法过活，只得典地卖产，暂维生活。田产大批的出卖造成田价狂跌的现象。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底调查和估计，水田每亩价格一九三一年为六〇．〇元，一九三二年一五六．四元，一九三三年一五二．八元。旱地价格也从一九三一年的三〇．〇元，减为一九三二年的二七．九元，到一九三三年更减为二六．七元。河北的定县和保定，年来收成尚好，只农产价格跌落，定县田价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保定竟跌落了百分之七十五。其他歉收区域，自然更不消说。一般军人、官吏、商人、地主、富农，在此时期，就大批“廉价”收买。照近来的趋势，这种收买田产的人们，主要地是村外的商人和村内的富农。他们买进田产往往先从借贷入手。贫困农民现时已无所谓“青黄不接”，他们终年处于饥饿的陷坑这种情形，第一迫令农民终年须赖举借抵押过活；第二令债主对于他们的条件，益发苛刻。年来农田抵押的价格也随着买卖价格底狂跌而激减，同时农民押出田产，因为无力回赎，无异永远变卖。因此商人地主富农等等都愿从事放款押进田产；换句话说，他们愿以较低廉的卖价还要便宜的价格，得取产权。例如在上海附近的宝山，县境北部各区近来田产底买卖，虽然并不增加田产底抵押却有增无已。

这里，我们应当指明一件严重的事实。一部份商人，地主



和富农，在这种田价狂跌声中固然还在扩展他们底田产，可是一般说来田产底移转除掉大都市附近以外，已比年前减少得多。农产价格底跌落对于收取田租（中国地主所收田租主要地还是实物租，钱租仅占极少部份）的地主和出卖农产的富农都属不利，同时田赋额数还在不断增加^①（虽然一部份地主，尤其在陕西，河南，浙江诸省，已令佃户直接负担田赋。）^②因此他们对于买进田产，往往极感踌躇。这里还得注意：“赤区”底存在，以及各省各县农民抗租抗捐行动底频发，对于田产底移转，已经给予严重的威胁。在此场合，那些身居乡村，和外界缺少联络的“土地主”们，因为外援不强，又没有什么坚固的政治地位，因此非但不敢买进田产，倒反尽力将自己所有的田地相机出卖。这种情形在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省最为显著。例如湖北黄安麻城一带近年出卖田产的成份，一年减少一年同时出卖的人们中间许多还是地主，而买进田亩的多数是富有的农民^③。就在江浙一带，田产移转底停滞已达可惊的程度；乡间以收取“中费”和“代笔费”（田产买卖时，照例须提田价底一部份作为媒介人底“中费”和写契约

①按江苏省各年税率地主田租收入减去田税支出，其每亩净收入如下：

年份	田租收入	田税支出	余数
1931	9.00元	1.30元	7.70元
1932	7.80	1.70	6.10
1933	7.40	2.70	4.70

（中行月刊，卷八，一二合期，一九三四，二月。）

全国田赋增加如下：地税占地价百分比：水田：1931—2.07%，1932—2.37%，1933—2.68%。旱地：1931—2.36%，1932—2.50%，1933—2.80（中央农业实验所报告第十期）。

②例如河南滑县，辉县，镇平等县，摊派杂捐兵差，也要?佃各半。（见中国《经济情报社周刊，中华日报》，7，11，1903。）

③根据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农村调查。



人底“代笔费”）为大家收入的乡长图正，现在也在大闹“不累气”。在这种场合，一方面发现旧地主底崩坏（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另一方面产生了新起的地主。这些新起的地主，不是有雄厚政治背景的军人和官吏，便是和都市资本发生密切关系的商人；此外，还有一些富农，他们稳居乡村，兼做小商人和小债主，他们底“吸盘”显然最为牢固。

这种田产移转底停滞非但没有停止了农民底破产，倒反扣住了农村大众底咽喉。贫农中农底田产，价格虽然尽量捺低，可是还是无人承买，结果，留在他们手里的田产，也只能当作一文不值。同时，因为出卖不得现金益发枯竭，因此生活更难维持。这种现象底意义，正和近年来农村高利借贷比较减少的事实，如同一辙。高利贷款底紧缩，一面关闭了农民“饮配”的大门一面令借贷的条件更加恶劣。在田产移转的场合，农民仅有的田产，卖不出去固然无法过活；就是卖得出去，也是够惨苦的。

（二）金融资本统治农村的加强

内地现金继续不断地集中于都市已够描画中国农村惨痛的现状，以及分外惨痛的前程。试举上海为例，至本年五月底止，中外银行所存现银底总额已达五九四，〇五六，〇〇〇元，比较上年年底又多出四千多万。最近银行为要避免投机事业底最终破灭，或避免行将来到的总的金融危机，很想向农村方面投资。金融资本底走入农村已有悠久的历史旧式的钱庄就是内地投资的主要机关。近来各家银行已有代替钱庄之势，而他们活动底范围就格外广泛，活动底方法和组织，也比较改进。近年各省农村合作社，农民贷款所，和农村仓库等等，都在都市的金融资本策动进行。这些改进农村金融的组织，就农村本身而言，具有代替旧式高利贷的机能。换句话说，现时的



金融资本（同时，外国的资本还通过了这种金融资本而起作用，正在凭赖新起的和改进的组织，对于整个农村，遂行其直接的统制。

一般说来，这种新兴的农村信用组织（农村合作社最大多数为信用合作社，）它们向借方所收的利息，要比普通的高利贷款低些。例如各地农民借贷所的利率大致是月息一分到一分五厘。但如加上所谓低押品的栈租等项计算，利率也就不止于此。这里我们要看到这种新起的借贷形式，对于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到底有何不同这里可以先引一段话，来说明这种不同的作用。“为了安全的保障，借贷所往往将一部份的资金，用批发的形式，先贷与区公所里的豪绅们，同时他们也愿自动地请求贷放。在这种相互协助之下，事实上往往要发生二房东的作用；他们或者将自己的利银负担转嫁到贫农大众身上。”①

合作社贷款所和仓库底项款，被地主商人富农用以发展其自身经济的情形，可说到处可见，举例言之，江苏无锡西仓镇附近一个村落，曾成立一个合作社。照农民银行规定，会员十一人都应当是农民，同时他们向农民银行借款，都应作为发展农业生产之用。不过他们借款之前，必须有人妥为担保。结果，社员十一人中，一个就是乡长本人（是一个地主），两个是商人，另外是农民。农民银行的款项虽以合作社的名义，由那位乡长出面领到，实际上也就由那位乡长和两个商人拿去，作为经商的本钱。②

普通的农民借贷所，对于贫苦的农民可说没有缘份。因为“没有相当财产作为保证，农民是无从告借的。这样，贫农一

① 骆，农民借贷所与银行业的典当化，中国经济情报社，周刊，中华日报，五，二十三，一九三四。

② 无锡显学文通讯。



尤其是流为半佃农或纯佃农的贫农以及一无所有的雇农，对于借贷所无异是一种绝缘体”。^①例如绥远平市官钱局附设的农民借贷所，规定农民借款，不但要具有动产抵押品，或其他确实保证者；同时还须由“该村村长，出具保证书，以保证该抵押品之毫无纠葛”。至于目下盛行的仓库，情形也是一样。例如无锡安镇在一九三三年举办农村仓库，地主某就利用它移挪大宗款项，来接济他底商业。^②

由上所述我们已经明显看出，现今金融资本在农村中间的活动，究竟在维持那些人们底地位。这种事业对于毫无田产的农民显然无份；它们只增强了地主富农和农村商人底活动能力。实际上主持这些信用组织的人们多数就是地主富绅，他们能利用组织来扩大他们底经济范围。宝山近城某村的合作社，就以农民无法赎回其抵押出去的田产，变成一个新的集团地主。不消说得，这种合作社的主持者，就是那些田产实际的业主。而此类业主又从属于都市的金融资本。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目下金融资本底伸足农村，是意味着金融资本底直接控制农村，以及在这种资本和农村半封建统治者间更密切的关系底建立。

（三）民族问题与土地问题

中国现存的土地关系间接地还是由列强底资本在维持，这已是周知的事实。这里所要特别指明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内直接掠夺土地的事实。现时整个的东北四省，乃至河北一部份的所谓“战区”，已尽入日人手中。这个区域正在急激遂行其殖民地经济的行程。日本在台湾和朝鲜经营“拓殖”的经

^① 略，农民借贷所与银行业的典当化。

^② 无锡范明初通讯。



验，已全般地移用到东北四省，日本的军阀在侵略满洲的时候，曾向农民呼吁，谓一旦满洲在握，大批农民可以移住满洲，如入天堂。所以日本底移民政策，现正积极进行。他们利用朝鲜人作为移民底前哨。因此朝鲜移民在满人数和他们经营的水田正在很快地增加。

	朝鲜移民户数	所种水田面积 (单位町每町约合十六亩)
1932	107,797	64,550
1934	132,526	70,362
指数(1932年为100)	123	109

他们也为朝鲜农民置田开垦。例如一九三二年三月，东亚劝业公司在乱石山西买地一，二〇〇亩地，令鲜农垦殖。

日本在满农业移民的计划异常“远大”。预定从一九三三年以后的十五年内，开发五，〇〇〇，〇〇〇町的土地。日本政府一九三三年农民移住的预算已达一，五〇〇，〇〇〇圆。他们第一步先获得了自由的土地商租权。例如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沈阳县公署根据“满洲国”训令，出示布告：“凡有耕地而无耕作能力之农民得随意将土地租与外国人耕种”。^①同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个问题就整个解决，规定日人得自由移植。日本到满洲的移民虽然因为当地农民坚决的反抗，进行并不顺利，但还在陆续举行。如一九三二年天照园到有自由移民五十名；当年七月日本移民五百名到佳木斯。一九三三年五月天照园又有移民三十余名。除了“自由的”农业移民以外，日方主要地从事于武装的“自卫”移民，如一九三二年六月东满洲植民协会主持移民六百九十余名，内有机枪班和汽车班。一九

^①见“满洲国”年鉴。



三三年七月又有武装移民三百多名。这里主要的要看日本政府怎样地为他们的移民觅得安身之所。一九三四年五月间“满国”政府将依兰附近七县划为日本自卫移民的屯垦区域，低价收买农民土地。辽东里吉下江各县农田有三百二十余亩已被强制收买，每亩只给价一元五角。早在一九三二年八月，敦化东南一带有森林处女地九万町，已被收买，作为日本在乡军人三千人屯垦之用。现在日本当局正在筹设“农地开拓公司”，由日满双方合办，资本三四千万圆；由日本出现金，满洲出土地！

在这种场合，大批东北的土地会很快的落入日人手里。因此，这里土地问题底解决就直接地和抗日的任务融合一起。东北农民暴动底风起云湧，一面固然在反抗日本底统治，同时也就在遂行其土地问题底解决。

和日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掠夺土地相类似的，有英人在西藏乃至云南一带占夺土地的情形。此外像法人在绥远陕北一带。收买(或以租进的形式收买)大批的土地。建立其对中国农民直接的统治关系，因而造成所谓秘密国的情形；^①以及法国军队最近在滇省东南建水一带的占夺土地等等，都有同样的意义。列强和中国整个的土地问题，自然有其最一般的间接的关联；而这些直接的关系无疑地使上述一般的关系更加尖锐，更加明显。

以上所述是就中国整个民族底解放和土地问题的关系而言。中国国内显然存在着各个少数民族。大的如蒙族，回族，小的如退居西南部的苗徭各族。多数蒙古王族是巨大的地主；辛亥以后这些王公就能自由出卖旗地，他们因为负债的关系，

^①例如绥远全省有天主教堂二六五处，教民八六，二二四名，这些教民几乎全是农民，每个天主堂常拥地千多亩，绥远全省有田五万多顷属于教会，他们名义上是向蒙古王租进，实际上等于他们所有(绥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



将土地移转到汉人手里。同时汉人地主往往强取豪夺，大批蒙地，已入他们手中。例如绥省“大地主拥有多段地亩，由来已久，包西各县及武固等处为垄断之区……后套则有地商之横行强占，向蒙旗利诱，霸占六段之地；武固等处遂有大地主之把持。且有空手得数百顷之地，而有巨富者”。这种情形常引起蒙民底反抗。“绥西达拉特之旗民，居住于临河县之祥太魁地方…。近自屯垦实施以来，祥太魁地方已垦未垦各地，多被屯军垦种，对蒙颇民事压迫。蒙民感于谋生乏术，致挺而走险。百年罕见之督贵潮突然爆发。”①

汉人在新疆各地对于回人的土地也有相同的情形。前新省主席金树仁被控没收哈密回王土地，分给其甘肃同乡的事件，便是显例；新省回人反汉运动底起因，固然由于汉官底剥夺备至，而回人感于土地底被汉人地强占，亦是主因之一。至于汉人驱逐苗瑶等弱小民族，令其“遁迹山林”，而自己占领其土地的事实，更是“数见不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少数民族底解放，和土地问题底解决实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整个民族目前正遭逢空前的危机。国民经济底恐慌在日趋深刻，列强底压迫正采取最露骨的最尖锐的形态，同时人民底不安也在一天一天加甚。中国现存的土地关系，却是此种危机底最主要的主观条件；同时这种危机又加深了中国土地问题底深刻。因此目下土地问题底解决已属于急不容缓；可是这种解决也只有配合着整个民族解放的工作，才能彻底完成。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一九三四、八、二〇）

①见陈海石，《中国垦殖问题》，中华月报，卷二，期四，一九三四。



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 研究的任务

——兼论王宜昌韩德章两先生农村
经济研究的“转向”——

(一)

我们开宗明义第一句应当是说，研究中国农业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

文化之与政治和经济一般地总是采取相应的步调。目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落后的因素“蠢蠢欲动”，以捞取它们理想之中的“复兴”。在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领域里面，最近也发现了这种“风烛残年”式的挣扎。这种挣扎虽然力量还不算很强，然而它所表示的倾向却够我们注意。因此我们在这里有正面提出我们的任务，和对于上述倾向加以批判的必要。

作者在本刊上期“《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文内，曾有这样一段话：“现阶段的农村研究，其总的任务乃在对于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上面去探讨，从而规定一种新的能使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同时作者在同文指明，“这种研究有别于前阶段的农



村经济研究者三：

第一，它的出发点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造，而后者乃从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出发。

第二，现阶段研究的对象是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前阶段则着重于生产力的技术的分析（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

第三，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是从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和矛盾的过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而前此的研究则把事物的片段孤立起来，仅仅从事于静止的观察”（本刊上期P. 97—98）。

所有这些作者在此都愿继续肯定。同时，作者在本刊上期曾更进一步指出了前后两个研究阶段的代表作品。这里我想补充说的，便是前北平社会调查所韩德章先生的《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济调查》，可以看作金陵大学卜凯教授所著的“《中国农场经济》”的“具体而微”的承绩。

现在且让我们简要地分析我们目前的任务。

我们敢这样断言：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段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二者必居其一，而我们是站在后者的一面。

重复说一遍：我们研究的对象不是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农村生产关系。我们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中的任务，是在从农村生产关系演变的过程中，全面地阐明其本质与归趋，从而“规定一种新的能使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



首先我们应当指明什么是中国农村生产关系改造中的核心问题。据我们的意见，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核心。何以故？因为，（一）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根据我们的估计，中国全部的耕地，大约有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手里；而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二）中国目下农村资金的累积与剥夺，主要以“土地所有”这一种财产关系为根据；换句话说，农村资金运用的可能和方向，一般地还是附隶于地权上面。同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是目前农村资金累积的主要杠杆，而这些活动，一般地也以地权为基础。谁不承认地主和富农是目前中国农村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主要活动者呢？（三）农村劳动力的荒废起因于农民的失地，而完成于大土地所有者的不致力于大规模的经营，（工业不发达的条件除外）；因此使这一种最主要的“生产力”——即劳动力走上颓废毁灭的途径。

很显然的，在上述意义之中的土地问题主要的是指土地的分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要阐明下列几点：

（一）**中国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和性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地权分配的性质，而且可以指明中国的土地所有在怎样适应农村资本主义的成长与停滞，而采取其各别的形态。即这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了解，虽然它对于这种了解并不是最基本的条件。在这里我们不想详细地指出那些以土地所有的性质来决定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人们所犯的错误的。我们只须知道，近代的土地所有不一定包孕着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而封建和半封建的地权形态却能充当资本主义的奴才。这里我们可以看



出，有些人以为中国大部份的土地既然可以自由买卖，那末中国农村自然已经资本主义化的主张，不是意存“曲解”，便是要想“贪懒”。

(二) 中国现存地权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分配。这点就是土地分配问题的本身；而且也是我们研究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着眼之点（自然，我们必须补充，假如我们只注意于这一点，那末非但完全不够，而且会发生错误的结论）。这里，我们应当首先研究各个农村阶层的涵意和如何划分的问题。几年以来国内学者在划分农村阶层的时候有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的；有分为大农场，中农场，小农场的；有分为大农，中农，小农的；有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最近还有人提出分为农村生产者与非生产者（农民与地主），和企业家与雇用劳动者的办法（王宜昌先生，见本期附录）等等。至于我们，至今还是赞同将农村社会的组成分子，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办法。因为至今为止，只有这种办法才能全面地显出社会全体的机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把握今日农村中生产关系的核心（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同时将各种主导的和副次的因子，有机地连系起来；而且也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正确地估定各个农村阶层的地位，性质以及他们对于农业彻底改造运动所保持的态度，及其所能尽的任务（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参看本刊第一，第三期读者问答，及本期附录《答覆王宜昌先生》）。

我们对于农村阶层既然知道如何划分，接着便要观察土地在各个阶层中间的分配。这里，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土地的面积，而且要规定各种土地的质量。山地和川地，水田和旱地，土质既然不同，肥瘠也就大有差异。因此它们所能生长的作物也就不同，而且就是同一作物，产量也有很大的差异。这里我



们须要对于中国耕地的土质，详作技术的检讨；然后（一）可以决定各种肥瘠不同的土地，到底怎样分配在各个阶层里面（例如陈翰笙先生在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内指明地主所有的田地质量较优，而贫农所有的质量最劣）；（二）可以帮助说明中国水田区域（长江及珠江流域）和旱田区域（北方各省）土地所有的面积乃至农业经营的面积，因为土地生产力强弱不同，因而有显著的差别（例如淮河以北每户农户所耕种的面积，一般地较大于长江及珠江流域）；因此我们这说明农业资本主义在中国各个区域发展程度的时候，不致会犯只把各区农田面积作机械比较的错误。

这里我们必须郑重地指明，我们对于各区土地的土质详作技术分析的要求，和把这种技术工作当作基本的，“自我满足的”任务的主张，丝毫没有相同之点。我们之要进行这种技术工作，为的是要更进一步阐明土地分配的社会意义；在农村经济的研究领域之中谁要把这种技术的分析作为最后的任务，谁就是阻碍了这种研究工作的的发展。

（三）土地的分配固然是土地问题的基本着眼之点，可是决不是土地问题的全部。余霖先生曾在本刊上期指明，“研究土地问题，主要的任务是在阐明在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P. 2）。同时作者本人更具体地指出，“单是土地分配的研究决不足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之全部；我们一定要加上农业经营方式的研究，然后可以全面地确定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本质”。“因为土地的分配只能说明那种最重要的生产手段的所有关系；而农业经营的分析却能更进一步地阐明就在此种生产手段的分配状态之下，农业生产在怎样地发展”（本刊上期P. 100—101）。

关于农业经营的研究我们一定要注意下述几个方面：



(A)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市场的机构这种研究的任务主要的在看：(1)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使自足自给的农民经济转变成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经济；这里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自然是应当注意之点。(2)观察中国农村市场的机构主要地受农业生产者统治呢，还是由那些完全和生产脱离的商人们所支配。这里，我们对于目前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活动自然要当作主要的课题。

(B) 农业经营面积的消长和农业成本的构成作者在评《卜凯教授著中国农场经济》一文中指明“农场面积的大小是农业经营广度的指标，而农业成本的构成是农业经营深度的规准”。关于农场面积大小的研究，主要的要阐明目前中国各区农场的面积对于近代生产的发展是否有顽强阻碍的作用，同时最重要的，要指明目下农业经营的面积是否跟着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作相应的消长。

至于农业成本的分析，第一要看农业成本集约的程度。

“在一般场合，农业愈是发展，经营的方式愈是进步，那末每个农场所投下的农本也就愈多”（拙著《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第二，我们要研究农业成本有机构成（即人类劳动与劳动以外的成本之间的比例）的变化。一般说来，农业经营愈是进步，劳动以外的成本，特别是改良农具，改良肥料，甚至机器等等所占的成份，必定相对地提高。

(C) 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农业最主要的指标，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农场经济的方式和发展的阶段，必须注意中国农村中雇佣劳动的成份。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在农业部门愈是发展，那末雇佣劳动的成份也就愈大。我们在从事这种分析的时候，一面固然要观察农业经营本身之中，家工与雇工的对比，同时还需要观察那种雇农——农村无产者在整个农村中所占的



成份。前者的目的在看资本主义经营发展的程度，后者除掉上述一点之外还能测量农村阶层分化的深度。

这里我们须要特别指明农业劳动的形态与性质的问题。一般研究者常把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男工女工和童工，等等，以为已尽农业劳动之质的分析的任务（如陈正谟先生，见陈著《各省农工雇用习惯的调查报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冬季号）；更有人以为我们“应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而且“我们要研究雇农底质与量，应注意其在农业劳动上与家族劳动的对比，而不应注意其在农村人口数量上与全村人口的对比”（王宜昌先生，《见本期附录》）。我们以为，第一种办法根本没有顾到农村雇佣劳动的质量问题，而第二种办法也没有搔着问题的痒处。我们知道，规定农业劳动质量的要素，固然不是什么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和劳动时期的长短；同时也决不是“农业生产劳动”本身。它的决定要素乃在农业劳动者之有没有生产工具，乃至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两个农业劳动者尽管同样是壮年的男子长工，他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劳动”尽管相同，然而假使一个是自带农具同时由雇主用“农田使用”的形式来支付工资的“雇工”，而另外一个是全不带农具，由雇主按年给货币工资的雇工，那末他们之间显然有“质量上”的差别。我们在观察农业经营的发展，统计雇佣劳动成份的时候，假如忽视了这种质量上的差异，结果会得出万分错误的结论（例如广西思恩一带是全省最落后的区域，而“雇农”成分特多，假如我们不弄清楚那里的雇农是具有“家属奴隶”的特性，那末我们要说，那里资本主义的农业在广西全省要算最为发展的了）。因此，我们上节的话应当如此补充：我们观察农业经营的发展，不但要注意雇用劳动的成份，而且要鉴别农业劳动的性质。不过此“质”



并非那“质”，我们所指农业劳动的“质量”是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对于他人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的，决不是由农业劳动的自然和技术的因素来决定的。

我们对于中国一般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市场的结构，农场面积的消长，农业成本的构成，以及农业雇佣劳动的质和量加以分析之后，对于以现有的土地分配为基础的中国整个农业经济的动向，一定会有个一般的了解。换句话说，我们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在向资本主义之途迈进呢，还是逗留于“饥饿”的零细经营上面的问题，必能有个一般的解答。然而，这样我们能说，我们研究土地问题的任务，已经完全尽却了吗？显然不能。何以故？因为我们对于使那种农业经营趋向发展或衰亡之途的内在的主导的原因，还没有加以研究。因此，

（四）我们对于租佃关系的问题，是必须加以透彻的研究。一般说来，在地主所有的土地占到全国总面积极大成份（在中国竟达半数）的国家，租佃关系即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应当看作农村生产关系的核心部份，特别是在农业资本主义还并没有十分发展的中国现阶段上。在这里我们所应注意的中心问题当然是全国千百万的佃户，怎样在各种交付的形式之中（钱租，谷租，力租），在长短不同的时期之内，以及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势力之下，受极少数土地所有者的宰割。这样宰割的结果，在佃农方面是生活条件的更趋恶劣，农业资金的格外枯竭，或变为城市和乡村中间的无产者和苦力，或是滞留在半封建剥削的泥淖之中。在巨大的土地所有者呢，他们完成了或多或少的资本的累积，或则扩大其生产的规模，或则继续置田买产，苛收田租，同时经营着商业高利贷活动。农村资金的累积既是以“土地所有”为主要的杠杆，而租佃关系乃是这种杠杆作用所赖以完成的框子；所以租佃关系的研究是土地问



题的重要部份。

關於土地问题的研究除了上述四项之外，再应指明下述两点：

第一，中国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可称息息相关。一般说来，中国现存的土地关系还是由列强的资本直接间接地维持着。我们舍广泛的间接的关系不说，单说列强如何直接地占夺中国的土地，那末日本人是在满蒙，法国人之在陕北绥远和云南等等都极明显。这些都能更加明显地表示，中国的民族解放问题和土地问题是有密切的关系。其次，中国少数民族如蒙，回，苗，徭等民族的土地时常被汉族巧取豪夺，这种情形常是历次各民族“叛乱”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的土地问题除一般对于帝国主义的统治有关以外，还跟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息息相关。

第二，目前横行全国的农业恐慌，也应当作为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中国农业恐慌的形成主要地因为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被引入世界市场，而成列强资本的俎上之肉。因此我们所要注意的第一点，便是目前呻吟于经济恐慌之中的资本主义列强，如何在凭赖其雄厚的资本，以倾销过剩农产的形式，以侵夺中国输出原料的国外市场的形式，使中国的农业恐慌越发深刻，同时使中国的土地问题格外严重。第二，我们要注意到目下农业恐慌越趋尖锐期内新近加入的因素，那就是中国金融资本，以救济农村的名义，深入了农村。我们知道，中国的银行资本无非是外国金融资本的附庸（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一九三五年），它所尽的任务多半是买办的作用。这里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这种附庸性质的中国银行资本，在怎样利用新的形式，驱逐农村之中旧有的高利贷商业资本，而直接地在农民的血汗上，建造其堂皇 丽的金字塔。中国的金融资本确乎逐渐在



用了这种形式，增强其对农村直接的统治；而各地原有的豪绅地主也就在这种过程之中，跟“近代的”金融资本，结托得更加密切，完成了两者之间的“农村合作”。同时旧有的土地关系也在这种过程之中，更加巩固，或者逐渐地隶属于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在形式上走向和日本相仿的途径。

(二)

最近王宜昌先生在《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周刊》上（四十八期，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篇“《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提出三点重要的意见：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

（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

（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第三方向转换，是在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用的情形和其利润分割的情形。这里，不仅重注意到农业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

当我拜读王先生大作的时候，就向朋友说起，不管王先生本人的意向如何，他这篇文章很够做成一般落后分子重起挣扎的幌子，因为它能相当地用前进的言辞，来掩盖其后退的内容。后来，薛暮桥先生便把他个人对于王先生那篇文章的意见，逐条批判，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

王先生的大作发表之后，《益世报农村周刊》四十九期接着登载了韩德章先生一篇“《研究农业经济所遇到的技术问题》”。



题》”。据周刊编者的声明，该文“是响应上期本刊王宜昌先生的《农村经济研究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而作的”，而且“韩君的论点在好多方面都比王君更深一层去讨论了”。韩先生在那篇文章中间开首就说，“在本刊上期里，有《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深深的给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一个棒喝。在那里原著者很明确的指出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应当从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转换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于是他开始讨论他那“土壤，农作物，家畜，农具，肥料，度量衡”的全套。

这里的韩德章先生便是作者在上节推为前一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后起的代表的韩先生。韩先生看到了王宜昌先生的大著自然会恨相见过晚，拍掌大呼它能“深深的给传统的中国的农业经济研究一个棒喝”，而且更会将王先生所谓“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语，一口气改成“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应当从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转换到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不问王先生本人的意向如何，王先生的文章已经做了人家的幌子，已很显然的了。

所可惜的，韩先生的文章虽然在主观上是响应了王先生的大作，而且“在好多方面都比王君更深一层去讨论了”，然而王先生本人对于自己的大作却有其真能代表真面目的“续响”。那就是王宜昌先生在《中国经济》月刊（本年二月号）发表的那篇“《从农业来看中国农村经济》”。王先生在这里确能毫无保留，毫不晦涩（王先生在《益世报》上所发表的那篇文章，有几处是令人看不懂的）地，把要说的话都说了。王先生全文分六节。他在第一节“技术”和第二节“农业经营”里面，用农业机械，改良肥料以及农业经营形态（据他分法有赋役制，雇役制，资本制）“推知中国有资本制农业经营存在的”。他在



第三节“农业商业化”里，指明农产的商品化与专门化，以及“农民网入于市场”。第四节“农业副业”中间，说明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各种副业的独立化与专门化；并且指明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创始”。第五节是“商业金融与农业”，王先生在这里指出农村中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货币制度，以及苛捐杂税对于中国农民的影响，而使农业资本减少。王先生再在第六节“市场上的中国农业”里面，说明“中国农业依赖于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上的农业又依赖于中国市场”。因此在市场上开始了资本制农业商品的竞争，而导来了中国农业的恐慌。我们在此，不能不说，无论王宜昌先生的论点与所得的结论对与不对，他对于中国农业经济处理的方法，是和韩德章先生是迥不相同的。

王先生和韩先生的论点既然迥不相同，为什么韩先生又能这样和王先生“桴鼓相应”呢？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王先生在方法论上犯有跟韩先生同样的错误。

王先生和韩先生是方法论上的基本错误在那里？

第一，两位先生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都从人对自然的技术关系出发。韩先生的“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应当从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转换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韩先生“平日想到的”土壤，作物，家畜，农具，肥料，度量衡等等问题，我们固然不必说它；就是王宜昌先生本人在本质上也正坚持着这种主张。他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第一个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他又说我们要“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他又说“笔者曾企图从旧有中国农村经济统计中，就生产的范围来分析农业经营底大小，生产



的规模，并由此以研究资本主义地租”；同时他在《中国经济》月刊发表的论文，第一先从技术出发讨论，而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名“从农业来看中国农村经济”。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及早指明：农业经济的研究决不是农业科学（如土壤学，肥科学，病虫害学等）的延长，而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农业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是有关于农业生产自然因素的配合与组成，而农业经济所要研究的却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之上的农业的生产关系。不论王先生的本意如何，我们以为他所提出的办法，终究会将一切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還元到人对自然的技术关系，因此会将农村生产关系这一种历史的范畴，把它从具体的社会环境脱离出来，变成空洞而永久的范畴。这样，这种办法才会适合于一般“以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为出发点”的研究家们的口胃，也只有这样，王先生自己在客观上才充当了近世已经没落了的正统派经济学的尾巴。

自然，我们在研究农村生产关系的时候，并不会排斥对于“技术”的研究；相反的，我们对于技术也是十分重视。所不同的，我们对于农业技术的研究，第一并不是将那种研究看作最后的目的，而是作为阐明社会关系的必要步骤；第二，我们所要研究的技术，乃是在某种社会经济关系之中活动着的人对自然抗争的形式，而不是孤立的关于自然因素的分析。

由于这种基本的差别，我们和王先生之间对于所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联的了解以及对于它们的处理方法，也就很不相同。据王先生的意见，“旧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只注意到生产关系的一面，而未注意到生产力的一面”。实际说来，中国前阶段的农村经济研究，其主要的工作却在生产力的技术的分析（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而现阶段的特点



乃在廓清这种流弊，注重于农业生产关系的分析，同时对于在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之下的生产力发展形态的研究，也并不放弃。这种实例在陈翰笙先生的近著“《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以及拙著《评陈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文中已可看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指出，现阶段中对于生产力的研究，决不是对于几种构成产生力的自然因素，加以孤立的纯技术的分析；而是在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之中来分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态。

我们不能否认，目下对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形态，即农业经营形态的研究，还是完全不够；同时，我们又不能否认，对于生产力的研究只有在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之下，才有阐明的希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矛盾之中的全貌。

第二，王韩两位先生都有以私经济的研究为主要工作的倾向。王先生在指明所谓第三个方向转换的时候，以为我们要“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用的情形，和其利润分割的情形”。同时说明“Chinese Farm Economy的著者Buck（卜凯教授）曾于我们所指出的方向转换，特别是第三方向转换之一部份加以注意”。我们在这里并不想指明王先生在研究态度上跟卜凯教授有什么血统关系；我们只想说明卜凯教授的研究，可以说完全从私经济的分析出发。卜凯教授所重视的是何种个别的经济形式最为有利（Most Profitable）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所注意的是农业生产者在何种技术的条件下，对于自然能作最有效的利用。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那些私经济的活动内容的基础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人对自然的技术关系。因此，旧有农业经济研究的任务，就在详细分析农场收支以及资本运用的情形，求得何种农业企业



最为有利。

我们在上节已经指出，韩德章先生的作品可说是卜凯教授典型的继续；而王宜昌先生过分重视农业经营的收支，资金的运用，以及农业生产劳动等等技术的分析，结果也会陷入私经济研究的泥淖。

自然，我们并不主张对于私经济的活动内容可以置诸不管。我们对于这种个别的经济现象，是要把它们当作实际的具体的材料，从而在它们身上抽出一般的形态和性质。换句话说，我们不以这种个别经济内容的分析为满足，而要更进一步观察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经济的意义。王宜昌先生鉴于目下关于农业经营的正确分析的完全不够，而要求特别用力，可说十分正确；可是他说卜凯教授已经满足了他所要求的一部份，那却错了。何以故？因为前一句话，是要求我们循着现阶段的既定方针继续发展，而后一句话非但要人家“转换方向”，而且要人家大开倒车；换言之，他要拉人倒退到中国农村研究的“卜凯阶段”。

王宜昌先生和韩德章先生的论点既有上述两种基本的缺陷，因此他们对于农业技术的观察，对于农村阶层的划分，对于资金运用以及收入分配的研究等等，都显得杂然并陈，茫无中心。这在王宜昌先生那篇“《从农业来看中国农村经济》”里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关于这些薛暮桥先生对于王宜昌先生大作的批评，已经说得相当详细，本篇也就不再论列。

总括说来，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我们对于人与自然的技术关系，社会的生产力，以及私经济的活动的分析，固不应放弃；但是，所有这些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之中都是处于从属的，辅助的，初级的地位；我们对于它们的分析，无非是要加深我们对于人与人间社会关系的了解。现对于农村



生产关系的全部，特别是农业经营发展的形态，了解得十分有限，我们须要遵循现阶段原有的方针，继续努力。我们认为王宜昌先生的“方向转换”至少是在方法论上是个很大的错误，而韩德章先生的开倒车运动，其意义且在方法论的错误之上。因此我们目前所要求的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决不需要方向的转换，更不许大开倒车。

（1935年2月18日）



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讨论

一 一个‘老’的问题的诠释

【问】 最近市面上又掀起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论战。这个论战的中心问题似乎不很确定，你的意见怎样？

【答】 是的，这次论战开始的时候，论争的所在是农村经济研究的对象的问题。甲方的意见以为研究农村经济主要的对象是农村生产关系，而乙方的意见以为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并重。在论争的过程之中，甲方固然早经表示农业生产力当然不是绝对不要研究，不过他们所研究的却是在某种生产关系制约之下的生产力；同时乙方所指的生产力往往是意义最广泛的生产力（有时连甲方认为是生产关系的，也给乙方包括在生产力里面）；所以一到论战的第二个阶段，论争的中心很显著地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问题转到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问题。这里，我们不能说关于农村经济研究对象的问题，已给论争本身解决；事实恰恰相反，甲乙两方关于研究对象的差异，却已归结到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不同了解之上。



【问】 照你说来，目前甲乙两方争论的焦点就在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问题上面。那末，他们具体的主张到底怎样呢？

【答】 这个问题本来也只算“旧事重提”，几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至少也曾是当时论战的中心论点之一。一九三三年，《新中华》半月刊又发动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如今这个问题却又在以新的力量显现在我们眼前了。甲方的意见以为中国的农村还逗留在半封建的阶段，因此今日中国农村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一个剷除封建秩序的土地问题。乙方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中间已经占到优势，因此今日中国的农村问题已经是一个资本问题。这便是双方主张的主要之点。

【问】 我明白了，甲乙两方意见的差异主要的是在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的不同：甲方以为中国的农村社会还在半封建的阶段，而乙方以为它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阶段。但，什么叫做半封建的阶段？

【答】 你第一段的归纳可说完全正确，因为他们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阶段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他们对于农村社会的性质也有不同的了解。至于半封建的意义，一定地是指那种封建经济已在崩坏，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可是它还没有占到优势的过渡阶段说的。

【问】 甲方的意见认为中国农村有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同时存在；乙方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优势，当然同时也承认中国农村中有封建残余存在。那末，问题的关键似乎在“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中是不是占到优势”的问题了。你看对不对？

【答】 是的！上述复杂的问题固然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单纯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本身却并不“单纯”，因为单就



研究范围而论，它正包含着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大问题呢。

【问】 是的，我也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甚至觉得非常模糊。你说，“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占到优势”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答】 你这个问题确乎异常重要，许多“有谓”“无谓”的纠纷，就因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共同的了解所以闹得不可开交。当然，我不是说一切论争都是起因于此；反之，我们要考虑到：一般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因为他们在主观上有种种不同的要求，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和看法，就可以绝然不同。

【问】 你说，目前对于这个问题有那几种不同的解释呢？

【答】 第一种相当流行的见解以为：商品经济的占到优势，就表示资本主义的占到优势。坚持这种主张的人以为中国的农民生活大部分已经依赖于市场，商品经济已经统治农村，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农村已经占到优势。

【问】 这个看来好像很有道理，资本主义的发展确乎会扩大商品的交换；商品交换既很普遍，似乎可以说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呀。

【答】 你的话一部份是对的，可是主要地却是错的。你对的部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扩大商品的交换。坚持上述主张的人的主要错误就在于认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谁都知道，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单纯商品经济；直到劳动力也变成商品的时候，商品经济才完成其更发展更成熟的形态，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样说来，看见商品经济就以为看见资本主义经济，那就像看见动物就以为看见了人一样的糊涂。我们没有否认，在自有生产手段的小商品生产者统



治的——即单纯商品经济时代，已经孕育着一切走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可是这种可能的实现却要由某个社会的历史的条件及其周围的环境来决定。大家晓得，古罗马曾经有过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可是那时所有的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奴隶经济。在十八世纪的俄罗斯，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展，可是那时所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古典的”农奴经济。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最完全的表现，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单是商品经济的存在，却不够决定资本主义之已经发展。

【问】 我明白了，中国农村虽然自足自给的经济已给外力摧毁，商品交换的关系已经相当发展，可是这种商品经济还滞留的单纯商品经济的阶段；并没有更进一步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可是，这是单就正常的情形来说的。我觉得中国的情形有些特殊。比方说吧，中国的商品经济主要地是由外货的销售来促成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就表示着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大，你能否认中国的农村并没有受列强资本的控制么？假如你承认这点，那末主要由列强来促成的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不是表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么？

【答】 你这段话恰巧牵连到目前流行的关于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第二种见解，所以你提出的问题可以在讨论这种见解的时候，顺便地解决。

【问】 第二种意见怎么说法？

【答】 主张这种见解的人说：目前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国只是这种资本主义世界之中的一环，而且是受人支配的一环，那末中国的农村经济还能不是资本主义的么？这就是他们主要的命题。

【问】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中国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中



的一员，它能逃出资本主义的范围么？

【答】 尽管你这样说，然而事实还会告诉你：这是一种机械的见解，因此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我们分开两部份来讲。第一，今日的世界，除掉苏联以外，谁都不能否认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在这里资本主义的秩序是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各个资本主义列强都把落后的国家和半殖民地 殖民地 国家，紧紧地抓在手里，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巩固并且扩张其资本主义的体系。全世界六分之五的领土都在少数金融资本家的掌握之中。中国当然不是一个例外，相反的，中国恰是各个列强都想加紧宰割的肥肉。

【问】 我们绝对不能否认这件实事，中国已经完全受资本主义列强的支配了。

【答】 是的，我们绝对不能否认这件事。然而不否认这件事，跟只承认这件事是相去几万里的。只有形式逻辑，只有机械论者，才教我们“即此留步”。真正想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人，一定会更进一步去探索的。所以，第二我们要讲一般中的特殊。中国是隶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这是无疑的，然而中国正跟其它各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组成国家一样，是有它的特殊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帝国主义时代的腐化性，特别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宗主国家与殖民地之间日益深刻的矛盾，决定了中国（跟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样）经济发展的落后性。所以，尽管中国挽近整个的经济行程，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大再生产，尽了“施肥”的作用；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是世界资本主义中不可缺的一环，中国国民的经济生活跟世界经济已经息息相关；然而事实的另一方面却还“客观地”存在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还是极不充分；中国大部份的人民正在受着资本主



义已经发展，同时资本主义又不充分发展的苦痛。更简单地说，中国是不是已受世界金融资本的支配是一个问题，而中国的生产方式是不是已经资本主义化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实在是事实的两面；只抓住两面中之一面，或把两面混淆起来，非但无裨于问题之解决，间接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起来。

【问】你说“中国已受世界金融资本的支配”，可是这并不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中国占到优势”。这种分别我还不十分清楚，请你更详细地说一说吧。

【答】资本之征服某一国家的国民经济，本来有两条不同的途径。一条是自由的通畅的康庄大道，一条是迂回的惨痛的羊肠小径。前者是创造出多数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和少数拥有生产手段的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后者则资本利用古旧的（即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的，甚至封建地租的）剥削形式，直接地支配其整个的经济生活。英国的资本在殖民地的美国建立起跟母体完全一样的资本主义的秩序，这是前者的例子；与此相类的有加拿大，澳洲等处的开发，在那里，封建的残余已给资本的铁 打得粉碎；在那里，广大的群众主要地只在资本的鞭策之下生活。至于走第二条路的，我们可以英国资本对于印度的统治为例，在那里英国的独占资本虽已掌握了整个的经济命脉，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虽然也有相当的发展，可是所有这些并没有妨碍英国采用纳贡等等办法，维持当地封建的跟半封建的秩序，而令印度的大众喘息在高额地租跟“高利贷主”的践踏之下。在那里，资本之于国民经济的支配，无疑地已经确立的了；可是当地的生产方式却还没有充分地资本主义化；因此那里的大众一方面既受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同时又受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的痛苦。与印度相类的，有



不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像朝鲜，台湾，波斯，阿富汗，和西阿非利加（在那里英国资本的统治是利用“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的方法，由当地的氏族领袖，封建地主——在北日及利亚称为Emir——来实现的）等等；中国也就是其中的一个。

【问】 资本的支配与生产的资本主义化，这两者的区别，我已经明瞭了。在你刚才所说的两条路径之中，在任何场合资本取得支配的地位是共同的现象。我们站在大众生活改善的立场来说，我们在无论何种场合都要排斥资本的统治；换句话说，只要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我们对于上述两种场合，又何必加以区别呢？

【答】 这正是问题的重心所在。我们正是为谋问题之可能解决，才认为这两种场合，有分开的必要。那些赞成国际资本支配中国，就是资本主义方式已在中国占优势的人们，根本上没有注意到问题解决的可能；换句话说，他们除刚才所说的，只注意到“一般”而没有注意到“一般中之特殊”以外，他们又只注意到“客观”的和“外在”的力量，而不注意到“主观”的和“内在”的矛盾。这在哲学上便是机械论的特色，这种特色除掉阻滞社会的发展之外，是毫无足称的。

【问】 我要求你说得更具体些。

【答】 关于这，详细的情形且待下面再讲，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提一提。中国国民经济作为世界资本主义附属的一环，这件事要求着中国民族的进行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的斗争，以求自身自由独立的发展。可是假使我们的观察只止于此，而不去研究中国的国民经济本身是否已经资本主义化的问题，那末，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对于中国国内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和相互的关连；以及对于国内统治势力和外



国资本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无从识别；结果，对于国际资本怎样支配中国的问题，就无从了解；因此对于如何具体地执行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的任务的问题也就无从解决。我们知道，帝国主义之统治中国虽然是“外铄”的力量，可是列强资本为要实施其支配起见，一定要利用中国社会内在的矛盾。金融资本所要征服的对象决不是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因为后者本身所能给它的只有媚笑，没有别的；所以它对象只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血汗。帝国主义要完成这种任务，必须利用中国的上层分子，令其恪尽买办的任务，然后大众的血肉才能变成银块和金条，落到他们手里。在这里，我们自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金融资本到底和国内那些阶层勾结着呢？或是，它要造成或维持着那些阶层的优势，才能满足它自己的慾望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便要求着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因而也是国内阶级的构成）问题的研究。这里，我们单就农村关系说罢。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找出帝国主义之侵入中国农村、到底是以什么为附着点。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研究外资支配农村的结果，农村生产方式的本身有没有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到怎样的程度；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决定中国农村中间，到底那种性质的阶层是给帝国主义者直接间接地维持了，同时也就直接间接地加强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那些阶层才是这种狼狽式的统治之牺牲品，同时也就是要求摧毁这种统治的主力军。找出国内基本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与国际资本主义统治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主要的任务；只了解世界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一般的支配，而不更进一步地研究这种支配究竟如何完成，究竟发生何种结果，那一定找不出否定这种支配的真正动力。事物的运动是事物内部矛盾之展开。只知道外在的客观的关系，而忽视了内在的主观的矛盾，结果，就会得出



这样的结论（事实上也真有一部份人这样说着）：中国的问题只能等待着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已告解决之后，才能解决。那也无怪他们朝着德国问题的解答，暮等着法国情势之展开了。

【问】 刚才你说过了两种见解：一种以为商品经济的优势就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另外一种以为，中国身受国际资本的支配，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在中国已经占了优势。这两种见解的错误，我都了解了。那末，“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中已否占到优势的问题”究竟应当作何解释呢？

【答】 我个人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应当以中国农村生产方式的本身为关键。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中已否占到优势的问题在这里应当看做：在中国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否已占优势的问题。资本主义之征服农村固然可以有不同的途径，而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却只有一种基本的形态，即一面是农业企业家，而另一面是工资劳动者的近代农业生产。所以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占优势，就是说这种近代的农业生产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已经占到优势。

【问】 那么什么叫做占优势呢？

【答】 我们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占优势”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的经营（不论是地主的或是农民的），它们所有的生产手段和所生产的生产物，在农业生产手段和生产物总量中已经占到多数的意思。这是仅就数量而言。同时，我们还要观察，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在农业生产的整个进程中间是不是扩大地被再生产起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就是这样着手。

（第一节完）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 农业改造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中国，正跟今日一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样，农业生产还构成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换句话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一世纪以来列强资本的侵入，以及二十多年来国内民族工业相当的发展，都没有变更这个事实。这是因为第一，列强资本之在中国，其唯一的任务是在奴役中国的大众，取得最大的利润；而绝不在使中国的人民也沾到所谓“近代资本主义产业”的恩泽。第二，列强资本与中国民族资本的矛盾，以及列强资本在此矛盾之中，占到绝对的优势，使国内的民族工业非但不能长足发展，甚至还备受摧毁。

复次，中国的农业生产的的确在日趋枯萎，譬如：中国农产品的输出在一天一天减少，而国外农产品的输入反在相对地增多。同时因为农业生产的破落，大批的农民都在离开本乡，走向都市或是脱离生产，流为土匪流氓。但是，这样我们就能说农业生产已经不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吗？不，决不能的，因为



这种事实只够表现：中国的农业生产正跟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衰落而在很快地崩坏，绝不是因为工业发达，农业循着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作相对的萎缩，我们可以说，农业生产在相对的比例上，还是那样的“滞重”。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在今日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其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劳动大众中，勤劳的农民占了绝大的多数。国内挽近工商业都市的发展，以及近代劳动者的产生，并没有表示新式的产业部门，可能容许农村大批预备军的参加；而到最近，都市的大门对于农村的过剩劳动：已经重重紧闭。结果，亿万贫苦的农民只能逗留在残破的乡村里面，过着非人的生活。

这里我们应当归结到这一点：在中国劳苦大众的切身问题之中，农民问题应当占到最重要的地位；同时在中国劳苦大众解决其切身问题的过程之中，农民大众应当是一支巨大的主力军。

假如关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即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那末我们应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农业改造问题或农民问题，在整个民族的国民经济的改造运动之中，应当占首要的地位；同时这个农业改造或农民问题的任务与性质，在规定中国整个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的时候，是有决定的作用的。

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

目前一般论者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主要地有两种不同的了解，因此他们对于农业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也有两



种不同的认识。

一方面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中已经占到统治的地位，因此中国农业改造或农民运动的任务是在反对资本的统治；它的性质也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另外有一种见解表面上和上述的意见虽然不同，可是它们的结论可说是“殊途同归”。这种意见的主要论点是：中国整个处于帝国主义资本的支配之下，所以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农村问题“只是资本支配下之部份或连带的问题”，它的解决只有等着民族的解放而顺便地解决。谁来解决民族问题？——只有无产阶级。

跟上述两种见解相对立的，另外一方面的意见以为：中国农村还具有半封建的性质，因此中国农业改造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主要地是在铲除封建的秩序；同时因为这种封建残余是被帝国主义所维持，所以反对封建主义跟反对帝国主义变成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任务。这样，就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观点而言，目前中国改造运动的性质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虽然领导这种改造运动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自身。

我们对于农村社会性质的讨论既然具有这样严重的政治意义，那末，谁要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只看做理论上的游戏，谁便直接间接地妨碍了中国改造运动的前进。

二 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指标

在目前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间，首先提出一个“不同社会经济的结构应当由什么来决定”的问题。那就是说，一方面的意见以为社会性质应当由生产力来决定，另一方面以为应当由生产关系来决定。



主张第一种意见的主要理由是：“无论是生产诸关系，或经济结构，虽然可以做上层建筑的基础，但它本身还是一个被决定的东西；要明白这种被决定的情形，非透过生产力来说明不可”。而且“没有了它（指生产力），经济结构的变动就无法说明”（张志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

主张第二种意见的人以为：一切社会形式虽以一定的技术水准为其基础，但是“规定社会性质的直接指标不是技术或生产工具，而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

本文作者同意于第二种意见，而反对第一种主张。

固然，谁都不能否认“生产者相互间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生产者交换他们的行为，以及参加生产的条件，每由生产手段的不同，而有差别”（《工钱劳动与资本》）。而且“人们一经获得了新的生产力，就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一经改变了生产方式，改变他们维持生活的样式，他们也就改变了他们全部的社会关系”（《哲学之贫困》）。

同时，又谁都不能否认：尽管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的关系之中，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是起有一种反作用的，可是生产力之推动生产关系乃是基本的，主导的；这样才能完成“我们的公式是一元论的公式，而这一元论的公式中又含有唯物论的种子”（《蒲列哈诺夫》）。

然而目前所要讨论的，不是那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不是讨论：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是否由生产力来决定呢？假如讨论这个问题，那末答案无疑的是：“是，而且是绝对的是”。

目前我们的问题是在怎样来决定一个特定的（Certain）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决不能以知道了“用手推的磨子，产生了封建领主的社会；用蒸汽机的磨子，



产生了产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就算完事；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确认所谓“封建领主的社会”和“产业资本的社会”其各个社会经济的结构究竟有什么特征；然后看那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究竟具备何种特征，由此而决定那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

总括说一句：某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应当从这种结构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来辨识，而不是由别的东西来规定。在这里应当容许我们打个譬喻：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关系”和“政治社会制度”决定的；然而当我们要辨明那种思潮是唯心的或唯物的，那种方法是形式逻辑或是辩证法的时候，我们一定从分析那种思潮或那种方法的本身入手，决不是空空推源到那时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社会制度，甚至推源到生产诸力，来决定它们的性质（假如要决定具有那种性质的思潮或方法论的社会经济背景时，问题又转到别方面去了）。为什么？这是因为决定的和被决定的因素之间，在一定时期以内，往往有或大或小的游离的缘故。社会主义的社会应当容许比较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生产工具，和更大的劳动生产率的存在；可是今日的苏联比起美德诸资本主义国家来，无论从生产手段讲或劳动生产率讲，都还落在后面。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来断定：苏联不是一个前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么？

因此我们说：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主要地应当由这种结构自身，或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之总和，形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具有的特征来决定。

其次，我们要更进一步研究那一种主要的生产关系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基本指标。

我们同意于下面的意见：我们主要地用生产手段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结合形式，因此也是用榨取直接生产者剩余劳动的形态，来把某一种社会



经济结构从另外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区别开来。

“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剥夺无偿剩余劳动的那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决定了支配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生产内部直接生长出来，同时对于生产又给与决定的反应作用。……生产条件所有者跟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对立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在任何场合所采取的形式，按照自然的顺序来说，总跟劳动的种类和方式，因此又跟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之一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常常表示出全部社会构造的，因此也是主权对臣属关系之政治形态的，简单说来是各种场合的特殊国家形态的，隐蔽着最内部的秘密的根底”（《资本论》第三卷，下册）。

“不问生产的社会形态怎样，劳动者跟生产手段，总不失为生产上的因素。可是这些东西假如就其相互分离的状态来说，那末它们只是具有可能的生产因素；在生产进行的时候，它们的结合是必要的。而社会构造种种不同的经济的时期，就由这种结合的特种形式来区别”（《资本论》，第二卷）。

下面是关于社会结构的本质的古典的规定：

“其中只有那种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劳动者身上剥夺的形态，才区别了社会之经济的构成。例如：奴隶制的社会不同于工资劳动的社会”（《资本论》，第一卷）。

本节小小的结论是：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辩证关系之中，生产力是决定的，主导的因素。可是在辨认某一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单纯地，直接地用生产力来决定；而要从生产关系本身——特别是生产手段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结合形式，以及剩余生产物被榨取的形态——的分析来决定。

譬如，当我们分析一个封建社会的时候，主要地是在观察



在此社会的支配的经济形态中间，土地所有是不是占有剩余生产物的基础，直接生产者是不是营独立的经济；以及支配直接生产者跟生产手段所有者间关系的是不是经济外的强制，等等；而决不是凭“手推磨子”或“帆船”来决定。

又如，当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主要地是在观察那时统治的经济形态是不是澈底的全般的商品生产形态，在那里劳动力是不是也变成了商品（“生产商品，并不是把这种生产方法——指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跟别种生产方法区别出来的东西。可是商品具有生产物的支配的决定的性质这件事，确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区别的特征。在这里首先包含着这样条件，即：劳动者自己只是演着商品贩卖者，因此也是自由的工资劳动者的任务，而劳动一般地变成工资劳动”——《资本论》，第三卷下册，第五十一章）；同时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不是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支配的动机，资本是不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根基等等。而决不是凭“蒸汽磨子”或“轮船”来决定（注）。

三 中国今日农村经济生活的骨干

我们在本节里面，想是扼要地说明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生活中主要的成份，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联，和活动的趋向。这里，我们避免数字的运用。

第一，我们首先就应当指明：中国整个农村生活已经受帝国主义资本的完全的支配。这种支配的形式，一部份是间接地

（注）“正像在封建时代军事和裁判上的最高权方是土地所有的属性，产业上的最高权力就是资本的属性（《资本论》，第一卷）。



透过国内买办资本跟封建势力来实现，另一部份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的统治。两种支配形式的比重，在目前中国殖民地化进行得空前尖锐的时候，正在急剧地变化。那就是说，在帝国主义者力图独占和瓜分中国的时候，列强资本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支配，是在一天一天采用直接的形式。就农村而言，东北和华北的农民已经差不多全般地跟日资的触须相接触。

第二，中国也有民族资本的存在。中国民族资本曾经有过独立的发展；特别在欧战正酣及其直后，它曾唱过胜利之歌。从五四到一九二六年，就是这个民族资本，曾经运用其相当结实的基础，在中国政治上排演过英勇的场面。它在那时，为要求得其独立发展的最大可能起见，曾经一面反对外国资本的统治，一面反对封建残余的跋扈。

可是列强资本强烈的压迫，毕竟使得我们的民族资本，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同时国内革命势力的发展，又使大部分民族资本丧失了反抗外国资本和削弱封建势力的最后的勇气。结果怎样呢？我们的民族资本的大部分，为要维持其丰满的利润起见，为要令其自身的存在不受致命的威胁起见，它就不得不收束起英勇的独立旗帜，向外国资本投降，向封建主义妥协了。

中国的大部分民族资本逐步逐步地向外国资本投降，结果它只做成帝国主义资本在华流转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所能得到的好处也就是外资在中国大众身上所取得的额外利润中的一部份——即“买办利润”。中国民族资本这种买办化的过程，在这次世界经济长期的恐慌跟肃条期内，发展得特别显著。恐慌的狂飙，把所谓真正的民族企业吹得烟消云灭。几个硕果仅存的“民族”工厂，不是给外资收买，便是抵押给国内的银行资本。国内买办性的金融资本一天天变成中国“民族”资本的



支配形态；中国整个的经济生活就主要地透过了这种‘金融’资本，把支配权交给帝国主义。这种买办资本在农村里面，一面间接地用接济财政等等形式维持军阀对于各区农村的统治；同时进行收购农产，代销货品，办理合作和仓库等等，加强其自身对于农村的支配。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指明，上述趋向在最近期内，因为都市地产和债券等投机事业的不振，同时农村社会的不安，日益加甚，因此格外表现得尖锐。

其次，我们要说中国买办性资本怎样跟封建势力妥协。我们以为这种妥协的根源，从经济上说，是民族资本本身力量的薄弱（主要是因为受外资压迫的缘故），使它没有可能摧除封建的桎梏，自由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政治上说，是革命势力的高涨，使它预感到自身的毁灭，因此不得不跟旧有的统治力量，勾结起来，进行其野蛮的剥夺，维持其自身的存在。

买办资本跟封建势力妥协的结果，在经济方面是：使原有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经济形态搀杂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成份，同时资本本身则充分地利用原有的落后剥削形式；结果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生产方式（因此也是剥削方式），因为得到买办资本的‘资助’（不要忘掉外国资本的主导作用），越加坚强起来。在政治方面的结果是：买办资产阶级跟封建势力在外国资本的卵翼之下，在国内革命势力的威胁之前，建立起一个联合的政权。

第三，现在我们要讨论封建残余在中国农村中的变质和趋向的问题。

谁都不能承认中国还存在着典型的封建主义。这种典型的封建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早经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腐蚀完了。然在目前，中国还保留着极雄厚的封建残余；而且在近代的中



国，这种封建势力已经作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作为外国资本侵略中国的‘前卫’。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残余，或半封建的统治者，他们同中国‘民族’资本已经建立起最密切的关系，他们一小部份已经自身兼做了资本家（最显著的例子是军阀兼办实业和银行），其余的也已经接受了资本的后援（如近日银行资本举办农村合作，实际上是资助地主富农）；因此一般讲来，封建势力之与土著资本，不仅不在‘火并’，而且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建立了巩固的联合战线，一面效忠于帝国主义的支配，一面宰割农民大众的血汗，阻滞生产力的发展。

国内封建和半封建的势力就在上述的关联（即其与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的联系）之下，已经起了质的变化。换句话说，这种封建的统治势力跟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侵入以前，在性质上已经有所不同。而且这种不同的性质在挽近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完全。例如，在目前农业恐慌一天天深刻，农村不安的情势一天天严重的时候，旧式的孤立的中小地主和别种半封建的势力，都在日渐衰替，而随之而起的，都是新的地主的兴起；这种新起的势力，一定跟城市资本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有的甚至自身就是城市有产阶级。

这里我们应当郑重地指明，封建或半封建的势力虽然已经起了质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没有使那种势力转变为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它并没有使封建势力走向自身的否定。

第四，刚才说过，目前有许多旧式的地主在衰亡，另外有许多新式的地主在兴起。同样的，在富裕的农民阶层中间，大部份固然成为中农，甚至变为贫农，还有一部份却在欣欣向荣。这些新兴的分子才是目前农村中直接的统治分子。

在新起的地主中间，他们绝对多数都是把耕地出租给一般



农民耕种，根据其土地所有权，来收取农民的剩余生产物（甚至一部份必要生产物）；另外有极少数的地主，也雇用长工和短工，进行其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不过这种地主经营除掉在华北发现少数以外，其他区域可说绝无仅有。这些地主一面在城镇里面就是银行钱庄的存户，甚至就是它们的股东，同时还是商号，当铺的老板；在乡村里面他们又是收税吏，小店铺和高利贷的主人。当然除此以外，他们又是乡村行政上的领袖。

中国乡村中的富农，本来是前进的资本制经营的代表；他们常有较好的生产工具，雇用些长工和短工，从事商品性较高的生产。广东番禺一带栽种水果的农业企业家，可以作为这种情形典型的例子。可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富农主要地因为国外农产的竞争和国内市场的狭小与割裂，因此往往不愿自己扩张生产，负担企业上的危险，而把土地出租，赚取较为稳定的田租。在此场合，富农既然不愿扩张生产，那末他的资本就不想全部投向农业生产，而只想多置田产，以备出租；或则兼营商业和高利贷放，收取高度的商业利润和利息。

因此，我们在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地主和富农在农村中间现在正用着半封建的跟资本制的剥削方式，来剥夺下层农民的剩余生产物；而在这两种剥削形式之中，在数量上无疑地是半封建方式占到优势。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明一种正确理论的错误应用。科学的经济学者都会知道，当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发展的时候，它们需要在其周围维持多数的小农经营，这样可以保证其可以经常地获得多数的廉价劳动；因此大经营本身会出租土地，给附近的贫农耕种。这里我们绝对不能说，资本主义经营是在维持落后的经济形态；恰恰相反，它之要维持小农经营正是为的要发展其自身的资本主义经营。这个理论是一个完全的



真理。

若干学者就把这个理论来解释中国地主和富农出租土地的现象，而企图说明他们之维持贫农的零细经营，也正是资本主义经营发展的表征。实在的，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何以故？第一，他们没有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大经营利用可怜的小经营的场合，大经营本身是在走发展和扩大的途径（如德国）；在呢，地主和富农自身的经营一般地是在收缩其生产的规模，免受企业上的危险。那就是说，前者是在向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途上迈进，而后者则因资本主义生产之无前途，只得退而（或者说，更进一步）抓住旧有稳妥的剥削方式，来增进其经济上的地位。第二，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地主和富农假如要发展其资本主义的经营，万万用不到这种方式来保证廉价的劳动；因为中国农村中有的的是廉价劳动啊！在这里问题恰恰相反，中国农村中泛滥着广大的廉价劳动却是阻止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呢。

第五，上面说过地主和富农是中国农村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活动的主持。的确，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两者常相混合，所以常称商业高利贷资本）在中国农村中的猖獗，甚至已经引起政府当局的惊奇。它们在分解农民经济，在令农村阶层急遽分化的过程之中，表现其最大的特长。

现在我们来看这对‘孪生儿’在中国农村中所表现的性质。大家知道，无论商业资本，无论高利贷资本，它们自身都不能建立独自的生产方式；它们终是附隶于某种生产方式，而令其发展或解体。这种资本可以存在于奴隶社会，可以存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它们的性质与任务也跟着它们附隶在那一种社会而有不同。

在中国农村中的商业高利贷资本是买办资本（因此也是外



国资本)与内地半封建势力勾结的主要媒介剂,同时又是这个‘联合阵线’剥夺农民大众的主要武器之一。它既不是单纯地具有资本制以先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性质(作用于两个游离的独立生产者之间的),同时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跟生利资本的性质(构造产业资本流通过程之一环,而获得超过利润);它是兼有两者的性质,它为半封建势力,同时为资本的利益而服务。

第六,中国的农民大众,正在上述帝国主义总的支配之下,又在国内封建势力跟买办资本的联合宰割之下,在大批的破产。我们现在来看这些无产化或半无产化了的农民究竟走向什么途径。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条件之下,这些破产的农民应当是城市产业劳动最丰富的预备军。不过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工业的发展不仅异常遇缓,甚至可说已经完全停滞(在恐慌期内,甚且衰落)。因此乡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只有极少数才走进工厂的大门,其他走向都市去的,多数是做苦力,仆人等等。

另外一批跟农业生产脱离关系的农民;有的去充乡村苦力,大多数的做了土匪,以及充当了军阀制度的物的基础——士兵。

至于大多数破产的农民,还不能跟农业脱离关系。他们有一小部份‘移植’到边区省份,去进行垦殖的工作;不过这批农民,因为东北和别的边省的沦亡,已经遭遇到最后的厄运。

其他留在农村里的破产农民,虽然有些还找到长工和短工等等农业工作,来出卖他们的劳力;不过最大多数还是自己维持着最小的土地,或租进些土地,来进行其最惨痛的零细经营。这些零细经营就数量而言是目前中国农业经营的支配形



态；同时它们就是中国半封建关系的最深刻的，最永久的根基。

这里，我们应当指明两种理论上的错误：

（甲）一部份人以为农业经营，不能单从经营面积来决定它们的性质，中国零细经营的发展，根本就代表资本主义小经营的发展。这种说法，可说似是而非。农业经营当然不能单从经营的面积来决定，我们应当同时观察其他生产条件如农具，肥料，乃至劳动等等。来决定某种经营是不是资本主义经营。因此，美国北部的农业经营面积尽管比南部的经营要小得多，可是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比南部要丰富得多；同样，美国南部的经营面积从南北战争以后尽管在很快的缩小，然而这种现象决不是表示资本主义的没落，而是表示资本主义的成长。

可是中国的小农经营决不像美国北部和德国巴登的较小的经营；因为后者在农业资本的构成上，在雇佣劳动的成本上，都表现出比较旧式大经营的进步；因此它们的确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而后者则在各种生产条件都表现出特殊的落后，在这里是排斥着一切社会劳动合理的运用，排斥着使生产力发展的可能，在这里只是饥饿农民的火坑，而绝不是农业企业家的乐园。

同时，中国农业经营规模之日趋狭小，决没有像美国南部旧式大经营分散为小经营那种进步的意味，在这里恰恰相反，它是表示资本制农业生产的碰壁。自然，这种‘碰壁’的原因不是什么小农经营的优越，而是外资压迫，和国外农产竞争的作祟。这里我们如能覆按帝俄在中亚细亚发展棉业的历史，那末对于目前情势的了解，便会更加透澈（注）。

（注）帝俄在中亚细亚曾经一度开辟大规模的植棉农场，后来终究因为敌不过美棉的竞争，这些大植棉场便纷纷收束，改为小农经营。



(乙)另一方面的意见,指出那些“小农经营是在大规模生产之边余处,做‘过甚的劳动和过劣的消费’之挣扎;实际上乃是商品生产中之‘外在的’工人”(王景波先生)。这种意见认为:即使目前的零细经营本身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可是它们是在“大规模生产之边余处”苟延残喘,甚且以‘外在工人’的资格,替资本制生产服务。

这种见解要是配合到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场合,可以说完全正确,可是用到中国却又变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意见。因为:

(1)假使主张那种意见的人们认为中国的小农经营就是在中国国内‘大规模生产之边余处’挣扎,而且是做国内‘商品生产中之外在的工人’;那末我们以为他们的错误,是在把国内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估计得过高。因为在实际上,中国国内的大经营绝对没有发展到‘独占鳌首’,而让出些‘边余处’来,容小经营去挣扎。中国地主富农经济之所以能在农村中维持其优越的地位,决不在其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把‘边余’让给小农经营,并令后者以‘外在工人’的资格替他们的大生产效忠;它们坚实的基础倒在利用他们的地权,乃至商业高利贷资本,让出‘广大的地盘’,容许无数小农的‘繁荣’,以保证其最高度的剥夺的可能。

(2)主张上述意见的人们,他们的真意也许不是在此。他们以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以上所谓‘大规模生产’和‘商品生产’云云,都是指国外的企业而言;而中国的小农经营便是在那些‘国外的’生产之‘边余处’挣扎,并且做了它们‘外在的’工人。

对于这种意见的整个的批评,让我们到第五节里再说。这里我们只须指出:这种意见忽视中国国民经济相当地完整的存在,认为中国经济只在帝国主义国家‘大规模生产’之‘边余



处’挣扎，因此他们完全抹杀了中国国内内部的矛盾，结果在其政治的结论上，他们发现不出真正革命的动力。

第七，我们在这里要替本节做个小小的总结。帝国主义的资本已经掌有中国农村的完全支配权；这种支配有的采取直接的形式，而多半还是透过中国买办性的资本跟封建和半封建的势力实现出来。中国的买办资本跟封建残余在帝国主义的指导之下，已经结合成坚固的联合阵线，来对付下层群众；买办资本和封建残余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矛盾，可是这种矛盾已给整个统治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克服了。国内资本跟封建势力为要维持其对农民大众直接的支配，正采取着种种原有的半封建的方式；他们在外资的钳制底下，半封建的势力固然不能转变成近代的资产阶级；就是土著资本也还是沿用旧式资本（即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方式，并不向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前进。因此，农村的直接生产者虽然多数变成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可是他们终不能大批地走进资本主义的生产之门；他们终陷溺在饥饿的小农经营里面，过他们接近中世纪的生活。

最后，我们还要就中国农村中现存的各种经济成份，来作一个扼要的观察。一般说来，中国农村现在有下面四种经济成份：

- (1) 私人的资本主义企业：包括从事较大经营的经营地主，富农；此外，在若干区域内还有少数帝国主义的农业企业。
- (2) 简单的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的贫农，和一部份的中农。
- (3) 家长制的自足自给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的中农和一部份的贫农（在商品经济极不发展的内地较多）。



(4) 原始的共同体和奴隶制生产：这种生产除掉西南部少数民族相当保留以外，其他区域，可说已经绝迹。

这里，我们应当指明，在今日中国这些经济成份之中，在数量上讲，简单的商品生产是占到绝大的优势。

四 农村再生产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农业改造的任务

今日中国农业再生产过程的特征，第一是整个农业生产的缩小再生产；第二是‘简单商品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

什么是整个农业生产的缩小再生产？这就是说，一般讲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正在一天天萎缩；中国农业生产的的速度，在整个国民经济之中，只有民族工业的崩坏‘差能与之相比’。

什么是简单商品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大家知道，简单商品生产是一种以供私人消费为主要目的的商品生产（并不是为争取剩余价值）。根据上节的分析，简单商品生产在全国经济成份中间已经占到数量上的优势。同时我们知道，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一般地正在停滞甚至解体的过程之中（帝国主义企业除外）。另一方面，农村中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摧毁着家长制的自足自给经济和原始共同体经济，这样商品生产的成份又在急速增加。这样，单纯商品生产的成份当然在被扩大地再生产起来了。

现在我们要研究具有这些特征的农业再生产过程，到底是在那些支配因素的作用之下进行？

第一，我们应当指明，帝国主义的资本是中国农村再生产过程的最高支配者。



第二，在这最高的支配者之下的，有两个‘兄弟行’的臣属——即买办性的资本和封建势力。这两个因素对于中国农村生活而言，可以说是‘同辈’的支配因素。

下面，我们要更进一步探讨这对支配因素之关联和比重的
问题。

我们在这里应当指出，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外资依附性的加强（反面说来，是企图独立发展民族生产的要求一天天薄弱），提供了这种资本跟封建势力妥协的可能；而国内革命势力的发展又使它们之间的妥协成为必要。在目前场合这种‘可能’与‘必要’只在一天天成熟，因此它们之间的妥协，也在一天一天地巩固。这是事实的一面。

在另一方面，中国民族资本要谋其英勇的独立发展的时候，固然会大碰钉子，见削弱，可是当它们‘低首下心’效忠于列强资本的时候，却会狐假虎威，日渐膨胀起来。中国买办性的民族资本（特别是银行资本），在最近期内，一面因为农村的破产，内地资金大部集中都市，同时对于外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屈服，格外澈底，因此颇有‘威灵显赫’‘不可向尔’之概。近几年来，银行资本在政治方面积极加强其对于政府（无论中央和地方）的控制，在经济方面积极加紧其对于工业，特别是农村方面的活动。显然地，这种资本势力的急剧扩充，使两种‘狼狈为奸’的支配因素——即买办资本与封建势力——之间的比重，已经起了相当的变化；那就是说资本的势力已经相对地增强了。

这点在农村中的表现是：这种买办性的资本在很多省份已经用合作社、仓库、农民银行分行等等的形式，直接地和农村群众相接触；在多数场合，它们还透过原有的地主、商人和债主来扩展它的活动。在另一方面，封建势力对于这种资本的粘



着性格外加强，在许多场合，甚至已经变成依附的关系。旧式的独立的封建势力在迅速地衰亡，而新起的半封建势力跟资本的联系格外密切；甚至有许多就是都市资本家本身。

我们要问这种变化的原因在那里？我们以为，这是因为（1）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支配益发加强的缘故；而买办资本在帝国主义者看来，是一种比较封建势力更有效更灵活的工具。资本主义列强无论在收买原料方面，在销售商品方面，乃至在输出资本方面，都想更多地利用那种买办性的资本（自然不是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本）；于是买办资本的势力就“坐大”了。（2）这又是因为国内革命势力高涨的缘故。大家知道，农民的革命，主要地在摧毁封建的桎梏；在这里依照常理而言，资本的出现是颇能和缓这种革命情势的发展的（实际上办得到办不到是另外一件事），因此近几年来资本在农村舞台上，非但粉墨登场，甚至有扮演主角的模样了；因此，目前已经能够找到不少‘资本制性’的改良主义的口号，在口头上热闹了。

接着，我们要问上述变化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上到底引起了什么变化？我们的答案是：它是引起了变化的；它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加强，格外尖锐罢了。

这里我们应当提到一种意见。有人以为资本的支配既然在那边加强，那（1）它一定会摧毁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起资本制的生产方式来；（2）至少资本家们可以在不牺牲地主利益（因为他们和地主还保持联盟的关系）的条件下，进行普鲁士式的土地改良。



我们以为，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之下，这些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第一种方式固然不消说得；就是普鲁士式的发展，虽然目前也有类似于此的政策和口号等等的存在，但是决不能实现的，何以故？第一，因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不够，中国的农民不能像普鲁士一样，给都市吸收，因此很难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第二，中国资本的累积，因为帝国主义者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不如普鲁士那样容易；特别在农村方面，地主除了土地以外，可说很少保留别种生产手段。第三，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完全处于劣等的地位；因此地主资本主义的企业不易发展。第四，中国逗留于封建主义的阶段可称最长；这种历史上的沉淀，实在最难扩清。因此农村地主于这种旧的剥削形式，异常“执着”。

现在我们要总结到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和农业改造的任务的结论方面来。

我在第二节里曾经指明，当我们要辨认某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的时候，我们必须从生产关系本身——特别要注意生产手段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结合形式，以及剩余生产物被榨取的形态——的分析来决定。

同时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中国整个农村虽然已在国际资本的支配之下，中国买办性的资本对于农村生活的支配虽然也在一天天加强，同时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生产虽然已有相当的存在；可是在这里土地所有还是占有剩余生产物的最主要的基础，直接生产者还是经营独立的经济，乡村的政权还是以巨大的土地所有为根据；前资本主义性的地租还是剩余生产物的支配的形态。在这里，各种经济成分之中，简单的小商品生产者占到绝对的多数；同时这些独立经营的小商品生产者还没有



具备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换句话说，它们还不能如帝俄十九世纪下半纪一样，在‘经营的一般构成已经建筑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之上’（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上册，第四章）的条件下，进行生产。

总括说一句，中国的农村社会还是具有半封建的性质，在那里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方式（因此是剥削方式）乃由帝国主义维持着，半封建的势力与国内资本乃在外资的支配之下，结合地存在着。

同时，具有半封建性质的中国农村社会，是组成今日国际资本最重要的‘利润的渊藪’；就这点而言，中国农村以中国国民经济最主要的地盘的资格，构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环。因此，我们所谓中国农村社会的半封建性，绝对不能从国际资本的关系离开；相反的，中国的农村社会正是因为全般地受国际资本的支配，所以农村社会自身的半封建性乃具有一种特性，——那就是，这种半封建性很少被资本清算而转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这种特性几乎是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切被金融资本所维持着的半封建关系所共有的特性。

下面，我们要简单地说明中国农业改造的任务与性质。

中国二百多万户的地主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而差不多七千万户的农家，却只有不到半数的土地，这是今日中国农民在革命中为争取土地而奋斗的主要基础。‘在这主要的基础上，技术的极其落后，农业的散漫，农民群众的备受压迫，这样无穷的农奴的服役的各种剥削形式，是必然的事情’（俄国农民问题与土地政纲）。同时，现在的‘小农是在门争，是为了获得土地而斗争。小规模（资产阶级的）耕种法是反对大的（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同书）；这样我们已经说



明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

在中国，无论在实践上，无论在政策上，很少表现出地主经济企图自身资本主义化的要求；同时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中国要由‘大地主的经济，渐渐变成资产阶级的经济，而用资产阶级的剥削方法，以进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的农民要用革命的方法，消灭一切封建的废物，‘自由的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的要求，非但不会因何种统治者的改良政策所削弱，而且会一天天‘激越’起来的。

最后，我们必须指明，上述农村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半封建关系，是由国际资本所维持，同时又作为帝国主义剥夺中国大众的主要的附着点；因此中国的农民在要求澈底的农业改造之中，首先就具有反抗国际资本统治的性质；同时，他们为争取土地的奋斗，也就是在摧毁列强资本统治中国的基础。

五 对于目前两种主要意见的批判

在这一节里，我们想对于两种目前流行的主张，加以扼要的检讨。至于对于其他不正确的意见，我们且待有机会再说。

A. 第一种主张以为：‘今日中国的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诸先生）。同时“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王宜昌先生）。

我们对于这种主张，应当指出下面几点：

第一，坚持这种主张的完全忽视列强资本与民族资本的矛盾，完全忽视帝国主义摧毁民族生产力独立发展的作用，因此他们一面强调着外资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一面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过高的估计。



我们知道：工业与农业不均衡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的条件之一。在资本主义正常的发展之中，农业方面的投资，常是特别的少，因此资本主义在农业部门中的发展，也特别的慢。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用着各种不同的特殊的形式侵入农村的’；同时‘乡村工人对土地的分割，时常是有利于乡村的经营主，所以占有分有地的乡村工人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特征’。

我们又知道：当我们要辨认资本主义在农业部门发展的时候，决不能机械地按照工业资本主义的标帜来测量。例如小农民资产阶级有时就不一定僱用雇工；同时他们常和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村半无产者结合在一起，不容易分辨清楚（参考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第四章）。

然而所有这些并没有阻止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国际资本虽然支配了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里面虽然相当存在，可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变成中国农村中一切矛盾的支配形态，而榨取剩余生产物的基础，主要地还在土地所有。这是因为：（一）帝国主义对于民族资本在农村中的独立发展，乃用全力阻难；（二）中国民族资本在投资于农业生产的意愿（当然因为不值得，或不可能的缘故），比较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薄弱；（三）国内封建残余因为外资以及国内买办资本的支持，非但‘不自殒灭’，反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力量，加紧其向农民大众的剥夺。

许多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欢喜用帝俄的情形全套地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实际上，十九世纪末纪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俄国，它自身已经成为‘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无论在都市和农村里面都在



迅速发展。单就农村而言，农民社会的分化异常激烈，“受农奴式剥削的农民，渐渐破产，而一部份的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给‘品行端正’的户主了。很少的富农，渐渐变成农村间的资产阶级，他们租入田地，经营资本主义的生产”（引自《俄国农民问题与土地政纲。按本书为主张中国已完全资本主义化，而土地革命已成过去的人们所不大愿意引证的书籍。唯本书出版在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以后，而且是在‘一九〇五年秋至一九〇七年秋，两年来的革命，关于俄国农民运动及农民为争土地而斗争底性质与意义给了很大的历史经验’以后才写的。参见该书序言）。同时，那时地主经营虽然运用着落后的雇役制，可是很多已向采用雇工的资本主义经营上发展。所以在那时‘地主与农民都是要求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前者（地主）要求这种发展能够尽量地保留地主的经济，地主的进款及地主的剥削形式；而后者则要求在当代技术的程度之下，尽量保全农民的利益，要求消灭地主的大田庄，消灭一切农奴制的剥削形式，扩充自由农民的土地’（同上）。总括说一句，那时俄国的地主和富农都在向资本主义的企业发展，所不同的一则要保全地主的利益，一则要保全农民的利益罢了。

中国的情形怎样呢？

俄国当时的富农积极租进土地，扩充企业——中国的富农除极少数外（如广东的水果农场），常出租自己的田亩，缩小自己的经营；

俄国当时的地主积极利用较落后和前进的劳动扩展其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国今日的地主绝大多数只是出租田亩，不自经营；自己根本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的企业。

俄国当时的贫农多数出租其分有地，出外做工——中国今日的贫农多数租进零细田亩，进行极小的经营（注意，这里贫



农租进土地，并不是为地主富农的农场保证廉价的劳动，而是为地主富农保证一种有时连工资在内的剩余生产物的获得）。

因此，在当时的俄国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一般经营构成的基础，而在今日的中国，土地所有还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基础。

坚持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的人们，自然会颂扬帝国主义会促成殖民地资本主义之前进，诱致民族生产力的发展的。那也无怪乎张志澄先生先读了国联专员哈斯氏的报告之后，要替帝国主义在华的开发，击节叹赏了（参看张先生：略论中国目前的经济建设，中国经济月刊，三卷八期）。

第二，他们主张：今日中国的农村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了，所以中国今日的农业问题，应当是资本问题，而不是土地问题（我们在此对于王宜昌先生梦呓一样的命题：‘土地分配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后便已过去’，似乎可以不必多提，因为除了在大革命时出卖了革命利益的“显贵”以外，谁能这样地残忍，说什么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已经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呢？所幸王宜昌先生理论上的知己王毓铨先生已经指明这种意见的谬误；所以我们更可以不必多说了）。现在我们从理论上指出这种意见的错误。

（1）在农业资本主义的确是在日益发展，可是那种发展还不充分的时候，或是那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地是采取普鲁士式的途径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性的农民为要求得自由地通畅地发展其资本主义而保全其自身利益的时候，还需要进行土地革命的。在本世纪的初叶，帝俄的农业生产一般地已经站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可是那时的农民革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那时‘革命的真实内容，民粹派以为是社会主义化，其实只是最坚决的最澈底的肃清农奴制度，准备资本主义



发展的道路罢了’（俄国农民问题与土地政纲）。你看，在资本主义的农业关系之中，农民的革命还是以争取土地，反对封建残余为其主要任务的。

（2）中国的农村，根据上面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不如俄国，土地所有还是农民被剥削的主要基础；所以土地问题更应当是农业改造的中心问题了。

第三，我们要指明，根据上述两种不正确的论点，他们对于农民在农业改造中的作用与力量一定会估计得很低。这种估计之在政治上一定会产生消极的影响，那自然又在那些坚持这种意见的先生们的意想之中的了！

B. 第二种主张以为：（1）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同时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外国资本的支配之下，城市的资本家和乡村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在民族工业不能发展的条件下，大都只有附和帝国主义的金融制度，在原有的土地所有的基础上，从事对于‘过多劳动和过少消费’的农民之榨取。（2）为争得民族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要推翻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剥削，而是外国资本的统治。中国土地问题之解决无论在经济或政治的观点上，只有在推翻外国资本支配之下，才可思议（王景波先生，《中国农村》一卷十期）。

我们对于这种主张，应当指出下面几点：

第一，据王先生的意见，中国因受外国资本的支配，所以中国也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意见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1）这里我们决不能把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跟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把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牵入资本主义的体系（如发展其商品经济，建筑铁路等等），使它们成为提供高额利润最好的场所，可是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本身并不就因此变成资本主义的社会。我们不能否认帝国主义之侵入落后国家也会相当地促进当地资本主义的成长；可是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而言，它们并不希望落后国家也建立起跟母体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假如这样，资本输出的超额利润便有被消灭的可能。这种倾向在独占资本主义时代可说特别显明。

(2) 王先生也承认外国资本‘束缚了民族的生产力之发展，因而发生生产的停滞和乡村的人口过剩’；同时国内统治阶层“大都只有附和帝国主义的金融制度，在原有的土地所有的基础上，从事对于‘过多劳动和过少消费’的农民之榨取”。这点意见是王景波先生跟王宜昌张志澄先生等不相同的地方（虽然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而且也就是王景波先生的意见高明于上述几位先生的地方。可是他一谈到中国本身，以为中国尽管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是中国也尽能做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里，他第一完全忽视了中国国民经济相当完整的存在，而直认中国就是大工业国家的农村；第二，他完全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一定要建立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之上，决不能‘张冠李戴’，任意套上。照王先生的意见，全世界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只要除掉苏联，其他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环节，它们没有一个能逃掉国际金融的支配。我们拿目前万目睽睽的黑人国家阿比西尼亚来说罢。阿国之已受英法意比资本的支配是无疑的了；同时阿国国内主要的生产是游牧和农业，‘阿国的农民还是过着一种特殊的农奴生活’，‘工厂工业是没有的，因此所谓真正的劳工阶级也是没有的’（参观世界知识，二卷十号，阿比西尼亚的社会结构及其武力）。这样的社会照王先生的说法，一定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了。这种忽视了内部的矛盾，



只知外力的支配，所得出的结论，其所发生的影响决不是以理论上的错误为止的。

王先生看到人家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国经济，用‘一般中的特殊’的法则，来分析其特殊性，就认为有二元论的倾向。我们这里应当指明，王先生对于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则（或者说对于方法论一般）是了解得很有限的（只看他说‘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包含着……‘运动’与‘静止’诸关系）。谁都知道，正确的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是对事物之矛盾与运动作最完全最具体的观察；我们分析‘特殊’就要使‘一般’的内容更见丰富。而王先生的方法则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即在力求简单，使什么东西都一般化。他以为多方面的观察，便是‘面面周到的烦琐哲学’；他以为精细地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结构本身，便是把‘特殊’从‘一般’中割裂起来，而带有‘二元论的倾向’。事实上假使容许我们借用王先生那样不大适切的‘一元’‘二元’等等名词的话，那末我们真感觉到王景波先生有些空洞的‘国际一元论的倾向’呢。

在这里，我们如能指出王景波先生和王毓铨先生用了相反的方法，得到相同的结论，是不为无益的。王景波先生可说只顾到国际资本的支配，完全忽视国内经济结构本身的矛盾。王毓铨先生则反是，他是主张要想解答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问题，‘我们就得把帝国主义统治作用问题放在一边，而从事中国农村经济全部生产过程之内部的探讨’；而且认为‘要阐明中国农村经济底性质，必首先研究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农村的作用’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惊人的研究方法’，而且是‘多么大的一个笑话’（参看《中国农村》本期附录）。由此可见两位王先生在运用的方法上可算是完全相反了，可是他们的结论却是一个：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一



致？这是不是表示中国用无论什么研究方法都能得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不是的，都不是的，一切错误的方法都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抹杀“特殊”（王景波先生）或使“特殊”孤立化（王毓铨先生）的不正确的方法，会得出同样错误的结论，也决不是偶然的。

第二，王景波先生认为“为争得民族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要推翻的，不是封建剥削，而是外国资本的统治”。王先生这种意见是他只注意国际资本的支配所必然产生的结论。帝国主义已经整个地支配中国了，这是不能不承认的。然而只知道这一点是完全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更进一步分析在外国资本的统治之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各个阶级的对立关系及其阵容的配置等等。关于这一点，王先生是完全忽略了，因此他在提出怎样谋中国民族生产力之独立发展时，只提出反对国际资本的统治；而没有认清这种外资的统治，在中国国内在经济和政治上，究竟用什么做根基。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中国农村中的半封建关系才是外资支配的主要附着点，而且这种附着点，又因外资及其助手（买办资本）的援助，非但不在消灭，反在坚强起来。因此中国的农民大众为要得其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对外必须摧毁外国资本的统治，而对内又必须铲除封建的残余；而且铲除封建残余也就是消灭外资统治的根本步骤。

王先生似乎不愿谈对内的问题，他只用空洞的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口号，来抹杀国内矛盾的开展。他空洞地指明“因为外国资本的支配，把生产工具集中到外国去了，使中国资本主义生产不能发展；因此我们要“在民族的范围内要求资本主义的经济之自由发展”，言外指示出中国整个民族无论“大贫”“小贫”，对于外国资本的统治，只有作“国民一致的”反抗



才有出路。

王先生之是不是愿意作出上面的结论，在这里是不成大问题的；不过一根据王先生的主张，将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是一个“举国一致”的运动，那是无疑的。到那时，要是我们能靠某某“在天之灵”，“取得民族的独立”，那末可以“不须完全排除外国资本，只须在关税自主上对民族经济的发展，作相当的保护，民族工业以及资本主义的农业，就可在原有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蓬勃地发展起来；如此则乡村的“封建剥削”亦可因而解除了”（见王先生原文）。在这里，我们才看出王先生全面理论的真谛。

第三，王先生也曾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也重视“农村问题”；他说“中国的农村问题与民族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加之近五六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迁，一般的都使中国的农村问题成为日益加紧的重要的问题了”。他又以为土地问题是“民族的彻底改造在农村中的核心问题”。这在王先生的理论中，似乎是一个奇迹，而且似乎是他的理论远过于王宜昌先生的地方。

但是，让我们来检讨他的土地问题论罢。王先生怕有人“误会”了他，所以自己先说“也许还有人以为这样会把农村问题高悬起来，成为一个反帝国主义的简单问题。这样的想法，乃是由于人们自己把问题肤浅化了”。接着王先生便为我们“指示”出一条“迷津”，他说，“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必须精确地分析这个统治之所有之力量及其相反的力量，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专看脚尖上走路，那是一定要跌倒的”。这里，我们除掉感谢王景波先生指出王毓铨先生的理论“一定要跌倒的”之外，我们只能听到一些渺渺无踪的空谷“佳音”而已。



同时，王先生是重视土地问题的。他以为只有像他那样的分析才能把“农村问题与民族问题，及由民族问题到国际问题，都从其最高和最低的地方完全统一起来”。他认为土地问题应当这样提出，即它是民族的彻底改造在农村中的核心问题；“问题这样的提出，其答案也就用不着再加说明了”。

可是问题恰恰在这“用不着再加说明”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王先生在别的处所是加以说明了的。他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之解决（即为充分发展生产力，消除土地的垄断），无论在经济或政治的观点上，只有在推翻外国资本支配之下，才可思议”。同时，他在反对那种“为争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就要反对封建势力或解除封建经济的束缚”的主张的时候，指明这种主张有一种错误，即在认定在任何历史的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都不会障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这又是机械的想法，仿佛认土地问题就是反封建的问题”。

这里使我们根本怀疑到王先生对于土地问题的意义，是不是真正了解，他仿佛认为土地革命可以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也可以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我们关于这点，只想引用一句名言来作结论：“民粹派的想像，平均土地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实际上仅仅是最激进的资产阶级的企图”（《俄国农民问题与土地政纲》）。

我们深深感到王先生之提起土地问题似乎只在“敷衍门面”，以求其从最高到最低”的“生硬的统一”。结果，严重的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便偷偷地从王先生空洞的“反对外资支配论”中溜跑了；结果也就变成像王宜昌先生所说的**问题已成过去，无须再求解决！**

（1935年8月18日）



谈谈“土地村有”

（一）土地问题是委实严重了

从山西绥靖主任阎锡山发表了土地村有的办法以后，全国的舆论界好像掀起了一个波浪，反对的反对，赞成的赞成，有的人讽刺几句就算完结，有的人却在冷眼看热闹。舆论界沸腾了一番，接着就有意阿开战呀，日本对华新政策呀，华北“自治运动”呀，最后，还有刺汪事件呀，标金风潮呀，白银国有，放弃银本位呀，这些都夺去了人们的注意。于是晋阎的土地村有方案，只让给出席六中全会的诸公去讨论，在一般舆论界好像已经消失了它的影子。

不过，问题却还留着。同时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本身，正在一天天严重起来。

有人说，晋阎之提出土地村有，目的并不要真正解决土地问题；而且也绝不能解决土地问题。这句话是对的，可是，单说这句话是不够的。因为阎氏自身虽然是山西“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可是他此番因为防共情急，竟把中国问题的奥秘之一，——土地问题——泄露了出来。他说：“今日之土地和



有，实为共产党露下一大空隙，亦为现社会埋下一个摧毁的爆炸弹，土地公有已成不得不办之势。”他说：“年来山西农村经济整个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穷；土地集中之势渐次形成。”他又说：“无田之耕农，欠儿所分之粮少，不足以供食用；丰年所分之粮钱，不足以易所需，而租息生活者，不劳而获，反比一般贫农无论丰年生活为优。土地私有实为枷锁。”

土地问题，在今日的中国委实是严重极了。据一般的估计：全国的土地约有百分之七十落在地主和富裕农民的手里；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农、贫农和农村工人，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耕地。有人以为，中国农村土地分配不均，固然是一大“空隙”，可是农民所受的苦痛；除开地租以外，主要却是税捐，高利贷和商人的剥削。这话有一部分的理由。不过，假如我们更进一步考察，又谁能否认乡村中的豪绅地主，不是兼做商人，便是重利盘剥；不是身兼收税吏，便是与官府朋分民脂民膏呢？换句话说，谁能否认据有广大土地的地主富农是一切对于农民大众的剥削的下基础呢？自然，我们在这里不能忘掉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帝国主义持这些“猫脚爪”的作用。不过，土地私有是这些“猫脚爪”的基础却是无疑的。

那么，“今日之土地私有，”的确“为现社会埋下一个摧毁的爆炸弹”了。

（二）怎样办到土地村有？

要替现社会掸去这个“摧毁的爆炸弹”，各人就有各人的办法。有的主张“平均地权”，有的主张“耕者有其田”，有



的主张“微收农田增值兑”；阎锡山就主张“土地村有”。

根据阎氏的办法大纲，实现土地村有，第一先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有。然后“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作。”“人民满十八岁即有向村公所呈领份地之权，到五十八岁将原领之田还村公所。”

收买土地的公债用什么来还本呢？根据他的大纲（甲）产业保护税，凡动产不动产均年抽百分之一产业保护税。（乙）不劳动税、（丙）利息所得税，“凡以资产生产者，应按所得利益征收百分之三十为基本之累进所得税。”（丁）劳动所得税；农业劳动取田地收入十分之一，其它劳动征收百分之一为基的累进所得税。

最后，我们不要忘掉，阎氏规定在此法“推行之初，耕农村对省地方负担，仍旧征收收田赋。”

（三）谁是真正负担公债的？

很多人指出，阎氏上述的办法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是一个乌托邦。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它能阻止我们去研究晋阎实际的企图在那里。

还有许多人说，阎氏的办法只在说得好听，只在缓和 he 身受的致命的威胁。我们局意这点，可是不同意于只是这样说。

不消说得，晋阎要实行他的土地村有办法，他在技术上，甚至在政治经济上，不知要遇到多少困难，可是在我们尽可以不管这些。我们所要说的是，假使这个办法实行了，事实上便成了怎么一套货色呢？



第一，我们要指出；假如土地真的成为村有，假如农民真的可以领到“份地”，那末农民在此所出的代价是非常可观的。

收买土地是公债；偿还公债是用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我们来看吧，这四种公债的担保，在其他一切制度没有变更之前，那一种是“拿得稳”的。

土地村有了，执管土地的是跟现在一样的村公所，而负责征收各项税捐的也是跟现在一样的村公所。山西目前的村公所也跟其他各省一样，是地主富农豪绅的办公所；假如目前的制度不改，尽管土地实行村公有，村公所也还是那些地主豪绅富农的办公所。

再来看公债的担保。第一，产业保护税要从有动产不动产的人们身边捐过来的，而村公所的老爷们便是这些人们的代表。你能相信这些老爷们会自己缴出“保护税”来还债吗？第二，不劳动税和利息所得税也跟产业税一样，是要从有钱有地人身上出来的，因此这种来源也没有什么希望。最后，还是靠劳动税吧劳动税不是有钱人出的，村公所的老爷们一定愿意去征收，而且劳动者也不敢不缴的。这样，农民大众就变为永远的债务奴隶，而且，在推行之初，农民还要缴纳出赋呢。

因此，真正负担公债的还是农民别的劳动者。

（四）乡村公有呢？豪绅私有呢？

有一个地主的代表质难地说：“收回土地，即归农民耕种，收回公债亦应由农民分年偿还，斯为公道。“阎氏回答说，“如你所说，不是公有的办法，是转买的办法。”（《见



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说明。))

还是阎先生的妙语。实际上，这个公有的办法，非但是一种“转卖”，而且是一种“勒索”上面不是说过吗？实际负担公债的还是农民劳动大众，他们出了偌大的代价，方始领得份地耕种；然而这种份地都不是农民私有，而是村公有的。

农民出了钱，挽得了一个土地公有，已经吃了大亏；然而事实悲惨的一面还不止此。上面说过，村公所是地主豪绅的机关，而村公有的土地是归村公所执管的，公有土地上一切的税收就掌握在村公所手里。这里，大家只要记起国内现有各地的族田、庙田、尝田、祠田等等名义上的公产，实际上怎样变成豪绅族长的私产的话，那末一定可以了解村公所有公田的实际上一定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的。

这就是说，农民出了钱，没有得到土地，地主豪绅得了钱（收回债本）田地还留在他们手里。好聪明的办法！

（五）“村”是中世纪的乐园呀！

阎氏真会解决土地问题，铲除封建的残余吗？他为什么提出土地村有而不提出土地国有呢？我们知道，只有土地国有是资本主义农业最彻底的要求，同时也是毁灭一切封建剥削最有效的手段。

阎氏所主张的是村有，绝对不是国有。尽管他说“主权在村，即是在国；”但这是诡辩，村有跟国有在性质上绝然不同。阎氏要将土地归为村有，目的无非在巩固农民的乡土观念；并且把中国“村”的中世纪的特质理想化吧了。换句话说，他要用土地村有的办法替封建残余作更有力的保留；这跟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土地，收归集体所有或归国有，铲除封建残



余的办法，相去得多么远呀。

（六）对帝国主义则秋毫无犯

谁不知道，中国的封建渣滓的背后，是有帝国主义在撑腰？谁不知道，中国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同时也就要摧毁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解决土地问题跟争取民族解放是中国改造运动两个分拆不开的基本任务。

但是阎氏却说我们“解决一件事，只能就一件事的范围内说，即称土地问题，只好就土地说。”

但是，照阎氏的办法，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还是很明显的。



经济政策



中国国防经济建设

播话当引言

当我去年九月四日下午在北京不罗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经济委员会，做了下面的报告之后，我曾经碰到一个难于解答的疑问。我当时曾经这样说：

一切侵略战争的制造者，他们主要的目的就要霸占人家的原料，侵夺人家的市场，攫夺人家一切的资源。是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研究造成战争的经济原因，这可以说是走了研究战争祸根的捷径。

我应当在这里唤起各位的注意，东方的侵略者是我们四千七百余优秀的代表所代表的全世界和平势力的最丑恶的敌人。我们今天在具有光荣抗战历史的比利时开会，然而我没有权利来隐蔽一件最无耻的事实：东方的侵略者已经掠夺了我们八百多万方里的土地，你们知道那有多么大，——它有八十个比利时那么大！它有四个法国，五个德国，十个英伦那么大！（各代表愕然）就经济资源讲，我们邻国的军阀和财阀们才已经攫夺了我们百分之七十大豆生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铁矿储藏，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煤矿生产，以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煤油生产。而在最近两年以内，他们还想占夺我们中国的北



部，在华北五省，铁矿的藏量约占全国总藏量的五〇%以上，煤矿的藏量约占全国五三%，棉花的产量约占全国五〇%以上，羊毛约占全国四分之一，豆类约占全国二〇%。他们在我们的交通系统上，已经完全握有满洲和华北的铁路和航空的支配权，在那里的航运轮船，也都已挂了太阳旗。他们把我们面粉和棉纺织品的市场完全霸占住了。

“……刚才我曾经说过，研究侵略战争的经济原因，我们确乎走了探讨战争祸根的捷径。不过我们应当认清，要解决战争问题，要消灭战争，却不是单从经济上想办法可以完成的，我们一定要用政治的途径；而在我们中国这样的被侵略国讲来，我们还得用自卫的战争来制止侵略的战争。就经济而言，我们如果对世界和平真要有所贡献的话，我们一定要实行国防的经济建设，那就是说，一定要进行那种适应于对我们的侵略者抵抗的经济建设。”

五点四十五分，当天的委员会散会了，有一位捷克斯拉夫的代表找我谈话，他说：“你刚才说你们中国要以自卫的战争来消灭侵略的战争，这一点我很同意。不过，你一定知道，现代战争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战争。你方才告诉我们，你们大部份的资源已经在日本手里，交通事业有一部份也被日本控制了，那末将来你们要和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你们不要说在军事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处于劣败的地位。你们将用什么办法来补救呢？”

恰巧谈到这里，有一位阿比西尼亚的代表走来，他听了那位捷克代表的话，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的，我觉得这问题太重要了。我们阿比西尼亚在军事上暂时挫败以后，墨索里尼最近拚命在开发我们的经济，他要霸占我们一切的资源和市场，这样使我们正在进行的武装抵抗，真受到很大的阻碍



呢！”

我当时怎样回答呢？我说：“不错，侵略者把我们的资源一步步占夺，的确会使我们抗战的实力一步步削弱。然而我们这些被侵略者能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尽可能地运用留在我们手里的一些资源，拌上我们的热血，和侵略者拚命。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拚命的过程之中，能够逐渐收复我们的领土和资源，这样我们抗战的实力又会逐渐充实起来；要不然，我们就没有路可走。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我们在向侵略者抵抗的时候，对于留在我们手里的资源和一般的经济生活，都要严重地加以开发和整理。当贵国国民英勇抗战的时候，”我回转头来对那位阿比西尼亚的朋友说，“不消说是赢得全世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热烈同情和赞誉的。我们也不消隐蔽事实，贵国的军事抵抗已经暂时地受到顿挫了，这当然是墨索里尼毒气战略的结果，可是另外有个原因，我们似乎也应当指出，那就是贵国政府在人民抵抗的时候，对于经济生活的改善恐怕也注意得不够，结果人民在抗战的时候热烈和忠诚的程度也就差得多呢。”

第一节 今日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

一 在抗敌的前提下，完成适应国防需要的经济建设

先建设？还是先抗战？

当然，我当时那种说法并没有把问题解说得清楚，而且在我们国内，同样的问题还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我们应该是由经济建设中间争取民族的解放呢？还是在争取民族解放之后，才能谈得到经济建设？



在眼前国内提倡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人们，似乎多数是主张由国民经济建设中间去求得民族的解放的，而所有主张“以建设求统一”的人们，至少在口头上也是以国民经济的建设做救亡图存的先决条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主张对不对，实行这种主张的成绩好不好？

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不管他住在通都大邑也好，住在穷乡僻壤也好，他应当感觉到他真正的主人固然不是他老自己，但是也不是在南京，倒是在伦敦纽约和东京。近来东京的主人越来越凶，他要把全中国的人民乾脆变成他老人家一个儿的奴才。

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人提倡要在维持现状的条件之下，进行国民经济的建设，美其名曰充实国力，准备御侮，那结果一定是肥了人家，瘦了自己；国力不但不能充实，反而会进一步受着敌人的破坏；外侮非但不能排除，国难反而越弄越深。在理论上讲，这样的经济建设，是用了半殖民地大众的血汗，替帝国主义主人谋利的建设，是替帝国主义扩充资本和商品市场，增厚超过利润的经济建设，同时又是在近代化的外衣底下，毁灭民族经济的经济建设。

在事实上呢，虽然有些先生们能够大胆地承认近年来国内的经济建设已经有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在国联的讲台上，在伦敦金融家和一般外国专家的嘴里，中国经济的进展似乎已经博得额外的赞赏。是的，中国近几年来公路和铁路已经增筑得很多了，金融和币制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了，然而这种没有国防的建设，对于人民大众究竟有没有好处，固然不必多说，它们对于国家民族的安全是不是有所裨益，也是不能令人无疑的。在相反方面，我们的民族敌人却用中日经济的提携来迎合我们的经济建设，于是他们越提携，我们越建设，结果我们华北的资源



铁道都被他们“提携”过去，全国的纺织业和火柴业也都被日本“建设”了去。

根据上面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军事和政治上维持现状的经济建设，是替人家培养国力的建设，这种建设只能使得我们自己民穷财尽，当然说不上什么国力的充实，更说不上什么争取民族的独立。这样我们对于上面提出的问题得出第一个结论，那就是说：我们决不能从单纯的国民经济建设来求得民族的解放，恰恰相反，在一个主权日损，国土日蹙的半殖民地国家，所有维持现状的经济建设只是替帝国主义谋利，便利敌人的侵略。

——那末是不是中国的国民经济一定要等到民族完全解放以后，才能从事建设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应当有两个：第一个答案是“是的。”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真正的国民经济建设，应当是建筑在合理的社会法则上面的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机构，必然要排斥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机构里面，我们能才从事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求得大家生活真正的改善。

然而单是这样的答案是不是已经够了呢？不，我们还应当有第二个答案，一个否定的答案。不错，在民族没有完全独立之前，事实不容许我们作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然而，惟其因为我们的民族还没有独立，惟其我们要用自卫的军事行动来争取我们民族的独立，我们就必需从事于部份的经济建设来巩固我们的国防，加强我们的抗战力量。不消说得，这里的经济建设决计不是为建设而建设，也不是从单纯的经济建设，求取民族的解放，而是把国民经济建设的工作从属于国防的需要，把经济建设的任务从属于国防建设的任务。

有人要用“现代战争不是武器的战争，而是国民经济战



争”的名言，来辩护他们先建设而后抗敌的主张。这不过是用“经济上的安内攘外论”来糟蹋和污浊上述的名言而已，对于他们自己的论据，可以说是毫无所补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天天殖民地化的中国，如果在不攘外的条件之下进行经济建设，那末这种建设不仅不能有助于我们自卫的战争，反而有利于敌人对我侵略的战争。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所谓现代战争是一种国民经济的战争的话，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也只有以国防为前提的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来加强国防的力量的情形之下，才算得到适当的运用；否则便只是次于“唯武器论”的“唯经济论”，这种理论的破产是必然的，而且过去的事实已经指明这种理论早已破产了。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郑重指出，在我们国内，至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正确的论调。有一部份朋友因为要排击“长期准备”的理论，有意无意之间就以为我们的对敌抗战，真正可以不必准备。是的，一切不抗抵的准备只是为敌人的侵略准备，并不是为我们的自卫准备，关于这，过去东北和华北的悲痛的教训，已经再不容许我们有所怀疑。然而是不是说，我们的抗战是完全不需要准备的呢？

我们坚决地回答：我们是绝对需要准备的。谁要以为我们的抗战只是热情的儿戏，而不是血与肉的力量对比，那便是犯了天大的错误。我们决不能容许这种错误继续存在，尤其当我们看到了阿比西尼亚军事抗战的暂时挫败，和西班牙人民的坚苦奋鬥之后，我们更不能容许这种错误存在。我们知道，阿比西尼亚暂时的军事失败，在它主观上固然是因为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弄到一切可能的巨大的胜利都不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而一大部份可能避免的失败，终于变成无法避免的失败。然而在另一方面，阿比西尼亚因为它原有落后的社会结构关系，因



为国内统治者在事前并不能顾念大众生活的改善和整个民族的安全关系，他们对于巩固国防和动员抗战的努力是完全不够的。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把一切可能的准备都准备好，结果就不能把一切胜利的可能都把握住，而失败倒成了必然。

在西班牙的这次内战中间，政府军和人民义勇军在初期的确惨败过几次，这种惨败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双方武器的优劣和多寡，简直相差得太远；另一方面，保卫民主政府的人民义勇军，他们平素的军事训练和纪律，的确也是太不成了，因此在战争中间曾经吃过几次很大的亏。这一点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向敌人作全国规模的抗战之前，我们必得尽可能地做种种军事上和其他方面的准备。这是消极的一面。在积极方面，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他们为要保卫光荣的民主共和，为要使全国人民不做法西斯侵略者的奴才，他们在经济政策上尽量地给与人民以各种各样的优惠，以鼓励人民的勇气，使他们知道他们的奋勇作战，为的是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替人家去当炮灰。所以，如果我们说：在今天，西班牙人民之所以还能坚守着京城马德里，使德意侵略者不能为所欲为，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实行最适当的经济政策的话，那末我们也不妨说，明天我们中华民族一致对敌作战的胜利，也一定要由正确的经济政策来做坚实的保证的。

完成国防的经济任务

所以，我们今天单有救亡的热情是不够的，我们要预先估量到中国的对敌抗战将是一个长期的苦斗，在这时期，我们必须有坚实的相当有计划的建设。在今天我们不谈抗敌救亡的国防则已，如果要谈国防，那末我们就千万不能忽略了经济的国防，因为这是国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同样的，我们今天不谈国民经济建设则已，如果要谈经济建设，那末我们就绝对



不能忽视国防的经济建设，因为这是今天经济建设顶顶重要的任务。

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第一就是在抗敌的前提底下，完成适应国防需要的经济建设；换句话说，就是要完成国防的经济任务。我们在重工业的建设中主要的就是要开发各种军事的资源，和部份地创造军火的生产；在轻工业的生产中，就要完成战前和战时前线 and 后方人民生活资料的自给；在交通运输的建设中就要积极提高我们的运输效率，而在消极方面，就要排除敌人及其帮手的阻碍；在金融财政的建设中就要觅取货币流通更坚实的保证，和获得战时财政可靠的来源；在农业的建设中，就要保证粮食和原料的充分供给。脱离了这些而谈软性的国民经济建设，那一定是敌人经济的滋长，我国国民经济的崩溃和破灭。

二 巩固和扩大独立的民族经济

外资压迫民族经济

现在我们要说今天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二个基本任务。

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今天中国的主人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而是住在伦敦，纽约和东京的财主们。这些远在千里万里以外的财主，他们的一言一动，才能牵动我们的全身。也许说来不信，我们可以举个实例来证明。当前年伦敦的银行家愿意用改革中国币制来加强其对我金融财政上的统制的时候，我们各人袋里雪白的银元便着了慌，上海的市民就都不得不到银行里去换法币，苏州一带的渔民不得不用银元按照较低的价格向天主教神父去换法币，而四川的农民也不得不向小军阀们领换法币，使这些军阀大发其财。请你告诉我吧，全中国四万五千万



人民中间，有那一个逃得了那些伦敦绅士的作弄？

这还不算，今天日本的财主和军阀们却要教我们全中国人民都要直接受他们的指挥。他们要强夺我们的土地，使我们种田人没有田可种；他们要挤倒我们的工厂，使我们做工的人没有工可做；他们要占夺我们一切的资源 and 交通运输机关，使我们要失掉一切而替他们做牛马，当奴隶。这样，他们才算心满意足。而我们呢，到那时我们已经没有民族经济，只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经济了。

你如果以为今天我们还没有沦落到这般可悲的田地的话，那末请你记住下面的事实吧：

在今天，我们的金融财政，在华北的部份已经完全由日本方面控制，而在别的部份，就由英美的资本统治着。我们的重工业——主要是矿业，那差不多完全在日本人手里；我们的轻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缫丝业，火柴业等，不是被日本资本吞蚀，便是受日本生产的严重威胁。我们的交通和运输机关，在华北部份已经完全落在日人掌握之中，在华中和华南也差不多都在英德美几国手里。而我们古老的农业呢，也决不能过他“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淡漠生活，日本也已经用了“农业中国，工业日本”的政策，使它变成日本工厂的原料生产部门了。记得从前拿破仑一世的军队里面曾经通行着一条规律说，“你用被占领了的敌国的费用去生活吧，”这句话从今天战争技术的水准讲来，虽然已经是一句历史上的陈话，可是日本军阀们却偏偏要使他们兵士们用中国的资源来养活他们，同时进一步来侵略我们。

在这些悲惨的事实之前，也竟有些聪明人在做这样冷酷的打趣：他们以为中国经济的确比以前进步多了，封建的死水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暖流，冲洗得精光，我们只要问我们是不是过



的近代的经济生活，我们又何必管它是外国的资本主义，还是本国的资本主义呢？

表面上看来，国内愿意弄这样无情的打趣的人并不多，不过打开天窗说亮话，这类聪明人才不算少呢。有人常常以为帝国主义可以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生活，这些人的聪明程度不消说得是够得上面所说的标准的。此外，国内一大批抹杀了中国半殖民地的条件，开口闭口经济建设的人们，在他们的心头难道还有所谓帝国主义经济压倒民族经济，帝国主义主人压倒殖民地奴才的“野蛮行为？”

然而这种野蛮的行为毕竟是历史的事实，而且这种事实在这半世纪来，不仅有千千万万人身受过，而且有千千万万人曾经用血来洗刷过。

这个历史的事实在我们中国，无论是在正的方面，或是反的方面，都是逼迫我四万万人民必须另找途径的最有力的杠杆。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统治，在帝国主义方面确乎延长了它自身的生命，而对于我们中国，却像一条毒蛇围住了颈脖一样，使我们无从呼吸。具体说来，可以指出下面三点：

第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统治，主要的是斩断了我们民族经济的发展，它攫夺了我们的资源，侵占了我们的市场，最后还统制了我们的人力，这样使我们完全没有可能发展我们独立自主的经济，而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完完全全变成附属于国外金融寡头的奴隶生活。

第二，帝国主义斩断民族经济发展的生机，这并不是名义上的损失。我们知道，民族经济如果能够独立地发展，那末一切财富和利润，都不会流资别人的荷包里去。现在呢，中国人民所流的血汗却都转入伦敦，纽约和东京到本家的收入账上去了。



第三，帝国主义控制了我们的经济，同时也就控制了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南京和上海，往往会变成白宫，唐宁街尤其是霞关的支店。在这里我们特别应当指出的，帝国主义因为对于我们的财政，交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控制，他们就直接或间接控制了我们的国防，使我们在物质上完全解除了对外御侮的武装。比方说吧，煤铁石油都是重要的国防资源，而我们多数的矿藏却已经落在日本的手里；铁道是军事运输的利器，然而我们的铁道，东北固然不必说它，就是华北的铁道也已经受日人的控制，而华中和华南的也都在英国和德国资本手里。这样，对于我们的抗战，还不是加上一重致命的障碍？

发展民族经济是完成中国近代化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今天要进行国民经济的建设首先就要酌量目前国际的情形，考虑各国对我的关系，分别轻重，对于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加以适当的处理，而确保我们民族经济顺畅发展的前提。更具体点说，在今天中国的对外关系里面，我们应当没收至少是限制民族敌人在华的企业，使他们没有存在的余地；同时对于英美法诸国的企业，在平等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调置，使他们在消极方面不致大大妨碍我们民族企业的发展；在积极方面，甚至可以相当地有助于我们国防财政与国防经济的建设。

我们要用一切力量来培植，巩固和扩大民族经济；因为要使我们中国人有真正独立的主权，和政治文化生活，就必须先要具备独立的经济基础。而近代的民族经济——即近代化的工业和农业，才是我们的经济骨干，只有民族经济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虽然能够在我们的破旧的经济废墟上面，盖上一件近代的外衣，然而本质上只使我们过一种近代奴隶的生活，而没有给我们以近代的文



明。同样地，国内古老的地方经济也和近代的民族经济处于对垒的地位，那种封建和半封建的经济单位，它们在本质上是中世纪的遗物，而在我们中国就是几千年来农业社会生活的骨干。在今天呢，它们不但不能促成近代的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障碍了民族企业的独立的发展，间接做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附着点。

所以，我们规定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巩固和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没有民族经济就没有中国的国民经济，更没有国防经济。

三 建立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前进的工作

那末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的国民经济建设目的又在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呢？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经济生活的组成部份吧。你放眼看去，就可以看到除掉帝国主义的经济成份以外，中国的各个生产部门中，（尤其在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即农业部门中），自给自足的家长制的生产，和小的商品生产还占绝对的大多数；除此以外，便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在极少的场合，比方说吧，在交通运输矿业和金融的部门，我们还见到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踪迹。不过我们应当指明，在目前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份中，帝国主义的资本和它们间接的支配力量，显然是占着优势的。

一个国家只要还是农业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同时就经济的成份上讲，还是自足自给生产和小商品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那末它的经济发展的水准如果和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一定是差得很远。在这样的国家里面，资本主义生产就是



一种进步的经济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比起自足自给的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来，还前进的多呢。同时使自足自给的经济变成小商品的经济，使小商品的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过程，也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过程。

一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生活当然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列强资本的推动之下，中国自给自足的生产逐渐破坏了，它们有一部份变成小商品生产。这个过程虽然是惨酷，可是要算是进步的。在另一方面，自足自给经济和小生产的破坏，也造成了一些规模较大，气象较新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可是，这个过程在这世纪来，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内表现出一个“跳跃”以外，实际上就进行得很慢；相反的，帝国主义自身在中国的企业，无论在工业，金融业，交通运输等等方面，都发展得很快。这样，中国旧有经济的破坏，一面当然是列强经济势力的侵蚀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又变成了帝国主义经济在华发展的“垫脚板”，对于民族经济本身显然不但没有使它逐渐上进，反而使它平添了几重障碍。

因为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旧有的经济生活急速地崩溃了；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资本的箝制，中国进步的民族资本主义生产非但得不到顺畅的发展，反而做成了列强资本的牺牲。结果，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准也只能始终逗留在半野蛮的阶段，国民的生产事业，始终只能由原始的劳动支配着，而不能由钢铁的牛马来代替瘦坏了的肉体的牛马。

要中国成为一个真正近代的国家，要中国的人民真正能过一种近代的生活，而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的话，我们就必须使中国的经济推进一个阶段，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真正能够进步到“资本主义”的阶段。

然而在目前的状况之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却绝对没有发



展的可能。这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的资本在逐渐吞蚀我们的民族资本，在逐渐剥夺我们民族资本的出路。所以我们为了要保卫民族资本的发展就必须具有革命的民主政府来经营我们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效地排击一切外来的打击和压迫，适当地运用国际间各种有利的因素，来发展我们的民族经济。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由革命的民主政府所统制的经济体系，一个由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所推动所发展的民族资本经济体系。在目前，小数的私人经营，它们的命运只是帝国主义经营的买办的后备军，它们即使能够对于帝国主义的侵袭有所抵抗，它们抵抗的力量也是异常微弱的。我们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抵抗，这种强有力的经济抵抗，只有由一个为广大的各阶层的民众所拥护的革命民主政府所主办的国家经济体系，才能产生出来。

其次，国内相互隔离，甚至相互绝缘的地方经济，它们在政治上是割据局面和不能统一的基础，在经济上也是阻碍民族经济独立发展的一大因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无数自足自给生产变成小商品生产的过程。这种小规模经济的发展在本质上讲也就是小资产者的发展，换句话说，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在目前的环境之下，不仅异常遇缓，而且异常惨痛。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这种发展简直是使列强资本进一步无情宰割的预备的步骤。

我们必须排斥割据性的地方经济，这种经济是以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我们同时又必须排斥小商品生产的遇缓的发展，这种发展只能扩大帝国主义势力的“半径”，加深国内大众的苦痛。我们必须以强有力的统一的民主政府，建设全国性的经济，来消灭割据的地方经济；同时我们必须以同样有力的政府，建立巨大的国营经济和被集中了的私人经济，来抵制小经济的零零散散的发展。



所以，总结起来讲，我们对外因为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在今天，我们要消滅民族敌人在华的一切势力，我们必须以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建立巨大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国家强有力的统制力量，来抵抗帝国主义庞大的竞争和侵略力量。在另一方面，因为我们要使中国的经济向前推进一个阶段，因为要迅速而有力地削減割据性的地方经济，同时要減除小生产发展的迂迴的苦痛，我们也必须以集中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巨大的国家资本主义，以集中的经济解消分散的经济，以国营的大经济和集中了的合作经济，来减少私人经营的小经济。

所以，在中国这个历史阶段上，我们的国民经济建设必须以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的內容。

第一个疑问

一定有人要怀疑：目前资本主义不但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而且已经到了快要崩溃的阶段；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却欣向荣。那末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什么不走社会主义建设的路，而一定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呢？

这样的疑问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将怎样解答这疑问呢？我们说：第一，当然咯，如果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那末社会主义自然比国家资本主义前进一步，而且一个国家的建设也的确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纲领之下才能有真正的建设，才能有绝对有利于人民大众的建设。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人类才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现象，才没有人吃人的现象；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面，人类才有真正的平等，才能过真正‘人类的’生活；同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之中，人类的才能才有被充分运用和充分发展的机会，而全人类也就成为友谊的大家庭。所以如果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把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我们简直还不能说它们



之间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它们之间的距离应当还是天与地之间的距离啦。

人们能够具有高尚而合理的理想，这终是人们所以能够永远地高出於其他动物的地方。然而如果人们仅仅沈迷於理想，而不能计划和实行要实现这些理想的具体步骤，那便是天大的傻瓜了。

聪明而能干的中国人今天所碰到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要不要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很显然的。今天他们眼前的问题恰恰是：在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着着进攻之前，中国旧有的经济在破坏，新的独立的民族经济却不能发展，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一天天接近於名义上也快要变成奴隶和牛马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将怎样恢复我们生命的力量呢？我们将怎样完成我们独立的存在呢？我们将怎样免於沦为奴隶而死，而求得我们光荣的生存呢？或者更具体点说，我们将怎样维持我们抗敌战争中前方和后方的给养，前方和后方的运输，以及保证前方和后方军事上胜利的前途呢？

今天的问题是这么些噜苏而悲惨的问题，至於漂亮而舒服的社会主义问题呢，那还是明天的事情。如果人们能够跳开今天不过，而直接去过明天，如果中国人都能藏身‘桃花源’里，滑过了秦汉魏晋，那末请舒服地畅谈社会主义的建设吧。

要实实在在地过活，也只能这么实实在在地想，而且也只能这么实实在在地做。

我们有绝对的理由说：社会主义比国家资本主义进步；然而我们同样有绝对的理由，说：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比封建的或半封建经济和小商品生产也要进步。我们站在社会主义的前面，有这样的权利，说：资本主义是丑恶的东西；然而在封建经济和小商品生产不前，我们却只能说：资本主义或国家



资本主义比起你封建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来要‘美丽’得多呢。

上面已经说过，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自足自给经济和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只是说：社会主义应该是我们建设的目标，那不是一句大而无当的空话，便是一种过於急躁的主张，因为这样说法并没有指出从中国今天的经济结构到社会主义的结构之间到底要经过什么中间的连锁。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了解，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力量，使我们由家长制的经济和小商品的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我们必须在小生产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出一顶桥梁来。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运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使它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而使我们的经济生活，脱离半野蛮的散漫的水准进展到接近於近代的水准。

那末，我们对于刚才提起的疑问——中国为什么不走社会主义建设的路，而一定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的问题，大概可以这样解答了吧：是的，中国经济的建设最后终是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路，然而从今天到明天，我们必须有个过渡，必须由国家资本主义来做桥梁。我们瞧吧，在1921年的苏联，国民经济中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成份，然而在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却要求以国家资本主义来把落后的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在我们中国，更加需要找到一顶过渡的桥梁。

第二个疑问

其次，又有些人要怀疑：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没落的今天，决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因此你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决没有建立的可能。

这样的疑问也是非常有理的。我们将怎样解答这个疑问呢，我们说，是的，就全世界的范围而论，资本主义早已不是



历史的进步的因子，反之，它已经是历史发展的障碍物。单就这点来说，中国好像早该不问其可能不可能，就不要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是一个进步的东西，所以资本主义的本身尽管已经在崩溃，而在中国就其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资本主义还是应该发展的东西。

成为问题的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有没有可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我们的答覆是绝对没有的。中国要发展民族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要肃清一切封建残余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独立国家，首先就要和帝国主义斗争。

在这里，问题又变成中国是不是能够和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谁都知道，跟帝国主义斗争并不就是和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在我们方面也是尽可能地要避免战争，然而在某一个帝国主义逼迫得我们不能不以自卫的战争，以争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的时候，我们也不惜以战争相周旋。那么我们今天能不能以这样的斗争方式来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呢？百分之九十九的民众都会回答说：可能的，我们是可能的！

这样说来，我们和前此的土耳其一样，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是抗日的斗争开始而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不仅是完全可能，而且已经应当排在我们的日程上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面，我们就必须以强烈的国家统制力量完成生产力的相当於资本主义阶段的扩大过程；必须以强有力的国家资本主义建设，来加强我们以抗敌战事的力量。

这样我们对於上面的疑问，大概就可以这样解答了吧：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在崩溃了，然而在中国还算是进步的东西。中国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要想发展民族的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反之，假如中国能够以全民族的力量（资产者和无产者农民共同进行的）完成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那末自身的



资本主义就可能发展；而且为了保证上述斗争的彻底胜利，同时保证中国国民经济的容易进一步发展计，就必须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

第三个疑问

第三，一定又有人要怀疑：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如果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这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一定不见得有利的；因为既然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是操在资本家手里，那末资本主义的茶毒，怎样免得了呢？

这样的疑问的确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末我们怎样解释这个疑问呢？我们说，是的，照一般的说法，国家资本主义原来是什么东西呢？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运用国家的权力，统制全国的企业，来更有效地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谁要把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神化到像天堂一样，或描摹到像社会主义一样，那便犯了滔天的大罪。甲是甲，乙是乙，国家资本主义尽管是社会主义的前身，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准备阶段，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尽管已经没有什么中介的东西，然而国家资本主义决不就是社会主义，也决不等於社会主义。

三个不同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一个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们统治着的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巩固独占资本的基础，增厚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们的利益，加强对劳动大众的剥夺的制度。它决不会变成美丽的玫瑰花。

在一个工人统治着的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强烈的国家政权，利用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力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备，而在某种程度以内对于资本家给以局部和暂时的让步的制度。它不可能变成吃人的豺狼。

那末在一个革命的民主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怎样一



种制度呢？它只能是以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政权，迅速地肃清封建残余，有效地抵制外来的侵略，从而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的制度。它不可能马上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这还需要人民的奋斗，它也不可能成为只向资本‘施肥’，而不顾大众苦乐的制度，因为这里存在着大众的奋斗。

这样，我们对于上面的疑问就可以这样的解释了吧：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说法。这第一要看，这种制度究竟在怎样一个国家里面实行。在大资本统治的国家里实行呢，还是在劳动者统治的国家里实行？在前者，国家资本主义保障了资本的利益；在后者，它又保障了大众的利益。如果这种制度在一个革命的民主国家，在一个对外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对内肃清封建残余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实行的话，那末对于民族资本固然有很大的好处，对于人民大众也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这是无疑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在对外抗敌的前提底下，在民主的政治前提底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人民大众的生活一定有些改善的。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一切本质的弊害，然而我们却可以由此而使中国的经济推进到更高的阶段。让我们重覆说一下吧，这种推进的工作，仍然需要人民的奋斗；这种推进过程的长，短，快，慢，仍然要看人民大众的奋斗的程度来决定。

让我们把解释疑问的工作告一个结束，我们来研究在我们中国要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应当怎样实现的具体方法。

在中国，我们至少要用下面几种方式，实现有战斗性的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

第一，**国有国营** 像一切重工业，尤其是军需工业以及重要金融机关的国营。在轻工业部门中，关于粮食的生产和改



制，都须改为国营。其他像铁道，航运，航空和一切交通工具的国营。

第二，国有民营 在农业生产中，我们必须有急剧的变革。我们要使全国土地化为国有，然后分给农民耕种。这是肃清一切封建残余的彻底办法。

第三，私有经济的合作经营 由於国家的干涉和督促，大部份的小商品生产者都加入合作的组织。这种经营可以说是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形式。这种合作的形式比较一般私营经济容易受国家的统制，因此它是接近於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形式。同时这种经营形式可能包括多数私人的经营，因此它對於经济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显然有很大的利益。

第四，国有经济的租让经营 国家把一部份资源租让给本国的资本家或外国的资本家经营。我们因为生产工具和运输机器的不足，可以把部份的企业，渔区，矿山，和森林等等租让给人家经营，以扩大我们的生产力。在这种形式中间，我们当然有不少的牺牲，我们必须以高额的利润支付给外国资本家。然而我们也只有这样才可以从他们身上取得工业生产物，机器以及近代的技术。

第二节 经济建设的政治前提

问题的提出

我们在前节讲过，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如果要想完成应於适国防需要的各项建设，那末那种建设就必须以抗敌为前提，政府必须坚决执行抗敌御侮的政策，否则国防建设不是一句空话，便是不为自己，而为人家的建设。同时我们已经指明，我



们要巩固和扩大独立的民族经济，要建立能够扩大民族生产力，有利於人民大众的国家资本主义，那首先就要执行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政策，必须采取革命的民主制度，要不然，独立的民族经济非但无法巩固和扩大，‘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非但无从建立和发展，相反的，中国的经济命脉便完完全全操在帝国主义手里，中国将很快地沦为某个或是某几个帝国主义十十足的殖民地。

因此一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於经济建设的本身，而是在於经济建设的政治的前提。——我们在军事和政治上还是要维持原状呢？还是不，我们对民族敌人要采取坚决抵御的政策？对内要采取民族共和，人民民主的政策？问题的关键在这儿，中国的前途也是由于这些来决定。

建设决不能离开政策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那些脱离了国家的整个政策，而侈谈经济建设的主张。这些主张当它们存在於纸面上的时候，我们说它们是学究的游戏已经够了，如果真的实行起来，那末就是‘无以厚我，反以资敌’的计划，也就是危害民族国家的计划。我们必须郑重地申明，在国家没有确定的新的政策之前，适应於中日经济提携的国民经济建设，就是便利於日本对我侵略的建设；适应於英美对华政策和国联技术合作的国民经济建设，就是纯粹替欧美资本家争取利润的建设；适应於‘防共’和‘以建设求统一’的国民经济建设也不过是‘劳民伤财’‘撑撑面子’的建设而已。

我们今天所要的建设决不是浮夸炫耀，而是朴素坚实的，决不是迅速完成，而是坚苦缔造的，决不是顺利进行，而是需要战斗的一种建设。国民经济建设是一种奋斗的过程，是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独立的生活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中间一个重要的



部份。谁要把国民经济的建设从中国人民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奋斗中孤立起来，谁要把经济建设只看做机器和技术家的总和，而把政治的因素硬生生地撇开不管，谁就是把中国的经济建设去了势，把中国的经济命脉斩断了，出卖了！

我们认为中国如果要有真正的国民经济建设，而且那种经济建设要能真正完成上节所说的任务的话，那末必须具备下列几种政治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抗敌

第一，国家必须坚决采取抗敌的政策，必须按照一定的计划与步骤，收复已失的领土，资源和主权。

这个政治的前提在经济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它的经济意义是这样的：国家应当收回一切已经丧失，或者名义上还算保存而实际上已经丧失的土地，（农业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人民，（劳动力），资源，交通运输工具，其他财富和市场；收回来作为民族经济的资产（assets），作为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的条件；而在另一方面，恰恰在经济上，而且在经济的主要命脉上，打中了民族敌人的咽喉。收回我们海关自主权，绝对禁止敌人的走私，这样可以有力地保卫我们的民族企业，而使敌人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阴谋完全破产。我们还必须无条件地抵制敌人的一切商品，这在经济上就可以部份地制敌人於死命，同时大大地发展我们民族企业所有产品的国内市场。——因为日本的制品多半和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是属于同一类别的。

这个政治的前提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有的，它最严重的意义是这样：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强的抗敌政策，那末我们一切的建设都是为了敌人而建设，过去东北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建设，华北在交通和农业上的建设，到现在已经谁都清楚，它们早已落到敌人的手里，变成了对我民



族经济积极进攻的利器了。这种惨痛的经验还不够惊醒主张‘埋头’建设的朋友吗？好吧，当你有一天把你久久‘埋’在泥堆里的头伸出来见见世面的时候，你却‘连人带马’，跟着‘葫芦岛’一起掉在敌人手里了。

只有坚强的抗敌政策，才有可能保证我们一切建设的成功是我们自己的成功，一切建设的胜利是我们自己的胜利；而且也只有这样的政策，才有可能使得一切愿意埋头建设的朋友，不致把头‘埋’到别人怀里去。

第二个前提——联合友邦

第二，国家必须坚决地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联合友邦的政策，调整我们同它们的邦交，更进一步决定它们与我们的敌人的邦交。

这个政治的前提在经济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它的经济意义是这样的，国家应当认识自身的优点和缺点，认识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决不是机械地采取战争的方式，认识中国本身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资金的缺乏，我们必须在某种限度以内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国外的资本。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革命的民族独立的立场，跟英国，美国，法国，苏联以及一切除了我们的敌人和敌人直接的帮手的国家，建立平等的友谊的关系，借用它们的技术和资本，以扩大我们的生产力量，巩固我们在战时的财政和金融。我们可以运用借款甚至租让的形式，虽然我们在这些形式中间，我们会遭受一部份的牺牲；不过我们为了增加生产力，为了学习技术，为了改善我们的经济组织，就不得不向人家纳些贡物。

除此以外，这种政治的前提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有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适应於国防和抗敌战事的进行。我们为了要保证我们有充分的军火，有充分的接济，保证我们在战



时有比较健全和巩固的财政机构和金融组织，我们能够缺少国外的帮助吗？绝对不能的。不能，就得从一部份友邦方面想办法。而在目前的国防情势之下，尽管各国对我的关系可能有程度上的不同，而这种办法大致上是可能的。然而这种可能也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奋斗来争取，来实现的。

从1931年日本积极向我们进攻以后，远东的国际关系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了。尤其是到最近，英美对于日本的态度，已经从原来的观望和求取妥协的态度，一变而为积极干涉和阻止的态度。就在这种国际关系的转变里面，就产生了种种可能，使我们中国能够跟英美等国采取比较平等的态度来帮助我们的经济建设，而共同对付一个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第三个前提——民主政治

第三，国家应当是一个真正近代的国家，应当实行高度的有革命性的民主政治，政府应当是代表整个民族利益，而相当地代表国内各等级人民利益的政府。在这里应当有一个正式的代议机关，由国内各等级的人们推选真正的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大计，全国完全统一，没有封建的割据，也没有特殊的畸形组织，中央政府是一个集中的团结各方实力的中央政府，它的政令能够在事实上普及全国。

这个政治的前提在经济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它的经济意义是这样的：只有一个革命的民主政权，对外才能排除帝国主义的压迫，保障民族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内呢，只有这样的一个政权才算得上是一个近代的政权，也只有这样的政权才有充分的力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才能统制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同时也只有在这样的政权之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才能不致只是代表资本和地主的利益，而对于劳动大众完全没有利益可言。



一般讲来，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胜利只能结束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的任务，然而在今天的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恰恰是一种最有力的保障，这种保障可能保证中国民族解放的彻底胜利，同时可能保证我们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建设。这是积极的一面。在消极方面，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可能排斥一切法西斯侵略者的力量，尤其是排斥日本军人法西斯对我的无耻进攻，而保障我们经济生活的完整和安全。

除此以外，这种政治的前提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有的，谁都知道，一个革命的民主政权，在它所具有的力量上要比原有的政权大过好多倍，因为这样的政权必然地会得到全民族的拥护，由各个等级的人民为后盾。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动员整个民族和我们的敌人作战，动员各等级的人民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你能想像在一个脆弱的政府之前，国外的侵略力量便能‘退避三舍’吗？你能想像民族的敌人在一个只为少数人所支持的政权之前，能够不进一步向我们进攻吗？这些事情我们是不能想像的。所以只有这样一个民主的政权，才能保证抗敌政策的坚决履行，也只有这样一个政权，才能使我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各个友邦建立友谊的关系，而获得它们对于我们经济建设的真正的帮助。所以，发展革命的民主政治，应当是一切政治前提的前提。没有这样的基本条件，我们便什么都无从做起。

而且最重要的，民主的政治固然可以保障胜利的国民经济建设；同时在这种政治之下，尤其是在全国各等级人民一致对外抗战的情形之下，我们的经济建设恰巧还能完成一种最神圣的使命，它能使各等级人民在政治上的联盟，进展而成为经济上的联盟，而使民主政治的基础更加巩固，更加向前推进。

第四个前提——内战绝迹



第四，国家应当使各种各样的内战完全绝迹。

这样的政治前提对於国家的经济建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不论今天国内的内战具有何种性质，它们都能使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大大地耗损。我们的生产给内战大大地破坏了，我们的劳动力给内战大大地毁灭了，我们的财富给内战大大地吞噬了，而我们一切生产，交通和商务的机关都给内战毁损了。这样我们就只有国民经济加速度的破坏，我们还能谈得到经济建设吗？内战只能加速我们国民经济的崩坏，只能毁坏我们的生产力，这终是谁都明白的事吧。

那末，停止内战在国民经济的建设上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呢？有的，谁都知道，今天我们民族敌人的阴谋就是要加甚我们的内战，促成我们的内战；这样才可以‘兵不血刃’，而收‘以华灭华’之效。所以，我们的内战一天不能绝迹，那末敌人的阴谋就有一天酝酿和完成的机会。今天我们全中国的人民在要求统一救国，而敌人却在迫令我们分裂亡国。今天我们全中国的人民都在要求停止内战，保障不再内战，实现和平统一，而敌人却在鼓动我们的内战，加甚我们的四分五裂。所以，我们在内战的问题上，就处在和敌人正相对垒的地位。我们的内战如果能够消灭，那末我们的国力就能大大地充实起来，这样我们来制裁敌人的侵略，彻底执行我们的抗敌政策，才有充分的可能。也只有这样，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上述几种政治前提，才有可能实现。

第三节 各部门的经济建设

各部门经济建设的原则

在第一节里我们已经研究过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第一是



要在经济上完成我们国防的任务；第二要巩固和扩大独立的民族经济；第三是要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在第二节里，我们又研究了要进行这种国民经济建设，必须具备那些对内和对外的政治前提。

在本节里面，我们却要研究经济建设的方案本身了。首先我们要了解在进行各部门经济的建设的时候，我们必须遵守那几个原则？

我们以为中国在这一阶段上的经济建设，必须遵守下面四个原则：

第一，特别用力量去发展有关国防的企业部门，如军火工业，重工业，运输业，战时金融，以及粮食的生产等等，在贸易上也完全以保证国防的加强为原则。

第二，尽量发展民族的企业，在消极方面，我们必须没收或限制敌人的企业，同时对于其他列强的企业，也一定要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调整。

第三，一切重要的生产事业和其他企业，特别是有国防的企业，必须完全国营。

第四，一切小的生产事业和其他企业，应当由政府的力量，使他们尽量地集中起来，完成它们之间的合作组织，这些组织可以看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变相的组织。根据上述几个原则，我们建议中国各部门经济建设应当采取下述的政策。

工业政策

如果今天还有人来提出这样的问题：国民经济的建设究竟应当采取重农政策呢？还是采取重工政策？那末常识将会坦白地告诉他，假如我们的经济建设的确要使我们脱离中世纪的生活，而有一种近代的文明的生活，那末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在工业，尤其是在重工业。所谓重农政策和“以农立国”也者，



早已应该变成历史上的标语了。然而如果有人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发展经济的关键既然是在工业，那末农业方面大概可以置之不理了吧？显然的，这又是一种偏颇的说法，我们说，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工业，是要说明整个国民经济的近代化（农业也在里边）完完全全建筑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面，而并不是说除了工业以外什么都不要建设，恰恰相反，我们在国防的任务高于一切的今天，有关国防的工业固然要给以最大的注意，对于前线 and 后方有密切关系的粮食问题原料问题，又都非致力于农业的改进不可。特别是农村社会关系的相当改善和对于农民生活给以一定限度的保障这一点，对于中国的自卫战争，尤其有决定的意义。所以我们绝对反对那种只管发展工业，不管改良农业的办法。

我们要以发展工业为建设国民经济的枢纽，为巩固国防的关键；因此我们在研究工业建设政策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工业对于国际和整个经济建设的关联。

在目前的阶段上，中国的工业建设应当遵守下列几个原则：

一、凡是已经落在敌人手里的军需企业，重工业的企业和资源，以及和军事密切有关的粮食纺织工业，必须一律无条件地没收；

二、对于其他友邦在华的工业投资和企业，必须妥为保护；不过我们又必须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对市场条件，纳税及其他有关国家利权的方面，重新加以调整。

三、一切军需工业，重工业和粮食生产事业，必须全部由国家经营；由强有力的国家统制力量，作相当有计划的扩展。

四、轻工业方面的各种企业，应当经过国家的统制完成若干集中的组织，小企业应当尽量参加生产的合作组织。



根据上述各项原则，我们对于工业建设的具体方案可以举例如下：

A 重工业

一、燃料生产 煤油和煤炭是近代工业之母，对于国防愈加重要。辽宁，热河，吉林，黑龙江四省所藏的煤油占全国藏油总量百分之七十以上，这种重要的资源必须全部收回。目前国内煤油的产量每年不过二三千桶，和我们目前的需要量相差到千倍以上。近年来每年煤油进口额有四万万到五万万公斤，汽油石脑油等进口额有一万五千万公升左右。我们在东北未收回以前，政府必须从速开采陕西，四川，广东，湖南等省的油矿。同时我们对于汽油的生产应当非常注意，因为国防航空及陆地军运对此都有极大的需要。举例来说，在广东我们必须扩充从页岩油提炼石油的生产；在陕西云南，山西等省要多多用低温乾溜法，提炼飞机用的汽油。

在煤业方面，我们东北四省的煤炭藏量至少要占全国藏量的百分之十八；同时中日合资办理的煤矿，其投资额数占全国煤矿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这种生产实际上完全由日方把住看。我们对于东北已失的资源和中日合资办理的煤矿，必须全部无条件地收回。

在目前中国煤炭的生产和消产相差得还不很远。比方在一九三五年中国煤的进口总额为一百万公吨，而出口数量也有八十万公吨。不过在加紧建设，特别在战事发生的时候，那目前的煤炭生产实在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对于煤炭的生产必须有大量的投资，有一部份不妨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英美等国合资经营。

在这里我们应当重覆说明，我们的经济建设本身就必须是一种奋斗，而且必须是中华民族为独立为解放而进行的伟大奋



斗的一部份。譬如说吧，我们在东北已失去的煤油煤炭资源，我们是必须加以收回的，这一点就说明了经济建设本身战斗的任务，说明了经济建设和自卫战争的关联，更具体点说，这又说明了下面一个重要的命题：今天的国民经济是要巩固国防，而国防战争的胜利，又是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胜利的前提。

二、钢铁生产

钢铁和煤炭一样是制造武器的顶重要的根源，近代的战争如果没有了钢铁，就变成了猴子的打架，同样的，钢铁又是近代工业主要的推动因素，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也就是钢铁和利润的一部合奏曲。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在帝国主义时代，钢铁的生产更加突飞猛进，从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二九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钢的生产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

中国有钢铁生产吗？有的，这正像问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一样，中国的确有些资本主义的气息，然而这种气息很淡很少，而且还带着极浓的“洋气”反过来说，又带着极浓的“奴才气”。你看，中国的铁矿藏量照已有的估计标准说，不过有十一亿三千吨；而辽宁和察哈尔两省所藏的铁矿已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些资源现在已经完全在敌人手里。同时长江一带的铁砂，也因为和日本订有长期售砂合同的关系，卖给日本的又有二千万吨之多。再就铁矿的生产来看，铁矿的产量跟日本资本有关或竟完全落在日人手里的已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有湖北的象鼻山和安徽的宝兴两处矿区还算纯粹由华资经营，然而每年产量只有三十万吨左右，占全国铁矿产量的百分之十三。

所以钢铁生产如果要想改进，第一步当然就要把已失的一切资源完全收回；把已经落在日人手里的企业和与日资有关（实际上是由日资支配）的企业完全收归自办；把长期出售矿